

苏联历史
档案选编

—— 第 9 卷 ——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第 9 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郑异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沈志华执行总主编;郑异凡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

(内部发行)

ISBN 7-80149-634-5

I. 苏… II. ①沈… ②郑… III. 历史档案-档案资料-汇编-苏联-现代 IV. 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5922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9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郑异凡

责任编辑: 章若男 刘仲亨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本《选编》正文用纸由山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提供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476 千字

版 次: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634-5/K·086 全套定价: 4000.00 元

内部发行 不得公开引用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任：王忍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主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明* 于沛 王正 石泽

叶军 叶书宗* 刘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一 姚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书：方琼

编务：罗淑娴 闻静 胡甫强 宗静

注：*为分卷主编。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共3个专题。

“关于‘托季联盟’（一）”：1923年3月列宁最后病倒，彻底退出了政治生活。俄共内部开始了越演越烈的党内斗争。1923～1924年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1925年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或称“列宁格勒反对派”。1926年，先后遭到失败的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开始谋求联合，他们组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托季联盟”，在理论、政治、经济政策，直到世界革命方针（特别是处理英国矿工罢工和中国革命的方针）等各个方面提出与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不同的观点主张，他们要求实行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加速工业的发展，反对美化新经济政策，要求开展反对城乡资本主义的斗争；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世界革命的方针，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反对派同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本卷发表的是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的文献，主要是反对派一方的文献，这一时期正是“托季联盟”成立并开展活动的时期，他们在各种场合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政策方针。这些文献是过去国内不多见的。

本卷的另两个专题“新经济政策下的城乡‘结合’”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通过群众（主要是农民）来信展示

了当时普通百姓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看法、感受和意见。这对我们理解苏联 20 年代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都有参考价值。

郑异凡

2000 年 7 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9-1

关于“托季联盟”（一）

（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

专题说明 9-1

№07932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避免争论致斯大林并转
全体政治局委员（1926年7月13日） 9-3

№07933 梅德维捷夫就党内右倾危险问题致联共（布）
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体委员
（1926年7月17日） 9-5

№07934 托洛茨基等13人致中央七月联席全会
（1926年7月） 9-7

№07935 我们为什么投票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同志
就苏维埃改选问题提出的决议案
（1926年7月） 9-26

№07936 关于拉舍维奇等同志的事件的决议草案
（1926年7月） 9-32

№07937 托洛茨基：谈谈施米特同志关于工资的建议
（1926年7月） 9-37

- №07938**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
(1926年8月) 9-41
- №07939**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委员
(1926年8月13日) 9-44
- №07940** 反对派声明
(1926年8月13日) 9-47
- №07941** 拉狄克：关于反对派
(1926年8月) 9-50
- №07942** 托洛茨基给一名匿名共产党员的信
(1926年8月25日) 9-70
- №07943** 托洛茨基给拉狄克的信
(1926年8月30日) 9-73
- №07944** 托洛茨基答B. 尼基京问
(1926年9月5日) 9-75
- №07945** 托洛茨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926年9月7日) 9-78
- №07946** 托洛茨基的便条
(1926年9月19日) 9-83
- №07947** 托洛茨基：三个标准
(1926年9月) 9-84
- №07948** 托洛茨基：供宣传用的问题与答复
(1926年9月) 9-85
- №07949** 托洛茨基给一位不知名的收信人的信
(1926年9月21日) 9-99
- №07950** 托洛茨基：论党的统一
(1926年9月) 9-101
- №07951** 托洛茨基：就反对派问题答同志们问
(1926年9月) 9-107

- №07952** 托洛茨基：关于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
(1926年9月) 9-109
- №07954** 声 明 (1926年10月16日) 9-135
- №07955** 托洛茨基：关于政治局的决定
(1926年10月16日) 9-136
- №07956** 托洛茨基：是否需要争论？
(1926年10月) 9-139
- №07957** 托洛茨基：对我国革命的评价及农民问题
(1926年10月29日) 9-143
- №07958** 托洛茨基：答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指责
(1926年10月29日) 9-147
- №07959**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农业和农民
(1926年11月) 9-153
- №07960** 皮达可夫：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草案
(1926年11月) 9-155
- №07961** 皮达可夫：对李可夫同志“关于经济状况”
提纲的修改意见 (1926年11月) 9-161
- №07962** 克尔纳给托洛茨基的信
(1926年12月6日) 9-167
- №07963** 克尔纳：论一国社会主义
(1926年12月初) 9-169
- №07964**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会议上的
发言摘录 (1926年12月9日) 9-179
- №07965** 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
(1926年12月12日) 9-181
- №07966** 托洛茨基：反对派声明
(1926年12月13日) 9-189

- No07967** 托洛茨基：札记（1926年12月）…………… 9-192
- No07968** 季诺维也夫：声明（1926年12月中）…………… 9-193
- No07969** 季诺维也夫等三人致共产国际第七次
扩大全会主席团（1926年12月14日）…………… 9-197
- No07970** 季诺维也夫：国际局势恶化下苏联对外政策的
任务（草案）（1927年1月）…………… 9-202
- No07971**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1月6日）…………… 9-205
- No07972** 季诺维也夫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1月）…………… 9-207
- No07973** 托洛茨基：关于《列·托洛茨基全集》第14卷
第1册前言（1927年1月8日）…………… 9-209
- No07974** 艾森贝格的便条和托洛茨基的批语
（1927年1月13日）…………… 9-211
- No18174** 托洛茨基：对文章的几点说明
（1927年1月14日）…………… 9-213
- No07975** 托洛茨基：对外政策的提纲
（1927年1月15日）…………… 9-215
- No07976**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
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
（1927年1月26日）…………… 9-218
- No07977** 索恩采夫：当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基础
（不晚于1927年1月28日）…………… 9-220
- No07978** 托洛茨基致索恩采夫
（1927年1月28日）…………… 9-227
- No07979** 弗·米·斯米尔诺夫：联共（布）中央全会总结
基本建设投资（1927年2月）…………… 9-230

- No07980** 托洛茨基：致卡普林斯基同志
(1927年2月2日) 9-238
- No07981**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7年2月7日) 9-239
- No07982** 托洛茨基就注文问题致巴甫洛夫
(1927年2月15日) 9-242
- No07979**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
主席团(1927年2月16日) 9-243
- No07984** 托洛茨基：关于注释
(1927年2月16日) 9-245
- No07985**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
(1927年2月21日) 9-247
- No07986** 托洛茨基就派遣皮达可夫出国问题致
奥尔忠尼启则(1927年2月21日) 9-252
- No07987**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雅罗斯拉夫斯基
(1927年2月22日) 9-253
- No07988** 季诺维也夫致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3日) 9-258
- No07989** 托洛茨基：札记
(1927年2月26日) 9-259
- No07990** 托洛茨基致萨普龙诺夫
(1927年3月2日) 9-261
- No07993** 奥尔忠尼启则就皮达可夫出国事致托洛茨基
(1927年3月11日) 9-262
- No07994** 托洛茨基就哈萨克问题致索柯里尼柯夫
(1927年3月11日) 9-264
- No07995** 托洛茨基：哈萨克斯坦政策中的民族因素
(不晚于1927年3月11日) 9-265

- №07996** 托洛茨基就皮达可夫出国事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7年3月18日) 9-268
- №07998** 托洛茨基：我们能取得经济独立吗？
(1927年3月19~27日) 9-270
- №08000** 托洛茨基：不肖徒辈
(1927年3月) 9-283
- №08001** 斯米尔诺夫：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总结
关于价格政策问题（1927年3月底） 9-285
- №08003** 托洛茨基：德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问题
(1927年4月2日) 9-297
- №08004** 季诺维也夫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1927年4月) 9-306
- №08005** 托洛茨基：关于农业任务的提纲
(1927年4月11日) 9-310
- №08006** 托洛茨基就速记记录事致托夫斯图哈
(1927年4月14日) 9-314
- №08007** 托洛茨基：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
(1927年4月15日) 9-315
- №08008** 托洛茨基：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提纲
(1927年4月15日) 9-319
- №08009** 托洛茨基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决议草案
(1927年4月16日) 9-324
- №08011** 托洛茨基致中央书记处
(1927年4月18日) 9-328
- №08012** 托洛茨基：关于对外政策的提纲
(1927年4月19日) 9-331
- №09425** 托洛茨基：不要倾倒垃圾！
(1927年4月21日) 9-333
- №09426** 托洛茨基：提交瓦尔金的意见
(1927年4月26日) 9-339

- №09427** 斯米尔诺夫：谁在说“高烧胡话”
(1927年4月) 9-341
- №09428**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通过决议后
发表的声明(1927年5月初) 9-370
- №09429** 格季耶就治病问题致托洛茨卡娅
(1927年5月4日) 9-374
- №09430**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1927年5月16日) 9-376
- №09431** 托洛茨基：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
(1927年5月16日) 9-381
- №09433** 托洛茨基就提纲事致皮亚特尼茨基
(1927年5月18日) 9-395
- №09434** 托洛茨基就提纲问题致中央书记处
(1927年5月18日) 9-396
- №09435** 托洛茨基就提交提纲致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委
主席团(1927年5月18日) 9-397
- №09436**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1927年5月25日) 9-398
- №09437** 叶夫多基莫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5月25日) 9-412
- №09439** 拉狄克：热月危险和反对派
(1927年6月) 9-414
- №09440** 八十三人声明和我们的任务
(1927年6月) 9-423
- №09441** 托洛茨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两次发言
(1927年6月) 9-430

- №09442** 托洛茨基就发言稿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1927年6月4日) 9-484
- №09443** 托洛茨基就发言稿的引用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主席团(1927年6月9日) 9-485
- №09444** 托洛茨基:一个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决议
(1927年6月) 9-487
- №09445** 托洛茨基的声明(1927年6月) 9-488
- №09448** 托洛茨基的札记(1927年6月25日) 9-490
- №09449** 给联共(布)中央全体中央委员的信
(1927年6月27日) 9-493
- №09451** 托洛茨基和叶夫多基莫夫的声明
(1927年6月28日) 9-497
- №09452** 季诺维也夫就声明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便条
(1927年6月28日) 9-507
- №09453** 托洛茨基就社论给季诺维也夫的便条
(1927年6月28日) 9-508
- №09454** 托洛茨基就准备开除反对派一事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7年6月28日) 9-509
- №09455** 托洛茨基就发言记录问题致中央监察委员会
秘书处(1927年6月29日) 9-511

新经济政策下的城乡“结合”

(1924年4月至1928年8月)

- 专题说明** 9-512
- №11127** 杰米多夫就农村生活改善给《农民报》的信
(1924年4月2日) 9-513

- №11128** 比留科夫：首长帮助农村
(1924年5月20日) 9-514
- №11129** 莫罗佐夫就农民地位给《农民报》的信
(1924年6月) 9-515
- №11130** 凯楚涅耶夫就城乡结合给《农民报》编辑部的信
(1924年11月10日) 9-517
- №07303** 扎洛莫夫致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信
(摘录)(1924年12月18日) 9-519
- №11131** 叶西波夫：我们的首长是怎样工作的
(1924年12月27日) 9-521
- №11132** 巴任就农村状况给《农民报》的信
(1925年6月13日) 9-523
- №11133** 雅罗沃依关于粗暴对待农民的报道
(1925年6月27日) 9-526
- №07305** Л.Н. 加里宁致维·米·莫洛托夫(摘录)
(1925年11月14日) 9-527
- №11134** 斯季哈辽夫就农村状况给《农民报》的信
(1925年) 9-529
- №11135** 农妇马秀拉就无产阶级专政给《农民报》的信
(1925年) 9-531
- №11136** 戈戈伊关于工农关系的提问
(1926年6月13日) 9-533
- №07306** 捷尔任斯基就管理体制问题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负责工作人员的信(摘录)
(1926年7月1日) 9-535
- №07304** 扎波罗热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摘录)
(1926年8月30日) 9-537

- №11137** 齐布特金：亲娘生的和后娘养的
(1927年3月12日) 9-538
- №11138** 鲁索夫就苏维埃职员问题给加里宁的信
(1927年3月30日) 9-540
- №11139** 什巴金就农民的状况致《农民报》的信
(1927年10月14日) 9-542
- №11140** 什克里诺夫就农民负担给《农民报》的信
(1928年1月4日) 9-543
- №11141** 一个贫农给《农民报》的信
(1928年1月27日) 9-545
- №11142** 谢奇科就发展公共经济给《汽笛报》的信
(1928年7月14日) 9-547
- №11143** 乌克兰农民 C. M. 就中农地位给《农民报》的信
(1928年8月11日) 9-549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

(1923年5月至1927年11月)

- 专题说明** 9-552
- №11144** 拉祖莫夫给《农民报》的信
(不早于1923年5月) 9-553
- №11145** 细木工联合会克列敏费格区委会全体委员为新生儿命名大会记录(1924年1月20日) 9-554
- №11146** 伊捷尔斯基就其弟上学问题给《农民报》的信
(1924年2月10日) 9-557

- №11147** 切尔诺伊万诺夫就富农逞凶给《农民报》的信
(不早于1924年5月1日) 9-559
- №11148** 女农民诺维科娃的入党申请书
(1924年10月28日) 9-561
- №11149** 加宁就命名会给《农民报》的信
(1924年11月25日) 9-563
- №11150** 洛巴诺夫就青年生活给《农民报》的信
(1925年2月18日) 9-565
- №11151** 红军战士奥尔洛夫斯基的申请书
(1925年3月6日) 9-566
- №11152** 普里瓦洛夫给《农民报》的信
(1925年3月7日) 9-567
- №11153** 冈恰连科就离婚问题给《农民报》的信
(1925年3月25日) 9-570
- №11875** 扎伊采夫就尼科利斯克事件给《农民报》的信
(1925年4月7日) 9-572
- №11154** 古采夫: 坚冰已被打破
(1925年4月15日) 9-573
- №11155** 康达柯夫: 我在农村所看到和听到的
(1925年夏) 9-575
- №11156** 博勃科夫给《农民报》的信
(1925年8月18日) 9-577
- №11157** 纳乌莫夫为《男人心灵的哀号》一文给《农民报》
的信(不早于1925年12月8日) 9-578
- №11158** 科尔多绍娃就农村旧习俗给《农民报》的信
(1926年3月31日) 9-580
- №11159** 德维亚科就妇女地位致《农民报》的信
(1926年4月3日) 9-581

- №11160** 波里舒克就婚姻问题给《农民报》的信
(1926年4月3日) 9-582
- №11161** 塔林斯基就入团问题给斯大林的信
(1926年7月17日) 9-583
- №11162** 科洛索夫斯基就托儿所问题给《农民报》的信
(1926年7月30日) 9-586
- №11163** 普柳斯尼娜: 塞尼金托儿所的印象
(不早于1926年8月28日) 9-588
- №11164** 霍赫洛夫: “不需要托儿所”
(1926年10月18日) 9-590
- №11165** 波达波夫就妇女解放问题给《农民报》的信
(1926年11月22日) 9-592
- №11166** 库兹米奇就使用乌克兰语给《农民报》的信
(1927年2月15日) 9-594
- №11167** 库戈列夫就社会秩序问题给《农民报》的信
(1927年2月22日) 9-596
- №11168** 工人杜罗夫采夫就社会秩序问题给《农民报》的信
(1927年9月24日) 9-598
- №11169** 科兹洛夫就阅览室的作用给《农民报》的信
(1927年11月10日) 9-600
- №11170** 梅里尼柯夫给《农民报》的信(摘录)
(1927年11月27日) 9-603
- №11171** 莫斯科军事检察院关于两名红军战士酗酒所作的
初步调查(1927年) 9-604
- №11172** 普霍夫就儿童教育给《农民报》的信
(约于1927年) 9-605

【专题说明】

关于“托季联盟”（一）

（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

本专题收入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一年间的有关“托季联盟”的文献。这正是联共（布）党内斗争进入最紧张的时期。自列宁逝世之后，党内先后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两派领袖之间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到1926年春夏两派捐弃前嫌开始联合，最后结成了“托季联盟”，或称“联合反对派”。他们于1926年7月提出《十三人宣言》，次年5月发表《八十四人宣言》，6月发表《十五人政纲》，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政见和对斯大林为首的中央的批评。相应地，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则先后采取组织纪律措施，以俄共十大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为武器，把有关人员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以至开除出党。1926年7月中央联席全会决定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0月中央联席全会又决定撤销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同时决定解除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同年10月和11月先后召开的联共第15次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反对派联盟的问题。1927年11月中央联席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对这些措施，反对派领袖都有回应，但无济于事。关于托季联盟的纲领主张，过

去能看到的资料不多，他们的许多观点经过有关部门的加工、修改，已经被弄的面目全非了。本专题提供了大量国内过去不易看到的文件资料。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赵国顺、侯静娜、门三姗、李京洲、
翟民刚、韦清豪、王丽华、项国兰、韩英、刘燕明、屈洪等）

№07932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避免争论 致斯大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①

（1926年7月13日）

明天就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议题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些尖锐问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以及将要作出的决议定会对党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毋庸置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一定要全力避免在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采取有可能削弱党的步骤。迄今为止，所有的正式声明都谈到了必须避免党内争论。然而，已经确定于今、明两天在莫斯科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和各支部会议，为的是尽快就应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解决的问题作出决议。有理由担心，莫斯科党组织书记乌格拉诺夫^②同志的这一举动将使中央委员会面临一场实际上已从上层开始的单方面争论。

因为我们深信争论会给党带来极大危害，所以我们认为必须提醒政治局对这一情况加以注意。

① 文件左上角有托洛茨基的附笔：“看来为季诺维也夫所写”

② 乌格拉诺夫，尼·亚·（1886～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先后任彼得格勒省委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书记，1924～1928年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任中央书记。

格·季诺维也夫^①

列·托洛茨基^②

1926年7月13日

-
- ① 季诺维也夫，格·叶·（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25年是“新反对派”的组织者之一，1926年是托季联盟的组织者之一。1936年被处死。后平反。
- ②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列·达·（1879～1940）——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俄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40年被暗杀

No07933

梅德维捷夫就党内右倾危险问题 致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体委员

（1926年7月17日）

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

尊敬的同志们：

在今年7月10日的《真理报》上，你们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的文章。在你们这篇文章中批判我于1924年1月写给我的一个巴库同志的私人信件，引用我这封信中的许多话来证明你们对我的观点所下的结论，而在我的原信中这些话根本就没有。你们在文章中为同一目的而引用的其他许多话也完全歪曲了我的信的原意。

眼下我正忙于结束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几件紧急工作，但我仍将在近日内提出具体材料来证明上述文章作者对我的观点所作的结论是有意捏造的。与此同时，我认为现在就有必要坚决驳斥上述文章对我的观点的诽谤，所以我坚决请求你们在最近的一号《真理报》上刊登我的这些简短的反驳。

1. 文章作者根据自己的捏造作出论断，说什么我主张“取消西方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

事实上我主张巩固、发展西方和东方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主张西欧无产阶级脱离黄色第二国际，恢复无产阶级的一切阶级联合

形式，主张让全世界所有的工人群众和半无产阶级群众摆脱这一黄色国际的影响。

文章作者认为我的主要口号是“回到社会民主党行列中去”，这一论点是根据针对我的杜撰和有意捏造得出的。

所谓我认为“共产国际赖以生存的土壤——欧洲工人群众——显然是没有希望的”，这也是杜撰出来强加于我的。

2. 文章作者断言，说我主张“以租让资本排挤独立的苏维埃国有工业，从而取消后者”。

事实上作者在与这一捏造相隔两段文字的地方又说我主张“尽快发展国有大工业”——我的确是主张尽快发展我国的国有大工业，坚决反对取消、哪怕是稍微削弱它的。

关于租让问题，从这个问题的提出到现在，我一直严格遵循的是弗·伊·列宁当时所阐述的观点，而不是文章作者捏造出来并强加给我的那些观点。

3. 我再次郑重声明，在阿姆斯特丹问题上我是按照党的决定及策略行事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谢·梅德维捷夫^①

1926年7月17日

^① 梅德维捷夫，谢·巴·（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红军从事政治工作。1920～1922年任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后从事经济工作。1933年被开除出党。

No07934

托洛茨基等 13 人致中央七月联席全会

（1926 年 7 月）

声 明

致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对近来党的生活中所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明显的危险现象必须作出认真的、负责的评价。尽管上层有人企图将相当一部分党员与工人群众隔离开来并使其脱离真正的党的路线，我们仍对保持党的统一抱有坚不可摧的信心。正因为这样，我们想在此对危害党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直率地、明确地、甚至毫不客气地表明我们的看法，决不闪烁其词、遮遮掩掩或是轻描淡写。

1. 官僚主义是派别活动的根源

党内危机不断加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官僚主义，它在列宁死后极度膨胀并在继续发展。

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对党施加影响时不仅拥有思想上、组织上的手段即党的手段，而且还拥有国家手段和经济手段。列宁一直担心行政权力集中在党的机关手中会导致官僚主义向党施压。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产生了成立监察委员会的想法，这个监察委员会手中没有管理权，但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保障党员自由发表意见和凭良心投票而不用担心招致迫害的权利方面，却拥有一

切必要的权力。

1924年的一月党的代表会议决议指出：目前监察委员会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反对党的机关和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歪风，处分那些阻碍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人民主制原则（如在会议上压制自由发表意见、不按党章规定随意限制选举等）的党的负责人员。

然而实际上——这一点应首先指出——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行政机关，帮助其他官僚机关搞压制；为它们做那些地地道道的惩罚性工作，禁止党内存在任何独立的思想，禁止发表任何批评言论，禁止对党的命运公开表示任何忧虑，禁止对党的某些领导人提出任何批评。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党内的工人民主制就是在实行党的共产主义政策时所采取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表现为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①

只有遵循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内生活制度才能真正消除党内那些与无产阶级专政切身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派别活动，把反对派别活动同党内生活制度问题割裂开来就是歪曲问题的实质，助长官僚主义歪风，从而也是助长派别活动。

得到一致通过的1923年12月5日决议明确指出，官僚主义禁止自由发表意见、扼杀批评，必然把忠诚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近来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拉舍维奇和别连基等同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4页。

志的“事件”^①，完全证明这些指示是正确的。如果把这一事件说成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恶意所为，那真是太盲目无知了。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显然而且无疑是主导方针造成的结果，在这一方针下，只有上头讲话，而下头只能听从和暗自盘算，心思各异、藏而不露。

不满意者、持异议者与怀疑者不敢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广大党员听到的只是党的领导千篇一律的讲话。相互联系和对领导的信任逐渐减弱。会议被形式主义和随之必然产生的淡漠态度所笼罩。投票时常常只剩下寥寥数人：与会者都匆匆离开，以免违心地对事先授意的决议投票。无论在哪里，各种决议都“一致”通过。所有这些只是反映在党组织的内部生活中。党员们害怕公开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愿望和要求。拉舍维奇等同志“事件”的起因亦在于此。

2. 官僚主义增长的原因

很显然，领导核心越是不能利用党内民主的办法贯彻自己的决定，工人阶级先锋队便越不把他们的政策当成自己的政策。经济政策的方向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感情、想法的方向的背离，必然使施加压力的要求变得更为强烈，并使整个政策带有行政官僚性质。对

① 指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格·别连基在莫斯科近郊树林召开秘密会议一事。中央候补委员拉舍维奇在会上作了报告。

拉舍维奇，米·米·（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5、1926年任中央候补委员。在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

别连基，格·雅·（1885～1938）——1903年入党。1925年以前任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书记。1925～1927年追随托洛茨基反对派，为此多次被开除出党。

官僚主义的发展原因的任何其他解释都是次要的，都说明不了事情的本质。工业落后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降低，尽管工人的数量增加了。工业对农业促进作用的落后和富农的迅速增加使贫雇农在农村的比重下降，并使他们慢慢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和自信。工资的增长不如城市非无产阶级分子和农村上层人物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快，其结果必然使作为执政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衰退。更重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苏维埃选举的积极性因此而明显下降，这对我党是个十分严重的警示。

3. 工资问题

近几个月来，认为我们应该在经济困难时期千方百计保障实际工资，以便在情况好转时继续提高工资的观点被抨击为蛊惑人心。其实，这种提法对工人国家来说是最起码的。无产阶级大众的决策核心已经足够成熟，明白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但是，如果他们每天听到的是我们的经济在增长、我们的工业在蓬勃发展、关于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的所有论断都是没有根据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有预先保障的、对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的任何批评都是基于悲观主义和不信任等等，而另一方面，又有人反复对他们说保障实际工资的要求和不断地继续提高工资的前景是蛊惑人心，那么工人就会不明白官方对大前景的乐观主义与对工资的悲观主义怎么能联系起来。这种言论势必使群众觉得是欺骗，使群众不再相信官方消息，使他们消沉不安。由于对官方的会议、报告和表决不信任，一些纪律性很强的党员力图（越过党的机关）了解工人群众实际在想些什么。这一点极其危险。但是不要单单治标，而要治本，尤其要根治对待工资问题的官僚主义态度。

四月全会否决关于保障实际工资这条最合理、最必要的建议是

个明显的错误，它导致了实际上的工资降低。对部分工资征收农业税的做法使情况更加恶化。

错误地实行“节约制度”进一步加重了这些事情对工人生活和情绪的影响。由于错误的提法，首先由于缺乏工农的监督，原本十分必要的争取正确地、认真负责地、节约地使用国家资金的斗争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机械压制，最终压到了工人头上，并且是压到了保障很少、待遇最差的那些阶层和集团的头上。工资、农业税、节约制度这三方面的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不容拖延。现在就应着手准备在秋季适当提高工资，从这方面情况最差的那类人开始。虽然现在或将来都有困难，但就我们目前的经济和预算规模来说，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再者，正是为了克服困难，首先必须调动工人群众对提高国家工业生产能力的积极性。采取其他任何政策都意味着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目光极其短浅。因此不能不承认：这次七月全会拒绝讨论就解决工人状况这个大问题作出明确指示是极其错误的。

4. 工业化问题

国家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今年已十分明显，今年的收成又使我们处于没有商品储备的境地。然而，只有当工业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经济的总体发展，而是带动经济，使国家逐渐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水平的时候，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才会有保证。一切都应服从于这项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都同等重要的任务。只有在工业得到极大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保障提高工资并向农村提供廉价商品。过多指望外国租让，是不明智的，我们不能改变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所以我们不仅不能让外国租让在我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且不能让它占有稍微重要的地位。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借助税收、价格、信贷等方面的合理政策，合理分配城乡的积累，从而使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失衡状况尽快消除。

如果农村上层能够把去年的粮食保留到今年春天，并因此而使进出口减少，使农业人数增加，零售价格上升，那么这就表明，使富农能够采取这种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方针的税收和经济政策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税收政策与正确的价格政策共同构成了指导经济的社会主义方针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数亿卢布的积累现在已经集中在农村上层的手中，成了对贫农进行高利贷盘剥的工具。商人、掮客、投机者的手里已经积累了早就超过十亿的数十亿卢布。必须通过更强大的税收压力来吸引这些资金的相当部分用于支持工业、巩固农业信贷体系，以优惠条件向农村下层提供机器和农具。在目前条件下结合问题首先是工业化问题。然而党不安地看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实际上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就像关于党的民主的所有决议都化为乌有一样。在这个事关十月革命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上，党不能而且也不想用一些公文套语来敷衍塞责，因为这些公文套语的提出常常不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派别斗争。党要了解，要思想，要审查，要决定。现有的制度妨碍党做这些事。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党的文件秘密传播的情况，才产生了拉舍维奇“事件”等等

5. 农村政策

在农业政策问题上，向农村上层倾斜的危险日益明显，一些权威人士已经公开表示，农村农业合作社的实际领导权应当转到“强大的”中农手里；应当为富农的存款完全保密；应当拍卖不能按时还款的借债人即贫农的必需的农具等等。同中农的联盟常常变成依靠“殷实的”中农的方针，而这部分中农通常都是富农的弟弟。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帮助贫农摆脱走投无路的处境。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由于缺少资金而不能立即实行根本的变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看实际情况，可以用

依赖别人帮助的说教来糊弄贫农而同时却纵容富农。这种在我们党内越来越常见的情况有可能在我们与我们在农村的主要支柱——贫农之间造成鸿沟。只有在无产阶级与贫农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情况下，他们同中农才能建立正常的共同联盟，即领导权属于工人阶级的联盟。然而事实上，去年十月全会关于组织贫农的决议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在地方组织的工作中得到贯彻。事实上，甚至在上层行政当局中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尽可能将农业合作社干部中的共产党员或贫农置于次要地位，或用“强有力的”中农取而代之。事实上，在贫农与中农结成联盟的幌子下，贫农常常在政治上完全从属于中农并通过中农从属于富农。

6. 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畸变

现在，我国国有工业的工人数量不到 200 万；加上交通部门的工人——不到 300 万人。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所有其他部门的职员总数无论如何不会少于 300 万。仅这种对比就已经证明了官僚们的巨大政治和经济作用。显而易见，国家机关按其成分和生活水平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日益脱离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一方面倒向生活舒适分子，另一方面倒向承租人、商人、富农、新生资产者。列宁多次提到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畸变，指出工会必须经常保护工人免遭苏维埃国家的损害。然而党内官僚主义者恰恰在这方面沾染上了最危险的自我欺骗习气，这一点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见 1925 年 12 月 13 日《真理报》）。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是却有人向我们提出，认为最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使工人阶级更加接近我们的国家……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提出使工人接近我们的国家的任务，那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谁的国家。难道不是工人的国家吗？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怎

么可以使工人接近国家即使工人本身接近掌握政权和管理国家的工人阶级呢？”这些奇谈怪论否定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应当为使国家机关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从属于自己而进行斗争的任务。这种立场同列宁的观点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列宁在其最后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国家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①因此，真正认真的而不是摆样子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被说成捣乱、闹纠纷、派别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7. 党的机关的官僚主义畸变

1920年，列宁领导下的党代表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不容许党的机关和个别同志不根据实际情况而根据任何其他的考虑来动员同志。“不容许采取任何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②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与此背道而驰的做法随处可见。真正的纪律松松垮垮，取而代之的是对机关权威人士的服从。那些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党可依赖的同志越来越多地被排挤出干部队伍，被调走、流放、镇压，取而代之的常常是一些没有经过考验但却盲目服从的得势小人。正是党的制度的这些严重的官僚主义缺陷将党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视为忠诚的和守纪律的党员的拉舍维奇同志和别连基同志变成了被告。对他们的起诉书就等于是对党的机关的官僚主义畸变的起诉书。布尔什维克党内紧密团结的统一的机关的作用无需赘言。没有这样一支党的骨干力量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党的机关大多是由忠诚的和无私的党员组成的，他们除了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没有其他的动机。如果制

^① 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3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1页。

度正确并能适当地分配力量，这些工作人员就能成功地帮助实现党内民主。

8. 官僚主义和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

官僚主义使工人在党性、经济、生活和文化方面受到了沉重打击。党的社会成分在近几年无疑得到了改善，但同时也极其清楚地表明，仅仅靠增加党内的工人数量甚至是机床旁的工人的数量，还远远不能保证党避免发生官僚主义畸变和其他危险。实际上普通党员的比重在现行制度下极小，常常等于零。

官僚主义制度对工农青年的生活影响最为严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没有经历过旧式阶级斗争的青年，只有通过独立思考、批评和检验，才能达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水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提出，对待青年的思想过程必须采取特别关心和爱护的态度。相反，官僚主义束缚青年的发展，使其心存疑虑，压制青年的批评，从而一方面播下不信任和颓废情绪，另一方面则播下名利思想。在青年团的上层，名利思想近一时期大肆泛滥，致使青年以及老一代人中产生了许多官僚。因此，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分子、雇农和贫农被排挤出青年团的干部队伍，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和小市民，这些人能较容易地适应办公室领导的需要，但离工人和下层农民群众都更远了。为了保证共青团有一条不亚于党内的相宜的无产阶级路线，应当向民主化方面转舵，即创造条件让青年去工作，去思考，去批评，去决定，在党的爱护和指导之下逐步达到革命的成熟水平。

官僚主义制度就像铁锈一样，侵蚀了每个工厂和车间的生活。如果说党员实际上被剥夺了批评区委、省委或中央的权利，那么在工厂里党员则被剥夺了批评顶头上司的可能。党员噤若寒蝉。行政负责人作为“忠实的人”能使自己保证得到上级组织的书记的支持，从而使自己免遭下层批评的风险，而且还常常免除了对经营混

乱或刚愎自用应负的责任。

在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节约国民资金的主要条件是群众首先是工厂工人的警惕的监督。

只要他们还不能公开地反对混乱状况和舞弊行为，不能指名道姓地揭露，不能解除被赶出支部甚至工厂的后顾之忧，——那么争取建立节约制度的斗争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一样，必将沿着官僚主义的轨道运行，即受到打击最多的是工人的切身利益。现在出现的正是这种情况。计件定额工作搞得一团糟给工人带来沉重打击，这十次有九次都是官僚忽视工人和生产本身的最起码利益的直接后果。在这方面还应当加上不按时发工资，就是说，把应该最先办的事情推到了次要地位。关于所谓上层铺张的问题完全同压制批评有联系。反对铺张的通令写了不少。监察委员会审理了不少的“案件”，但群众对这种官方的反铺张斗争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这里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使群众敢于讲出心里话。在哪里讨论所有这些迫切的问题呢？不是在党的正式会议上，而是在偏僻的角落和小巷里秘密进行，并且总是提心吊胆。由于这些不能忍受的条件而发生了拉舍维奇同志等人的事件。从这个“事件”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应当改变条件。

9. 争取和平的斗争

世界革命运动在劳动群众兄弟般团结的基础上的发展，是苏联不受侵犯和我们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保证。然而，如果直接或间接地让工人群众产生或怀有一种希望，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或阿姆斯特丹国际分子，包括以托马斯^①或普赛尔为首的总理事会，愿意或能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等的斗争，那就大错特错了。

^① 托马斯，詹·亨·（1874~1949）——英国工党领袖之一。1917年任全国铁路员工联合会总书记。1920~1924年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主席。

英国妥协派领袖们过去在总罢工期间卑鄙地背叛了英国工人，而现在又对掘煤工人的罢工进行背叛活动，并在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之际更可耻地背叛英国无产阶级以及苏联和和平事业。列宁在给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只有在群众面前无情地揭露机会主义者，才能防止资产阶级企图重新挑起战争并使工人们措手不及。列宁在谈到出席海牙会议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和平主义者”时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意外的时刻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多少能够采取适当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列宁提请党特别注意，甚至许多共产党人的讲话中也有许多“极端错误、极端轻率的反战言论”。他写道：“我认为，对于这种言论，特别是战后发表的这种言论，应当坚决反对，毫不留情地点出说这种话的每个人的名字。对他们的评论可以委婉一些，特别在必要的时候，但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能缄默不言，因为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是一种最坏的绝对不能容忍的恶事。”我们的党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应当重温列宁的这些话。应当大声宣布，托马斯之流、麦克唐纳^①之流、普塞尔之流没有能力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像策列铁里^②之流、唐恩^③之流和克伦斯基^④之流没有能力制止帝国主义的屠杀一样。

① 麦克唐纳，詹·拉·（1866～1937）——英国工党右翼领袖之一。1924和1929～1931两度组织工党内阁，1931～1935年任“国民内阁”首相。

② 策列铁里，伊·格·（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1918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之一。后流亡国外。

③ 唐恩，费·依·（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

④ 克伦斯基，亚·费·（1881～1970）——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总理、最高总司令等职。后流亡国外。

不断成长壮大的红军与我国和全世界的劳动群众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保卫苏联因而也是维护和平的强大条件。一切能够提高工人阶级在国家的作用，加强工人阶级与贫雇农的联系并巩固工人阶级与中农的联盟，进而使红军更加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措施，都能保证苏维埃国家不受侵犯，巩固和平事业。

10. 共产国际

拨正党的阶级路线就等于拨正党的国际路线。应当把所有那些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同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过程和结局没有密切联系的可疑的新理论抛到一边去。殖民地人民正在为争取独立而进行斗争。这是共同的路线。每一个地段的每一支队伍都应当作出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而不要等待别人先行动。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同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及东方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关于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关于共产国际内部制度的问题同我们这个过去和现在始终在共产国际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党的制度同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党的任何举动都必然会影响到共产国际各党。因此，从国际的角度对我们的路线进行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审查就更加必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认为各外国党必须更加独立地参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然而这一决定同其他决定一样，是纸上谈兵。这不是偶然的。只有我们的党本身有正常的制度，才能通过正常的政治和组织途径解决共产国际的迫切问题。机械地解决有争议的问题越来越有削弱各共产党的内部团结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危险。在共产国际方面我们应当坚决地转到列宁所指出的并在列宁生前经过检验的道路上去。

11. 关于派别活动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的两年里，有一个名为“七人小组”

的派别集团，它由6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同志组成。这个上层派别集团背着党预先解决每个列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日程的问题，并自作主张地解决了许多问题，根本不提交政治局审议。它按照派别方式分配力量并用派别的内部纪律约束其成员。参与七人小组活动的除了古比雪夫，还有中央监察委员会那些无情地反对“派别”和“集团”的领导人，如雅罗斯拉夫斯基、扬松等同志。这样的上层派别集团无疑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仍然存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及其他大中心城市，党的机关中的部分上层人士组织召开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尽管整个官方机关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这些按照专门的名单召开的秘密会议是彻头彻尾的派别会议。在会上宣读秘密文件，没有加入这个派别人仅仅因为传播这些文件就会被开除出党。那种认为“多数人”不会结成派别的说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对代表大会决议的解释和执行应当在正常的党的机关范围内进行，而不应通过由派别统治集团背着正常的机关预先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进行。在派别统治集团中也有少数派，这些人把派别纪律置于党的纪律之上。

这整个派别机构的任务就是不让党有可能通过正常的法定途径改变党的机关的成员和政策。这个派别组织日甚一日地威胁着党的统一。

列宁逝世以后出现的对党的制度的严重不满，以及对政策的变动的更大不满，必然会引发反对派言论和激烈的争论。然而，领导集团不是在新的、越来越有说服力的事实中学习和拨正路线，而是不断地加重官僚主义的错误。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是，1923年反对派的基本核心提醒大家注意背离无产阶级路线的危险和机关制度的危险发展是正确的，现在的领导集团的演变也说明了这一点。然而，1923年反对派的数十名乃至数百名领导人，其中它包括许多

经过斗争锻炼、不图名利、不阿谀奉承的老工人布尔什维克，直到今日仍被排斥于党的工作之外，尽管他们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和纪律性。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列宁格勒反对派骨干的镇压，不能不引起那些加入我们的党并习惯于把列宁格勒工人共产党员看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最优秀的工人的极大不安。在必须对羽翼日益丰满的富农进行反击的关键时刻，领导集团却对列宁格勒工人的先锋队下了手，他们的罪名仅仅是对富农危险提出了警告。数万名优秀的工人被赶出了列宁格勒。数千名作为列宁格勒组织的优秀分子的工人共产党员被以各种方式排斥于党的工作之外。现在每个正直的党员都已经基本认识到，这些列宁格勒工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只有彻底改变党内制度，才能治愈列宁格勒组织遭受的创伤。如果事情继续沿着现在走的道路发展下去，那么毋庸置疑，不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还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压制、清洗和驱逐，而且其他的政治区域和中心如顿巴斯、巴库、乌拉尔也定将受到影响而进行更加疯狂的镇压。对列宁的背离的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力图借助“孟什维主义”这个字眼回避对现行党的方针和危险性作出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正是这种态度使那部分思想最僵化的“领导人”露出了马脚。孟什维主义认为苏联必然要发生资本主义蜕化，并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同苏维埃国家的决裂上，就像社会革命党人希望“强大的”农民同苏维埃国家决裂一样。实际上，只有在工人阶级与苏维埃国家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的情况下，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孟什维主义才能真正指望有朝一日摆脱微不足道的地位。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首先应当在这种裂痕一出现就作出明确的判断，而不能闭眼不看裂痕，就像否认有必要解决使苏维埃国家接近工人国家和农村下层群众这一任务的官僚一样。粉饰现实，官方对一般经济问题的乐观和在工资问题上的悲观，不愿正视富农的增长以及对富农的姑息纵容，对贫农关心不够，特别是在工人

中心进行的粗暴压制，不愿弄明白最近苏维埃改选的教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发挥影响打下真正的、现实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基础。

那种认为先从组织上把所谓的反对派收拾掉，然后就可以扩大党内民主范围的想法是一种拙劣的自欺欺人手法，党根据自己的全部经验无法再继续相信这种安抚人心的神话了。组织镇压的手段将造成新的裂痕，使又一批人被解职和开除，对全党形成新的压制。这种方式必然会使上层领导人减少，降低领导人的威信，因而不得不用两倍和三倍的压制来代替思想威信。党无论如何应当中止这种危害极大的过程。列宁指出，对党实行坚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卡住党的咽喉。

12. 维护统一

毫无疑问，党完全有能力克服一切困难。那种认为党在统一方面找不到出路的想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出路是有的，并且正是在统一方面。为此必须对提出的问题采取认真的和真诚的布尔什维主义态度。我们反对“季节性的”争论，我们反对争论时的狂热。这种由上面强加的争论让党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它带给党的主要是损害，党在思想方面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加强和丰富。

我们向中央全会建议——依靠大家的力量在党内恢复那种能完全根据党的一切传统，根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感情和思想来解决一切有争议问题的制度。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行党内民主。

只有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行健康的集体领导制，其他的途径是没有的。我们在这条惟一正确的道路上的斗争与工作中将保证完完全全地无条件地支持中央。

补充声明

关于所谓拉舍维奇“事件”的问题根据政治局6月24日的决定被提上了这次全会的日程，但在最后时刻却被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7月20日的决定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事件”。我们认为必须首先确认，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议草案中没有一个事实、一个消息、一个疑点是6个星期以前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拉舍维奇等人“事件”作出决定时大家所不知道的。在这个决定中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然而在最后的决议草案中已经斩钉截铁地声称，“所有的线索”都牵涉到作为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所有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不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内，而是在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派别集团内决定的。

我们现在亲眼看到，在实现蓄谋已久和系统推行的计划方面进入了新的阶段。早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不久，在相当广泛的党的干部队伍中就开始流传来自中央书记处的风言风语，说什么必须改组政治局即把列宁在时也曾参与领导工作的一批工作人员清除出去，代之以能够对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作用给予应有的支持的新成员。这个计划得到了紧紧抱成一团的斯大林同志的最亲近的拥护者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同任何“反对派”都毫无联系的其他一些人员的反对。无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领导集团决定利用每一个适当的时机实现计划。扩大政治局并把加米涅夫同志从政治局委员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蓄谋已久的彻底改组党的领导的计划的第一步。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留在扩大后的政治局内以及加米涅夫同志改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肯定会使党产生老的基本核心得到保留的错觉，从而消除对于中央领导的修养和权威性的担忧：早在代表大会闭幕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后，在继续反对“新反对派”的同

时，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斗争就在各个地方首先是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就像接到了信号——掀开了新的一章。在这段时期莫斯科组织领导人在积极分子中公开散布说，最近的打击矛头应指向托洛茨基同志。一些根本不属于“反对派”之列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表示不赞成莫斯科组织领导人的所作所为，而且众所周知，给莫斯科领导人撑腰的是中央书记处。在这一时期，关于应把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在党内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行了讨论，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其他许多地方都进行了讨论。反对拉舍维奇同志引发的事件实质上并没有使改组党的领导们基本计划发生任何变化，但是使斯大林集团对实施计划的方式作了某些改变。如果说在前不久计划首先打击托洛茨基同志，把季诺维也夫问题推到下一阶段解决，以便使党逐渐适应新的领导，使每一个新的局部变化对党来说都成为既成事实，那么拉舍维奇、别连基等人由于他们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关系密切而促使领导集团改变次序并决定首先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对于计划的这种变化并不是没有动摇和反对意见，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拉舍维奇同志“事件”的最初决定根本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问题就可看出，尽管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新的决议草案列举的所有“事件”因素在对拉舍维奇同志发起迫害的最初时刻就都存在。在最后时刻提出的建议——把季诺维也夫同志赶出政治局——是中央的斯大林集团所为，是用新的斯大林式的党的领导取代老的列宁式的党的领导的一个阶段。计划仍然是分几个部分实施的。托洛茨基同志暂时还留在政治局内，第一是为了能够使党相信季诺维也夫同志确实是因为拉舍维奇事件而被解职的，第二是为了不使党因为过激措施而产生极大的不安。然而毋庸置疑，托洛茨基同志的问题同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一样，早已被斯大林核心预先决定了。即把他们驱除出领导层，完成这一部分计划只是一个履行组织手续和找到适当理由（确实的或臆造的）

问题了。这里说的是彻底改变党的领导。对这种改变的政治含义我们在拉舍维奇同志的“事件”变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事件”之前起草的基本声明中已作了全面的评价。

这里只需补充一点：如果斯大林集团预定的改组领导班子的计划真正得到实现，那么背离列宁路线的露骨举动就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机会主义的发展。在被称作《遗嘱》的一份著名文件中，列宁清楚而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则根据近几年的经验深信，斯大林及其集团的组织政策使党面临基本骨干进一步遭到打击以及进一步背离阶级路线的危险。事关党的领导，事关党的命运。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决不接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派别性的和极其有害的建议。

И. 巴卡耶夫^①，Г. 利津^②，
米·拉舍维奇，尼·穆拉洛夫^③，
А. 彼得松^④，К. 索洛维约夫^⑤，
Г. 叶夫多基莫夫^⑥，格·皮达可夫，

① 巴卡耶夫，И.П.（1897～1936）——1906年入党。1925年任列宁格勒省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后遭镇压。

② 利津，Г.Я.（1864～？）——1892年入党。1925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后遭镇压。

③ 穆拉洛夫，尼·伊·（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0～1921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36年被捕，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④ 彼得松，А.А.（1895～？）——1917年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成员被开除出党。

⑤ 索洛维约夫，К.С.（1897～？）——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遭镇压。

⑥ 叶夫多基莫夫，Г.Е.（1884～1936）——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7～1928年任中央消费合作社总社理事，乌里扬诺夫斯克省计委副主席。1929～1934年任萨马拉州农业合作社联社主席。后遭镇压。

И. 阿夫杰耶夫^①，格·季诺维也夫，
娜·克鲁普斯卡娅^②，列·托洛茨基，
列·加米涅夫^③

1926年7月

-
- ① 阿夫杰耶夫 И.А. (1877~1937?) ——1901年入党。1927年任列宁格勒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央候补委员。在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后遭镇压。
- ② 克鲁普斯卡娅，娜·康·(1869~1939) ——列宁夫人。189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副教育人民委员。1924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中央委员。
- ③ 加米涅夫，列·波·(1883~1936) ——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职。1936年8月被判处死刑，后平反。

№07935

我们为什么投票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 同志就苏维埃改选问题提出的决议案

(1926年7月)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我们投票反对莫洛托夫^①同志代表政治局多数派提出的决议，因为决议的政治结论根本不符合决议自身也确认的那些极其重要的事实，当然，决议对这些事实的确认是模棱两可的。

毫无疑问，中农群众以及城市小市民的情绪变得好多了，不仅好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而且好于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然而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中间蕴蓄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不允许的。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农村的分化和促进了私商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作用和政治自觉，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允许扩大小工业主的选举权，不允许合作社的方针向农村上层倾斜或者对这种倾向中蕴含的危险估计不足。

在莫洛托夫同志的决议看来，改选的基本事实如下：（1）“贫雇农积极性的增长赶不上其他农村阶层积极性的增长。”而贫雇农恰恰是党和工人国家在农村的支柱。

^① 莫洛托夫，维·米·（1890～198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1年起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等职。1962年被开除出党。

（2）正像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代表份额有了明显的增长”。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即统治阶级的代表权遭到了相对的削弱。

（3）利用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指示破坏苏维埃宪法。

然而，企图把这些基本事实说成是偶然情况和个别错误的结果，是根本错误的。最糟糕的政策是含含糊糊地承认危险，以便绕过这些危险去完成当前任务，等于是继续执行产生这些危险的政策。我们认为中央机关报的结论是正确的，尽管在表述上夸大了危险，这个结论是：“竞选活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党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是矛盾的。”（7月7日《真理报》社论《苏维埃改选的教训》）。

不弄懂《真理报》指出的矛盾，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矛盾之处在于，总的政治指示认为主要危险是工人和贫雇农对富农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进攻，而实际上危险是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进攻。

斗争矛头不是对准实际危险，而是对准事先对这种危险提出警告的人。

把雇农的消极全归咎于他们“没有文化”是不对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首先是依靠农村中的这些人进行了一场极其伟大的土地战争的。在这些年里农村下层的文化水平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如果说他们的积极性仍然比不上其他阶层，那么相当大一部分责任应由错误的政策来承担。

不能允许农业合作社的领导者以合作社特别是信贷合作社要是不改变主要依靠“贫农”的做法就不可能强大起来作为借口而实行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的方针。

说政治局迄今为止没有进行清楚明确的讨论，是根本错误的。

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的建议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农业人民委员认为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有资本积累的富裕农民”……和有条件地吸收比较富裕的、有文化的先进农民阶层参与合作社的领导工作。

农业人民委员认为农业信贷合作社管理中的错误在于，“生产能力强的中农”还没有在合作社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尽管所有资料都无一例外地说明农业合作社，其中包括信贷合作社，发生了有利于农民上层的某种进展，农业人民委员却认为信贷合作社的实际工作中发生了有利于“贫苦阶层”的偏激行动。

农业人民委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是：“为了克服‘社会保障’倾向，应当修改我们的法律，即在借债人不偿还贷款时合作社可以拍卖借债人利用贷款购置的财产，即使这部分财产是其经济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坚决驳斥这些在莫洛托夫同志的决议草案中没有得到适当评价的倾向。农业合作社是党和国家将农民经济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的强大工具之一。将这一工具交给农村上层，意味着把合作社从社会主义的工具变成资本主义的工具。

为了在工人和贫雇农现有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党、所有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政策的阶级内容应当完全适合这种积极性，提高和培养这种积极性。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的方针必然会压制贫雇农的积极性。选举只是暴露了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很显然，卡冈诺维奇同志提出的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一部分同志进行谴责的建议是极其错误的，这些同志对反映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压力的危险倾向及时提出了警告，并及时指出必须实行更坚决的工业化方针，对富农采取更正确更坚定的政策，首先要创造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发挥更大积极性的条件。必须使每一个党员明白，要想端正党的路线即实行更加明确的无产阶级方针，就不能把斗争矛头对准坚持和捍卫这一方针的人。资产阶级和

孟什维克现在主要把希望寄托在苏维埃的蜕化上，就像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把希望寄托在武装干涉上一样。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希望建立在我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上，建立在比例失调上，建立在剪刀差上，建立在富农的增长上，建立在私商的发展和富农的不断增长的影响上。我们政策的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优势，决不允许实际权力在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同中农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从他们手中转移到试图领导并已部分地领导贫农和中农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尤其是在目前时期，在城乡之间的经济比例失调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对降低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系统内的政治比重的迹象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不得不经常在我们的敌人的注视之下批评自己的错误。他们必然会抓住我们自我批评的每一句话大做文章。

然而，谁要试图以资产阶级敌人为借口而压制自我批评，谁就恰恰帮了这些敌人的大忙。能够真正削弱我们和帮助敌人的不是批评而是掩饰错误。

我们坚决地批驳那种所谓利用错误的数字来论证政治局多数派路线的批评的指责。不论我们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自身的资料中援引的这样或那样一些个别数字如何，在选举中暴露出来的基本政治过程和倾向是不容置疑的。

相反，我们认为，任何试图通过玩弄数字把戏来掩饰基本政治过程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这些过程向何处发展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

去年秋天在饲料粮问题上就发生过不能允许的玩弄数字的做法，其目的是掩盖农村的分化、低估富农的经济增长。从那时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发生的一切（春天把粮食抛向市场——这是一方面，基层苏维埃选举——这是另一方面），都是对试图使统计数字迎合既定的政治结论的形形色色的做法的最严重的警告。

我们谴责那种把我们反对某些错误和倾向，维护某种路线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出于某些卑鄙动机的派别斗争的行径。

这种诋毁对全党来说是一种侮辱，也使这样做的人因此背上了骂名。

我们同样谴责那些不是公开批评我们清楚了表述的观点，而是把一些同我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同我们反对的观点极为接近的思想和倾向硬塞给我们的形形色色的做法。

只有用不尊重党内舆论才能解释《真理报》上那篇著名小品文中和全会上一些讲话中暴露的企图，即通过暗示、中伤和阴谋硬说我们赞同或容忍下述观点：把国有工业的大部分或主要部分租让出去；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对共产国际毫无根据的卑鄙的攻击；把国有工业比作“土包子”等等。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与这种思想毫无相似之处，而就我们观点的实质本身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思想贫乏和不择手段的人才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们。

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把一些同我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塞给我们，另一方面对一些更加荒谬的类似的错误却不加以制止，因为这些错误是他们本派别的追随者造成的。我们一时一刻都不怀疑，党必将把争论的核心同混杂其中的垃圾区分开来，不仅就问题的本质，而且就不能允许的争论方式提出决定性的意见。

最后我们认为，以上所揭露的领导错误和由这些错误引发的政治错误，无论如何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会贬低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苏联建设方面为教育和团结城乡劳动群众所做的巨大工作。

及时而明确地改正错误将使我们有可能更广泛地开展工作的，更

紧密地保持同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联系。

尼·穆拉洛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列·加米涅夫、尤·皮达可夫、
格·季诺维也夫、米·拉舍维奇、
彼得松、列·托洛茨基

№07936

关于拉舍维奇等同志的事件的决议草案

(1926年7月)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维护布尔什维克党的统一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除了政治领导方面的措施，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得到了最清楚不过的表述。在党的政策的一次最急剧的转折时期，在完成这次转折的过程中，党内出现相当大的意见分歧，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和不允许派别活动的著名决议。与此同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持党的统一的基本条件即党内民主的决议。在第十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党进一步壮大，党内状况得到改善。党内存在的意见分歧在以党的决定为基础的齐心协力工作过程中全部被消除。

1923年起党内状况开始恶化，目前成了危险的党内危机。尖锐的意见分歧涉及到党的基本骨干。分裂的危险清楚地摆在党的面前。

有些原因对于理解目前危机是至关重要的。在商品货币经济的种种矛盾中发展的国内生产力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苏联各个阶级和集团在社会政治方面的活跃。随着以国有经济（国有化工业、运输业等）和无产阶级为依托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相当大的增长和活跃，在生产能力强的我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具有基础的私有经济成分的比重和作用也在增长。随着农村经济实力和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的增长，敌视共产主义的成分的思想进攻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极大地增加了党的工作的难度。联共——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惟

一的党——在领导国家的过程中感受到来自各种社会成分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官僚主义畸变的压力。

目前，党内在领导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对于党的统一的危害，比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要小得多。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城乡劳动者福利增长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无产阶级远远摆脱了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受过的饥饿和贫困。然而，近年来党内的生活条件不仅妨碍党本应随着国内整个经济状况的改善而壮大，而且造成威胁党的统一的局面。1920年9月由弗·伊·[列宁]起草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说：

“必须指出，不容许党的机关不根据实际情况而根据任何其他的考虑来动员同志。不容许采取任何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遗憾的是，无论是这个决定，还是党关于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制度的其他一系列决定，都没有得到实行。由于意见不一致而解除一些共产党员的职务，成了党的领导的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这样一来，党支部生活就处于停顿状态——一部分党员离群索居，游离于党的工作之外，另一部分党员则充满与共产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逢迎和向上爬的思想。青年党员在压抑和不正常的环境中接受了党的洗礼。所有这一切不仅妨碍党的干部应有的成长，而且导致现有干部变得庸俗。

可见，在保持党的统一的两个基本条件——不允许派别活动和实行党内民主制度——之中，后一个条件没有得到实行。不遵守这个条件又从另一方面恶化了现状，党内的意见分歧没有消失，反而越积越多。在党的领导方面，甚至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也采取了一些党章规定之外的组织形式。

拉舍维奇等同志的事件是这方面出现的危险现象之一。只有采

用列宁的方法才能同这一类现象进行胜利的斗争。因此，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在听取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一部分联共党员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在树林中集会并在会上讨论有关党的生活和工作问题的报告之后，坚决谴责召集这次会议的同志的所作所为。全会认为，个别党员的这种行为与党通过的关于统一和不允许派别活动的决定背道而驰，威胁着党的完整，其危害不亚于上面所指出的党的领导的错误结论。

同时，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全会要求所有党组织、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采取切实措施来实行党内民主制度。在党纲和党章以及代表大会决定的范围内，每个党员都有权在党内自由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当前，在农民经济不断增长使农村富裕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积极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党内民主制度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27年的竞选活动是上层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积极性提高的鲜明例证。在这种形势下，搞活无产阶级组织首先是我们党的工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顺利进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否则，无产阶级就会面临其在苏联的领导作用被削弱的危险。通过上层争论来消除党内分歧的做法已经失败。不对争论的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没有广大党员群众的充分参与就作出决定，一方面会导致争论的白热化，另一方面会导致领导干部与党员群众之间的联系的削弱，而这是最危险的。只有在与人为善和协调一致地讨论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党的各个支部和阶层之间正常和定期地交流经验，才能在党的决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必不可少的团结，应当成为我们在党内工作方面的政策的主要内容，不是那种只会触痛和加重党的肌体上的创伤的周期性的激烈争论，而是对有关党的生活和活动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讨论。只有在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并对党所关注的问题进

行讨论的情况下，才能最顺利地消除现有的意见分歧。每一个党员都应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不要害怕因为意见不同而受到打击。尽管上层的“争论”会把党引向分裂，但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当前，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地方的监察委员会的作用极其重要。根据弗·伊·的倡议，为维护党的统一而建立的组织——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党内状况，而且还常常走上错误的道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同志参加所谓的七人小组以来，否定了列宁关于党的统一机关的思想。关于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建议，促使党走上继续采取镇压手段的道路，即我们向党发出警告的那条道路。只有当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光是靠镇压手段来坚定不移地维护党内民主制度和党的统一的时候，其针对派别行动的决定对党来说才会有权威性。

捍卫党的统一！

反对分裂！

恢复党的基本骨干对党的集体领导！

捍卫统一的惟一保证——党内民主制度！

提高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积极性！

伊·斯米尔加^①、克·拉柯夫斯基^②、

① 斯米尔加，伊·捷·（1892~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② 拉柯夫斯基，克·格·（1873~1941）——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1923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曾任党的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1941年被处死。后平反。

格·什克洛夫斯基^①、И. 库奇缅科、

恩·奥新斯基^②

① 什克洛夫斯基，格·李·（1875～1937）——1898年入党。1919～1921年是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曾在莫斯科做党的工作。后在俄罗斯联邦驻德国商务代表处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撤销此职务。

② 奥新斯基（奥博连斯基），恩·，瓦·瓦·（1887～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3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在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38年死于狱中，后平反。

No07937

托洛茨基：谈谈施米特同志关于工资的建议

（1926年7月）

施米特^① 同志的决议把必须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尽管我们这里说的是工资，而不是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但只字不提相当一部分经济工作者力图过度扩大管理机关的权力，致使工厂的内部规章不仅回到了“战前模式”，而且还有过之。例如，列宁格勒“红三角”工厂就规定，“如果一个工人在三个月之内迟到五次，哪怕一次只迟到一分钟，那他就会无条件地被解雇”。要求“对因病缺勤三天以下者保险部门减发甚至完全停发工资”，就是说，缺勤不超过三天的工人将被自动归入泡病号者之列。建议“为大型企业配备医生并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使他们成为对开病假条负责的人”。要求制定“强制性的工业法典，该法典应当规定管理部门的权利并赋予这种权利以某种不得抗拒的效力。”所有这些都刊登在《工商报》上（1926年7月1日第147号），标题为《如何同旷工现象作斗争》。

这些要求在全苏劳动局和工资等级制定局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有反映。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对劳动法典加以修改，使其规定：（1）管理部门有权在轻的处分未取消时给以重的处分；（2）“对多次违反上下班规定，一个月内三次擅自离岗，没有正当理由缺勤三天以

① 施米特，瓦·弗·（1886~1940）——1918~1928年先后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际委员会副主席。1925~1930年任中央委员。后遭镇压。

上者立即予以解雇时，对被解雇者“不发退职金”；(3)认为必须“在缺少劳动等价物的情况下（即在哪怕有正当理由而缺勤的情况下）将确定需要支付报酬的情形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修改停工付酬办法”，“修改关于为未成年人预留工位的立法”等等。（1926年7月14日《工商报》）

毫无疑问，工厂的劳动纪律应当得到维护。但劳动纪律的维护和加强应当越来越建立在工人自觉对待生产、搞活工会工作的基础上，而不应建立在机械地加重“处罚条例”和“授权管理部门任意运用该条例”的基础上，否则必然会出现粗暴损害工人权利的现象。对任何修改劳动法典以减少工人权利的企图都应予以坚决的反驳。所有提高工资的含含糊糊的许诺，同对经济制度的官僚主义歪曲和管理部门加强对工人的机械压力一样，其后果只能是加深工人与国家之间的裂痕。

* * *

施米特同志（在其石印的报告中）列举的数字说明了许多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工资政策的总方针是错误的。(1) 苏联商业企业职员的工资大大超过了工人的工资：**甚至在外省**，今年第二季度商业职员的平均工资也达到了60.81金卢布（莫斯科为102.82，列宁格勒为84.80），而同期全苏工人的平均工资仅为51.48；(2) 今年第二季度，工业职员的工资从第一季度的98.38金卢布**提高到了**101.42，而同期工人的工资从第一季度的52.14金卢布下降到了51.44。可见，工业职员还可以部分地补偿这一时期日用消费品的涨价，而工人甚至连名义工资额都未能保住；(3) 机关职员的工资与业务人员的工资之间的巨大差距引人注目：例如，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州和省级机关职员的平均收入在莫斯科为100.6卢布，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工作人员——其业务水平并不低——为66.61，而普

通学校工作人员为 50.68。农业人民委员部也是一样，农业人民委员部机关——91.29，而试验和示范机构——59.66，卫生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机关——108.93，而医疗机构和疗养院——51.76。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一种普遍的很不正常的倾向，即我们机构的官僚部分（工业职员，人民委员部的管理机关）与那些为居民的社会文化需求服务的工人和工作人员（医生、教师等等）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向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扩大。因此必须指示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采取坚定的方针，使这两部分人的工资最大限度地趋于平均。

* * *

建 议：

1. (1) 鉴于至今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尽管为此作了一个又一个决定，因此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同各加盟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在两个星期之内制定出对任何拖延发放工资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和其他责任的措施草案。

(2)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和劳动人民委员部从保证按时向工业和运输业发放工资的角度修订国家银行第四季度的信贷计划。

2. 认为必须：

(1) 使实际工资恢复到去年年底的水平；

(2) 防止工资下降；

(3) 在签订新的集体合同时保证工资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提高，首先从落后的工业部门（矿山工业、冶金工业、运输业）和每一部门中工资最低的那类工人做起。

(4) 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向政治局提交有关的计算结果。

3. 鉴于节约制度总是集中在阻力最小的方面，损害工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成立一个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对有关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并具体地提出可行性建议，即应把厉行节约的斗争引上适宜的道路的建议。

认为不能容许按照加强对工人的机械影响措施的精神修订劳动法典，工资等级制定局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正是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4. 责成李可夫同志（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一个月之内就下一个经济年度的失业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列·托洛茨基

[1926年7月]

№07938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

（1926年8月）

尊敬的同志们：

领导党的某种体制所引起的党内危机无疑已经成熟，需要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加以解决。对此大家都有同感。问题仅仅在于选择什么方式来解决危机。面对近期就要作出的重要决定，我们准备在这封信中把问题明确地提出来。

1. 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在一系列文件中，首先是在声明中，我们指出了那些把我们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领导的政策分开的深刻的原则分歧。不管这些分歧如何严重，但分歧本身并不是党目前所遇到的极其尖锐的危机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背离阶级路线的那些倾向是可以得到纠正和消除的，而且不会动摇和威胁党的统一——但是得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拥有正常的党内制度。然而主要危险恰恰在于目前党内制度完全使党丧失了表现自己、说出自己的意见、拨正党的路线和确定党的领导成员的可能性。列宁在遗嘱中极其明确地描述了对党构成威胁的远期的和近期的危险，遗憾的是，当时党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分裂必然会导致党的分裂；但这种前景极其遥远，而且也不大可能发生。在列宁看来，更严重得多的分裂危险来自机关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对这种权力的滥用。正是这第二种危险极其尖锐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在各阶级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分歧非常严重。然而，只有当无产阶级丧失了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领导农

民的可能性时，这种分歧才有可能动摇党的统一。这种危险没有现实意义。至少它没有对党构成直接威胁。党内制度则不大一样，它使党没有任何可能对自己的领导施加必要的影响。党对自己的机关没有任何影响。在党的机关的帮助下总书记周围逐渐形成的小集团把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无数的解释工作说明，向党解释的只是党的机关背着党、未经党同意、未向党通报所决定的事情。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解决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并对党的领导成员进行了重大改组。当时，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除列宁格勒外，全党根本就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在要党同意已作出的决定时党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些问题。7月，对党的领导进一步作了改组（将季诺维也夫同志赶出政治局，把组成斯大林集团核心的几个同志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在七月全会之前对此一无所知。这一建议本身是在最后时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提出来的，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全会召开前几天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根本就未涉及政治局的组成。党要做的只不过是听取对七月全会决定的解释，接受新的领导。

早在四月全会之前就知道，斯大林集团的上层决定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并保证使斯大林取得对托姆斯基^①、李可夫^②和布哈林^③的绝对优势。一些属于多数派的政治

① 托姆斯基，米·巴·（1880～1936）——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当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加创建红色工会国际，任总书记。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1936年自杀。

② 李可夫，阿·伊·（1881～1938）——1898年入党。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1930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31～1936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22～1930年为政治局委员。1938年3月被处死。后平反。

③ 布哈林，尼·伊·（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真理报》和《消息报》主编，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1938年被判处死刑，1988年平反。

局委员提到这个计划时非常气愤。当时还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拉舍维奇“事件”。该计划来自斯大林集团的整个组织政策。拉舍维奇“事件”后来只是部分完成这个计划的一个借口。我们当时在声明中已经指出，近期内将会找出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进一步改组党的领导。开除季诺维也夫同志，让托洛茨基同志留在政治局内，让加米涅夫同志留任位居第八的候补委员，目的是不使党受到太大的惊吓，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逐渐地、分几次完成对党的领导根本改组，以便后来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并“通过解释”迫使全党接受未经党的同意甚至未向党通报就决定的东西。为改组党的领导而提出来的那些借口实质上只具有次要意义。计划早在找到这样或那样一些合适的借口之前就炮制好了并开始实施。列宁在遗嘱中谈到斯大林滥用机关权力的危险时警告党注意的正是这种计划。

我们早在四月全会期间就对斯大林集团关于党的领导组织计划提出过警告，今天我们再一次认为有必要指出，现在问题不单纯是粉碎目前的反对派和把反对派从党的领导机关开除出去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个使任何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都不可能出现的领导集团。但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党的领导今后必然发生分裂。以上指出的组织改组的目的，是企图建立由那些过去同领导没有关系，不知道在列宁生前领导如何形成，接受的主要是斯大林集团上层的教育并被斯大林集团提拔到领导岗位的党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

[1926年8月]

№07939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委员

(1926年8月13日)

抄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关于（布哈林等人在讲话中）对我关于 我国性质的思想的公然歪曲

我在七月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苏维埃改选时说：

“奥索夫斯基同志说，我们是工农国家。这样说对不对呢？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用过这种说法，并且对此作了说明。他说，我们是工人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并且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弊端。”

这段引文已完全说明了问题。我重复列宁关于我们国家的论述，是为了在这方面把它同奥索夫斯基提出的错误论述加以对比。是工人国家吗？是工人国家。但不是一般的“工人”和一般的“国家”，而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农民占多数、并且存在着机关官僚主义弊端的国家中的工人国家。

我在这篇讲话中接下去谈道：

“列宁说，工人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而现有的工人国家反映了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巨大压力……”等等。

这段引文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工人国家，而是“现有的工人国家”。接下去我在这篇讲话中说：

“列宁说，工会要保护工人免遭的不是抽象的工人国家的损害，而是现有的工人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和一定范围内的损害，同时还要为保护这个工人国家免遭阶级敌人的危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即使不说其他任何话，光这段引文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我无需再重复我过去关于我们国家的性质不止一次和经常说的和写的那些与刚才所列举的引文意思一致的话。对于每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来说问题显然是非常清楚的。确切些说，这里根本不存在问题。

但在未经整理的速记记录中存在明显的歪曲、明显的谬论，——有人企图利用它们大做文章。正是紧接着关于工会应当为保护“这个工人国家”免遭阶级敌人的危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这段话之后，——紧接这段不容许作任何曲解的话之后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面临着危险的倾向——有利于富农的倾向——我们要求我们的党坚决进行干预，防止本来就远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进一步下滑，防止进一步从正确的（无产阶级的）路线向有利富农的方向下滑……”

究竟是我本人说走了嘴，还是速记员漏记了一个词，我认为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问题不在于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文字游戏，而在于确定我想要讲的内容。显然，速记员记录下的“远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几个字只不过再一次重复了上面多次重复过的内容，即我们拥有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纯粹的”无产阶级国家，而是具体的、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端等的工人国家。所以在整理速记记录时我把明显地歪曲了我的思想的“远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几个字换成了“远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意思是指明上面所说的一切。即使我没有对速记记录进行整理，对于任何一个根本就不了解我的观点、没有读过我的一篇文章、没有听过我的一次讲话的读者来说，只要他是认

真、内行和负责的人，通读全文之后完全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否定工人国家（甚至批驳这一胡说都着实让人感到难堪！），而是否定对工人国家的抽象的或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还需要对这一点加以充实的话，可以指出一个事实，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奥索夫斯基的观点大错特错，他说的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

昨天，对关于在速记记录中保留明显歪曲我的思想的说法的提案进行了表决。诚然，这一说法本身未必能引起认真负责的读者的怀疑，但在报刊上已经出现了分明不怀好意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坚决反对在我的速记记录中保留明显错误的说法的企图。这纯粹等于是，如果我在某一句话中漏了个语气词“不”，或者这个语气词是速记员偶然漏掉的，于是便有人企图根据这一点来制造政治诬陷，全然不顾这一句话和整篇文章的总的意义，而后来为使这种诬陷永久化，便提议永久保留文章中被偶然歪曲的地方。

列·托洛茨基

1926年8月13日

附记：

一些同志认为可以把被歪曲的那句话抽出来，使它同我的整个讲话相对立，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能促使这些同志发表声明，承认他们的行为是轻率的或错误的。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

政治局不得不在我缺席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因为我从星期一一开始外出休假，获准的假期为一个半月。

列·托·

No 07940

反对派声明

（1926年8月13日）

我们反对将奥索夫斯基同志开除出党，理由如下。

1. 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奥索夫斯基同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为由作出了开除奥索夫斯基同志的决定，没有向他提出任何其他的指责。中央监察委员会称这篇文章是孟什维克取消主义的文件。显然，对此不应当理解为：奥索夫斯基同志是暗藏的孟什维克，钻进党内是为了达到反对我们党的目的；而应当理解为：他在文章中叙述的观点发展下去可能会得出孟什维克的结论。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像对待凶恶的敌人那样对待奥索夫斯基同志。在第二种情况下应当把他看做一个走上错误道路的同志。不管中央监察委员的决定措辞多么激烈，但决定指的是第二种而不是第一种情况。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

2. 维护党的思想路线是包括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内的党的领导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开除党籍无疑是维护党的统一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则是一种必需的手段。但这是一种极端的手段。正确地使用这种手段，即正确地使用党的惩罚措施是保持党的制度的健康其中包括维护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3. 我们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整个活动中，特别是在这件事上，没有正确地使用党的惩罚措施。实质上事情是这样的：奥索夫斯基同志那些以高度概括而且是错误的形式表述的极其错误的观

点，先是被偷偷塞给了整个反对派，尔后，在用这种不能容许的手段给奥索夫斯基的文章加上其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政治分量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追究奥索夫斯基同志的责任并将他开除出党。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不是维护党的思想路线的措施，而是半遮半掩、有意罗织的对反对派的打击。这一点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给政治局的附函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4. 说反对派没有在全会上指出奥索夫斯基同志的错误观点，有意把一封原先谁都不知道的信拿来进行讨论，这是不正确的。但反对派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只集中打击奥索夫斯基同志，而对一大批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提出的明显违背党的原则的声明和建议从不作任何谴责的做法。

5. 尽管有人完全准确地多次指出了在工会章程、在对待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合作社、苏维埃改选、党内民主等问题上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也没人对那些犯有粗暴歪曲和公然破坏党的路线的错误的领导同志进行谴责，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同志式的形式提出谴责。

6. 只要提起下面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关于党内制度的问题上，当一位政治局委员提到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23年12月5日决议说党内官僚主义制度促成派别活动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谢夫同志声称，上述党的决定是“对托洛茨基的错误让步”，而这个决定至今仍有完全的效力和极其重要的意义。记入速记记录的这些话没有遭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任何反对或谴责。对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制度和派别活动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决定持否定态度的古谢夫同志，以他的一票决定着一些被指责搞派别活动的同志的命运。

7.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予以关注的是，在针对反对派的出版物中出现了大量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文章和小册

子，这些作品没有遭到反对只是因为它们是针对反对派的。例如斯列普科夫同志，尽管他写的东西具有不可饶恕的机会主义性质，不仅没人去谴责他，相反，他却去谴责别人。

8. 一批既没有经受过阶级斗争考验，也没有经受过革命考验，更没有经受过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斗争考验的年轻教授在党的刊物上横行霸道，使党的发展中一些必要的迫切问题要么在刊物上根本得不到阐释，要么得到的是纯粹的表面的、肤浅的、经院式的阐释。这导致党的思想工作处于零敲碎打的状态，缺少活生生的检验，缺少同志式的思想批评，因而是畸形的。这种状况的后果之一就是奥索夫斯基同志的错误观点。

9. 无论是从奥索夫斯基同志的文章中，还是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的解释中，我们都得不到如下的印象，即奥索夫斯基同志从内心里同党断绝了关系，即使比较正确地对待他，他也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这就是我们反对将奥索夫斯基同志开除出党的原因。

10. 此外，我们愤怒地坚决驳斥这样一种诬陷，似乎我们想要把我们党变成几个派别的总和或某种类似的英国工党的东西。我们完全主张在革命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极力主张对那些破坏党的路线的纯洁性并使党陷入内部纷争的右的倾向进行谴责。党的思想纯洁的真正保障在于回到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列宁主义的党内制度上去。

列·托洛茨基

No07941

拉狄克：关于反对派

(1926年8月)

第1个问题：联共（布）内是否存在反对派？

答：1923年联共（布）的队伍中产生了反对派。反对派提醒党注意由于不善于加强工业、由于官僚主义压制日益严重而产生的威胁革命的危险。反对派要求实行党内民主和计划经济。尽管反对派集合了三分之一的党员，但还是被以一己的意志冒充党的意志的党的机关所击败。然而反对派并没有消失。

1925年末，一部分党的领导人确信，1923年的反对派提醒注意对党构成威胁的危险是正确的。这部分党的领导人坚定地认为，继续存在对党施加官僚主义压制将扼杀工人阶级先进部分的积极性，将使他们在面对小资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富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解除武装。这些领导人坚定地认为，应当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快发展工业（工业化）来对付这些危险。

1923年和1925年的反对派在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联合起来，为纠正党的总政治路线而共同奋斗。

第2个问题：反对派对联共多数派提出了哪些指责？

答：（1）对党进行官僚主义的压制；（2）美化苏维埃国家的现状，否认苏维埃国家接近工人的必要性；（3）美化新经济政策和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比重估计过低；（4）不理解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潜伏的危险；（5）对农村的分化估计不足，掩饰富农不断增长的作用，同时纵容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农业合作社方面采取依

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即实质上是富农的方针；（6）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比工人、贫农和贫苦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得还快所产生的危险估计不足，由于放宽了选举条例和选举办法而助长了这种提高；（7）对工资、农业、住宅建设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节约制度问题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8）歪曲统一战线策略，将团结群众的方针偷换为同工人运动的右派领袖结盟的方针；（9）对建立东方全民族运动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强大的独立组织的必要性不理解。

第3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反对派提出了哪些指责？

答：（1）不理解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2）过分强调官僚主义的危险；（3）对靠牺牲农民实现工业化会破坏结合的危险性估计不足；（4）对工人问题采取蛊惑人心的态度；（5）企图通过组织派别来分裂党；（6）结成无原则的联盟；（7）借口党内民主而鼓励取消专政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第4个问题：党内官僚主义制度的表现是什么？

答：表现是：1. 党的机关代替党作决定。

2. 在党的会议上每个党员都不敢对党的机关和党的政策提出批评。

3. 敢于揭露和批评的人均遭到迫害。下放到农村和撤离生产岗位不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而是为了进行迫害。

4. 在党内建立告密和诽谤制度（通过所谓的秘密情报员），受害者往往是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党员。

5. 从上到下，从省委书记到支部书记，挑的都是“阿谀奉承”的人，这些人由于“害怕”而不顾党员的良心执行上边的任何决定和命令。

6. 工人党员感到自己在支部书记、行政领导人和地方委员会或工厂工会委员会主席面前处于无权地位：一旦发生冲突就有被解

雇的危险。

7. 一切关系到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都未经广泛的党的会议讨论，都是背着党决定的（生产伏特加酒；工资问题；向农村有产业的工人征税；推行节约制度问题，而节约制度往往是裁减低级工人；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修改工会章程，从而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打开了大门；放宽选举条例，违反苏联宪法给富农、小业主等以选举权）。党的机关进行上层争论，而全体党员群众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

8. 向党隐瞒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重要决定和问题不在党内进行集体讨论，而是事先按照官僚主义的方式在统治集团中间加以敲定，然后拿出准备的决定，谁也不敢对之提出异议。

9. 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统治集团由于害怕公开性和批评自己的错误，自己就在组织派别。上行下效，省委和区委内纷纷组织派别性的三人小组、五人小组和十人小组，在小组范围内传阅秘密文件，作出不仅党全然不知而且其余正式的机关干部也全然不知的决定。因此，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集团脱离其余机关干部，而机关干部本身又脱离党的状况，具有危险的性质，结果党在党外群众中丧失了威信。所以，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提出，官僚主义导致党脱离群众并成为派别活动的根源，这是正确的。

10. 党在思想上的蜕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出现了新的工作人员阶层，这些人官气十足、一身媚骨、阿谀奉承、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独立的见解，成了一群没有原则、只知服从的官僚主义乌合之众。

11. 官僚气十足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占据了党的所有职位，并为那些等待时机以便把无产阶级专政拖离共产主义政策轨道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开辟道路。他们企图利用工人阶级的消极性把无产阶级专政转向农民资产阶级一边。

12. 官僚主义制度扼杀了党内的积极性，从而使工人阶级无法对走背离革命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小资产阶级道路的企图予以反击。

无产阶级恰恰在城乡小资产阶级赢得民主权利的时刻失去了主心骨。（农村的苏维埃民主和最近选举的总结。）

第5个问题：能否一下子消灭官僚主义？

答：当然不能。但问题在于，官僚主义没有减少，相反却有了极大的增长。党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每一次重要尝试都引起上面的迫害，从而迫使优秀的党员去建立派别，官僚主义越是反对派别，它所产生的和滋养的派别就越多。

思想上的短视总是与官僚主义相伴而生。统治集团的领导者使自己越来越孤立，已经没有能力评价整个形势和预见明天，也不能给党以广泛的指示。党的政策盲目不定，从而有导致更大失败的危险。无论是谁，只要他试图总结困难，弄清困难之间的联系，对未来作出展望，都会使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者惶恐不安，并招来搞派别活动的指责。一种制度积累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越多，它就会变得越让人难以容忍。

第6个问题：官僚主义增长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答：基本原因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党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党的传统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传统。背离阶级路线就必然要剥夺党的决定权，必然要以机关官僚主义的方式将政策强加于人。

与农民的关系

第7个问题：反对派的政策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的危**险，这种说法对吗？**

答：反对派的政策旨在加强结合。结合的基础不是关于结合的动听言辞，而是以农民能够接受的价格向他们供应足够数量的优质

商品。商品荒及由此而引起的价格上涨对结合构成了威胁。反对派极力主张加快发展工业，这是克服商品荒从而克服城乡分离的最重要的手段。此外，对结合的威胁来自富农和耐普曼的增长，他们试图将农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将农民同无产阶级分离开。反对派力图缩小富农和耐普曼在经济中的影响，从而缩小他们的政治影响。可见，反对派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

第8个问题：反对派想不顾一切地把农民的积累抽给工业，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样提问的目的无非是想搞乱人的思想和吓唬农民。这也是一种蛊惑煽动。既然我们的国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既然这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这对于农民的利益来说同对工人一样必要，那么就不能把人民的即首先是农民的资金投入工业。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在每个时期能给工业投入多少资金，以便通过这种途径达到最正确地、对全国来说最合理地分配积累和全部资金。工业品的匮乏和批发、零售价格的巨大差别表明，对工业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任何数字、结论、尤其是关于超工业化主义者的任何空话，都无法消除这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表明，国内的积累在工业和非工业居民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当，由此产生了商品荒，从而养肥了私商并削弱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

农民从这种实物和货币积累中，即从农民无法换取其所需要的工业品的积累中，能否得到好处呢？不能，农民由此得不到好处。在工业国有化和外贸垄断的情况下，农民本身已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股东，因此同正确而合理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以及农民积累体系相关。对于农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他投入了多少卢布，而是他拿这些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商品荒和价格的过度差别表明，如

果农民投入国有工业的积累比现在多，国有工业将会给他们绰绰有余的回报，即向他们提供较便宜的商品，这样全体农民就会得到好处。

第9个问题：笼统地说从“农民”口袋里掏钱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农民根本没有一个总的口袋。农民现在已经包括有经济力量各不相同的各个阶层。据粗略计算，农民积累了大约4亿卢布的钱财。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平均4卢布或每户20卢布。农民积累的分布极不平均。贫农一点儿积累也没有，却负债累累。中农多少有些积累，但大多数积累在上层即最富裕的阶层手中。积累的主要部分在富农上层手里。粮食储备的情况也是如此：储存和积累粮食的是富裕农民。可见，这里说的不是从农民总的口袋（没有这样的口袋）里，而是从富农和富裕阶层的积累中抽取额外的资金给工业。这样取得资金将会给中农和贫农提供比较便宜的工业品。这对于农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利的。

对工业的态度

第10个问题：说反对派认为应当把国有工业租让给外国人，是这样吗？

答：这种论断同关于“超工业化”（即力图过度而不合时宜地发展工业）的叫嚷直接矛盾的。不仅如此，这种论调也是一种最卑劣的诬蔑。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手段，只是因为党被官僚主义扼住了脖子。

《真理报》断言，梅德维捷夫同志在其1924年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主张对大部分国有工业实行租让。梅德维捷夫同志两年半以前所写的这封信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谁也不知道这封信，因而无法判断《真理报》所讲的信的内容是否属实。但1923年的反对派

和 1925 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与这封无人知晓、反对派既没写过也没传过的信毫无关系。

反对派认为，关于国有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为此反对派要求改变税收体制和价格政策，重新编制预算。租让在我国的经济中只能而且应当处于受到严格限制和从属的地位。任何试图使租让的范围超出一定限度，即让外国资本对我国经济拥有主导性的或哪怕只是相当大的影响的做法，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公然背叛。

第 11 个问题：说反对派想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并通过这样的方式靠降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来发展工业，是这样吗？

答：不，不是这样。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祸害是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剪力差。这种剪力差养肥了商人和投机倒把者，他们赚了数亿卢布（今年已近百万卢布）。国家按出厂价格出售商品，而农民和工人则按零售价格购买商品。近一年半以来我国的批发价格始终未变，但零售价格却大幅上扬。在许多情况下，当零售价格上涨导致需求减少时，可以提高出厂价格而不提高零售价格，因为需求制约着私商哄抬零售价格的限度。任务在于把尽可能多的批零差价交到国家手里以发展工业，而无论如何不要提高零售价格。如果零售价格居高不下，批发价格低廉对工人和农民来说毫无关系，提高出厂价格要打击的是私人资本，而不是消费者。应当从这个方面寻求解决办法。

要是提高出厂价格导致零售价格上涨怎么办呢？应当谨慎行事，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如果零售价格随批发价格开始上涨，应当停止行动。应当慎之又慎地摸索。国家得到的商业加价部分越多，工业发展得到的资金就越多，工业就能更充分地满足需求。这是降低零售价格的惟一途径。这与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工 资

第 12 个问题：说反对派提出先保持现有工资等以后再逐渐提高的口号是在进行蛊惑宣传，对吗？

答：只有不知道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人才会这样说。不逐渐地提高工资，不提高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道路上将一事无成，因为如果工人不关心工业的发展，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我们只是在工人开始“磨洋工”时才提高工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是靠劳动力单纯地拼体力。同时，工资的提高甚至常常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或者相反。（从 1925 年 8 月至 1926 年 3 月这段时期每个工人的日生产定额提高了 7.0%，而日工资却下降了 8.0%。）

这不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策。这种政策带来的是昙花一现的效果。最后，机床过载将导致机床的损坏，劳动力超负荷将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和工人体力衰竭。在企业的官僚主义制度下对这种政策的不满也会促使工人走上酗酒和政治消沉的道路。这就是对工资问题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导致的后果。在工资方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应当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工资和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应当靠对机床和机器进行技术改造。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均匀增长。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反对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

1. 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反对派提出建议，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降低实际工资，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提高时提高名义工资。相反，统治集团起初建议不降低名义工资，但允许在一定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只是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多数派才通过决议，同意

“把工资保持在现有的实际水平上”。

2. 在中央七月全会上，针对实际工资持续下滑和推行节约制度时出现的官僚主义弊端，反对派再次提出讨论工人状况问题。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拒绝了这一建议。

可见，在工业接近战前水平、耐普曼和富农的收入不断增长的时期，提高工资的要求却被看做是蛊惑宣传。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关于提高工资是蛊惑宣传的论断被他们自己推翻了。中央由于害怕反对派的壮大而任命了一个全苏委员会来制定提高工资的措施。这就表明，反对派提出的要求是可能得到满足的，所谓反对派进行蛊惑宣传的叫喊只不过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居心不良的表现。

最近，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由于觉察到了工人的不满和惧怕反对派，于是宣布将工资平均提高7%。这种提高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举措，是为了对付反对派，而不是工人政策中心的某个方针，这有下面的事实为证：（1）这种提高是不够的，因为反对派要求提高15%，以使实际工资水平达到1925年秋天的水平；（2）这种提高不能保证工人的工资在零售价格上涨时不降低，因为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拒绝了反对派关于在价格上涨时提高名义工资的建议；（3）现在实行的提高完全被房租的提高和生活费用的上涨所抵消；（4）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在工业方面的政策导致商品荒加剧，使经济上的困难越积越多，从而使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改善更加困难。

可见，现在实行的力度不够的提高工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举措，像12月5日的决议一样。其目的是让工人共产党员摸不着头脑，从而轻信他们的话。这就是反对派要求自由讨论一切有争论的问题的原因。

第13个问题：有加快工业化速度和保持并提高实际工资所需

的资金吗？

答：毫无疑问，资金是有的。提高工资所需的资金同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一样，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放在国家金库里等你去拿。这些资金应当去争取。为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正确的工业积累政策、正确的税收政策和正确的预算政策挖掘这些资金。

为此必须：（1）在确定出厂价格时做到确保现在由于批零价格剪刀差而落到私商手里的那部分商业利润的相当大部分能流入国家的口袋里。（最近两年从工业领域的超额加价大约有 15 亿卢布。而今年的基本建设工程，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计，至少必须投入 12 亿卢布。）

（2）加强对富农的征税力度，因为富农利用手中积累的多余资金收购粮食，囤积居奇，促使粮价上涨，剥削贫农，不仅对工人的工资，而且对国家的整个进出口计划都是个打击（最近富农阶层的积累已达 4 亿卢布）。

（3）在分配预算资金时确保工业比以往任何时候得到的都多。现在根据预算，工业为预算提供 23100 万卢布，而得到 23050 万卢布。

（4）实行节约制度，吸收工人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应保证工人群众对旨在削减生产过程中的非生产性开支的措施的落实进行监督。来自下层的社会监督是实行节约制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必须彻底消除那种主要是在工资上节约、动不动就裁减低级工人的节约制度。

（5）每年对国民经济资源进行有利于工业的再分配，以便结束那种工业越来越落后于国民经济需要的增长、由于商品荒导致零售价格昂贵而工人和农民多付钱的状况。

工人国家还是工农国家？

第14个问题：说反对派否认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对吗？

答：不对。反对派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曾否认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但与列宁一样，反对派注意到，我们的工人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非无产阶级的，国家不能将大量的、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这两个因素带来的后果是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困难重重。旧沙皇和资产阶级官僚的残余在工人阶级及其国家之间建起了一堵墙。要同这种情况进行斗争，只有尽全力吸收工人阶级参加国家工作，放手发动工人批判官僚主义弊端，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党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借口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而否定使工人阶级接近国家工作的任务。中央委员会多数派认为对官僚主义的任何批评都是故意捣乱和反对派行为。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富农和私商的力量即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估计不足。可见，他们实际上在促使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减退。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指责反对派，说反对派的言论削弱了我们国家的工人性质，这是错误的。可反对派指责中央委员会多数派，说他们的政策如果得不到党的纠正，就会在实际上导致苏维埃国家丧失工人性质，而这已得到了证实。

关于派别

第15个问题：什么是派别，派别是如何产生的？

答：派别指的是从整体分离出来，对一系列根本问题持有特殊的观点，拥有比较固定的单独组织，试图改变党的政策的党内一部

分人。党内特殊观点的产生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没有得到全党的赞同；但只有在党组织不让少数自由发表其自己的观点的情况下，观点上的分歧才会导致派别分离。在没有机会以合法方式捍卫党的情况下，少数派或者应当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者应当进行斗争，但斗争会扩大由于意见相左而造成的裂痕。可是如果分歧事关重要的问题，那少数就不能放弃斗争，即使遭到再大的迫害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看来，党的政策是错误的，有导致革命灭亡的危险。在各封闭的派别的斗争中，分歧越积越多并趋激化，派别的隔绝越深，暂时分歧变为永久的分歧就越多，并决定着派别成员对所有其他问题的态度。分歧的总和可以说明，党内的各个部分开始或多或少地反映或表达不同阶级的利益。说到底，无产阶级党分裂为各个派别表明了非工人的集团和阶层对党的影响。处于萌芽状态的派别斗争是党内阶级分化的反映或先兆。

第 16 个问题：我们党内的派别斗争是否有阶级内幕？

答：当然有。苏联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除此之外还有在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复活的旧资本主义阶级的残余。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是不矛盾的，因为农民将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然而，第一，农民的利益同少数农民——富农的利益是矛盾的；第二，广大中农群众并不向往社会主义，他们把要求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任何牺牲都看成是沉重的负担。因此在苏联以苏维埃政权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展开了斗争，而富农和私商则极力激化这一斗争。

在共产党内存在着农民成分和受工人阶级熏陶不够即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有一定联系的知识分子。这些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党内维护私有者的利益。此外，党内的工人多数在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时不得不顾及农民的情绪以及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反抗。对这种反抗过度恐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导致从无

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滑向农民观点。这样一来党内的农民成分和半农民成分就结合起来，先进工人内部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方面产生的分歧就具有成为阶级分歧、成为拥护还是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的趋向。

第 17 个问题：反对派是否维护派别的存在？

答：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反对派不仅不会维护派别的存在，而且相反，是派别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反对派反对派别，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按照反对派的意见，只有在非无产阶级成分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执行无产阶级政策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承认任何在党内建立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权利。先进工人中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方法方面将会经常出现一些分歧，但这并不需要建立独立的派别。这些分歧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在党组织内消除。在工人们的问题经过讨论并弄清问题的实质之后，由各个组织通过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暂时错误比党的分裂带来的危害要少。在共产党内是不允许出现小资产阶级派别的。要是党内民主，先进工人并非一定要分裂为各个派别的。

第 18 个问题：谁应对联共内派别斗争的激化负责？

答：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联共（布）内派别斗争的激化负有特别的责任。

它以其堕落到为小资产阶级分子保驾的政策奠定了这种斗争的基础。工人共产党员不能容忍那种一提利用富农和耐普曼的积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大喊救命的政策。先进工人不能容忍那种要苏维埃专家和官吏低估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增长的政策。先进工人不能容忍农业人民委员部试图把合作社这种工人专政也就是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具，变为支持富农的工具的政策。先进工人不能容忍给予剥削分子苏维埃选举权的做法。任何从无产阶级的阶级

立场转向小资产阶级立场的行动都会引起和应当引起党内无产阶级的反抗。但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不仅以其政策引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而且使得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方式消除分歧。它禁止先进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和在党支部内同背离阶级路线的行为作斗争，对提醒党注意党所面临的危险的每一个党员横加迫害。它不让先进工人说话，禁止党内争论，向党隐瞒反对派的真实观点，把一些表达截然相反观点的文件作为反对派的观点抛出来，并以这样的方式伪造党的意见，用各种威胁手段强迫党的组织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在党内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党员不是根据自己的见解投票赞成决议，而是口是心非，以免遭到迫害。这种局面使得不能通过争论的方式形成少数派应当服从的真正的多数派。多数派除了不让党内先进工人的代表说话，还对任何试图在党内越过官方组织而弄清分歧的做法加以无情的压制。同时，它并不满足于夺取党的机关，还在党内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以保证其对党的机关的控制，不管党内大多数人是否拥护它。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政治局被盲目跟随斯大林的中央委员的不合法的全会所取代。政治局被不合法的斯大林领导集体所取代。从省委和区委直至基层党支部内部，都存在着靠派别内部纪律维系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秘密组织。这些组织不仅使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权利，而且使广大没有参加反对派、但由于某些原因被看做不太“可靠的”党内同志的权利化为乌有。这样，中央委员会的斯大林多数派就以其政策、以其背离阶级立场的行动在党内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分歧，并以其组织政策阻断了通过正常方式——即通过对党组织的决定进行争论的方式纠正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错误的道路。可见，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及其政策和组织方法是联共（布）内派别产生和巩固的根源。

第 19 个问题：派别的存在是否违背党代表大会的决定？

答：是的，违背第十次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两个

决定清楚明确地禁止派别的存在。但这些决定同时也给予党以党内民主。正因为如此，这些决定要求抛弃由某些同志组成的集团封闭地、秘密地决定党的问题的做法，从而使全党有可能公开地、共同地解决党内问题。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送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它在断送这种可能性的同时又叫喊反对派别活动，那么这就意味着它要求由那部分表现出官僚主义蜕化倾向、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党的机关的干部垄断党的领导权。革命工人没有给予它这种垄断权，因为这种垄断权以书记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书记处则把党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引向具有农民民族局限性的政策，尽管速度缓慢，但确定不移。在中央七月全会上反对派不得不团结一致奋起制止党发生蜕化的危险。

反对派联盟

第20个问题：说反对派是一个无原则的联盟，对吗？

答：上面的回答表明，在所谓无原则联盟的叫喊后面隐藏着对反对派所捍卫的原则的畏惧。1923年和1925年反对派联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过去尽管进行过斗争，但这个联盟之所以能够成立，正是因为党的发展经验表明必须坚持三个原则：（1）加快和加强工业化，以此作为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成分所面临的来自资本主义成分的威胁的手段；（2）坚持党内民主，以此作为克服党的上层官僚主义蜕化的手段，这种蜕化表现为党慢慢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3）坚持能保证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和加强共产党与处于动荡之中的非共产主义工人群众的联系的国际政策。这三个原则表明，反对派联盟不是一个东拼西凑、由各种不满分子组成的临时性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由那些对革命的发展提出的基本问题作出相同回答的共产党员组成的战斗联合体。

正是为了向党隐瞒反对派联盟这些意见一致的回答，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时而试图把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在1924年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观点塞给联盟，时而试图把奥索夫斯基同志的观点塞给联盟，尽管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非常清楚，反对派坚决反对把我国经济命脉拱手送给外国资本、解散共产国际和分裂党的思想。这并不妨碍反对派反对把持有这些观点的同志开除出党，因为反对派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如果党回到党内民主制度上来，如果党给自己明确地提出日益成熟的革命问题，——那么它就能够把党内所有的无产阶级分子团结在明确的革命答案周围，并根除过去曾与党一起进行反资产阶级斗争的那部分党内人士的悲观失望的错误。

第21个问题：**是哪些原则把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团地在一起的？**

答：如果可以笼统地谈论我们党内的无原则性，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提出这样的指责。它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国家工业化的口号，可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它就开始叫喊什么实现这个口号困难重重。这些困难其实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就已尽人皆知。既然多数派认为这些困难是不可克服的，那它在代表大会上为什么要提出工业化的问题？它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向右转。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于反对派提出的提高工资的口号不依不饶，揪住不放。而两个月之后，这个刚刚还被说成是蛊惑宣传的口号，却被它接了过去。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大叫大嚷反对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但自己却建立了一个封闭的派别，而且滥用党的机关和设施。总而言之，多数派的行动和理论常常是脱节的。政策的无原则性正表现在言行不一上。

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称反对派是形形色色分子的大杂烩，那它自己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由形形色色分子组成的联盟。聚集到这个

联盟内的有滑到富农观点的党员（加里宁^①、亚·彼·斯米尔诺夫^②、伏罗希洛夫^③）和我国工会领袖中滑到工联主义观点、对欧洲工会的“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分子（托姆斯基、乌加罗夫、施米特），有拜倒在富裕农民脚下的共产党员和在形形色色的普塞尔和皮尤面前、在“工人运动的铁腕人物”面前卑躬屈膝的共产党员；聚集到这个联盟内的还有鼠目寸光的党内官僚，他们把机关当作党，把革命和反对派提出来的重大问题看作知识分子的捏造。富农把掏不出钱的贫农看作不务正业的人，而欧洲工会的头子则对进不了资产阶级办事机构的革命群众不屑一顾，党内官僚也一样，把不卖砂糖、不知花钱为何物、不愿背着党处理党的事务的革命者看作不务正业的人。热衷于事务工作，拒绝解决需要克服巨大困难的伟大任务——这就是维系斯大林集团的主线。然而革命的政策要求把日常工作同革命的前景、小心谨慎同敢想敢干结合起来。为了日常工作而放弃革命的前景，借口小心谨慎而放弃敢想敢干，将使党面临庸俗化和分裂的危险，使党内团结遭到削弱，使党没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能力反击巨大的危险和经受历史的考验。而失去革命前景的斯大林集团甚至无力保证自己队伍内部的团结。伟大的目的具有凝聚力，渺小的目的具有离心力。因此我们认为斯大林集团的队伍内地方利益、部门倾向之间将进行持续不断的争夺。如果明天

① 加里宁，米·伊·（1875～1946）——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起任全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起任党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年起为政治局委员。

② 斯米尔诺夫，亚·彼·（1877～1938）——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等职。

③ 伏罗希洛夫，克·叶·（1881～196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元帅。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起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防人民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反对派被消灭，那么斯大林集团就将会土崩瓦解，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事务主义原则不能取代列宁的原则、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反对派就是在这些原则周围集结起来的。

第22个问题：说反对派得到国际孟什维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赞赏，对吗？

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刊对联共（布）内发生的事件的评价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缺少正确评价复杂现象的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这样的方法。因此，在世界报刊对联共（布）内部事件的评价中，不乏赞赏反对派的声音，例如有名的倒戈者、玩弄社会主义原则的保尔·莱维^①。但越是接近资本主义实业界，对俄国共产主义内的派别斗争的评价就越正确。我国的报刊在斯捷茨基^②和马列茨基、舒宾和扎斯拉夫斯基^③之流的一手控制之下，竭力向共产主义工人隐瞒大资本主义报刊的声音。它们隐瞒这些声音是有原因的。资本主义报刊称斯大林的方针是依靠富农的方针。法兰克福交易所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直言不讳地写道，只要斯大林掌权，就没有人敢欺负富农。纽约一家大银行的机关报《Guaranty Survey》对斯大林从依靠工人转而依靠富农的举动大加赞赏。不仅如此，以维也纳《工人报》为首的孟什维克报刊欢呼斯大林的胜利，

① 莱维，保·（1883～1930）——德国共产党人。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成员；1918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0年当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在德国“三月发动”问题上同德共“左派”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被开除出德共和共产国际。1922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接着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② 斯捷茨基，A.И.（1896～1938）——1915年入党。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委员和列宁格勒省委部长。1930～1938年任联共中央部长，1934年起兼任《布尔什维克》主编。遭镇压。

③ 扎斯拉夫斯基，达·约·（1880～1965）——苏联新闻工作者、著作家。1903年加入崩得。1934年加入联共（布）。

说这是托拉斯大亨、银行经理、机关权势分子对1917年革命幻想家的胜利。但就是这家报刊在夸奖斯大林的有益开端的同时，也向他提出了要求：要想有所得，就要有所舍，既然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想要依靠小资产阶级，那就应放弃专政，因为拥有革命的过去的官僚专政不难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得到法律保障，需要消除官僚主义土皇帝恣意妄为的行为。为了证明存在这种恣意妄为的行为，资产阶级报刊援引了反对派对党内制度即对官僚主义高压制度的批评。但如果把这看做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反对派的支持，那么对于世界资产阶级报刊在得知捷尔任斯基^①的最后一次讲话即关于现在的多数派领导下的经济机关土崩瓦解的讲话后而欣喜若狂又该如何解释。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一字不差地转载了这篇讲话。捷尔任斯基为此已不可能承担责任，因为这篇讲话是在他死后发表的，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让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之流或前《交易所新闻》的编辑舒宾壮着胆子去谈论捷尔任斯基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吧。

最后，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出版一个单行本，把资产阶级领导机关报有关我们党内危机的文章都收进去。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因为大资产阶级报刊基本上是赞成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而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请他们就不要嫁祸于人，对这些实际上是一种警告的称赞好好考虑考虑。

反对派追求什么

反对派追求的不是党的分裂，恰恰相反，追求的是恢复党的统一。恢复党的统一需要：第一，建立党内民主，即党的所有组织都

^① 捷尔任斯基，费·埃·（1877—1926）——1895年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俄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有权自由讨论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有权在不受机关压制、不受迫害、流放和调动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有权选举所有公职人员，取消打着推荐幌子的委任制。所有党支部都应有相互交往的权利，因为党应当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而不是把他们分成相互隔离的小团体。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应当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各级党委自由解决党的问题的权利应当得到恢复。这样一来所有其他派别存在的理由就将轻而易举地消失。党将在自由争论中确定解决经济、政治和组织领域中已成熟的问题的办法。第二，坚决反对党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只有放弃纵容富农和私商的政策，放弃给予剥削分子（牧师、磨坊主、烟草种植园主）权利的政策，放弃通过合作社扶持富农的做法，这样才能够把农村贫农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只有动员农村贫农和中农才能开辟利用富农和耐普曼的积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实行党内民主，只有每个工人共产党员都有同所有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奢侈浪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行为作斗争的自由，才能实现节约制度的口号，把现在遭到浪费的相当大的预算资金用于工业化。只有正确的革命政策才能保证党的团结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革命不可能原地不动。它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只有反对派的政策才能保证作为革命杠杆的党的统一和革命的发展。只有一个领导着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能保证现在成为列宁所创立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大团结的残留组织的共产国际的团结和发展。

卡·拉狄克^①

1926年8月

^① 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36年被捕，后平反。

No07942

托洛茨基给一名匿名共产党员的信

(1926年8月25日)

尊敬的同志：

您在信中说：

“列夫·达维多维奇：联系到中央委员会内最近发生的事件，您不认为您‘在群众中的游说’（在一些疗养院）有点不知分寸吗？好像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没有这样做！

党证号为 294557 的乌共（布）党员及其他党员”。

我没有完全弄清楚，您在您的信中想说什么？您住在基斯洛沃茨克，所以想必您是知道的，我到几家疗养院去访问并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在那里治疗和休养的一些病员提出来的。对于您的信可以这样理解，即我应当拒绝以生病的同志们的名义向我提出的合影或谈话的请求，对吗？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您是否想过，如果我按您的主意去做，即拒绝顿巴斯、巴库、莫斯科的工人或“教育工作者”希望与我共同度过 10~15 分钟或合影的请求，——您想过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人指责我根本不想关心生病或休养的同志们，不是吗？我认为，这样的指责至少比您在信中提出的指责理由要充分得多。

诚然，您在信中说：“好像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没有这样做。”可首先您在这里就错了。我本人就同李可夫同志在基斯洛沃茨克疗养

院合过影。我不怀疑，其他政治局委员如果面对这样的请求，他们也不会拒绝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们会见或合影的。

您在信中提到“中央委员会内最近发生的事件”简直让人莫名其妙。党内产生的这样或那样一些分歧同看望生病和休养的同志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您这是不是已扯到极端荒谬的派别活动上去了呢？谁不想让思想上的分歧破坏党的统一，谁就不会用流言蜚语、无端怀疑、诽谤中伤来使这些分歧复杂化。而您，根据我对您的信的理解，走上的正是这样的路。请您认真地想一想您所写的内容！那些邀请我去疗养院的党内和党外工人及全体病员，当然没有想到把这样的邀请同我们的党内这样或那样一些分歧联系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我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是革命的工作人员之一。在与他们的简短谈话中我无非是讲了讲什么是我们党的共同的政治财产。我以自己的全部所作所为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思想，即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分歧，我们的党都会保持自己的团结，保持自己的革命统一。而您简直走到了可鄙的派别活动的地步，竟然说我看望同志们——完完全全是应他们的邀请——和我本着党的路线和党的统一的精神与他们谈话是“不知分寸”（?!）。

我毫不怀疑，像您这样的具有狂热分裂情绪的同志在我们党内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疗养院绝大多数同志的情绪正说明了这一点。我再说一遍，您要是好好想一想，您就会明白这一点。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6年8月25日

于基斯洛沃茨克

附言：还有一个情况不能不特别指出来，即我所收到的邀请上

都有几位同志受病友委托的签名；可您的信却没有签名，只有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党证号码和“及其他党员”。为什么不署名呢？这是否意味着您及“其他党员”自己对您的信的性质和口气感到有点难为情呢？

列·托·

No07943

托洛茨基给拉狄克的信

（1926年8月30日）

亲爱的卡尔·伯恩哈多维奇：

1. 今写信跟您谈谈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我完全赞成您就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但必须具体化——以方便不了解情况的读者，而实质上所有的读者都如此。极其重要的是将有关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展的主要实际材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材料传播的地区，罢工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共产党，工会，国民党内部的冲突，等等）。

在我看来，把中国的情况同印度的情况加以比较非常重要。为什么印度共产党没有参加任何民族革命组织？荷属印度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事实是，共产党是否有必要加入民族革命党，丝毫不取决于民族压迫甚至殖民压迫。问题首先取决于阶级分化及这种分化同外国压迫的错综交织。在政治上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共产党是否注定要在长时期内扮演由个别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宣传小组的角色（在革命民主党内部），或是共产党在近期内已经可以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中国无疑已经具备了第二种做法的条件。但还需要证明，哪怕是最概括的证明，然而要选择最必需的实际材料。请您不要忘记，布哈林将在党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报告，因此会上必然会提出国民党的问题。

2. “问题和答复”的情况怎样？

3. 您的信写完了吗？

4. 党代表会议的日程上有工会问题。据我所知，您曾经负责《劳动报》和工会报刊的工作。鉴于问题极其重要，扩大这一工作并使之系统化是非常重要的。

我每天写点东西，见见客人，与疗养的同志们合合影，打打鹤鹑，我希望您也这样做。

列·托洛茨基

1926年8月30日

No07944

托洛茨基答 B. 尼基京问

（1926年9月5日）

叶先图基市

致 B. 尼基京同志

抄送布哈林同志备查

尊敬的同志：

对于您所提出的问题，我只能给予极其简要的答复。

（1）如何解释所谓我害怕丰收的说法？

如果不能说这是别有用心我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就是无知，就是对我国经济的两重性不理解，就是对经济问题持小资产阶级的、富农的、非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丰收会提高生产力。但光这样说布尔什维克认为是不够的。布尔什维克会问：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上这种丰收会提高生产力——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丰收会使这两种形态中的哪一种取得优势？在工业落后的情况下丰收会使资本主义关系取得对社会主义关系的优势。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会从布尔什维主义滑向社会革命党。

（2）说我建议为了工业而掠夺农民，对吗？

我不明白，您是从哪儿听来像“掠夺”这种在目前条件下荒谬的、纯属黑帮用语的说的。各国的黑帮都用这种说法来挑唆农民反对社会党人尤其是共产党人。“掠夺”这个词在目前条件下含有工人国家对农民进行野蛮的阶级剥削的意思。这在我国谈得上吗？掠夺农民的是私商，通过极高的零售加价，这种加价是工业落后的

结果。农村贫农、部分中农和产业工人遭到囤积粮食的富农的掠夺。对富农施加税收压力——既是为了工业，也是为了农村群众。谁把对富农施加税收压力说成是掠夺农民，谁就是罪恶地掩饰农村的分化，也就是滑向社会革命党。

(3) 说我否认我们是工人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否定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吗？

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如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心怀叵测的诽谤者。认为我国不是工人国家，就等于承认我国是资产阶级国家。这样一来就应成为这个国家的阶级反对派。这是孟什维主义的观点。一个正派人，哪怕只读过我的一篇文章或是只听过我的一次讲话，也不会认为我否认我国的无产阶级性质。但我国不是完全的工人国家，而是有条件的工人国家，即农民占大多数，机关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变形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压力之下的工人国家。列宁曾相当雄辩地提醒过我们这一点。谁否认我国的工人性质，谁就是滑向孟什维主义。谁要是仅仅认为我国是工人国家，而忽视这个工人国家的具体特点，谁就是为国家发生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蜕化大开方便之门。

(4) 说我否认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性，只承认资本主义的政治稳定性，对吗？

不，不对。这个题目非常广泛。我只提醒您一点：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曾提出一个问题，即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危机会连续不断和愈演愈烈，某种程度的经济稳定是不可避免的，等等。所有这些观点您在我当时提出的提纲中和在我的《新阶段》一书中都可以找到。布哈林同志当时激烈地反对我的这个观点。现在来证明欧洲资本主义的状况不同于1919年时的状况，等于是敲打已经敞开的大门。现在应当确定这种稳定的具体程度，看来稳定程度是极其有限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保留的主要原因在于革命的

客观形势与共产党的力量不够之间发生脱节现象。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有：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进程；1920年意大利的九月事件；1923年德国事件的进程；从今年五月总罢工开始的英国事件的进程。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

（5）说我认为英国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对吗？

对这种蠢话大概不值得去驳斥。即使我对这种任意断章取义摘取词句并明摆着错误的解释不作任何说明，正派的读者也十分清楚，我所说的绊脚石指的是工联以及从托马斯和麦克唐纳到普塞尔和库克的各色工党的旧的官气十足的机关。共产党暂时还根本不足以同这个强大的保守机关相抗衡。不仅如此，共产党本身在批评绊脚石机关方面表现得也不够坚决。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6）说我想以新的组织形式取代英国工会，对吗？

这种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我完全赞同列宁关于这些问题的著述和讲话，我认为，随着英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在工联的基础上或与工联紧密相连，但与工联的保守上层相抗衡）新的组织，例如工厂代表（工厂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等，等等。认为不断增长的群众革命压力只能在工联规章的严格范围内改变工联的领导，就是患了工联主义的病症，而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性工联组织具有巨大作用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但这个题目太大，需要专门论述。

对于其他较小的问题我就不一一作答了，因为既然已经作了总的批驳，就没有必要再对零七八碎的诽谤加以驳斥了！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5日于基斯洛沃茨克

№07945

托洛茨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926年9月7日)

那些跟着自发势力随波逐流的政治战略家力图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在实际上化为乌有，于是把所有力图实现这一决议的人统统称作“超工业化分子”。

所谓“哪怕乌龟那样爬行，但我们一定能达到社会主义”（布哈林），“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足够的”（布哈林、斯大林）等等论调最鲜明地反映出对工业化的庸俗的、尾巴主义的态度。这些论调只不过是商品荒、批零价格剪刀差和比例失调加重的搪塞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份关于近几年内（从1925~1926经济年度至1929~1930经济年度）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对比关系的重要远景统计数字。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围绕国有工业的固定资本问题进行了计算。参加计算的有优秀的技术专家、经济工作者、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等。当然，得出的结果只是初步的、大概的近似值。要求这些结果十分准确是不合理的。但这已经是目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最重要的、最客观的数字了。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最主要的结论。

衡量工业发展的状况最好是以人均工业品消费为准。如果以现在1925~1926年度的价格来给工业品估价，那么战前（1913年）每个居民消费的工业品（包括伏特加酒）平均为47卢布，而今年则为25卢布。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会议制定的远景规划，

1929~1930 年度人均工业品消费为 44 卢布，就是说，仍然达不到战前水平。

这个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制定、还没有得到批准的五年计划，无疑将被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等加以削减，因为该计划要求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和整个拨款额大大超过了党和经济领导机关的预测。但在谈论问题的这一方面之前，我们应当进一步了解这个工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即仅仅在第五个年头快结束时才使我们在人均工业品消费额方面接近 1913 年的水平。

据初步计算，农业在这期间将达到战前水平的 106%。对此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根据目前公认的统计数字，十月革命使农民经济每年在农业支出和税收方面得到大约 5 亿卢布的好处，因而也使它的购买力得到了相应数目的提高。5 年总计为 25 亿卢布。由于我们现在存在商品荒，所以上述工业发展计划就成了持续不断和日益加剧的商品荒的计划。

除了人均消费额，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标准。国家的工业化是否向前发展，最鲜明的表现就是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是否在增长。1913 年，生产性工业消费占 56%，而个人消费占 44%。根据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制定的五年规划，个人工业消费到 1930 年将占 54%，而生产性消费占 46%。变化如此微不足道，以致由于数字极为接近而可以不予考虑。可见，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制定的整个五年计划草案实际上未使工业化有丝毫进展。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整个远景计划是极其保守的。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同样重要的标准。关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增长对我们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用不着加以解释。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的规划在这方面开辟了哪些前景呢？最起码的是：5 年之内工业无产阶级应增加 50 万人，即平均每年增加 10 万人。这实际上

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比重的减少。

这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所属的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拟定的五年计划。

然而，不要以为这个规定到1929~1930年度才能达到战前工业水平的谨慎的规划的实行已经万无一失。相反，规划的实行不仅没有保证，而且由于目前大多数人对工业发展问题所持的态度，也不可能是有保证的。为了达到战前可怜的消费额，全部工业产品在5年内（1925~1930）——由于人口的增长——应当增长1倍，而国有工业产品甚至应当增长114%。而由于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固定资本在今年内肯定会消耗殆尽，所以要使产量增长1倍，就需要投入与我们的规模相称的巨额资金，但同时却只能使消费额得到不大的增长，因为我国的人口增长很快，为了使上述实质上极其保守的规划得以实行，国家不仅应当将工业利润返还给工业，还应当在此之外每年从预算中拨出大约4亿卢布^①投入工业。为了对这个数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应当加以注意的是，根据1925~1926年度预算，国家除了把工业利润返还给工业之外，从预算中仅仅拨出大约3000万卢布投入工业，就是说，在五年中的第1年就少投入37000万卢布。因此为了完成预定的规划，需要在余下的4年里除4亿卢布外，为工业补足今年欠下的37000万卢布，就是说每年9000万卢布。这就是说，在今后的4个经济年度中每年应从预算中拨出49000万卢布即差不多5亿卢布投入工业。

然而就是这个数字也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它只能满足近5年内工业预定发展的需要。但还应保持下一个5年内工业发展的需要。为此在近5年时间内就应当投资建设新工厂、矿井、电站。这

^① 这一数字（4亿卢布）根本不包括用于电气化和军事工业的开支！——托洛茨基注

就是说，在近4年时间内平均每年用于工业的预算拨款额应当大大超过5亿卢布。在这4年内基本建设投资每年也应当大大超过15亿卢布。

整个这个规划当然需要进口相应的设备和原料。进口数额将远远超过迄今为止所拟定的数量。但我们在这里不谈问题的这个方面，以免使问题复杂化。

如果向预算提出上面所说的要求，那么关于超工业化的叫喊就会甚嚣尘上。然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只是使我们接近战前人均工业品消费水平，标志着将会长期存在的商品荒、比例失调和失业现象的加剧。

不仅如此，在这些统计数字中，名义工资在整个5年中总共只提高5%！显然，这个数字被大大缩小了。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国家，或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都不会接受这个数字。而且农民也不会接受的是，在十月革命12年之后他们才能达到战前人均工业品消费水平。可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拟定的工业发展五年规划并不是超工业化的，而是一个显然谨慎的，实质上是极其保守的规划。

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计算数字是因为：（1）对工人和农民的个人消费的增长明显估计过低；（2）实际上拒绝提高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即实际上拒绝工业化；（3）在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增长明显不够（这意味着农业人口过剩和失业的增长）；（4）工业品成本的降低明显不够；（5）工业明显地不能满足农业、运输业和国防等等的需要。这些计算数字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现在必须为下一个五年（1930～1935年）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时做好准备。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这些明显估计过低的计算数字导致每年必须追加5亿卢布的预算补助金和15亿卢布的基本建设费用，电气化和国防不算在内。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1) 必须放弃空谈工业问题的做法，而要切实进行具体计算。

(2) 必须了解，目前的工业发展速度显然是不够的。

(3) 必须了解，对结合构成威胁的不是工业的冒进，而是工业的不断落后。

(4) 必须了解，关于正确地重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的问题是国家的中心问题，不应按照阻力最小的路线，而应按照能够保证不断地和明显地改善工农业比例失调现象的路线解决这一问题。

(5) 必须了解，目前对工业发展所持的观望主义、尾巴主义的态度意味着农村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后果。

(6) 必须了解，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是工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7) 必须停止关于超工业化的轻率议论，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变成数字和准确指示的语言并着手全面落实该决议。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7日

№07946

托洛茨基的便条

（1926年9月19日）

亲爱的同志：

这份提纲草稿^① 是我为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准备的。我现在根本不能确定提纲将以何种形式提出。也许它只是用作发言提要。所以，问题不在于叙述的形式，而在于观点的实质。这份草稿的任务在于至少能够包括对内对外的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应当力求做到对所有争论问题给予认真而全面的解释。这是反对斯大林集团的幕后分裂计划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我再说一遍，这份草稿是一份未完成的草稿。请认真地看一看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19日

① 见本卷文件№07945。

№07947

托洛茨基：三个标准

(1926年9月)

不要空谈“相信”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可能性，而要在三个标准之下进行实际的建设。

第一个标准：生产力是否在向上发展？

第二个标准：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

第三个标准：我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距离是缩短了还是拉大了（价格和人均消费额）。

有些同志认为，只有前两个问题具有决定意义。这是犯错误的根源。第三个标准具有不亚于前两个标准的意义。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07948

托洛茨基：供宣传用的问题与答复^①

（1926年9月）

1. 说反对派想把党变成各种派别、集团等的大杂烩，对吗？

答：这种说法荒谬绝伦，纯属胡说八道。反对派主张加强因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倾斜而遭到削弱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统一和有战斗力的共产党才能实现。一个分裂为各个派别的党是不可能成为专政的工具的。所谓反对派维护各个派别和集团的种种论调都是出于派别利益而散布的谎言。

2. 说党内的派别活动日趋严重并极具危险性，对吗？

答：对。拉舍维奇同志等的事件只不过是不断增长的危险的表现之一。反对派与统治集团的区别根本不在于反对派容忍派别活动或认为派别活动是党内的正常状况。但反对派不会认为派别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个别人的恶意所致。反对派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是派别活动产生的原因。

3. 能否一下子消灭官僚主义？

答：当然不能。反对派根本不指望在这方面出现什么奇迹。但问题在于，官僚主义没有减少，相反却有了极大的增长。党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每一次重要尝试都引起上面的迫害，而这又促使人们走上派别活动和分离活动的道路。官僚主义越是反对派别，它所产生的和滋养的派别就越多。

^① 根据卡·拉狄克《关于反对派》一文写成。见本卷文件№07941。

思想上的短视总是与官僚主义相伴而生。统治集团的领导者使自己越来越孤立，已经没有能力评价整个形势和预见明天，也不能给党以广泛的指示。整个政策成了舍本逐末和尾巴主义的政策。无论是谁，只要他试图总结困难，弄清困难之间的联系，对未来作出展望，都会使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者惶恐不安，并招来搞派别活动的指责。一种制度积累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越多，它就会变得越让人难以容忍。

4. 官僚主义和舍本逐末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答：基本原因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党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党的传统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传统。背离阶级路线就必然要以机关官僚主义的方式将政策强加于人。

5. 这是否意味着分裂或建立两个党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

答：绝对不是。把这种观点强加于反对派的企图是一种最不正当、最毒害人的斗争武器。应当用党内手段来反对背离阶级路线的做法。可以而且应当在统一的党的范围内纠正背离的做法。

6. 背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答：（1）不理解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隐藏的危险；

（2）对工资、节约制度、失业、住房建设等问题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

（3）对农村的分化估计不足并掩饰富农的不断增长的作用；

（4）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力图奉行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即实质上是富农的方针；

（5）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比工人和贫雇农的积极性提高得还快所产生的危险不理解或估计不足；

（6）放宽选举条例和选举办法，以利于小资产阶级；

（7）美化苏维埃国家的现状，并不否认苏维埃国家接近工人的必

要性；

（8）美化新经济政策，掩饰和淡化新经济政策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比重估计过低；

（9）在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上（英俄委员会、国民党等）有中派主义倾向；

（10）抱有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希望，即希望与机会主义和背信弃义的领袖们的联盟能够有助于苏联的军事安全；

（11）力图脱离红色工会国际并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章程作了相应的修改）；

（12）不是同右倾，而是同那些对右倾提出警告的人不断进行斗争；

（13）不仅把真正的极左分子，而且把所有主张拨正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人都划为极左分子。

6.^① 说反对派的政策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的危險，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种指责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对结合构成威胁的，一方面是工业的落后，另一方面是富农的增长。工业品的缺乏往农村和城市中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富农开始将中央和贫农置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之下，使他们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这一过程现在还刚刚开始。但对结合的威胁恰恰来自这里。对工业的落后和富农的增长估计过低破坏了对两个阶级的联盟即在我国条件下实行专政的基础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领导。

7. 说反对派认为应当把国有工业租让给外国人，是这样吗？

答：这种论调是一种最卑劣的诬蔑。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手段，只是因为党被官僚主义扼住了脖子。

^① 原文序号如此。

《真理报》断言，梅德维捷夫同志在其1924年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主张对大部分国有工业实行租让。梅德维捷夫同志两年半以前所写的这封信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谁也不知道这封信，因而无法判断《真理报》所讲的信的内容是否属实。但1923年的反对派和1925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与这封无人知晓的信有什么关系呢？

反对派认为，关于国有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为此反对派要求改变税收体制和价格政策，重新编制预算。租让在我国的经济中只能而且应当处于受到严格限制和从属的地位。任何试图使租让的范围超出一定限度，即让外国资本对我国经济拥有主导性的或哪怕只是相当大的影响的做法，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公然背叛。

8. 说反对派与阿姆斯特丹派结成了联盟，对吗？

答：这种论调与上一种论调同样荒谬，也是建立在梅德维捷夫同志那封无人知晓的信的基础之上。如果梅德维捷夫同志或我们党的其他某个党员表示反对红色工会国际而拥护阿姆斯特丹国际，那么反对派会再一次坚决而无情地谴责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就像它曾经谴责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某些领导工作人员那样，当时这些领导工作人员背着党对我国几乎所有的工会章程进行了千篇一律的修改，即从章程中删去了“红色工会国际”并代之以“国际工会联合会”，这只能是意味着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扫除障碍。

《真理报》试图嫁祸于人的做法，只有在党内批评自由和公开的党的思想工作遭到严重压制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9. 说反对派否认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对吗？

答：这种指责是错误的，是建立在对问题本身的错误提法之上的。在我们这个落后国家里光靠自己的力量要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十年。如果认为在这样长的时期内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将保持下去并得到发展，而我们却在这段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否认

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联系，陷入不可容忍的民族局限性之中。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全世界革命运动的胜利是不可分割的。反对派深信社会主义将在我国取得胜利，不是因为可以把我国从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中分离出来，而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背离无产阶级路线必然导致民族局限性，导致低估我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和不可容忍地美化新经济政策。

10. 说反对派是一个集团，对吗？

答：无疑，反对派变成一个集团的危险是存在的。这种危险产生和加剧的原因在于封闭的统治集团的政策和组织措施，这个集团越来越容不下批评、集体讨论、选举制和集体领导。

11. “多数派”能否变成一个集团？

答：能。现在的多数派已变成一个集团。多数派并不是某种由同一批成员组成的经常性组织。在一个生活于内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党内，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组合和变动。多数派集团致力于把现有的多数派变成永久的多数派，不管其政治路线如何，也不管任务的变化或党内真正多数派观点的变化。多数派集团同党内民主制水火不相容。多数派集团是靠内部的秘密纪律维系在一起的，仅此一点就会歪曲真正的党的意志。多数派集团利用党的机关妨碍党以民主的方式确定谁是真正的多数派，谁是少数派。最有害的派别活动形式是直接负责全党的当权多数派的派别活动。

少数派别活动的危险来自多数派派别活动的事实。

12. 说反对派威胁党的统一，对吗？

答：威胁党的统一的是封闭的多数派集团的存在，因为这个集团使党的政策背离了无产阶级路线并把所有为维护无产阶级路线和健全党的制度而斗争的人推向了反对派。

统治集团的领导人把党的统一理解为：“不许批评我们的政策，

不许未经我们批准而提出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不许真正提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关于工业化、关于工资、关于农村贫民等问题。”在统治集团的领导人看来，反对领导集团错误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举动都是对党的统一的威胁。但这只是意味着领导集团不愿意实行党内民主制。

13. 说反对派背离了列宁关于党的领导核心的观点，对吗？

答：不，不对。对的是完全相反的意见：现在的领导集团竭尽全力来消灭与列宁并肩工作中形成的老的领导核心。在列宁患病期间和列宁去世之后的今天，人们多次向党解释领导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的重要性。过去的主要口号是：列宁主义的老近卫军万岁！人们向党解释说，领导经验是在多年的时间内逐步积累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是同两次革命的经验密切联系着的，党在列宁的领导下走过了这两次革命的历程。

现在斯大林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实行急剧的转折，用在创造性工作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实际工作者”等这样一些新的力量来对抗近卫军。这种对抗本身是放弃党的革命传统的一个步骤。这一倾向被反对流亡者、支持“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极其反动的言论所掩盖。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符合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这种新的、局限于本国的、就事论事的提法。

14. 只有“消灭”反对派，才能保证党内的统一和领导的一致，这种说法对吗？

答：不对，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官僚主义对党的压制必然蕴含着一次又一次的分裂。统治集团完全不是一致的。统治集团中有偏向富农、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庸俗习气的右倾；有与偏向小业主的倾向结成联盟，但又时常与这种倾向发生敌对冲突的工联主义倾向；有纯粹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方针，只是掩护右倾免遭反对派的批评；也有无数完全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性，但

还没有意识到党的政策和党的制度已发生变化的人。现在多数派集团领导人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是通过机关把多数派团结起来的。如果一旦认定反对派“已被消灭”，那么向右滑的多数派集团会立即开始分化为新的派别集团，并由此产生一切后果。现在该集团上层内部已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只是依靠集团纪律才把这些争论压制下去。可以防止这些争论发展为新的派别斗争的，不是消灭现在的反对派，相反，是认真对待反对派的批评，真正拨正党的路线并恢复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15. 说反对派联盟类似于1913年的八月联盟，对吗？

答：这种对比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八月联盟存在于布尔什维克党外并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八月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是不可改变的。

反对派是布尔什维克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分歧有多严重，都可以而且一定会通过党内方式得到解决。想分裂或暗中策划分裂的只能是那些罪恶的派别分子、党的敌人和十月革命潜在掘墓人。谁把1923年和1925年的反对派联盟同八月联盟相提并论，谁就是在推动分裂，就是要使党认可这种思想。应当同这些以统一的词句为掩饰的分裂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

然而，即使从一般政治的角度来看，也绝不能同八月联盟相提并论。在八月联盟时代布尔什维主义断绝了孟什维克奉行的指望六三体制长期稳定的方针，并提出了完整的口号。现在是谁奉行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方针呢？是斯大林集团。是谁坚持事件革命发展的方针呢？是反对派。是谁奉行与最恶毒的革命运动的取消派妥协的方针呢？是主张保留英俄委员会的人。是谁敦促党和共产国际注意反对妥协路线的呢？是反对派。

廉价的历史对比毫无用处。应当研究反对派在无数文件和声明

中所表达的真正观点。

16. 为什么把反对派叫做联盟？

答：因为反对派是由两个主要派别组成的：1923年反对派和1925年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中意味着同盟，有时则意味着暂时的同盟。可否把反对派看做由两个派别组成的暂时同盟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当好好了解反对派联合的基础。如果反对派的两个派别在当前的个别实际问题上意见一致，那么联盟可能只是暂时的同盟。而如果反对派是由于在苏联和国际发展的主要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团结起来的，那么我们得到的就已不是联盟，而是巩固和可靠得多的党内思想团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个反对派派别的代表人物在一系列当前问题上观点一致，越来越接近。在四月全会上他们就经济问题提出了相同的决议。在这一时期两个反对派别的接近被称作联盟。但从那个时候起接近变得要深入得多。以两个派别为代表的反对派都作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得出这样的回答不是由于妥协、相互让步等，而是由于共同的想法和根据近年来的经验而确定的共同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已经不是一个联盟，而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上紧密一致和在争取党和国际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中团结得愈益紧密的反对派。

17. 说反对派想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并通过这样的方式靠降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来发展工业，是这样吗？

答：不，不是这样。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祸害是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养肥了商人和投机倒把者，他们赚了数亿的卢布。国家按出厂价格出售商品，而农民和工人则按零售价格购买商品。近一年半以来我国的批发价格始终未变，但零售价格却大幅上扬。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在不提高零售价的情况下提高出厂价格，因为零售价取决于供求关系。任务在于把尽可能多的批零差价交到国家手里以发展工业，而无论如何不要提高零售价

格。如果零售价格居高不下，批发价低廉对工人和农民来说毫无关系。提高出厂价格打击的是私人资本，而不是消费者。应当从这个方面寻求解决办法。

要是提高出厂价导致零售价上涨怎么办呢？应当谨慎行事，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如果零售价随批发价开始上涨，应当停止行动。应当慎之又慎地摸索前进。国家得到的商业加价部分越多，工业发展得到的资金就越多，工业就能更充分地满足需求。这是降低零售价的惟一途径。这与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18. 说反对派认为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对吗？

答：不，不对。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国家。我们的政府叫做工农政府，因为它是在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它决定着国家的性质。但谁要是只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那他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国家，它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并且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国家机关从旧沙皇机关那里接受了许多不好的东西。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1）发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畸变，（2）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和（3）处于外部资本主义的压力之下。谁要是忘记或避而不谈问题的这一方面，谁就是粉饰现实，就是说，他是一个官吏，而不是一个革命者。

列宁教导说，工会应当保护工人免遭自己的工人国家的损害（即保护工人免受工人国家官僚主义畸变、小资产阶级压力、资本主义压制等的损害），同时要保护自己的工人国家免遭阶级敌人的危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否认国家的工人性质，即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滚到孟什维主义一边；否认或避而不谈官僚主义畸变和资产阶级影响，意味着充当官僚主义的辩护士和为国家的资产阶级蜕化开辟道路。

19. 是否需要和是否可能让工人接近国家、让国家接近工人呢？

答：既需要，也可能，又应当。否认这一点意味着局限于问题的第一方面并抛弃同样重要的第二方面，许多官吏包括党内官吏实际上都持这种辩护立场。对官僚主义畸变、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影响的任何批评都被他们说成是否定工人国家。他们从我们国家是工人国家的认定中得出结论说，工人不能也不应当要求这个国家接近自己。莫洛托夫同志在第十四次省党代表会议上最鲜明地和彻底地表述了这种官僚主义立场。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是却有人向我们提出，说是最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使工人阶级更加接近我们的国家……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应当提出使工人接近我们的国家的任务，那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谁的国家？难道不是工人的国家吗？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怎么可以使工人去接近国家，即要工人本身去接近掌握政权和管理国家的工人阶级呢？”（1925年12月13日《真理报》）。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列宁关于我们国家的性质问题的提法——不是“笼统的”工人国家（没有这样的国家），而是处于目前历史条件下的目前的具体国家。

20. 反对派想不顾一切地把农民的积累抽给工业，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样提问的目的无非是想搞乱人的思想和吓唬农民。这也是一种蛊惑煽动。既然我们的国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既然这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那么就不能不把人民的即首先是农民的资金投入工业。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在每个时期给工业投入多少资金；以便通过这种途径达到最正确地、对全国来说最合理地分配积累和全部资金。工业品荒和批零价格的巨大剪刀差表明，对工业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任何数字、结

论，尤其是关于超工业化主义者的任何空话，都无法消除这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表明，国内的积累在工业和非工业居民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当，由此产生了商品荒，从而养肥了私商并削弱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

农民从这种实物和货币积累中，即从农民无法换取其所需要的工业产品的积累中，能否得到好处呢？不能，农民由此得不到好处。在工业国有化和外贸垄断的情况下，农民本身已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股东，因此同正确而合理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以及农民积累休戚相关。对于农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他投入了多少卢布，而是他拿这些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商品荒和价格的悬殊表明，如果农民投入国有工业的积累比现在多，国有工业将会给他绰绰有余的回报，即向他提供较便宜的商品，这样全体农民就会得到好处。

21. 笼统地说从“农民”口袋里掏钱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农民根本没有一个总的口袋。农民现在已经包括有经济力量各不同的各个阶层。据粗略计算，农民积累了大约4亿卢布的钱财。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平均4卢布或每户20卢布。农民积累的分布极不平均。贫农一点儿积累也没有，相反地却负债累累。中农多少有些积累，但大多数积累在上层即最富裕的阶层手中。积累的主要部分在富农上层手里。粮食储备的情况也是如此：储存和积累粮食的是富裕农民。可见，这里说的不是从农民总的口袋（没有这样的口袋）里，而从富农和半富农阶层的积累中收取额外的资金给工业。这样取得资金将会给中农和贫农提供比较便宜的工业品。这对于农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利的。

22. 说反对派是一个无原则的联盟，对吗？

答：不，不对。“无原则的联盟”——这是气急败坏的谩骂，而在政治中光是谩骂是不够的，应当分析问题的实质。

正确的说法是：现在的反对派由两个不同的派别即 1923 年反对派和 1925 年反对派组成，这两个派别之间过去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基本原因在于，两个派别中的每一个派别在看到党的政策愈来愈经常地偏离阶级路线后，都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反对这种偏离。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特别是去世之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日渐巩固，不给人通过正常的民主方式拨正党的路线的机会。1923 年反对派同 1925 年反对派一样，对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持不同的看法并且相互之间进行斗争，后来才根据经验确定了共同的原则立场。使这两个派别接近的是它们不愿对机会主义偏离置之不理，而要为了党的无产阶级路线同这些偏离现象进行斗争的共同心愿。相反，现在的统治集团却推行逐渐偏离阶级路线的政策，掩饰偏离，闭口不谈富农倾向，粉饰现实等等。就是这个代表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政策，使两个反对派与统治集团对立起来，这两个反对派的出发点各不相同，而基本任务是一样的。

要对反对派联盟有原则还是无原则作出评判，应当对这一联盟的提纲、建议、宣言进行研究。反对派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农村的分化作出了评价，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建议。统治集团在任何一个经济领域内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精神、任何创造力。它或是保守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因而使错误越积越多，或是有时借用而且经常是不及时地、零敲碎打地借用反对派这样或那样一些建议。在政治方面，反对派联盟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合作社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进攻。在党和国家方面，反对派联盟分析了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及其深藏于领导集团政治路线偏差之中的原因。在国际工人运动方面，反对派联盟揭穿了一种旨在淡化把他们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国际分开的矛盾的倾向。反对派联盟以英俄委员会为例，逐步地揭穿了多数派领导的立场的无原则性，而且英国事态的进程每一次都无可辩驳地

证明了反对派所有主要预见是正确的。

如果认为并指望，经常提起反对派的两个派别过去的斗争就可以消除或削弱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派别根据经验和思想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达成共同的、不断得到各种事实充实的原则立场，那么这是毫无益处的。

23. 谁是真正无原则的？

答：真正无原则的是居领导地位的那个派别。执政派根本没有一条原则路线。实质上执政派是一个成分复杂的联盟，这个联盟不是靠思想立场，而是通过组织机构的方式纠集到一起的。执政派中有，第一，十分露骨的富农倾向，第二，十分露骨的工联主义倾向，第三，没有思想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在每个具体关头都是根据派别斗争的进程来确定自己的立场的。这类官僚主义首领的主要作用是，他们在背地里劝说自己的“富农”和“工联主义”盟友不要过分向右转，以免给反对派以口实。实际上，机关“领袖们”一方面掩饰偏向小业主和工人上层的倾向，另一方面集中火力打击左派即无产阶级路线。

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不回答反对派的批评或反对派准确表述的建议，而把反对派不同意的或与其丝毫没有也不可能共同之处的观点塞给反对派（为此目的专门从档案中翻出梅德维捷夫同志的一封旧信，奥索夫斯基同志的信等等）。《真理报》和所有掌握在领导集团手中的出版物拒不正视反对派的有原则的文件，不让党知道这些文件，把从各处胡乱摘录的文件和引文塞给反对派，避而不谈执政集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比梅德维捷夫同志和奥索夫斯基同志这样或那样的声明错误和危险得多的声明和行为。统治集团的无原则性在这种“思想”斗争方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思想上极其有害的表现。

24. 说反对派得到国际孟什维主义的赞赏，对吗？

答：在个别情况下不乏赞美之调，但对反对派的纲领国际孟什维克主义却持理所当然的敌视态度。孟什维克何时和因何夸反对派呢？在个别情况下因为批评我们制度的缺点而夸它。当反对派指出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党内的压制、对工人的需要关心不够时，孟什维克总是幸灾乐祸地附和这种批评。这方面没有任何新东西。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报刊不止一次兴高采烈地摘引列宁关于我们的病症和缺点的指示。当列宁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时，孟什维克高兴得喘不上气来。敌人过去和将来都试图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但这决不能成为拒绝公开而勇敢的自我批评的理由。

孟什维克的夸奖还有一个原因。布哈林领导的《真理报》肆无忌惮地歪曲反对派的观点。反对派的决议、声明和其他文件得不到发表。由于布哈林把别人的观点塞给反对派并歪曲反对派自己的观点，总想使反对派接近孟什维克，所以孟什维克在个别情况下信以为真就毫不奇怪了。让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国际孟什维克主义凭着准确无误的阶级嗅觉，对反对派的革命共产主义路线持这种敌视态度。

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报刊的情况更是如此。现在已经可以说，资产阶级舆论通常都认为执政派的政策更温和，更现实，更冷静，更能保证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相反世界资产阶级报刊把反对派说成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代表。就这个问题写了成千上万篇文章的既有资产阶级出版物，也有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

可见，对于上面的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孟什维克有时夸奖反对派是因为其批评；资产阶级报刊夸奖统治集团通常是因为其政策。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No07949

托洛茨基给一位不知名的收信人的信

（1926年9月21日）

亲爱的同志：

您的信我很晚才收到，因为我外出休假一个月，不在莫斯科。这也是我迟复的原因。

您询问党内的分歧并抱怨报告人所作的蛊惑性的解释。如果您写的属实，那么报告人的解释就不光是蛊惑，而简直是犯罪。

报告人在结束语中说，用您的话来说就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一次全会上明确声明，他过去不是布尔什维克，今后也不是”。还能想像出比这些话更没有道理的话吗？身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怎么可能不是布尔什维克呢？报告人诬蔑的不是我，而是党。无须多说，他的话从头至尾都是杜撰出来的。

接下去报告人说，托洛茨基“支持克瓦索夫斯基关于使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取得合法地位的建议”。我根本不认识克瓦索夫斯基。他是否提出过什么关于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取得合法地位的建议——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至少，我跟这样的建议不可能有任何瓜葛。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取得合法地位，因为这些人只不过是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个楔子。

在我看来，如果您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可以采取军事共产主义和加紧压制的措施来振兴经济，那么就是您自己错了。这种非常措施

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即在群众感到没有其他办法时可以产生效果。然而在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劳动纪律应当越来越依靠工人的主动精神和对自己劳动结果的愈益关心来保证。您以您在陶土开采场的经验为例作了证明，当时您在那里与之打交道的是当地农民出身的觉悟不高的工人。当然，这些工人的文化程度越低，建立自觉的劳动纪律就越难。但总的方针不应当是压制和“拧紧螺母”，而应当是劳动者的主动精神和关心态度，是劳动者舆论的集体监督，是正确地组织生产，等等。

您要求谈谈分歧的实质。我认为在这封信中无法做到，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展开争论，就像过去一直做的那样，是可以向党全面阐述分歧的。我认为，党代表会议将会确定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从而也定下代表大会之前争论的时间。到那时完全有可能向党解释分歧的实质，而党也将会作出人人都必须执行的决定。当然，争论必须在党性的范围内进行，就是说，不允许中伤、诬蔑和蛊惑人心，在普遍关心保持党的统一和战斗力的情况下进行。向党员正常而全面地通报分歧的实质是进行公正的党内争论的基本条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年曾就一次党内争论写道，谁要相信空话，那他就是一个不屑一顾的十足的白痴。如果您转述的您的报告人的话是准确无误的，那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规则首先应当用于您的报告人，就是说，不要轻信这一类报告人的话，而是要求他们拿出文件来。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21日

№07950

托洛茨基：论党的统一

（1926年9月）

这是争论中的主要问题。这是统治集团的一个基本的、实质上也是惟一的口号。反对派被指责破坏或有可能破坏党的统一。这是对反对派的主要指责。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党的统一的意义是每个党员和每个稍微有觉悟的非党工人都能理解的。由此可见，关于党的统一问题具有巨大意义，对这个问题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具有同样巨大的危险。应当明确而公开地指出：

党的统一的口号越来越成为执政派手中用来对付党的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恐怖（吓唬）武器。

党首先是一个行动的组织。所有党员群众都应当能够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随时响应战斗动员。没有思想上的一致党的这种战斗力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如果认为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单单是靠上面的指示形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思想上的一致是全党通过经常充实和积累集体的经验，通过在党纲、党章、传统、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集体思想工作而形成的。这一过程不可能没有分歧、批评和思想冲突。如果说党的革命战斗力量要求强有力的集中制，那么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党要保持、发展和加强思想上的统一则要求同样强有力的党内民主制。没有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制是通向孟什维主义的组织途径。没有民主制的集中制是通向党的机关官僚主义蜕化的途径。

在执政派的组织政策中存在着同所有其他政策中一样的“剪刀差”：口头上承认党内民主制，实际上却加紧镇压越出封闭的执政派上

层允许范围的任何思想和批评。这正是威胁党的统一的主要危险。

领导的派别上层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所有机关，可以用来维护派别的阵地，其中包括派别的错误。把全部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手中是绝对必要的。把全部权力集中在一个秘密的、封闭的派别手中是可怕的危险。中央委员会，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央委员会也会犯错误。但是一个实行集体生活的党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纠正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当党和国家的设施集中在一个靠凌驾于党的纪律之上的由集团内部纪律维系的封闭的派别及其上层（无论什么“七人小组”或“九人小组”）手中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党的正式机关、代表会议甚至代表大会全都形同虚设，只是事后追认已经作出的决定或完成的行动。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一些大幅度改变党的机关领导成员和党的政策方向的极其重要的决定强加于毫无准备的党。七月全会在最后一刻背着党对党的领导层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改组（鲁祖塔克^①同志取代季诺维也夫同志进入政治局，加米涅夫同志变成第八位候补委员，吸收实际上是执政派核心的成员为新的候补委员）。甚至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般委员每次也都让执政派上层弄得措手不及，要么一言不发地接受已经通过的决定，要么转向“反对派”。但由于任何反对派，甚至任何批评都被宣布是对党的统一的威胁并遭到最严厉的机关设施的镇压，所以大多数代表大会代表或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只能一言不发地接受派别上层采取的措施。

批评已经作出的决定被宣布为犯罪。在正常的党的制度下这是正确的。在讨论和起草决定期间提出批评要及时得多。但现行制度

^① 鲁祖塔克，扬·埃·（1887~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俄共（布）中央书记、苏联交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38年被处死，后平反。

的实质是要把背着党在统治集团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和作出的现成决定强加于党，并要党接受事先策划好的力量配置和事先有保障的形式上的多数等。所以，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决定强加于党之前，借口纪律而禁止争论。只有用这种极其有害的和彻头彻尾的反党手段才能维持派别集团无条件统治的制度。请在党内举出哪怕一个这种批评没有立即被上层宣布为“反对派”的例子来。请举出这样的反对派没有立即被上层宣布为“小集团”的例子来。这样的例子谁也举不出来，仅此一点就完全说明了现行党的制度的特点。政治上偏离阶级路线必然导致走上对党施加机关官僚主义压力的道路。这一方针必然会导致形成封闭的上层派别集团，导致该集团对整个机关的严格选择。同样，权力集中在背着党活动的秘密集团的手中必然助长一长制倾向。集体领导同党内民主制度密不可分。官僚主义机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必然要求上层保持统一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思想的任何独立表现都必然具有强烈的反对派性质。执政派打着党的统一的幌子压制任何批评、任何反对派。实质上，执政派上层是在党的统一幌子下以派别手段维护自己领导党的垄断权。

但全部问题在于，执政派越是疯狂地维护“党的统一”，它对党的统一的威胁就越大。争论，即使是走了样的和片面的争论，变得日益频繁日益尖锐，组织结论变得日益粗暴和反常。独裁倾向在党的领导过程中表现得日益明显和露骨。由于这一切党目前被人为分割为三个泾渭分明的部分：（1）执政派，这是由上层选定的机关的核心；（2）反对派分子，他们正为拨正党的路线和改善党的制度而奋斗；（3）广大的中间群众，这部分群众四分五裂，不明方向，实质上不可能对党的前途施加积极影响。党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是各种危险，首先是分裂危险的真正的和无可怀疑的源泉。

无论什么制度，只要它能达到目的就行。但现行制度未能使党达到统一，而是使党远离统一。自从列宁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我们

经历了1923年的争论，1924年的争论，1925年的争论（与列宁格勒人的争论），1926年春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又一次机关争论；反对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又一次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被正式与拉舍维奇“事件”（1926年6~7月）联系在一起，现在则成为反对整个“托洛茨基主义”和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又一次争论。目前这场争论的性质和方法尽人皆知，无须解释。不久前只有比较亲信的人才知道的事情，现在对于全党也越来越清楚了，即所有这些争论和组织结构的目的是要彻底消灭不久前被叫做老列宁近卫军的核心力量，由斯大林一人领导，而他所依靠的是一批总是对他言听计从的同志。

只有蠢人或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才会真的以为，斯大林争取“党的统一”的斗争能够真正保证统一，哪怕以消灭老的领导集团的现在的整个反对派为代价。综上所述极其清楚的是，斯大林表面上离目的越近，实际上离目的越远。斯大林及其小集团称之为“党的统一”的党的管理的独裁制，不仅要求消灭、罢免和除掉现在的联合反对派，而且要求逐步罢免现执政派中较有威信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领导职务。显而易见，不论是托姆斯基，还是李可夫，或是布哈林，从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威望来看，都不可能也不能够在斯大林手下发挥出乌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等人在斯大林手下所发挥的作用。除掉现在的反对派意味着中央委员会内的旧集团的残余力量必然会在实际上变成反对派。新的争论就会提上日程，卡冈诺维奇就会揭发李可夫，乌格拉诺夫就会揭发托姆斯基，而斯列普科夫之流、斯腾之流及其一伙就会诋毁布哈林。只有不可救药的蠢人才会看不到这一前景的必然性。同时，党内更加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也会对斯大林群起而攻之，说他“左的”偏见中毒太深，妨碍更迅速更露骨地下滑。

列宁写道，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的

情况下，党的分裂才是不可避免的。能否说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呢？绝对不能。尽管经济政策、苏维埃政策等出现了偏差，党仍然完全有可能纠正这些错误、拨正经济方针，从而保证在更高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使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关于党的制度和党的领导的问题要尖锐得多。党是革命的主要工具。如果这个工具变钝了，就会对革命的所有任务和革命的整个前途产生致命的影响。为了纠正经济错误和拨正党的路线，要求党不仅愿意这样做，而且有能力把自己意志变为行动。所以说改变党的制度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否会出现下述危险，即采取改变党的制度的斗争本身有可能导致分裂呢？否认这种危险是虚伪的。然而这种危险的根源不是对病症的治疗，而是这些病症本身，就是说首先是斯大林集团的政策。拒绝对病症进行及时治疗只能意味着使病症进一步自由发展，从而有可能在今后使党陷入错过治疗时机的境地。

简言之，能否在不发生动荡，尤其是不发生突变的情况下改变党的制度呢？我们相信是可以的。至少我们是全力以赴致力于此的。党的官僚化确实很严重，但决没有严重到使党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发生麻痹的地步。实际上，任务在于使党员有可能运用自己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意志——在章程的范围内和本着统一的精神。而这也意味着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斯大林集团（这个集团是执政派内部的一个集团）继续用单方面的争论动摇党和用为党内致命的独裁制开辟道路的组织结论破坏党。

如果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自己有力量结束这种破坏性的工作，消灭通过秘密集团管理党的局面并恢复集体领导，反对派就会全力支持这种行动，全党也会为这种英勇的举动热烈欢呼。然而，经过四月全会尤其是七月全会以后，对中央委员会或中央监察委员会能否为统一而采取主动行动已经不抱多大希望

了。4月和7月，反对派真诚地向党的最高机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建议未经审核即被否决，甚至被从记录中删去。反对派不得不保持沉默，而多数派代表人物在反对派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仍然对其进行残酷的迫害，向全党介绍反对派的观点和建议时将它们歪曲得面目全非。单方面的争论开展得越来越频繁，目的无非是要党对越来越不正常的组织结论作好思想准备。恐吓、威胁、开除等手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本加厉。最重要的一些任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外交等等）完全是从派别选择的角度考虑的，有损于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斯大林集团企图在最短的期限内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力图使即将召开的十月全会和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都为这个任务服务。斯大林集团企图再一次使党面对无可补救的既成事实，这样，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除了批准斯大林集团实施的分裂之外别无选择。

党完全有可能制止这些计划的实现。为此党员只需运用自己的党员权利而已。但是需要每个党支部内有几个或哪怕一个党员能顶住上层施加的巨大压力，在关键时刻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既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无力使党免遭新的磨难，它们就不应当阻碍党获得完整的信息并就迄今为止仍局限于党的领导机关范围内的分歧发表意见。我们预先宣布，任何背着党解决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的基本问题并使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对既成事实的企图都是反党的和不能容忍的！”

这是真正维护党的统一的道路。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No07951

托洛茨基：就反对派问题答同志们问

（1926年9月）

斯大林集团把自己分裂党的政策建立在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并断定1926年的反对派（列宁格勒人）背离列宁主义立场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基础之上。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党员都非常清楚，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斯大林集团公然背离阶级路线所引起的真正的分歧吸引到旧的分歧方面，而这些分歧或者已完全消失，或者已失去尖锐意义，或者是虚构的。

所谓1925年的反对派否定了自己并走上1923年的反对派的道路的说法是完全虚构的，是出于粗暴和不端的玩弄权术的考虑而提出来的。党从1923年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有那些甘愿滑入小资产阶级泥潭的人才不愿学习这种经验。列宁格勒反对派对于掩饰农村分化的行为，对于富农的增长及富农不仅对自发的经济过程，而且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影响的增长及时敲响了警钟；对于我们党的队伍内部在布哈林的庇护下产生了明显反映我国经济中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压力的理论学派也及时敲响了警钟；列宁格勒反对派坚决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从理论上为民族局限性辩解，所有这些头等重要的问题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写进了联合反对派的共同宣言。两派在宣言中提出了基本的经济任务和党政任务：必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和从根本上改变对工资问题的态度；必须反击富农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对合作社的进攻并保证与农村的结合，但不是通过富农，而是通过下层即通过雇农，通过贫农与

中农（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我们完全站在列宁根据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结合”而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学说的基础上）；必须坚决反对我党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蜕化倾向；最后，必须全力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并保证无产阶级中心、地区和支部对党的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使党的制度回到列宁的党内民主轨道上来。我们认为，而且经验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中的哪一个与列宁发生了分歧，那么真理必定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我们团结起来捍卫列宁主义并反对歪曲列宁主义的人，我们无条件地承认列宁在遗嘱中关于我们每一个人所作的一切指示，因为这些指示的深刻含义已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证实，我们无条件地把遗嘱付诸实施，遗嘱的意义不仅在于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而且在于保留列宁在世时形成的整个领导核心，并防止党的领导从列宁式的蜕化为斯大林式的。只是由于两派（1923年反对派和1925年反对派）的共同经验，所有基本问题——经济的、党的制度的、共产国际政策的——才能获得了正确的和完全的解决。

所有利用两派代表人物的旧文章或旧提纲在联合反对派内部通过重提过去的思想斗争，散布互不信任情绪的企图都是不能得逞的犯罪行为。斯大林“诋毁领袖们的名誉”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在革命政策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忆旧，何况是恶意歪曲的忆旧，而是党所面临的革命任务。联合反对派在4月和7月已经证明并将在10月证明，面对粗暴的和无端的迫害他们的观点只会更加一致，而党将会明白，只有在联合反对派的观点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摆脱目前严重危机的出路。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07952

托洛茨基：关于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

（1926年9月）

一、目前形势及其危险

1. 从苏联建设和联共党内变化的角度来看，国际和国内形势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呢？简述如下：

（1）在无产阶级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世界革命的发展速度放慢；

（2）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后新经济政策又得到了一系列的新进展（1924年4月）；

（3）工业滞后，商品荒，比例失调及比例失调日趋严重；

（4）农村分化加剧；富农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增强。

（5）整个小资产阶级即新旧小资产阶级得到加强；介入城乡经济关系的真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得到加强；

（6）在苏维埃和其他机构内发挥巨大作用的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趋活跃；

（7）通过吸收数十万没有参加过（至少没有自觉地参加过）革命前的阶级斗争、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等的政治斗争的新党员使联共规模得到扩展；党的干部或者靠新成员，或者靠其他政党的退党人员，或者靠脱党多年而十月革命后又回到党内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而得到补充；

(8) 列宁逝世。

2. 光是上述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了危险来自何方。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党不知不觉地发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蜕变的危险。他在最后几篇文章中提出要防止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产生官僚主义。他指出，及时跨上工业的铁马是防止农民狭隘性王国的保证。

3. 国有工业的发展不容置疑。关于这一发展的意义无须赘言。但问题取决于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对比，取决于由此产生的各个阶级的对比。商品荒、比例失调进一步加剧的前景、富农和私商的发展，实际上都表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速度滞后。这是理解形势的钥匙。

只有保持相应发展速度的工业才能为农业的集体化即把贫农以及中农组成生产联合体提供技术基础。在工业滞后、甚至连农村市场的日常需求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更不用说对农民经济进行改造了——农村的分化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对分化估计过低，掩饰分化，对此慰以空话，就是暗中破坏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础。

领导集团或者根本否定工农业比例失调，或者宣称比例失调是历史的必然，最后，或者是预言现行经济政策下比例失调将不断得到缓解。这一年来的实践已经彻底驳倒了这种充满内在矛盾的观点。比例失调进一步加剧。这就是说，农村的分化和私人资本的积累在近期将以更快速度发展。同时，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固定资本几乎已经消耗殆尽。工业的进一步扩大要求必须相应投入比现在多得多的资本。这也要求在国民经济积累的再分配方面采取更为系统和坚决的措施，从富农、商人、不断壮大的私人企业主向国有工业倾斜。在这方面从上到下都应当对国家预算进行修订。只有全党明确认识到那些现在就已相当尖锐的经济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危险，

才有可能实行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政策。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构成威胁的不是工业的冒进，而是工业滞后的不断加剧。根据这种情况全党应当接受新的方针。

富农、商人、全体小资产者一边巩固自己的经济阵地，一边在敲政治的大门。苏维埃中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小资产阶级而有损于工人和农村贫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抹杀这个事实（即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政治比重在减少）的意义，至少意味着以轻率的态度对待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步步进逼的条件下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合作社、农业贷款方面，一方面，工作实际上在向农村的富裕阶层倾斜，而另一方面，政治方针发生了转折，即有意识地把希望寄托在农村上层身上。关于农村和整个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斗争的问题，被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挤到了一边。

所有这些经济过程和政治倾向都以新理论作掩护，根据这个理论合作社本身似乎有能力把贫农、中农和富农的经济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将它们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取决于工业的作用。与此同时向所有农村阶层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而当时的情况是，富农明显地靠剥削贫农而致富。新的富农合作社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粗暴歪曲。

在国家存有积累的情况下，工业的滞后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比重的减少，而且意味着失业的直线上升和工资增长的停滞。

与此相应，在劳动力问题上的落后的资本主义的观点重新抬头，就是说，似乎只有在预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能提高工资。实际上，在我国条件下工资的提高应当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种惟一正确、惟一适宜、惟一社会主义

的政策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条件是对经济及经济资源给以正确的领导。

同常常冒充为“农民”的富农的关系趋于融洽是有代价的，不仅延误了工业的发展（这对工人和农民群众都是个打击），而且恶化了同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政治关系。

党的路线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官僚机构的压力之下发生了偏移，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不了解这一事实就不能找到摆脱危机的办法。

4. 在上面所指出的情况下，集中火力向左打，即打击那些不仅提醒我们注意小资产阶级蜕变的一般历史危险，而且警惕地注视着这种蜕变的每一个特征，要求采取相应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反措施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集中火力打击左，意味着通过消除党内的批评意见和警告来直接促进堕落和蜕变的过程。我们现在正不知不觉地慢慢堕落。乌斯特里亚洛夫^① 建议把这种堕落变为自觉的有控制的堕落。进一步集中火力对付左和策划“消灭反对派”——如果得逞的话，——意味着无产阶级成分的极大削弱，并有可能把堕落变成不加控制的灾难性的堕落。当然，从这种堕落中得益的不是那些目光短浅地集中火力对付左的同志，而是所有的阶级敌人。

二、政治上的两重性

（言与行之间的剪刀差）

官方领导集团是一个联盟，其骨干是斯大林的机关派别集团。

^① 乌斯特里亚洛夫，尼·瓦·（1890—1938）——立宪民主党活动家。曾参加高尔察克白卫政府，高失败后移居哈尔滨。1921—1922年在布拉格和巴黎出版《路标转换》文集和杂志，是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家之一。1935年返回苏联。

这个联盟有三种基本成分：一些人奉行指靠业主的方针，另一些人奉行工联主义的方针，第三类人是纯粹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把联盟团结在一起，用反对派来吓唬“业主”和工联主义者，竭力把整个集团从陡坡向右拉。

联盟的组织领导属于纯粹的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人没有政治方针，用耍手腕取代政治方针。两种明确的社会倾向的代表为政治注入了实际内容。以斯大林为首的专耍手腕的人就像是联盟在向右滑时的制动装置。总之，结果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建议的那种机制即所谓有控制的堕落。

从无产阶级观点对这一政策进行批评，总是马上而且几乎是自动地遭到抨击和谴责。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领导集团就会作出一项决议，赞成所谓的反对派说的许多话。但政策仍跟从前一样，因为决议的执行人实际上是反对决议的，他们只是出于谋略上的考虑，在联盟的机关领导人的压力之下才接受决议的。1923年12月5日关于党的制度的决议就是这种情况，决议作出后党的制度比通过决议之前变得更加糟糕。1925年十月全会关于贫农集团的决议也是这种情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体制民主化的决议也遇到同样的遭遇。最近时期关于工资、关于国家预算的结构、关于节约制度、关于农业合作社、关于住宅建设等问题也是这种情况。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工会、国家机关中的）的几乎是反对派的决议通过得越多，官僚主义就越严重。在正式决议和实际政策——关于工业、农村、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越来越大的差距即一种政治上的剪刀差。决议成了对付反对派的工具，确切些说，成了解除反对派武装的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了给党的无产阶级分子的一种口头上的礼品。而实际政策则成了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官僚主义机关的实际贡品。堕落的程度可以用这种政治剪刀差的程度来衡量。还可以用政治剪刀差的程度来衡量斯大林压制的程度：

政治实践越不符合决议即党的社会成分和党的传统，就越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党的途径来贯彻这一政策，就越需要采用委任制和惩罚手段。

只有在剥削阶级掌权的社会里两重性才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工具。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政治剪刀差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一方面是普遍的平等，另一方面是一小撮剥削者称王称霸。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不管这一专政多么严酷，正确的政策不仅可能而且应当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政治剪刀差在我们这里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是堕落到与党格格不入的轨道上的准确无误的征候。在斯大林集团中，把无原则性上升为体系的专家占了很大的比重。要求言行一致被戏称为浪漫主义。实际政策就是一方面口头上重复反对派的口号，另一方面不断向富农倾向和工联主义倾向作出让步。

* * *

允许党内存在富农倾向意味着实际上把党变成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的全国联盟。在专政面临右的危险时向左开火。在专政面临右的危险时向左开火，——这就是对党的统一的真正威胁。

每一种倾向同时也威胁着现派别领导集团的统一。领导联盟中的工联主义分子在一个月之前或晚些时候就已感到富农的压力不断加大。工联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的代表人物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产生的分歧，现在已在党的上层暴露出来。大量的这类分歧是通过派别方式即背着党解决的。然而，领导集团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的假象。阶级利益的逻辑比机关手腕和斯大林的诡计更有威力。不管官僚主义怎样向工会施加压力，工会都不可能不成为反对富农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组织。

三、向中派主义的堕落

中派主义是介于布尔什维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思潮。中派主义实质上意味着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在革命高涨时期中派主义通常是通往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桥梁。在低潮和衰落时期中派主义一般是从革命立场后退的桥梁。

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离在我国条件下意味着走向机会主义的两个变种：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是铁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在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的条件下，这种背离必然涂上民粹主义的色彩，这实质上意味着闭眼不看农村的分化，纵容富农，抹杀工业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保证的主导作用，剥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党内的领导作用。

正是在一个城乡无产者同富农之间存在着大量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背离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往往以通常的言论、口号和引文作为掩护，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然而如果这一过程今后仍将在无人阻止和反对的情况下继续下去，那么到了一定的阶段肯定会出现公开的政治变化即政权的阶级转移。同时，斯大林的中派主义保卫和掩盖右的倾向，模糊和麻痹党的意识——在富农、私商、工业的滞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的保障等问题上。同在传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公式的掩饰下粉墨登场的中派主义进行斗争，就是为无产阶级保持政权而斗争。

四、现实主义、实践主义和舍本逐末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经济派”、孟什维克、改良派、中派等所有机会主义者的虚假的现实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布尔

什维主义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内多次被指责为空想、浪漫主义、主观主义等等。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在本国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总是把当前任务同基本的阶级倾向联系起来。这正是列宁的革命现实主义，它同缺乏思想的实践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更不用说一天又一天地耍无原则的手腕了。

对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背离越来越经常地和牵强地披上了考虑“实际”政策、必须拥有“稳固的立足点”等外衣。与此同时，对国际革命的憧憬遭到了公开的嘲讽。对“稳固的立足点”的寻找越来越推动人们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迁就政策对革命改造政策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优势。对小资者、富农、官僚、英国工联主义者、庸俗的社会舆论、小市民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观点尽力迁就，掩饰这种迁就的哲学是认为富农及其后代是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人员。不仅嘲讽“浪漫主义”，而且还讥笑“流亡活动”。我们党的不可估量的优势就在于党的领导阶层中有数百名从前的流亡者，他们在多年的实践中不仅了解国际工人运动，而且同这一运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已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能不成为国际革命的政党。“流亡者”不可能不成为这个党的宝贵的财富。相反，滑向民族局限性、“一国社会主义”的泥潭等等，不可能不对革命“浪漫主义”和“流亡活动”产生仇视。

五、阶级敌人的评价

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的分歧的评价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报刊对我们党内正在进行的反对反对派的运动所作的众口一词的评论是极有教益的。除了像保尔·莱维这样一些极不负责任的政治阴谋家以外，所有“有声望的”

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报刊都一致认为，打击反对派、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等等，是我国接近“正常”制度的标志。依靠富裕农民的方针被资产阶级报刊看成是斯大林集团进步性的基本方面。一些报纸，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报纸，希望斯大林集团能进一步采取明智的措施，以此来保证在不发生新的动荡的情况下将俄国彻底纳入国际“文化”的范围。另外一些出版物，主要是大资本主义出版物，认为斯大林集团的政策只是让国家做好迎接新制度的准备，然而要实行新制度还需要其他集团和其他领袖。但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认为，只有斯大林集团战胜反对派，才能保证苏联回到资本主义进步的道路上来。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资产阶级报刊并不是一面准确无误的“反映”镜。在利用敌人的评价之前应当想一想，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评价而不是别的评价。但决不能对各国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报刊在这件事上意见完全一致这个事实不闻不问。对于反对派，外国报刊几乎完全是根据布哈林、斯列普科夫等人对反对派所作的歪曲评价进行评判的。而对于斯大林集团，我们的敌人是根据这一集团的自我评价进行评判的。敌人的评判表明，执政派的政策中有一些使各国大小资产阶级满怀希望的东西。可以不把这个事实告诉自己的党，但要回避这个事实却是不行的。

六、堕落的理论伪装

（斯大林集团打着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进行反列宁主义的斗争）

1. 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的产生，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和合作社的政治进攻，我们党内某些成分思想上的蜕化，偷换党的思想，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离等等这样一些过程的发展——

在一定时期内——是缓慢的，因而几乎是不知不觉的。起初可能觉得党的传统的继承性似乎完完全全地保留了下来。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事实的压力强于思想的伪装，哪怕是建立在坚定的传统之上的伪装。

2. 反对反对派的思想斗争（因为这里一般是可以谈论思想斗争的）是在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下进行的。同时“托洛茨基主义”的概念每天都在变。对新的经济和政治现象不是作阶级分析，而是完全按照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方法，用胡乱摘录的引文来做文章。

反对派的各个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甚至在相互斗争中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这一事实被企图用来证明反对派的“无原则性”。为了有助于作这种证明，向党和共产国际隐瞒了反对派清楚地叙述自己在所有基本问题上的观点的文件。要求从上而下地一致投票反对反对派，而试图宣读反对派声明的人则被开除出党。试图使党相信，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数百名有20年以上党龄的其他工作人员突然背离了列宁主义。这种指责无需考虑事实和反驳论据。

3. 政治上不知不觉的堕落是为了不让人感觉得到，需要思想上的伪装，需要利用一些旧的常见的名词术语、旧概念来达到与这些概念的本意截然相反的目的。如果说过去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具有调和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特点，那么现在由于发展的无情戏弄，“托洛茨基主义”被认为是旨在反对背离布尔什维主义立场而滑到中派主义立场的革命批评。认清这一思想伪装是在走向党的正确方针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4. 思想伪装在穷途末路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拙劣。列宁主义，革命时代产生自帝国主义，产生自世界范围内而不是一国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成熟”和“过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

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出现。这一专政的命运同全世界首先是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则与此相反，说什么既然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取得了政权，它也就使这个国家脱离了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被说成是“有保证的”，与世界革命的进程无关。整个这一理论从头至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革命时代的性质的学说的攻击。但由于历史的捉弄，对列宁主义的粗暴修正是打着批评“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出现的。

有一种极其荒谬的观点认为，似乎不承认斯大林的新理论就是怀疑论，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等等。坚决否定和谴责斯大林的理论只是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当掩盖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缺乏信心的表现。

* * *

5. 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除了在政治上发生明显的变动（农业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和卡明斯基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建议，加里宁和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关于选举的指示，布哈林“发财吧”的口号等等），最近时期还对列宁主义进行了同样粗暴的理论修正。尽管农业的商品率在工业滞后的情况下有了普遍的增长，但农民的分化却被有意低估，甚至被化为乌有，这完全是步民粹派之后尘。正在形成一个特殊的统计学派，该学派使出浑身解数，不是用来揭示，而恰恰相反，是用来掩盖农村分化的过程（雅柯夫列夫^①同志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越来越经常地解释为两个在

^① 雅柯夫列夫，雅·阿·（1896～1938）——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1923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后历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等职。

历史上“权利平等的”阶级的联盟，说它们都同样保证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个通过工业，一个是通过合作社。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被抹杀，就像工业在经济上的主要作用被抹杀一样。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本身也成了空壳。绝对不可缺少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被置于同无产阶级与世界革命的联系相对立的状态，似乎没有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无产阶级也能够应付自如——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没有世界革命也行。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对没有经受过阶级斗争考验的年轻一代进行教育，年轻一代只知道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却不知道社会革命党人是鼓吹工人和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结成“权利平等的”联盟的俄罗斯的民族的“社会主义”学派。党的新一代受到的是无耻修正列宁主义的教育，而这种修正是打着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出现的。

* * *

6. 我们在党内制度问题上也看到了这一过程。在评价党内制度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党在列宁去世后是否保留了党在列宁生前所拥有的议论、批评和选举的自由？谁说保留了，谁就是在撒谎。同时，对那些导致党的生活如今严重官僚化的方法进行的批评，却被说成是企图把党变成派别的大杂烩，把布尔什维克同麦克唐纳的党相提并论等等。执政派打着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反对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

任何企图驱除和消灭右派和左派集团中最积极的分子并代之以“按照委任制”偶然选派的领导人的做法，都必然蕴蓄着对党进行不稳定的官僚主义管理的危险。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右派集团同左派集团一样，在党内拥有独立的根基和传统，同群众运动有联系并且善于学习。现今的领导是暂时的组织联合体，由于他们把自己

同右派和左派对立起来，因此只能靠莫斯科的帮助苟延残喘。

七、政治水平的降低是政治堕落的结果

披着理论伪装的政治堕落不可能对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果导致党的理论水平每况愈下。这不是哪些人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现在“理论”的任务不是进行分析、总结和预测，而是在事后用常见的说法来证明堕落政策是正确的。由此使党的刊物变得异常官僚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字代办学派（斯列普科夫^①、斯捷茨基、斯滕^②等等，等等）。他们掌握了一点儿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为了用来达到政治诡辩的目的。党的出版工作的最高领导被托付给像布罗伊多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当统计数字同官方政策产生矛盾时，如有时揭示了农民分化的迅速发展（谷物饲料平衡表），而有时又揭示了小资产者和富农对苏维埃的进攻，这时就对统计进行行政干预。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离必然导致党在理论上解除武装。

官方反对持不同意见者的论战变得越来越粗暴——不是就其调子而就其内容而言，越来越不成体统。有争议问题的理论和政治实质被抛置一旁。任务只有一个，即损害反对派的声誉，在反对派和其他某个曾经受过批判的派别之间找出某种外在的、偶然的、人员的或时间上的联系来。实现这一目的靠的是拙劣的诡辩和间接的罪

① 斯列普可夫，A.H.（1899～1937）——1919年入党。1924～1928年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1928～1932年任伏尔加区委常务局委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部部长。后遭镇压。

② 斯滕，Я.З.（1899～1938）——1914年入党。1924～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处长，1927～1928年任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

证。曲解引文，断章取义地摘引片言只字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布哈林及其学派的推崇。梅德维捷夫写于1924年初、在两年来的时间里都不为党所知的一封信，现在被从档案中翻了出来，并借助于拙劣的和不正当的歪曲和暗示的手段塞给反对派，其目的是要把同反对派所坚持的主张截然相反的观点强加于反对派。奥索夫斯基当时一篇无人知晓的文章也是这种遭遇，他在其文章见诸报端之前就被开除出党。所有这种假装坚持原则的论战都充满了骇人听闻的思想粗俗、陈规旧套和弄虚作假。

要保证小册子或文章能够问世，只需往其中加上几句反对反对派或反对派某些代表人物的无耻谰言即可。这个方法似乎免除了作者对其他所有方面应负的责任。由于这样的制度，党的文库中增加了成百上千篇理论上无用、政治上空洞、但在党性和政治上靠得住的“著作”，因为它们是反对反对派的（请看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克维林同志及其他许许多多名气较小的现行路线的代表文章、讲话和小册子）。

革命的政策不仅应当对现在和过去作出评价，还应当对未来作出有远见的展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恰恰相反，只顾眼前利益，实际上不愿意作出理论概括。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路线涉及面宽，理论上准确。对这一路线的背离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法的内心敌视。背离需要掩饰。分析被经院哲学所取代。这就是布哈林的经院素质在今天获得如此大的发展并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原因。但即便是他，待他培育的代办“学派”彻底暴露时，大概也会被抛弃的。

八、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暴露出哪些倾向

在处于上面所分析的条件中的执政党内部，必然会产生诸如蜕化、革命意志消沉、沉湎于庸俗习气、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滋长以及追逐名利等等现象，对此难道可以有半点怀疑吗？这些不可避免的倾向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并蔓延到了多大的范围呢？由于党内的现行制度而无法对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检查。其实无须检查也很清楚，官僚主义制度不断加剧蜕化的倾向。因为数量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多的党内（实质是党外）庸人由于对上面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回答“是的是的”而受到保护和奖励；革命分子则因为提出批评、表示异议、要求答复而受到迫害并被开除出党。

在列宁生前，清党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把那些入党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为了捞取执政党的好处的分子清除出党。工人反对派的错误倾向在当时受到了党的谴责，然而工人反对派仍然被广泛吸收参加了把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异己分子、追逐名利者清除出党的工作。现在清党的目的则几乎完全是为了清除反对派。那些鼓吹所谓“铁的纪律”的人常常是一些同党的革命精神格格不入的分子，这些人从来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或是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脱离了党，他们加入党或回到党的队伍中来是因为党成了稳固的执政党，而这样的党实质上正符合他们的保守倾向。这是一些还维护“秩序”而不管秩序的阶级内容如何的分子。关于我国的建设同世界革命的关系，关于歪曲党的阶级性质，关于同贫农的分歧等问题的提法激怒了他们，他们觉得这是对“制度”和“秩序”的危害。就是这类一遇大的危险或在欧洲历史即将发生革命转折的关头就会绝望和惊慌失措的保守的小资产者，现在成了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极端派代表。

党的机关越僵化、派性越严重，党的基本群众就越是模棱两可和优柔寡断，党内就越容易产生蜕化，而且瓦解的过程越是不易察觉。反对派捍卫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政策的国际主义性质，因而成了吸引党的无产阶级核心、吸引真正的革命分子、吸引优

秀的青年党员，一句话，成了吸引所有那些不是把党看做管理现有国家的机器，而是看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的工具的人的核心。

斯大林集团所挑起的这场反对反对派的疯狂斗争一旦取得胜利，必然意味着保守派庸人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小资产阶级蜕化过程在党内相当多的和有影响的人士中间加速发展。

九、国际问题上的中派主义

1. 中派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即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产生的。在苏维埃的条件下即在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中派主义必然具有新的形式，而迷惑人的正是这一点。然而我国的中派主义在国际舞台上一亮相，就立刻暴露无遗。在共产国际问题上斯大林集团的做法是：

(1) 竭力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说得遥遥无期；由此导致过高估计资本主义的稳定；

(2) 力图割裂我国对内政策对国际革命的依赖关系；由此产生了反列宁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3) 越来越将重心转移到客观过程上来；由此产生了“阶段”论，使我们重返《工人事业》的“阶段”理论；由此导致对自觉的革命因素即党估计不足；

(4) 越来越接近共产国际中真正的右派或干脆没有思想的分子，同时不仅对极左派，而且对所有独立的革命分子进行残酷迫害；

(5) 力图用组织手腕代替政策；为此目的缓和了对中派的批评并且对真正的右派分子，只要他们俯首听命，就拒不作出组织结论。

* * *

2. 向中派主义立场的堕落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暴露得最为明显和不容置疑，而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不是偶然的。通过国内问题即首先通过发展较慢的经济进程为对斯大林集团的政治立场进行检验，必然要比通过西欧阶级斗争的进程特别是近几个月来英国阶级斗争所采用的激烈形式进行检验来得慢。

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对中派主义政策的布尔什维主义批评，不是被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而是被谴责为召回主义。正像已经提出的，对于堕落来说，极有代表性的是利用过去的说法作辩解，把这些说法从活的概念变成经院主义的文章。

召回主义是什么呢？召回主义就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要求无产阶级的代表退出反革命的假议会机构。那里所说的不是同背叛了的领袖自愿结成联盟，而是参加发展进程强加给我们的代议机关。仅此一点就证明类比完全是经院性质的。如果一定要从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时代寻找例子，那么不要从布尔什维克代表被迫参加杜马本身中去寻找，而要从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孟什维克党团自愿结成联盟中去寻找。这个联盟一直保留到孟什维主义变为公开的取消主义、变为斯托雷平式的工党为止。

当时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团同孟什维克党团断绝关系，最后他达到了目的。调和派和中派对断绝关系愤愤不平，说问题不在于“领袖”的联盟，说哪一派的后面都有“群众”。然而列宁是正确的。如果同那些公然变成合法的六三反对派的人保持一致，就不能实行革命的政策。现在也一样，如果同那些在巨大的考验中暴露了真面目、实为矿山主和保守党政府的直接和间接代理人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保持一致，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一致，就不能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实行革命的政策。

3. 在阿姆斯特丹国际问题上，中派主义路线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这种混乱能使共产国际彻底迷失方向。

一切有利于保留英俄委员会的理由都会被而且肯定会被刻意用来证明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对的。如果说总理事会是一个不能跳过去的历史“阶段”（斯大林语），那么阿姆斯特丹国际则是一个更大的阶段，因为整体总是大于自己的一个部分的（总理事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如果说在政治上同工会上层人士断绝关系意味着号召工人退出工会（布哈林的理论），那么显然，我们不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就等于号召全世界的工人不加入工会或退出工会。

然而，中央的《通告信》（1926年1月14日《真理报》）说：“联共（布）中央坚决驳斥所谓苏联工会有可能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反革命传言”。这个断然声明本身没有给任何曲解留下余地，然而需要重新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不加入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工会组织因而也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呢？

这种解释尤为必要的原因是：（1）我国几乎所有的工会去年在章程中都不再提起红色工会国际，而是说要加入工会国际联合会；当时人所共知，除了共产国际只有一个国际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国际；（2）许多著名的和负责的党的工作人员在1925年都表示赞成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一些人主张有条件加入（托姆斯基同志），另一些人主张无条件地坚决加入（政治局候补委员卡冈诺维奇^①同

① “……我们应当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取得牢固地位，我们应当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组织。有些人会产生疑问：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怎么能同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中坐在一起呢？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迂回前进的方式。广大工人群众在相当大程度上跟着阿姆斯特丹国际走——因此我们应当到有群众的地方去。我们布尔什维克希望，我们在反对资本进攻的基础上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共同工作，我们就能把其他国家的工会组织首先是英国的工会组织团结在我们周围……”（拉·莫·卡冈诺维奇《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党的工会的当前任务》第52页）。——托洛茨基注

志)。

同英国代表团的巴黎谈判和柏林谈判结果使问题更加复杂。总理事会坚决拒绝以任何方式同我们共同参加实际斗争，然而却又一次在关于工会运动的统一的决议上签了字。这一决议同保留英俄委员会本身一样，其惟一的现实意义只能理解为：委员会应当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桥梁。然而这一想法本身却被宣布为“反革命传言”。

显然，中派主义意味着在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前后脱节、自相矛盾和思想混乱。

* * *

斯大林集团在共产国际所有其他问题上的政策，就其实质来说，具有同样的中派主义性质。

4. 在波兰，在发生军事政变（在时间上正好与英国总罢工相合）的日子里，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行可怜的尾巴主义政策，将共产党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自发势力的组成部分。在如此严重的关头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大的机会主义错误。然而，我国报刊对波共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如同蜻蜓点水，似乎是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平衡。波共中央委员会在最紧要的关头把党引上了克伦斯基式的道路，却未伤一根寒毛。而左派却被解除工作，遭到批判，在德国左派则被开除出党。

5. 英国共产党在批评工党中的中派和工联主义方面过去和现在表现得都不够坚决。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共产国际关于总罢工被出卖的提纲过于严厉，只是迫于巨大的压力才将提纲登载出来。他们认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呼吁书是错误的。斯大林集团不是坦率地和坚决地指出英国共产党的这些弱点（这些弱点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克服，就会在今

后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极大的困难)，而是掩饰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消极观望和犹豫不决等过错，并对指出这些过错的人进行公开迫害。

6. 领导集团对国民党采取的立场具有完全的机会主义性质。现在，当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越来越按阶级路线划分的时候；当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发动有数百万工人参加的罢工而走上斗争舞台的时候；当工会组织吸收了数万、数十万工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再作为一个宣传团体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而应当给自己提出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任务，这个党应当为争取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共产党的独立性决定着它不能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并不排除它同国民党结成长期的政治联盟，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斯大林集团却把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组织上划清界限的问题提法本身说成是“极左”、“投降主义”、“取消主义”以及其他一些难听的字眼，以便掩饰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错误的、尾巴主义的态度和对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斗争中可能起的作用的贬低。

* * *

7. 斯大林集团在世界革命运动的问题上堕落到中派主义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联共党内反对反对派的残酷的机关斗争使这种堕落日益加剧。联共内部斗争的原则方针必然会在共产国际各党中有所反映。外国党内反对反对派追随者的斗争将推动斯大林集团越来越向右转，从而将斯大林集团在世界工人运动问题上的中派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暴露无遗。

十、关于“稳定”问题的抽象提法是 机会主义的理论伪装

战后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什么？经济方面：生产的不正常的急剧收缩和扩大——尽管某些领域取得了技术成就，但整体上仍低于战前所达到的水平。政治方面：政治局势如此急剧的动荡，忽左忽右。

什么是稳定？战前和战后的欧洲

可以称之为真正稳定和有生命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充分满足不断扩大的整个生产的需要，满足部分改善劳动群众至少是劳动群众上层状况的需要。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或一个工业部门的状况的暂时改善反映出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工业部门的状况的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理解稳定呢？

(1) 没有战争，至少在欧洲大陆没有战争。

(2) 没有革命——指公开的国内战争。

(3) 各国之间建立起比较“正常的”经济关系，其中包括通商条约。

(4) 货币比较稳定。

战前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什么？

经济方面：通过“正常的”行情波动——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政治方面：通过不大的动荡——社会民主党得到发展，自由主义遭到削弱。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经济和政治矛盾加剧的有序进程，从这个

意义上说，就是不断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先决条件。

稳定和普塞尔现象

稳定，比如说，对于今天的英国意味着什么呢？生产力的发展吗？经济情况的改善吗？更加美好的前程吗？工人群众的相对满意和平静吗？绝对不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所谓稳定依靠的完全是五花八门和形形色色的旧工人组织中的保守势力，而且是在英国共产党软弱无力的情况下。英国在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革命已经完全成熟。问题纯粹是在政治方面。稳定的主要基础是工党和工联的上层人物，这些人在英国实质上是按分工原则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工人群众处于总罢工和挖煤工罢工期间那种状态下，在资本主义稳定的机制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已经不再是麦克唐纳和托马斯，而是皮尤、普塞尔及其一伙。他们起主要作用，托马斯起补充作用。没有普塞尔，托马斯就失去了依托，而与托马斯一起的还有鲍德温。虚伪的、外交官式的、披上伪装的、普塞尔式的“左派”，时而轮流地，时而同时地与教徒和布尔什维克称兄道弟，他们随时准备不仅要退却，而且要叛变，这就是英国革命现在的主要障碍。稳定——这就是普塞尔现象。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知道了解整个政治形势的关键。由此可见，以存在稳定为由来证明同普塞尔结成政治联盟是正确的，这是理论上多么荒谬，实践上多么有害的机会主义。英国经济的客观稳定遭到了根本破坏。为了动摇政治稳定，应当摧毁普塞尔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工人群众的面前同普塞尔保持一致，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一致，也是一种极大的犯罪和耻辱。

为了德国党的稳定，两个基本派别应当在思想政治上相互接近和相互渗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拥有正确的政策和相宜的领导。

当然，这并不是说，右派或左派将完完全全以现在的形式加入这个联合组织。一定的选举是不可避免的。将被淘汰的首先是两个

派别中那些迄今为止仍对自己的片面性和党的领导必然建立在更正确、更全面的共产主义政策基础上缺乏认识的人。不可避免地将被淘汰的还有那些准备同共产国际分道扬镳或宣称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应当对这个国家采取反对派立场的“左派”分子。当然，这并不是说，应当将每个对共产国际或对苏联有过激言论的工人都自动排除在外。在受联共内部事件影响进行激烈的派别斗争的情况下，这种过激言论是不可避免的。但德国共产党变更力量配置当然应当在共产国际和严格的党的继承性的范围内进行。右派和左派在现时党的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的相互接近，其目的决不是要消除或摆脱“台尔曼集团”的领导，因为这样做只是意味着将台尔曼自己现在用于左派的那些错误方法用于这个集团。

* * *

在其他一些战后大规模群众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的国家里，共产党内的派别具有不够鲜明的特征，但这些派别总的来说反映了那些向这一或那一方向倾斜，集偶然事件、外部压力、个人因素等于一身的发展中的矛盾。然而，就是对法国来说，也不可能通过消除所谓的右派和左派方式来保证对党实行正确的和稳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那种旨在通过施加组织压力的方法使这两个派别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不可原谅的派别政策是极其有害的，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另一方面，每一个反对派集团和这些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如果意识不到必须在法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所提出的任务的基础上相互接近，将不可避免地被今后的发展抛到一边。革命的政策不是向昨天而是向明天看齐的。

* * *

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以上所述理解为，现存的右派或左派表达了

同正式的中央相对立的已经很完备的正确方针。无疑，在一些右派中间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在左派中间——则有不少的“幼稚病”。如果认为官方的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没有思想的官僚主义者，那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命运担忧的责任感使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暂时留在了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制度下，尽管对这种制度的不满与日俱增。然而，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在共产国际内部，在全面争论其中包括围绕联共许多问题进行争论的基础上，彻底的重新配置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共产国际各党才能摆脱以联共的现行制度为基本来源的机关淫威。

共产国际的所有有生命力的部分越是迅速地、广泛地、坚决地提出这个迫切任务，而不理睬现在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派别，这个任务解决时引起的震动就越小。

十一、出路

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所有问题必然会使我们重新面对党的制度的问题。在经济、工资、税收等问题上背离阶级路线，就其本身来说当然是极其严重的危险。然而，由于斯大林制度束缚了党的手脚，使党没有机会通过正常的途径纠正党的领导层的方针，这一危险扩大了10倍。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共产国际。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对共产国际实行更民主的集体领导的决议在实践中走向了反面。在共产国际问题上的最重要决议都是通过纯粹的派别方式作出的，通过斯大林派遣的秘使贯彻实行的。改变共产国际的制度成了国际革命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种改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或者同时改变联共的制度，或者通过反对联共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无须多言，所有的努力都应当是为了保证实现第

一种途径。争取改变联共制度的斗争就是争取改善共产国际制度和保留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的思想领导作用的斗争。

在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之后，关于党的制度的问题更加激化，表现为斯大林应不应当继续担任总书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提法同所谓的列宁遗嘱有继承关系，列宁建议为了党的健康发展应及时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列宁的理由是，斯大林粗暴，不守规矩，会滥用权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充满深刻的政治和心理敏锐性，对此现在未必还会有疑问。斯大林的力量十分之九不是他个人的力量，而是他“继承下来”的机关的力量，因为斯大林早在列宁生前就当上了总书记，尽管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违背列宁意愿的。在列宁生前，尽管斯大林是总书记，但机关执行的是政治局的政策即列宁的政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领导的机关变成了独立的力量。斯大林的作用就是党内派别官僚主义原则最完整的表达者的作用。但正因为这样，现在问题决不在于斯大林当还是不当总书记。显然，即使中央委员会明天能解除斯大林（“根据他个人的请求”）的总书记职务，任命鲁祖塔克、莫洛托夫等担任这一职务或者根本取消总书记一职，实际上这在目前的总的形势下也不会给党的制度带来任何变化。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样，完全是通过派别途径单方面挑选出来的。省委书记、边区书记和州委书记也是通过上头这种派别方式由上级挑选出来的，然后由这些书记如法挑选出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每一位书记再相应地为自己挑选出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区委员会等等。在选举出席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名单实际上是由书记们圈定的，而且经常警告说，省委或中央“不能容忍”反对派的代表当选。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管理中被荒谬到极点的派别官僚主义集中制取而代之。机关掐住了党的喉咙，不仅不让党说话，而且不让党喘气。机关的核心是封闭的斯大林集团，这个集团认为自己是不可

更换的：对它的任何批评在第一阶段都被它宣布为反对党的统一的罪行，在第二阶段则被说成是国事罪。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是以总书记身份还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或是以其他什么身份来领导他那个在党的机关内部组成的集团，已经完全无关紧要了。斯大林的集团独裁使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种独裁如果不遇到反击，将给党带来越来越惨痛的一次又一次动荡。问题不在于让斯大林名誉扫地和将他驱除出去，即不在于用斯大林之道还治斯大林之身，而在于恢复正常的即列宁的党内制度，斯大林集团也将会溶合于这个制度之中。应当将党对机关的权力还给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召开经过认真准备和民主选举的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将使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党的机关的组成符合百万党员的真正想法和情绪。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No07954

声 明

（1926年10月16日）

此项声明是我们在得到政治局关于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的决定之后作出的，当时还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通知草案。我们坚决指出，通知中关于我们放弃派别集团的结论无论是与我们的声明的确切内容，还是与我们的意愿都完全不符。事实上，我们的声明含义十分清楚，毫无争议，它不仅指解散那些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集团，而且指终止这一方面的任何企图，至少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不使用“解散”一词，就是为避免有人吹毛求疵地指责我们准备“解散”今天已经形成的集团以便以后再建立新的。我们认为“终止”一切派别集团的说法更清楚、更坚决。

我们重申我们的建议：希望按照党的纪律原则，在政治局有关决定的基础上签署文件。否则，我们坚持在发表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的同时发表我们的声明。如上所述，我们认为通知草案对这项声明的定性是错误的。

[格·季诺维也夫]^①

1926年10月16日

① 页下有托洛茨基的附笔：“可能是季诺维也夫写的，但也可能是我写的。列·托洛。”一些特征（如打字机字体）表明，文件为季诺维也夫所写。

№07955

托洛茨基：关于政治局的决定

(1926年10月16日)

关于政治局认可布哈林同志对我们的声明所作修改的决定，我们认为有必要申述如下。

如果不去考虑那些在我们看来政治上次要的、仅仅有损原文的微小改动，那么还有四处改动有独立的政治意义，我们认为不能把它们加进以我们的名义发表的声明。

1. 关于“派别和集团自由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完全准备在声明中加进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这些决定至今尚未取消，而且我们的看法和这些决定完全相符。我们认为布哈林同志的说法是片面的。因为事关我们在党内的行为路线，我们坚决声明：拒绝派别手段和集团，解散已经或正在形成的集团，采用这些手段是错误的和危险的等等。这些话清楚、直接、明确地反映了我们显然打算彻底履行的义务。

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派别和派别活动问题同党的制度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在声明中只字未提过去那些促使派别活动产生和传播的条件。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份反应表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彻底消灭派别活动的充分意愿的文件中援引这些条件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不仅提出关于我们的直接、清楚和明确的义务问题，而且提出了关于“派别活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认为只能用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确切文本来回答这个总的问题。

2. 我们承认在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有关决定的情况下开始辩论是错误的。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说“破坏了代表大会（第十四次）关于禁止全国辩论的决定”。代表大会没有这样的决定，而且根本不可能有。中央一月全会确定了关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运动的形式，禁止中央委员在其中发言。我们压根不知道任何禁止全国辩论的决定。只要向我们指出说的是哪个决定，我们就立刻把它加进我们的声明。尽管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但因为事关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追根究底。

3. 很明显，中伤共产国际或苏联的行为和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如果德国共产党员乌尔邦斯同志和维贝尔同志中伤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情况属实，就有必要按照党的有关制度对他们进行谴责。我们没有掌握这样的材料，所以不能谴责这两个党员犯有中伤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样严重的罪行（如果对“中伤”一词确实按它所包含的意思理解的话）。

对于被开除出共产党的路特·费舍^①和马斯洛夫^②，我们同样不了解他们的中伤事实。我们知道，他们和宣称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云云的科尔什划清了界线。如果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走上中伤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道路，那就意味着他们和共产主义一刀两断，共产国际的大门将永远对他们关闭。我们没有材料作出如上判断。因此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把他们同科尔什相提并论。

至于谈到以 700 份签名表示完全支持我们的德国左派，显然，

① 费舍，路特（1895～196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代表人物。1923年5月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左派”掌握领导权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当选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② 马斯洛夫，阿·（1891～194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领袖之一。1918年加入德共，1924年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和它断绝联系，至少是在它的这一部分观点上。说到派别活动，我们声明拒绝支持任何派别集团。

4. 有人指责梅德维捷夫同志，说他在差不多三年以前写的一封信中表露了取消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同社会民主党人融合或接近以及租让国家工业等等想法。这些怪异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对此谁都不会有片刻怀疑。梅德维捷夫同志对《真理报》所评论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我们在声明中没有追究梅德维捷夫同志的信的准确性，只表示绝不同意信中表述的思想。至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没有鼓吹取消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等等，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证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赞成过这些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以我们的名义声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持有上述观点。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告诉我们，这种“划清界线”是必要的，以使同工人反对派的联盟成为泡影。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一联盟到现在为止表现在哪里、在什么文件、哪些行为或声明中。这样的文件、声明和行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正如联盟本身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一样。

* * *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不能以自身名义向党说出得到政治局认可的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中的内容。我们当然完全认为，对党中央的服从必须以少数派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公开维护他们所不同意的观点为前提。如果政治局认为我们“必须”“按党纪原则”采纳布哈林写的修正案，我们将会服从并签署中央委员会认为符合当前党的利益的任何声明。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政治局要求我们签署这类声明的正式决定。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16日

№07956

托洛茨基：是否需要争论？

（1926年10月）

现在党内正在自上而下展开一场反对一切争论的激烈斗争。《真理报》撰文指出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是谁都没有说明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能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什么是争论？争论就是党对其所面临的而且在党内有分歧的那些问题进行讨论。党能否不经讨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如果不应由党解决这些问题，那又有谁会替它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就在这一点上：谁能为党、替党、背着党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真理报》以及反对争论的演说家们说：所有这些问题已经由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解决了。但问题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十个月了。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农村是富农的影响增加了的还是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影响增强了。在四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工业是超前了还是落后了、工资收入的提高是和国家福利的总体增长同步还是滞后。

在七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苏维埃中是无产阶级的影响增强了，还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分子的影响由于富农实力的扩大和工业落后而增强了，结果使无产阶级、雇农贫农和共产党的影响削弱了。

非常明显，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彻底解决。争论要受到生活的检验。应该考虑到最近一年内积累的那些事实，以便党能在成熟讨论的基础上对所有有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决定。

如果不是党还有谁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这是一些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问题。必须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对全部经验进行检验。除了党又有谁能检验这一经验呢？如果在党内出现了严重深刻的分歧，那么除了代表大会又有谁能解决它们呢？而如果党在代表大会之前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讨论，那么代表大会又如何能解决它们呢？全面讨论即是争论。

当然，争论有其消极方面。争论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际工作。但是问题关系到应该按照什么路线开展整个实际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使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加强，能保障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取得优势的的实际工作。如果分歧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发生的，那么下述说法，即干点实际工作，不要讨论按照什么路线开展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就是荒谬的。

每一个党员都不得不考虑的这些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这些问题就是：

1. 最近一年内整个国民经济向前迈了一步。工业发展了。国家总的富裕程度提高了。但实际工资与去年秋季相比降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继续高于工资收入增长，这是否会有危险？这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社会影响在降低。要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2. 国内的商品荒说明工业拿不出必需数量的产品来交换农业的剩余商品。由此产生了所谓比例失调，即工业品数量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以及在四月全会上争论过这种比例失调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的问题。今年秋天的事实表明比例失调扩大了。这说明尽管工业向前发展了，但还是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这表明国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是增大了，而是减小了。这正是实际工资在这一年减少而不是增加的原因。党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没有，没有讨论过。能推辞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不，不能。当然，无论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还是四月全会都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全党必须执行的回答。但是党所作的决定必须经过生活的检验。党考虑到了这一检验。如果在党内或在党中央委员会里产生分歧，党就对这些分歧加以讨论并作出人人必须执行的决定。对其他所有问题也是这样。这些问题结成了一根链条。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社会主义积累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积累；工资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这说明无产阶级的经济作用增长不够快甚至相对降低。而这不能不对政治有所影响。最近的苏维埃选举表明无产阶级及其在农村的可靠支柱贫农的政治比重有些下降。能说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吗？不能，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些具有非常意义的新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评价不一，包括在中央委员会里也有分歧。谁能作出决定？党的代表大会。

可以说中央委员会的少数应该服从多数。这毫无异议。可以认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委员破坏了纪律。可以因此对他们进行处分。但这不应取消关于党的代表大会的问题。问题是为了让党能以新事实、新经验来检验自己以前的决定。认为危险不是来自富农、而是来自对这一危险提出警告的那些人，这对吗？向左开火，即反对那些提醒注意工业落后、注意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中的政治比重下降和贫农在农村中的力量减弱等等的党员，这对吗？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的总路线。今年有大量事实来检验这一路线。谁能进行这一检验？怎样进行？如果党不倾听有争议的观点，拒不作出自己的决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如何能作出其决定呢？

所有不幸都在于一些同志包括《真理报》编辑部认为有人可以作出决定而不用通过党。他们说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这其实简直就是说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是有有害的和危险的。在出现分歧时究竟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没人给我们任何回答。

争论真的有危险吗？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争论。如果工人支部要

讨论一下为什么工资在经济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反而降低的问题，这有危险吗？如果工人支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倾听中央委员会多数以及反对派的意见，这有危险吗？任何危险都没有。只是这些意见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陈述，调子要适当，要从各个方面加以阐明，要向全党提供必要的文件、数字、不要让任何人蒙在鼓里。如果在报刊和会议上进行那种无休止的、激烈的、单方面的、愈来愈演变为对反对派的直接谩骂和诋毁的争论，并且对党隐瞒陈述了反对派观点的主要文件，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样的争论才是危险的。它毒化党的舆论，破坏党的统一。

《真理报》说争论导致脱离实际工作。但争论终归在进行，况且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从未间断。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出版小册子，制定反对反对派的决议。同时，反对派的真实意见和建议被肆意歪曲。不给反对派表白的权利。现在从上面又发起一场争论，声称不需要争论。出现了一种新理论，认为有争议的问题可以不经党内讨论而解决。就这一题目展开了激烈的、单方面的争论。党为此白白耗费了巨大精力，而没有从实质上去讨论工资收入因何降低、切尔文卢布的购买力因何跌落、富农在农村的影响因何快于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等问题。对专政构成威胁的正是这些事实，而决不是在党内对这些事实的讨论。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保障党的正确争论方针。谁想避开争论，谁就是想避开党。谁也不能替党解决问题。应该辩论的不是关于争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的那些重大问题。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07957

托洛茨基：对我国革命的评价及农民问题

（1926年10月29日）

1. 1917年在对革命的评价方面是否出现过什么分歧？
2. 采取农民自由委托书作为土地纲领基础。
3. 土地法令。
4. 剥夺富农政策。
5. 争取中农的斗争（见第17卷《苏维埃政权和农民》中的书信和报告）。
6. 列宁就中农问题答农民古洛夫。
7.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8. 解释新经济政策（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结 论

我坚决反对根据过去的、而且是被歪曲的关于不断革命的争论事后篡改十月革命这一活的历史的任何尝试。

我们是否认为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九周年之际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是因为它实现了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奠定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不认为我们确立了苏维埃制度后就把我国排除在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之外。

正是由此开始出现真正的分歧。

* * *

1. 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实现或者“相信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实现是基本前提。

批评，包括决议。

2. 指责想掠夺农民是第二个前提。

3. 既然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那究竟为了什么要掠夺农民呢？这个问题至今没人解释过。

4. 我们说，比例失调说明：

(1) 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

(2) 存在为此所需的内部资金。

5. 有人回答我们说：你们过去夸大了资本和私营企业主的积累；你们过分夸大了被官僚机制侵吞的资金数量。

换句话说——有人回答我们说：国内没有加快工业化的资金。

6. 所谓我们相信“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断言以何为基础？

7. 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根据以下客观情况：工业化的速度不仅由国内关系、而且由国外关系（世界市场）来决定。

直到最近还有人回答我们说：可以是乌龟爬行速度，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国际关系与此无关。国际关系以干涉来威胁我们；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8. 关于世界发展的相对监督的修正案在七月全会上被否决。

9. 我们认为“乌龟爬行速度”是不够的，因而被宣布为“悲观主义者”和“信念不坚定的人”。

我们说：

(1) 主要危险在于工业落后（比例失调问题）；

(2) 由此产生来自富农和私营企业主的危险；

（3）向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倾斜的方针是不正确的；向农村上层“偏移”是不容许的；

（4）扩大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的政治影响是不容许的。

我们确信这些倾向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危险的。为什么要把这称作“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呢？

* * *

当前的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国内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的资源，而不受世界风云变幻的影响？

这种提法带有经院习气。它对任何人、任何事情来说都不需要。

问题是这样的：国内是否有充足的资源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保障社会主义成分占有较大优势并缩短我国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差距？

缩短差距是好几年的计划。

这一计划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准备是相辅而行的。

我们应当逐年把我们的价格向世界价格哪怕稍微靠拢。我们的价格应当逐年变得更有竞争力。

无产阶级和农民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

10~20年内农民继续存在？

这是什么社会主义？

要知道问题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以确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确关系。是否有过分歧？

租赁和雇农。

关于富农、贫农、中农的争论也就是关于“同农民的正确关

系”的争论。

我的关于农民的引文：

“我们主要的力量对比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不仅使我们的国家在将来达到社会主义，而且直接使之免遭灭亡、瓦解和崩溃的阶级。正如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任务在于确立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正确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托洛茨基，1923年4月5日的报告）

“我们党的全部智慧应该用来使这个问题（从农民那里拿走多少）不变成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成为协商、妥协的问题。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妥协派，在使工人国家同农民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彻底妥协派。”（托洛茨基，1923年4月5日的报告）

“即使在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我们基本的社会主义方针也同样保持全部效力。”（托洛茨基，1925年7月29日《消息报》）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29日

No07958

托洛茨基：答关于社会 民主主义倾向的指责

（1926年10月29日）

1. 前言。决议指责反对派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社会民主党是部分依赖工人阶级的官僚分子、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执行资本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改良政党。社会民主党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置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下。

尽管《东方曙光报》认为反对派想在四条原则基础上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但这种意见未必会被作为决议的基础。

2. (1) 反对派反对把选举权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企业主。

(2) 反对派坚持增加对富农的税收并减免农村贫农 40% 的税收。

(3) 反对派反对向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倾斜的合作社方针。

(4) 反对派坚持更快地发展工业。

(5) 解散英俄委员会。

(6) 工会章程。

(7) 最后，反对派认为党的生活的某些现象同官僚主义的增长有关。

3. 反对派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有迹象表明，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滋生的有害倾向正威胁着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国家的工人性质。在这一点上很难找到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4. 只有撇开当前发展阶段产生的实际分歧，退回到遥远的过去，才能表面上构建能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指责辩解的逻辑体系。

5. 全部问题就在于对我国革命性质的评价。

6. 在此期间，我受中央委托就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写了一本反驳考茨基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20年），把布尔什维克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解作了对比。

1922年我写了一本关于格鲁吉亚的书（《帝国主义和革命之间》，1922年），更具体地把共产主义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解作了对比。

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行了论证。

7. 撇开这些著作却抓住一些东拼西凑的引文不放，是想把我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和列宁的理解对立起来。

8. 然而即使这种根据断章取义的或片言只字的引文（有时是用明显歪曲原意的未经校正的速记记录）间接取证的方法，也没能给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结论提供任何根据。

9. 我们在1917~1918年或1920年认为，只有在一系列国家革命之后才能真正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只有经过几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只有扩大我国革命的范围，才能摆脱在农民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难以相信，这一事实在1926年受到责备。

10. 分析引文。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

11. 农民问题（列宁给古洛夫的回信。我的《苏维埃政权和农

民》一书中的一章（第17卷，第2分册，第525～548页）。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及其他）。

12. 主要矛盾：不相信社会主义和掠夺农民（我们的词典里没有“掠夺农民”这个词组）。决议没有对反对派的真实观点作任何评价。决议的任务就是证明反对派具有倾向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为证明这一点，不得不脱离或撇开有争议的问题。不得不在故纸堆里搜寻间接罪证。不得不对写过的主要东西避而不谈。不得不对列宁在这方面的著述视而不见。在这种司法式的、经院式的、检察式的方法下矛盾无法避免。由此产生的突出矛盾使决议从头至尾漏洞百出。

13. 有人会说：引文确实不能证明它们应证明的东西。引文至少反映了那个时期党的总的观点。但现在是新时期了。党的方针变了。能不能把列宁《论合作社》一文中的几句话同列宁写过的所有东西对立起来呢？这个问题暂且放在一边。让我们不管那些旧引文，提出以下问题：

（1）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吗？

（2）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吗？

（3）我们能否不管世界革命的进程而取得胜利，即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

14. 我们是否认为我国的建设将导致社会主义（见《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前言）？

15. 有人会说：但这是恢复过程的情况。新时期的困难迫使我们改变观点并承认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援引关于改造时期速度的引文）。

16.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道课题，不是一个有保障的过程。争论的焦点是用什么方法解决这道课题。当前的中心问题是速度问题。

（1）比例失调问题。

(2) 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对比。

17. 你们是否认为这些问题没有欧洲革命也可解决？问题的提法是抽象图式化的（作分析时可以暂时从国际环境中抽象出来；作预测时则不能从国际环境中抽象出来）。

18. 这一时期欧洲会出现什么情况？（分析三种模式）

19.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吗？（引莫洛托夫的话）

结 论

反对派只有两条道路可走。第一条道路：如果认为我国不是工人国家，我们从事的建设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等等，那么就应当使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这个国家，应当建立另外一个党。

第二条道路：如果认为我国是工人国家，但带有官僚主义弊端；如果认为我们从事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但经济政策不足以保障对我国内资金进行必须的分配，那么就应在完全立足于这个国家的基础上，抱着对党和工人国家的总政策完全负责的态度，通过党的方法和途径同认为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和危险的现象作斗争。

20. 最近一个时期党内斗争的特点是斗争形式极端尖锐，已发展成派别斗争，关于这一点该说的在10月16日的声明中都已经说了。不管这种尖锐的派别斗争是由什么条件引起的，都无疑会被党员群众理解为或部分理解为，由于分歧的尖锐性和紧迫性协同工作已不可能，将会分裂为两个党。

我无论如何不想淡化分歧。分歧相当严重。以后的经验会对它们作出检验。但这完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范围内的分歧。

21. 10月16日的声明是消除上述不和谐的重大的、原则性的一步。其目的是：把为这些或那些观点而进行的斗争纳入协同工作和为总政策一致负责的范围。

22.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决议的目的是把从中必然导出派别政策甚至两党政策的那些观点强加给我们。这项决议具有把 10 月 16 日的声明以及欣然接受这份声明的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变为一纸空文的倾向。这项决议错误至极，同时它人为地为分歧推波助澜。

这项决议的通过将会造成重大损害。但是据所谓反对派的领导同志的情绪来看，这项决议的通过不会使我们背离 10 月 16 日的声明路线。我们不接受强加于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打算人为地助长或加剧分歧，以便以此证明派别斗争旧病复发。相反，我们每一个人在不淡化现有分歧的同时，将竭尽全力地把这些分歧纳入通畅的、集体的工作范围。

二

1. 决议指责反对派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

2. 实际分歧。

(1) 更快地发展工业，是结合和降低价格的条件。

(2) 工业化速度受国际条件影响。

(3) 增加对富农的税收，并减低农村贫农 40% 的税收。

(4) 通过税收以及更合理的价格政策增大对私人资本的压力。

(5) 反对把选举权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企业主。

(6) 反对向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倾斜的合作社方针。

(7) 工资问题。

(8) 党的生活的某些现象和官僚主义的增长。

(9) 反对过高估计经济成分的稳定作用和过低估计普塞尔主义。

(10) 要求解散英俄委员会。

(11) 修订工会章程。

3. 消除威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国家的工人阶级性质的危险。

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4. 失败主义？

5. 需要撇开当前发展阶段产生的分歧，退到遥远的过去才行。
从具体到抽象再到经院习气。

6. 全部问题就在于对我国革命性质的评价。

引文出自 1917~1922 年间的著述。

列·托洛茨基

1926 年 10 月 29 日

No07959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农业和农民

（1926年11月）

1. 第三分条应当这样表述：

党的农业政策是根据农村发展中的两种倾向——资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制定的，而由于国营经济对农业的影响太小，农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暂时略显占优势。无论是中央统计局，还是地方当局对农村的调查都毫无例外地表明，在最近五年中富农经济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富裕农户的数量得到了明显的、相当快的增长。他们租给贫农的土地数量逐年增长，拥有的牲畜逐年增多，对无农具的贫农的剥削日益加重，同时从事野蜂饲养业的始终有增无减，据全俄农林工会资料统计，在335万农业和林业工人中从事野蜂饲养业的达到了220万（包括60万牧民）。尽管生产合作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集体经济的发展无疑仍落后于农村非集体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许多资料表明，某些中农已开始壮大，尽管中农和贫农的合作化取得了很大成绩。鉴于党的经济政策和主要纲领性任务不是促进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式的整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形式的发展，代表大会决定：（1）在税收方面根据农村上层收入的增加逐渐提高其税收。（2）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合作社等机关应千方百计防止滥用国家用于发展农业的资金，即把一部分资金用于帮助并不需要帮助的富裕农民，而不是直接用于首先帮助贫农户、其次帮助贫穷的中农户。例如，由于供给集体经济和合作社的拖拉机不够，要坚决禁止将拖拉

机出售给富农和富裕农户。(3) 加强组织雇农、保护其不受富农和富裕农户的剥削的工作，同时加强对无农具和无牲畜农户的保护，使他们免受拥有许多牲畜和富余农具的农民通过各种条件苛刻的交易进行剥削。

2. 第10条和第11条互相矛盾。第10条说“相当一部分贫农群众的”发展，而第11条说“大部分贫农户的”经济发展。如果第11条的说法是根据亚·彼·斯米尔诺夫在10月22日《真理报》上引用的中央统计局对35个省的分类调查，那么(1) 这些资料讲的是无耕地农户在减少，而中央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无耕地农户从4%增加到4.7%；(2) 拥有2~6俄亩耕地的农户都被算作中农，他们从1922年的40.3%增加到1925年的49.3%。而实际上拥有2~3俄亩耕地的农户显然是贫农。如果这种农户增加，那就表现贫农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3. 第二条不应该掩盖农业人口大量过剩的情况，而应当直接说出拉齐索夫在《真理报》上引用的数字，即五年内农村的潜在失业人口预计增长到1000万。

4. 第13条，“贫农在经济和政治工作上的有利条件”显然不如不利条件即农业人口过剩的增长发展得快。在中部黑土地地区和乌克兰这一现象尤为明显。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926年11月]

№07960

皮达可夫：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草案

提交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

（1926年11月）

1. 工业落后

党和全国工人阶级应当集中注意的主要经济问题是工业、动力及运输的发展落后于苏联整个社会制度的发展。

这一事实尤其表现在下述方面：

（1）农业居民不能按照应有的数量、质量和可以接受的价格得到他们所需的工业品，无论是个人消费品，还是生产消费品。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即工业不够发达还在加重。如果认为这种比例失调完全是由于我们从沙皇俄国继承下来的工农业不协调造成的，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那就彻底错了。这种“历史性”的比例失调在近一时期内更加严重了，其明显标志是：

①“工业品价格居高不下，农产品价格相对低廉，使农业生产者在等价交换中无利可图。”（《控制数字》第125页）

②农业居民的收支状况为收入大于支出，收入“余额不断增长”，这说明即使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比战前提高，提供给农民的工业品仍然不够。

③农村得到的工业品的质量总体上比战前下降。

（2）农业人口过剩，这一方面使农民生存的物质文化水平下降，使富农对贫农，特别是雇农的奴役加重，使雇农的工资降低，阻碍了农业经济的技术提高；另一方面扩大了失业大军。1925/

1926年期间，尽管大工厂工业增收了42万工人，失业人数仍然有增无减。1926/1927年失业人数将更多，因为工厂无产阶级的人数只能增加15万，而农村每年有50多万富余劳力要到城里寻找工作。1925/1926年雇佣劳动者（农业工人除外）共增加了130万，而1926/1927年只增加40万，就是只考虑城市居民的自然增长数，这个数字也显然是不够的。

(3) 工业不能充分满足全体居民的购买力，这首先表现在零售价猛涨。此外，就是在工业品零售价指数过高的情况下，工业品短缺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4) 工业不能满足运输业的生产需求。

(5) 工业不能满足国防需求（特别是有色冶金业、化学、航空和汽车工业的需求）。

(6) 燃料危机日益临近，而国家的动力基础薄弱。

(7) 国家运输业的状况严峻，因而进一步提高我国交通道路的运输能力问题很尖锐地提了出来。

(8) 居住条件下降。

(9) 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反而有所下降。

2. 在农民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巩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生存的主要条件。无产阶级政党既然将巩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结合作为自己政策的重点，就必须在经济形势每发生变化时认真地研究什么会威胁这一联盟的完整，并采取果断措施消除破坏联盟的因素。在目前具体的经济形势下对结合具有削弱作用并在今后会导致削弱联盟的因素是：

(1) 工业不够发达（农民一方面得不到大量质优价廉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在没活干的情况下在城里也找不到工作）。

(2) 富农的经济作用不断增强，中农与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形成结合。

由于国有工业发展落后于农村中富农分子的经济增长以及私人经济的增长，苏联经济正被推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当然，这方面暴露出来的趋势还没有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太大的危险，但今后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并继续实行不大力发展国有工业、运输、动力的政策，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构成实际威胁。

因此，党必须认清这一点并齐心协力地、孜孜不倦地努力使工业发展达到应有的速度。

3. 党时刻都不应该忘记，苏联的经济发展只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党关于采取果断措施不断扩大出口的正确指示在经济上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无论是在出口方面，还是在进口方面，都要扩大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因此，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今后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就像在国内战争结束以来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恢复时期那样。这种依赖没有而且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有丝毫的统治与服从、剥削和奴役的色彩；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的加强并不意味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依赖关系的生长，而首先是苏联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生长。增加进口设备、某些原料、半成品是必要的，为此同时，为了建立黄金储备必须扩大出口，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在销售方面，还是在购买方面，苏联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在加强。这所谓的其他国家，首先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包围。农民。国内资本主义。

我们的速度应当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价格。黄金储备。出口。

4. 试图根据恢复时期产品、货运量和能源燃料产量的大幅增长系数来证明现在的工业、运输和动力的发展速度已足够了，这是根本错误的，是会影响党、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意识。党应当清楚地意识到，1926/1927年度是转折年，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工业和运输业只有在新的基本建设投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展。我

们所面临的时期与过去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已经充分利用了从旧制度继承的固定资本，以后需要建立新的固定资本。国家只是刚刚起步，旧的物质要素已经被利用，新的建设时期正在到来，要建设新的工厂、新的运输设施、新的动力基础。这就是新的建设时期的根本不同之点。

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是固定资本问题，首先是工业和运输业的固定资本问题。由于工业和运输业本身发展落后，一方面给我们在这方面造成额外的困难，另一方面十分尖锐地向党提出增加国家工业和运输业的固定资本这个中心问题。

应当根据苏联经济形势的这种根本性改变对党的经济政策作果断调整。工业和运输业的基本建设工程问题应当成为注意的中心，与此相应，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变基本建设工程不足的状况并使基本建设工程的规模适应国家的总体需求。

基本建设工程的必要规模只能根据经济发展前景确定。

年度计划不可能回答基本建设工程和新的基本建设投资应具有怎样的必要规模这个问题。因此首要的任务是制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特别是发展工业、交通和电力的长期远景规划。不制定这样的计划就无法确定每一阶段的基本建设工程规模，也无法确定新的建设方针。年度计划应当是远景规划的执行，它可根据每个经济年度的具体情况（收成等）作一切必要的修改。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业计划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虽然还不够准确，但在工业基本建设工程的必要规模问题上使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数字目标。运输业和苏联的其他经济部门也应当尽快制定出这样的目标。

工业的五年发展目标表明，如果对下一时期的基本建设工程估计不足，如果在五年内名义工资增长 25%，工厂工人人数增加 50 万，那么要使 1929/1930 年度的人均个人消费达到 1913 年的水平，

要使生产比重稳定，就要在 1925/1926 年～1929/1930 年这五年中对基本建设工程投资 61 亿卢布。

这个数字显然是偏低的。

但是，即使根据这个数字，鉴于 1925/1926 年度的基本建设工程投资额为 8 亿卢布，在余下的四年里投资额也应为 53 亿卢布，平均每年 13 亿卢布。

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把工业中所有的资金（折旧费及利润）投进去外，还需要 20 亿卢布，由于 1925/1926 年度投资不够，其他四年每年应投资约 5 亿卢布，电气化和军事工业费用除外。

在制定出更加完善的远景规划之前至少应当依据上述核算，以免给将来造成更大的困难。

此外，每年还需投入不少于 1 亿～1.5 亿卢布用于电力建设，1 亿～1.5 亿卢布用于交通，初步预算近几年内对工业、电气化和运输业的投资，不算这些部门本身消耗的资金，每年不应低于 8 亿卢布。

这是苏联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

5. 此外，住宅建设还需要大量开支。

1925/1926 年度通过各种渠道用于工人住宅建设的拨款为 2.17 亿卢布。为了保持 1926 年的水来（人均 10.8 平方俄尺），即仅仅满足每年新增居民的住房需求和维修现有住房，五年内需要 20 亿卢布的费用。（1926 年 9 月 23 日《消息报》社论）

这笔费用本身提出了一个资金来源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大力发展建材（玻璃、砖、水泥、金属、房盖材料等）来保证这笔费用的实现 [……]^①

[方 案]

2. 农村每年都不断地涌现出找不到活干的“过剩”人口。据

^① 决议草案未完，在此中断。

农业人民委员部资料统计，每年这种“过剩”人口平均增加200万。城市每年吸收50万~60万失业农民。1925/1926年，尽管大工厂工业增收了43.5万多工人，雇佣劳动者（农业工人除外）增加了130万，失业人数仍然有增无减。1926/1927年工人的年平均人数预计将比1925/1926年的年平均人数增加15万，雇佣劳动者人数增加40万。自然，城市中的失业人员将增加，而农村中的过剩人口使农民生存的物质文化水平下降，使富农对贫农，特别是雇农的奴役加重，使雇农的工资降低，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提高。因此忽视农村的失业现象不仅不会巩固，反而会削弱工农联盟。

3. 工业不能充分满足全体居民的购买力。这首先表现在零售价猛涨。此外，就是在工业品零售价指数过高的情况下，1925/1926年的工业品短缺仍达3.88亿卢布，而1926/1927达5亿卢布（《控制数字》第79页）。如果由于某些不利的收获条件短缺问题将有所缓解，那也不是经济状况好转的结果，而是恶化的结果（由于天灾粮食产量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同零售价增长作斗争不可能有明显的效果。

4. 工业不能满足运输业日益增长的需要。1926/1927年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工厂不能向劳动人民委员部提供“足够的金属……用于道路建设”；加强发展运输工具，即建造新的货车的计划也受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生产能力的限制，由于上述原因预计货车也将短缺”（《控制数字》第74页）。在其他供给方面，包括燃料方面，运输业同样会遇到困难。考虑到运输业基本建设工程不足和需要扩大，必须确认，工业的发展水平与运输业的需求相差甚远。

格·皮达可夫

[1926年11月]

No07961

皮达可夫：对李可夫同志 “关于经济状况”提纲的修改意见

（1926年11月）

第1页第4段删除。

第2页第1段，“恢复时期”一词后加上“是指利用过去的经济制度留给我们的一切固定资本”。在“完成”一词后加上“尽管人均个人消费率和对外贸易额尚未达到战前水平。”

第2页第2段后加上：

“同时必须看到，私人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特别重要的是，私人资本同手工业者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开始充当手工业的组织者。另一方面，在满足居民需求上我们还未达到战前水平。”

第2页第4段删除。

第2页第5段后加上：

“正是由于工业固定资本的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迫切要求党制定工业发展远景规划，把这种发展同国家的需求（个人消费、工业生产资料、住宅建设、交通、农具、电力设备、通讯设备、国防物资、文化需求等等）和潜力协调起来。固定资本的年增长量决不能随意确定，也不能只根据一个经济年度的情况而确定；另一方面，工业建设的方针，无论是在各工业部门的消耗方面，还是在新企业的地理分布及其技术分布方面，只有根据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的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工业发展计划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才能

合理制定。”

第5页第2段，从“支出部分……”起到段末应写得更准确些：

“民用工业拨款同工业和辛迪加化商业的收入（利润提成，购买公债券和所得税）之间的比例关系应当是收入明显大于支出，此外还应当保证对电气化、军事工业、产棉区水利和工人住宅建设的必要拨款。”

第5页第5段删除。

第6页第2段末加上：

“为此，应当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参与实行节约制度。应当把节约问题提交各党支部、生产会议和工会讨论解决”。

第12页第4段，在“总计”的词后加上“加上折旧费”。

第13页第3段“那些……年代”删除。

第13页第3段，（1）在“每年10~11%”后加上：“而且城市居民点的工业品价格增长了16%，农村增长得更多。”

第13页第4段，从“所有这些”到段末全部删除。

第14页第2段末加上：“但同时私人资本的阵地也得到了巩固”。

第14页第4段，将“基本建设投资”改为“基本建设工程”。在段末加上：“9000亿总数中包括4120亿不属于新的工业投资的折旧费。”从“不包括”一词到段末全部删除。

第14页第4段后加上：

“这样的基本建设工程规模是不够的。应当采取一切措施扩大规模，绝不允许任何压缩规模的行为。由于1925/1926年在基本建设工程方面投资不够。1926/1927年即使实现了基本建设工程计划，即低于11亿~12亿的工业投资（不包括电气化在内），也还是一个落后的年度，因此必须承认突破政府所规定的基本建设工程

规模（9000 亿）是党的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

第 15 页第 1 段，在“年”字后加上句号，然后直到段末全部删掉，改为：

“收获量比七月份预计的减少，稍微缓解了预计中的第一季度初商品荒的尖锐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年的商品荒得到缓解。农产品价格降低了 8~9% 以及工业品在农村中的零售价格过高，造成了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严重的不等价关系，掩盖了商品的匮乏。党决不当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发展工业和满足全体居民（包括农业居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方面形势已有所好转。相反，工业落后是显而易见的，党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克服并消除这种落后状况。”

第 17 页，“对基本建设工程和新的建筑工程投资”一句改为：

“保障工业基本建设工程投资不少于 12 亿卢布，加上电气化投资不少于 13.5 亿卢布。”

第 18 页第 1 段末加上：“各种建筑材料，化学的”。

第 20 页，从“只有这个方针”起到第 21 页第 2 段改为：

“切实降低零售价格即工人和农民据以购买商品的价格是符合城乡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代表会议指出，零售价格上涨是目前条件下工农联盟削弱、无产阶级物质生活水平下降、活资本积累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和堡垒整体上受到削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降低零售价格是目前党和工人阶级的中心问题”。

第 21 页第 3 段删除。

第 22 页第 3 段改为：

“私人资本的作用相当大，特别是在商业领域。一半的工业品贸易（包括手工业）被私人所掌握；40% 的零售贸易集中于私营商业；私人资本对原料市场和粮食市场的影响同样很大。由于商品荒，私人资本获得巨大的超额利润。私商与手工业者结合在一起。

近一时期出现了由手工业者“组建的”私人股份公司。私人资本为自己建立了粮食基地。党和国家应当密切注意私人资本的发展并首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私商在其买卖中获得有损于国家经济和劳动者利益的暴利，最终通过适当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来战胜私人资本。”

第23页第1段，从“仍然缺乏统计”到“（皮达可夫等人）”为止删除。

第23页末尾加上：

“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人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是充分发展工业。商品荒，批发零售价格差别太大，国营工业产品成本过高，原料及粮食采购机关在经济上软弱无力，这一切为私商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使私人资本一方面迅速发展，另一方面非生产性地消耗掉工人和农民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其结果使商品愈发匮乏。因此同私人资本的巨额利润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是加快工业发展，丰富市场并正确地组织国家和合作社的贸易，不允许价格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出现剧烈波动。”

第25页第4段后加上：^①

“尽管大工业工人人数增加了43.9万，雇佣劳动者（农业工人除外）增加了130万，1925/1926年的失业人数仍有增无减。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失业者的大量涌入。农村人口过剩导致农村每年富余近两百万的劳动力，其中有不少于50万~60万的人被城市吸收。1926/1927年新增工人及雇佣劳动者的人数将比1925/1926年大大减少（即40万雇佣劳动者，其中15万工厂工人），因此失业现象将更加严重。基本建设工程规模不足将使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因此，即便从消除失业现象的角度看，基本建设工程问题也具有极其

^① 这一行和下面整段被涂去。

重要的意义。”

第 26 页第 1 段，在“旷工率”一词后加上“伏特加酒消费量的增加是旷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起一节。

鉴于加快发展工业、工人住宅建设以及相对提高工人和贫雇农的物质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按照下列原则重新审定有关国民收入再分配问题：

1. 通过提高税收或实行正确的价格政策将私人资本过量消耗积累的资金部分收回。

2. 在不提高中农税收，减少贫农税收的情况下增加上层富农的税收。

3. 在上层富裕农民中实行义务粮食公债。

4. 大力压缩非生产性行政开支。

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应当认真注意每项措施实行的结果，适当强调其重要性，及时纠正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过火行为并准确预见实现的可能性。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召开党的优秀经济学家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公正的审查，并向中央提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具体方案。

第 27 页第 3 段加上：

“为了使工人住宅面积保持 1926 年的水平（人均 10.8 平方英尺），五年内需要投入近 20 亿卢布（即每年 4 亿），1925/1926 年投入 2.17 亿卢布，1926/1927 年计划投入 2.59 亿卢布（9 月 24 日《消息报》社论），这就是说工人阶级恶劣的住房条件在进一步恶化，因此第十五次代表会议认为首先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再恶化，并开始好转。

另一方面，鉴于建筑材料的昂贵和匮乏，必须尽快扩建相应的工业部门，以保证建筑工程必需的质优价廉的建筑材料。

代表会议认为，应当广泛吸收工人参与解决住宅建设问题（住房造型，价格，降低造价，资金来源，对资金支出的监督，决算等）。

第28页最后一段之后加上：

代表会议提请党注意，1925/1926年雇佣劳动者人数（农业工人除外）增加了130万，其中工厂工业工人增加了44万，但失业人数仍有增无减。1926/1927年预计雇佣劳动者人数将增加40万，其中包括工厂工业工人15万。今后，工业基本建设工程滞后会导致新增工人进一步减少。同时农村每年富余近200万劳动力，其中只有50万~60万人被城市吸收。所有这一切使党面临着尖锐的失业问题。农业人口过剩以及城市中的失业现象将会使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使贫农受奴役，使雇农受富农控制。使农业技术进步受阻，因此应当通过农业集约化、移民、社会工程以及大大加快工业发展来同失业现象作斗争，而适当的基本建设工程规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

格·皮达可夫

[1926年11月]

No07962

克尔纳给托洛茨基的信

（1926年12月6日）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如果我的信能够顺利地经过13位书记转到您的手里，请您务必读一下我寄给您的文章^①。在文中我努力从理论上探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是否妥当，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如有可能，请就此问题给我个答复。

如果我在文中（第一章）阐述的思想有一定的意义和重要性，我准备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或小册子），文中将列出一些对今天来说十分必要的章节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我将在文中揭示国际市场的一些做法，证明国际市场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资本主义不能胜任的，但却是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换句话说，我想认真地论证由重工业引发的国际联系的“规律”并由此得出全部结论（这是一个旧的，但不知为何如今被遗忘的思想）。

然而，在开始这项工作之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希望得到您的答复，我想您会给我回话的。

致真诚的共青团的敬礼！

克尔纳

1926年12月6日

^① 见本卷文件No07963。

附言：寄给您的文章我也寄给了《布尔什维克》杂志，但我并不指望它会被刊登。

地址：乌克兰，扎波罗日斯克市，卢森堡街5号，Л.Д. 克尔纳

No07963

克尔纳：论一国社会主义

（1926年12月初）

第一章 为什么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应当从理论上考察，应当进行学术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为这种学术研究做一点工作。

要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必须正确地提出问题。我们说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取得胜利，往往指的是在俄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俄国技术上落后。所以，这里混淆了两个单独的（尽管它们密切相关）问题：（1）能否在任何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和（2）能否在像俄国这样一个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如果对第一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也就不必讨论第二个问题了。但是，我们不否认在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内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就一定认为在俄国也能建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基础是重工业。列宁说过：“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① 这一点谁也无法反驳。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采取的工业化方针是构筑社会主义基础的方针。

苏联工业化是一项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经济举措。但是，在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01页。

施这一举措时要记住，我们越是使国家工业化，我国经济与我国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联系就会越多。由于所有这些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不断加强的联系，就无法在一个国家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读者也许有疑问：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真会导致与别国联系的加强吗？为了消除这些疑问，让我们先来搞清楚什么是工业化。

我们知道，工业化的首要一点就是增加工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但这还不是全部。工业化就是增加重工业在工业领域中的比重。正是重工业的发展及其存在本身需要国际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写道：

“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

资产阶级并不是自愿地消除了民族局限性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不再能满足需要了……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②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③。我们看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3页。

正是大工业打破了民族的闭关自守和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大工业要求打破国界并建立全面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我们由此看到了重工业所建立的“国际联系”的特殊“规律”。^①

但是，也许这个规律仅适用于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壳内发展的重工业？也许只有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才会使重工业建立完全固定的国际联系形式即资本主义特有的形式——世界市场？让我们想一想。

重工业的确是资产阶级建立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所建立的那种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这是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放弃这种工业就是倒行逆施，而且这样做也实现不了社会主义。

然而，资产阶级已无力支配它一手创造的这种生产力。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②

生产力正在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③ 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④需要新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有计划的国际生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以及他以后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作出论断：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国际社

①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规律，是因为重工业的存在与重工业所必需的国际联系的存在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国际联系的存在是重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克尔纳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69页。

④ 即重工业，因为重工业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一种生产力。——克尔纳注

会制度。可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工业也要求国际联系（新形式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重工业的发展，无论其经济外壳如何，都需要国际联系。

综上所述，一个沿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并逐步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必将越来越多地与周围其他国家发生联系。依我看，由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体系就将同资本主义的体系发生许多联系。

现在很难预料在我们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后这种联系究竟会是什么样，甚至难以预料苏联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会是什么样。我们是否会因工业的巨大发展而必须进口燃料，矿石或其他原料，是否必须进口我国不能加工的产品。至于将会有什么样的需求，这一点很难预料，并不太重要。只要确认在每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际联系（主要是经济联系）都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加强这一事实就足够了。由此可以作出某些结论。

不过，我们在作出这些结论之前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通过什么形式才能实现？每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明白，这种联系只有借助世界市场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将具有商品形式。

既然如此，请问，资本主义体系将如何借助世界市场来影响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经济呢？

这个国家的经济将经受（正在经受。参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世界市场的价值规律的压力，并会间接受世界市场的萧条危机等的压力。如果我们想高度概括世界市场对一个国家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压力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说，世界市场不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完全有计划的领导。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在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支配着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抗拒”^②理解这种生产力的作用。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完全有计划地控制着生产，从而也支配着“社会力量”。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③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世界市场将会使一个国家难以完全按计划行事，那么单独在这个国家中就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关系（世界市场）将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这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的经济。

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取得胜利。同样，没有进步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不可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章 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我在前一章中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不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可否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呢？承认在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又主张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不是荒谬之谈吗？

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尽力找到能够令我们满意的答案。但首先让我们弄清楚“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统统是这样的：“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这是一个处于商品经济包围中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孤岛。这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4页。

孤岛将逐渐扩大，逐渐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吸收简单商品经济成分并将其消化。当这个孤岛扩大到覆盖整个苏联领土并囊括所有生产和分配部门后，我国就会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这种认识来源于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经济制度的错误观点。

社会主义是一个经济整体，它的各部分是按计划协调一致的。社会主义是包括所有生产部门在内并能保证在这些部门之间合理地和有意识地分配着劳动的有计划的经济。

由此可见，不能把经济整体中某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称为社会主义。

它（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要素。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要素是指经济整体中这样组织起来的部分，这些部分在得到一定组合和发展的情况下可以构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像总和与分项即总和的组成部分截然不同一样，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要素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要素，当这些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时就会构成社会主义。

如果这样来理解建设社会主义，就不会对我们正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有丝毫怀疑。历史向我们表明，而且正直的人也不会否认，社会主义的要素正逐渐扩大和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迅猛发展。未来的世界革命定会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使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厦巍然屹立。

第三章 关于宿命论与冒险主义

我们正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我们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的论点。或许这种论点毫无意义？有人问我

们，既然知道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又何必建设它呢？对此我们可以坦然回答：我们坚信国际工人运动会取得胜利，所以不怕完不成社会主义建设。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否定社会主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的后果要么是政治上的宿命论（“反正不经过世界革命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要么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或许在“世界革命”前能侥幸成功），要么是二者并存。有人对我们说，不管怎样，“不相信”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就难以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对吗？

这种说法在什么情况下才对呢？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是对的，即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又不指望在该国的狭小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这种做法得不到历史证明，换句话说，不能使我们逐步接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问题无非就是：既然我们知道在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呢？

可以为这种建设找到三个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明。

（1）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存在和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为国际革命所作的最好宣传。这一点用不着多谈，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已对此问题作了详尽和清楚的说明。

（2）只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素，就有可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后更快地、更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

（3）国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劳动群众的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

现在我们懂得了明知在一国范围内建不成社会主义还要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道理。所有共产党员，无论他们承认还是不承认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都同样关注这个国家的

社会主义建设，^①所以根本谈不上政治上的宿命论和冒险主义。

这类指责只有在对胜利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失去坚定信心时才会产生。

第四章 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

近来常常有人把能否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同十月革命的性质问题扯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似乎否定在一个国家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的人必然也否定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有人对我们说，既然在俄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那就意味着我国革命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忆一下引发十月革命的原因。

1905年的革命刚一失败列宁就指出了俄国社会的发展可能走的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慢慢长入资本主义并使农民逐渐资产阶级化。这条道路使革命推迟“好多年”。

另一条道路是继续开展革命。沙皇政府与农民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在这场革命中争得最多的自由并使自己的经济状况得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能得到的最大改善，从而为准备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基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尚未没落。

然而战争爆发了。这个具有左右时局变幻的强大力量的“导演”也为上演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搭好了舞台。

是什么原因使得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偏偏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中实现了呢？为什么这场革命不是始于英国、德国或法国呢？

^① 区别只是在于对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追求的目的的看法不同，这一点没有实际意义。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克尔纳注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认为旧的社会只有在它已经没落并且其内部已经生成建设新社会的前提条件时才会崩溃。难道俄国的这两个条件，譬如说，比英国的更成熟吗？或许是马克思错了？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对这些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于重工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日渐形成的世界市场消除了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界线。但是，在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的那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不仅已经没落，而且为社会主义准备了一切必要条件。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对这一点的极好证明。正是这场战争将俄国彻底拖入腐朽的帝国主义的轨道，从而使俄国走上没落的资本主义阶段。俄国的资本主义作为民族资本主义还能有所发展，但作为国际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已经走到了尽头。

各交战大国如同一个巨大的脓疮，它在抵抗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俄国破裂了。无产阶级革命目前只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但这场革命不过是未来革命的美妙乐章的序曲，未来的革命尽早会到来，而且只会早不会迟。

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链条上的第一环。这就是关于俄国革命性质问题的答案。

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①

① 把十月革命和任何与之相同的革命单称作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不够的。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阶级特征而言是无产阶级革命，就目的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4页）至于首先获得解放的不是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而是俄国工人，这当然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性质。——克尔纳注

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场革命：(1) 开始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革命将会导致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2) 其自身就是准备这些革命的一支力量；(3) 提供了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尽管只是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承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不意味着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可以承认前者而坚决否定后者。

结 束 语

好探究的读者或许要问：“文章一开始就说要进行学术性的研究，但是文章远非通篇都在进行这项研究”。

这是因为，我不仅想尽量弄清能否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还想证明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对否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产生的那种纯属迷信的恐惧是毫无道理的。

我当然不能，而且不想揭示出文章所论述的问题的全部深刻涵义，但我希望共产党员同志们敢于面对实际情况，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最后我想指出：

对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可以相信或不相信，但建设社会主义是必要的，而且无论是“相信者”，还是“不相信者”，现在都同样在参加将来也同样会参加这一建设。

JI. 克尔纳

1926年12月初

No07964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全会会议上的发言摘录

（1926年12月9日）

同志们，我认为看履历的做法根本不能使我们解决原则性问题，我在许多问题上，尤其在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时期犯过错误，这是毫无争议的。但未必就该由此得出分析政治问题不应看其内容而仅看履历的结论，否则就得让全体代表都出示自己的履历……我个人就可以举出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德国有一个叫弗兰茨·梅林^①的人，他一生都在斗争，只是在进行了长期而又坚决的反对社会民主党（几年前我们都叫做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之后，他才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人，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梅林最初写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时还是一名反对者——不是资本主义的走狗，而是思想上的反对者，可后来他又把该书修改成一部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杰作，此时他已是忠实的朋友。另一方面，考茨基^②和伯恩斯坦^③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马克思，然而他们一直受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鞭挞。弗兰茨·梅林死后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共产主义者安葬的，而另外两个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至今仍作

① 梅林，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艺学家。

② 考茨基，卡·（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和主要理论家之一。

③ 伯恩斯坦，爱·（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创始人。

为改良主义者的走狗苟且偷生。履历这东西固然重要，但它本身什么也决定不了。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9日

№07965

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

（1926年12月12日）

这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对革命的怀疑论和民族局限性是其理论前提

关于能否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因欧洲革命发展缓慢而出现的，它已成为联共党内思想斗争的主要检验准则之一。斯大林提出的问题非常不切合实际，而且用来解答这一问题的也不是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而是纯粹形式主义的论据和只适用于过去种种不同情况的旧引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理论的拥护者们是以封闭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出发点的。他们当然承认敌人会手执武器来阻止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但是，他们除了死记这一危险之外，只剩下孤立地积累经济成就、发展国家工业、组织农民参加合作社，等等。至于这会给欧洲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全然不知。

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恰恰在于我们正逐步地彻底摆脱封闭式的国家经济状况，同欧洲市场和世界市场日益加深联系。如果把我国发展的问题完全看成苏联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且以为靠正确的政治手腕和建立合作社网就能使我们不再依赖世界经济，那就意味着被可怕的民族局限性所束缚。这一点不仅可以从理论角度来证明，也可以用进出口方面的困难来证实。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是否可能或应当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问题就如同无产阶级是否可能或应当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争取政权的问题一样。对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早已作出了回答。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夺取本国的政权，然后将自己的胜利扩大到其他国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英国组织煤矿工人罢工或德国建立工厂支部一样。

无产阶级是否可能在德国单独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当然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还取决于世界局势。在世界局势的影响下国内力量对比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苏联垮了，如果资本主义在英国和法国又获得新的力量，如此等等，那么在德国夺取政权就要推迟许多年。关于在我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这样提出。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建成社会主义即不仅使我国的工业高度发达，而且在工业的基础上实现集体化（在其他国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掌权的情况下），最起码需要比如说25年。这就是说，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根据欧洲的资产阶级制度将会在难以确定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下去的推测提出来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经济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个问题斯大林根本没提，换句话说，尽管欧洲存在很深的经济和政治矛盾、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更深的矛盾，尽管东方逐渐觉醒并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但欧洲目前这种经济和政治状况似乎还能维持25年甚至更长时间。这种设想显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

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推断，关于资本主义欧洲未来几十年的命运（因为斯大林的整个理论的根据就是资本主义欧洲将存在几十年）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 (1) 欧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重新振兴，

(2) 欧洲经济衰退，

(3) 维持现状，但会出现某些波动。

让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三种情况。

(1) 抛开一切条件和情况不谈，我们暂且假设欧洲正步入资本主义振兴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将会大大增加，这当然是一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但是这种有利之事还远远不能化解资本主义繁荣的新时代的各种负面影响。如果我们现在还难以使我国工业达到欧洲的水平（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那么一旦资本主义重新振兴，譬如说就像 20 年代欧洲的振兴那样，这项任务就根本完不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工业即它的廉价商品想必会冲击俄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形势也会变得非常不利。获得物质力量的资产阶级又会变得不可一世。它不会容忍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并驾齐驱。它的军事力量也会随着其强大的物质力量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反抗抱什么希望，因为战前欧洲和当前美国的经验表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繁荣，资产阶级得以在所有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把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还有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陷入绝境。

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设想。的确如此。但不可能有别的设想，因为提出这种设想的前提条件根本就是悲观的。那么在客观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悲观设想赖以成立的某些根据呢？完全没有！根据事物的发展，决没有理由对欧洲资本主义抱过分乐观的态度，因而不能据此论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自欺欺人的乐观理论。

(2) 现在我们作一下设想（极其符合实际情况的设想）：欧洲资本主义将会遇到重重困难，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降低。仍然有人要问：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明显崩溃的情况下欧洲

无产阶级还不能在几十年时间内夺取政权呢？怎么对它的力量这样“缺乏信心”？而且，既然认为欧洲资产阶级仍会掌权（尽管其经济体系日益崩溃），那就必然要问：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资本主义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估计它很可能进一步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经济发展将会衰退到何种程度？我国的出口将极为困难，因为衰退的欧洲没有能力购买我国的农产品。与此同时，工业设备和原料的进口也将陷入困境。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放慢，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还需要更多个几十年。在美国资本主义缓慢的发展速度下我们会陷入何种境地？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极难预料的。然而有一点很清楚：这条道路上的危险可能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宣称我们在这样的前景下仍能“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简直就是开玩笑。但这种前景是如何设想出来的呢？它来自一种不切实际的、完全荒谬的推测：尽管资本主义日益衰退，但欧洲无产阶级也不能在几十年时间内掌握政权和经济。换句话说，对“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盲目乐观情绪产生于对欧洲革命的极端悲观情绪。

(3) 现在来分析一下第三种情况：资本主义欧洲既没有衰退，也没有振兴；无产阶级的力量足以阻止资产阶级破坏苏维埃共和国，但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我们在最近一段时期所遇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各种力量的不稳定的平衡。但是绝不能认为这种状况会持续 20~30 年。欧洲的内部矛盾以及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非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不可的程度。欧洲不可能照目前这种状况——英国的失业和罢工、法国的金融危机、德国的经济困境——再存在几十年。如果欧洲革命推迟 25 年或者更长时间，那可能是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欧洲资产阶级找到了能够使其重新振兴并使无产阶级“屈服”的新的平衡点；要么是欧洲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仍没有

能力取代资产阶级，于是欧洲在经济衰退的同时出现了政治衰退。这两种推测我已经分析过了。它们所依据的不是对现存发展因素的分析，而是内心对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恐惧和对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的怀疑。

以上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美国和东方这两者的作用。但是非常明显，这两个因素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我们所阐明的看法。认为欧洲的内部矛盾在几十年内不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认为欧洲资产阶级还会在几十年内保持自己的殖民统治。如果接受这个“方案”的话，那么除了美国的强大这一危险外，还将出现资本主义欧洲恢复和振兴的危险。总之，那种能够使我们获得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将其进行到底所必需的起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条件的现实历史局面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这样的前景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它的前提是荒谬的。

十月革命不单单是国内局势的产物，而且是国际局势的产物。没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外国资本在俄国的作用，没有因此而引发的资本主义矛盾的极端尖锐化，没有世界对抗性矛盾，没有欧洲阶级斗争的经验，没有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没有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并没有中断这些世界联系和依赖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解除国际上对我国今后整个发展的制约。

可以肯定地说，那种竭力回避从国际角度看待苏联经济发展问题的做法实际上是盲目地害怕资本主义势力的表现，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经济能够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手对抗资本主义势力的表现。于是便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不对世界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准备事先宣布现有发展速度“够快了”，其实就是事先把苏联国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称为社会主义，而不顾

国外将会发生什么。

不相信世界革命，同时又提出在一个技术和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独立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案，这无疑是犯了民族局限性的毛病，而且还有点妄自尊大。对这种前景的否定并不包含丝毫的悲观情绪。相反，一味地追求这种前景只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怀疑。

无庸赘言，任何企图根据上述情况得出我们不能在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结论的做法都是极其荒谬的。我们的工作在国际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对世界力量对比有着巨大影响。我们每取得一项经济成就，就标志着欧洲革命临近了一步。我们的胜利是有保证的，这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气数已尽，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有高潮也有低潮）在不断发展，因为我们为生存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和我国经济的增长正推动着世界革命前进，从而使共同的胜利有了保证。

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与共产国际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对此不仅联共，而且整个共产国际都应理解和认同。这一理论会松懈和麻痹联共对国内和世界上种种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警惕和戒心。它助长听天由命的消极乐观情绪，而这种情绪极大地掩盖了对社会主义和国际革命的命运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如果这一理论得到认可，那么它必然对共产国际起到同样不可避免的作用。如果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世界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离开世界革命就无法实现的进程，那么

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它们的作用以及它们各自的责任就会上升到首位。反之，如果认为苏维埃政权仅仅依靠苏联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不会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发生事情的影响（但是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避免武装干涉），那么各国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立刻就会退居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共产党在最近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即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的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企图。因为事情很清楚，只要能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自然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继续向全世界扩展。整个前景就是这样被歪曲的。关于充分利用所出现的一切革命形势的问题被置于次要地位。编造一种毫无根据的、用来迷惑人的理论，说什么时间本身“对我们有利”。实际上，浪费时间、一再重犯 1923 年那样的错误是最危险的。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处在喘息的条件下，而决不是处在可以自然而然地保证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条件下。要想方设法利用喘息时机。要在喘息时机内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主义发展。但是，忘记这里所谈的正是喘息时机，即 1917 年的革命与某个资本主义大国的近期革命之间这一较长的时期，就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

所谓的极“左”派常常指责统一战线政策，说这一政策对国外政党来说就是放弃独立革命的立场，退而采取通过在各国工人阶级内部组建强大的“左”派（其实是中派）来一心一意帮助苏维埃国家的立场。根据列宁对统一战线的提法来看，这些指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英俄委员会的实践完全迎合“左派”和“极左派”的批评，并以此来证明这一批评是正确的。“左”派尽管仍然患有某种程度的“幼稚病”，但已获得新的营养，因为他们支持各国共产党发挥独立的革命作用，这些党不仅对本国无产阶级命运负责，而且也对苏联的命运负责，相反，官僚主义的

乐观主义却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只要不受到“干扰”，就自然会得到保障。在这些条件下，“左派”的斗争逐渐成为一种进步因素并且必然导致共产国际内部的重大改组。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12日

No07966

托洛茨基：反对派声明

（1926年12月13日）

1. 我们再一次坚决反对指责我们的发言具有派别性质。如果向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搞派别活动，那么究竟以什么方式来坚持自己的思想呢？

2. 我们重申：无论何人，即使他打算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我们的意见，但只要他否定我党和我国的无产阶级性质，都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回击。

3. 我们的全部批评都是针对偏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都是为了维护、保障和巩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及其同国际革命不可分割的联系。

4. 我们坚决反对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具有悲观情绪和缺乏信心。

（1）我们强调指出富农的危险日益增大并不是要向其低头，而是要让党更加坚定地依靠贫雇农并借助无产阶级国家的有力支持使他们能够带领中农反对富农。

（2）我们强调指出私人资本不断增长并不是要向其低头，而是要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把私人资本严格限制在从属地位。

（3）我们说正在建设中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并不是要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屈服，而是要坚持更合理地分配国民收入以促进国家工业，想方设法加快国家工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教育他们深刻理解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命运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密切相关。

5. 列宁的学说教导我们，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轻视敌人。我们党的革命力量一向在于向无产阶级公开讲明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先锋队不会悲观失望、精神颓丧。

6. 我们反对诬蔑我们怀疑我国的工人性质和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任何卑鄙荒谬的说法。迄今为止，反对派的拥护者一直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与其他所有同志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发展国家工业，稳定硬通货，加强我国经济的计划因素，保证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今后我们还会这样去做。

7. 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我们所坚持的政策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有时也想方设法利用我们的批评。迄今为止一直如此。利用分裂搞投机的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总是幸灾乐祸。这一次敌人又打错了算盘。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和纪律是坚不可摧的。

8. 但是不能因敌人的幸灾乐祸而停止自我批评。如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只能在预先保证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进行，那它们就没有必要召开。共产国际以及每个党的制度，应该保障有切实的可能进行那种既不会变成派别活动、也不会破坏统一行动的自我批评，这同我们的纲领和章程是完全一致的。

9. 我们认为，提交给你们的这份决议不仅对我们所捍卫的、我们确信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切传统的观点作了错误的、别有用心的评述，而且会破坏共产国际的制度，使本来就够开展的党内批评更加不开展。

10. 然而我们并不怀疑，即使通过了这一错误的决议，共产国际也和过去一样，仍是惟一个能够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

验纠正其某些部分及其自身的错误的组织。

11. 出于这一坚不可摧的信心，我们有权并且会完全服从你们将要作出的决定，同时号召所有自认为是我们的志同道合者的同志也这样做。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13日

No07967

托洛茨基：札记

(1926年12月)

艾维·利在美国以手稿形式出版了一本小书，印数200册，分别寄给美国知名人士。艾维·利在给凯洛格和柯立芝（美国国务卿和总统）寄这本小书时附了一份报告，其内容被一些共产党员得知。艾维·利在给凯洛格和柯立芝的信中写道：

“以斯大林、李可夫和契切林为首的温和派认为俄国应首先发展其社会和政治经济，这一点可通过同掌握世界主要金融资源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而顺利达到……该温和派认为必须——至少现在必须——抛弃世界革命理论……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加米涅夫等人为首的一帮人失去了权力……这一左翼共产党人集团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应该全力推动世界革命，支持第三国际采用各种暴力手段及非法活动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努力。

我不信俄国有任何负责人会愿意证明上述革命理论确实代表了某个共产党领袖的观点。当然，共产党和第三国际还在高喊：‘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红军万岁’……尽管俄国政府的某些领袖还在重复老一套说法，但事实上他们在日常事务中使其活动适合于现存条件。”

这是美国最大的投机商写给其主子柯立芝和凯洛格的。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

No07968

季诺维也夫：声明

（1926年12月中）

草案

我们自然会服从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无论这一决定有多严厉。但我们将在联共和共产国际的章程范围内、在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决定范围内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

1. 说我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所作的捍卫自己观点的发言本身就是派别活动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主义政党。在共产国际存在的7年当中所有党（也包括联共）的所有内部分歧都被提交共产国际，任何一个少数派都有权捍卫自己的观点。

2. 说我们不再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正确的。这是对我们的诽谤。我们毫不动摇地相信：联共（布）将战胜一切困难，社会主义建设定会向前发展，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我们定能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

3. 说我们对攻击苏联的人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只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准备为苏维埃、为苏联这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献身的人才能指望同我们达成某种一致。

4. 说我们轻率地看待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不正确的。说我们建议“掠夺农民”用于工业化纯属诽谤。我们坚持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没有这个联盟苏联的无产阶级

专政注定要灭亡。但我们说：“我们在农村的支柱是贫雇农，我们在农村的盟友是中农，我们在农村的阶级敌人是富农。”

5. 说我们不想为苏联的独立而斗争是不正确的。谁不想这样做，谁就不配留在工人阶级队伍里。但我们和列宁都知道，苏联独立的真正保障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6. 说我们现在反对统一战线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拥护此策略。但我们反对在托马斯、皮尤和普塞尔无耻地出卖英国矿工时同他们达成协议。我们反对在皮尔苏茨基^①制造政变以便日后血腥屠杀工人时给予他支持。我们反对实行共产党人实际上跟在社会民主党屁股后面行事的那种统一战线。

7. 说我们反对在改良工会中开展工作是不正确的。不，我们主张共产党人甚至在最反动的工会中工作，正如列宁教导的那样。凡是在工人组织起来的地方，就应该有我们共产党人。

8. 说我们赏识“极左分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反对、将来也要反对一切极左错误。但我们要求共产国际各支部像列宁教导的那样对待甚至是犯了错误的诚实的“左派”革命工人。我们也要求共产国际像列宁那样揭露和打击以表忠言词掩盖右派行径和勾当的右派领袖、外交家和议会主义者。

9. 说我们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依然跟列宁在世时一样，是反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是世界资产阶级现在在一系列国家实行统治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领袖是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说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对我们反对派的态度同样是不正确的。不，它像过去一样（甚至更加）仇恨我们，并且疯狂迫害我们，就像恼羞成怒的小资产者迫害

^① 皮尔苏茨基，约·（1867～1935）——1918～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1926年发动军事政变，任国防部长（1926～1935）和总理（1926～1928，1930）。

毫不妥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那样。

10. 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事实是不正确的。我们承认这一事实。我们在许多涉及英国罢工的文件中提到过这一点。我们只是否认能稳定“几十年”并要奥托·鲍威尔^①一班先生相信这一点。我们继续坚持列宁的观点，即我们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

11. 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我们没有丝毫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错误。如果有人人在斗争激烈时给我们加上这一罪名，那么将来会证明这一罪名是经不住批评的。

12. 说我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发言撕毁了我们 1926 年 10 月 16 日的声明是不正确的。我们对在这份声明中所承担的义务定会履行到底。但我们有充分权利来捍卫自己的原则观点。我们在 10 月 16 日的文件中宣布过这一点，对此谁也没有提出异议。我们不会做任何破坏联共或是共产国际统一的事情。我们将捍卫这一统一。我们将和派别活动作斗争。

13. 说我们捍卫“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在他和列宁争论过的所有带原则性的问题上——特别是关于不断革命和农民的问题——列宁是对的。我们捍卫的是列宁主义。我们首先反对修改列宁的国际革命学说。

14. 说我们宣称整个党、整个联共（布）“右倾”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联共内存在右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派别和集团现在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党定会克服它们的。

15. 我们始终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无论党和共产国际

^① 鲍威尔，奥·（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

把我们派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履行自己的职责。^①

格·季诺维也夫

1926年12月中

① 文件扉页上有托洛茨基的附笔：“草案是季诺维也夫起草的（‘草案’一词是他亲笔所写），看来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七次全会后不久。声明是否提交（我想是的），是原封未动还是有所改动，我说不准。”

No07969

季诺维也夫等三人致共产国际 第七次扩大全会主席团

（1926年12月14日）

尊敬的同志们：

在表决斯大林同志的报告的决议之前我们请求宣读以下关于我们的投票理由的声明。我们还请求在《真理报》、《国际新闻通讯》和全会速记记录上登载这份声明。

关于投票理由的声明

我们投票反对关于斯大林同志的报告的决议，我们认为需要发表如下声明以说明我们的投票理由：

1. 我们再次坚决反对关于我们的发言具有派别性的指责。我们重申：无论任何人，即使他打算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我们的意见，但只要他否定我党和我国的无产阶级性质，都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回击。

2. 我们的全部批评都是针对偏离无产阶级路线的错误，都是为了维护、保障和巩固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及其同国际革命不可分割的联系。

3. 我们坚决反对说我们不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责。事实上我们像过去一样毫不动摇地相信：苏联无产阶级在联共领导下将战胜一切困难，在国际无产阶级帮助

下社会主义定能在苏联建成。我们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只是为了继续坚持列宁一贯坚持的东西，坚持至今仍是共产国际一切纲领性决定的基础的东西。

4. 我们坚决反对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具有悲观情绪和缺乏信心。

(1) 我们努力使党集中注意不断增长的富农危险并不是要向这一危险低头，而是要让党更加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并借助无产阶级国家的有力支持使他们能够带领中农反对富农。说我们建议“压制农民”以利于工业化是不正确的。我们坚持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没有这个联盟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注定要灭亡。但我们说：我们在农村的支柱是贫雇农，我们在农村的盟友是中农，我们在农村的阶级敌人是富农。

(2) 我们强调并使党注意私人资本增长的事实不是要向这一事实低头，而是要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把私人资本严格限制在从属的地位。

(3) 我们说正在建设中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当然不是要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屈服，而是要坚持更合理地分配国民收入以促进国家工业，想方设法加快国家工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教育他们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密切相关。

5. 我们反对一切说我们怀疑我国的工人性质和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断言。至今为止，反对派的拥护者一直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与其他所有同志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发展国家工业、稳定硬通货、加强我国经济的计划因素、保障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我们能说出几十个在这些工作中不无成绩的优秀工作者、反对派拥护者的名字。今后，只要中央委员会把这项或那项工作交给我们，我们还会这样去做。

6. 说我们现在反对统一战线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拥护这一策略。但我们反对在托马斯、皮尤和普塞尔无耻地出卖英国矿工时同他们达成协议。

7. 说我们反对在改良工会中开展工作是不正确的。不，我们主张共产党人甚至在最反动的工会中工作，正如列宁教导的那样。凡是在工人组织起来的地方，就应该有我们共产党人。

8. 说我们赏识“极左分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反对、将来也要反对一切极左错误。但我们要求共产国际各支部像列宁教导的那样对待甚至是犯了错误的诚实的“左派”革命工人。我们也要求共产国际像列宁那样揭露和打击以表忠言词掩盖右派行径和勾当的右派领袖、外交家和议会主义者。

9. 我们依然跟列宁在世时一样，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领袖是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说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对我们反对派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不，它像过去一样（甚至更加）仇恨我们，并且疯狂迫害我们，就像恼羞成怒的小资产者迫害毫不妥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那样。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我们所坚持的政策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有时也想方设法利用我们的批评。迄今为止一直如此。

10. 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事实是不正确的。我们承认这一事实。我们在许多涉及英国罢工运动的文件中提到过这一点。我们只是否认能稳定“几十年”并要奥托·鲍威尔一班先生相信这一点。我们继续坚持列宁的观点，即我们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

11. 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我们没有犯丝毫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错误。我们深信将来会证明这一罪名是经不住批评的。

12. 说我们捍卫“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在他和列宁争论过的所有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

——特别是关于不断革命和农民的问题——列宁是对的。我们捍卫的是列宁主义。我们首先反对修改列宁的国际革命学说。

13. 说我们指责我们党的大多数人“右倾”是不正确的。我们只是认为联共内存在右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派别和集团现在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党定会克服它们。

14. 我们对在1926年10月16日声明中所承担的义务定会履行到底。但我们有充分权利来捍卫自己的原则观点。我们在10月16日的文件中就宣布过这一点，对此谁也没有提出异议。在共产国际存在的7年当中所有党（也包括联共）的所有内部分歧都被提交共产国际，同时任何一个少数派都有权捍卫自己的原则观点。如果向世界共产党领导机关公开陈述自己的观点是派别活动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其他方式在共产国际的共同决议范围内坚持自己的思想呢？我们将捍卫联共和共产国际的统一。

15. 不能因敌人屡次试图利用党内的一切分歧就不再自我批评。如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只能在预先保证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进行，那它们就没有必要召开。共产国际以及每个党的制度应该保障有切实的可能进行那种既不会变成派别活动、也不会破坏统一行动的自我批评，这同我们的纲领和章程是完全一致的。

16. 我们认为，提交给你们的这份决议不仅对我们所捍卫的、我们确信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切传统的观点作了错误的、别有用心的评述，而且会破坏共产国际的制度，使本来就不够开展的党内批评更加不开展。然而我们毫不怀疑，即使通过了这项错误的决议，共产国际也和过去一样仍是惟一一个能够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纠正其某些部分和其自身的错误的组织。

17. 出于这一坚不可摧的信心，我们有权并且会完全服从你们将要作出的决定，同时号召所有自认为是我们的志同道合者的同志

这样做。^①

格·季诺维也夫

列·加米涅夫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14日

① 文件第一页上有托洛茨基附笔：“极可能是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列·托。”参见本卷文件№07968。

№07970

季诺维也夫：国际局势恶化下 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草案）

（1927年1月）

绝密

只印三份

1. 在世界资产阶级中间，战争倾向和反战倾向正在进行斗争。世界资产阶级阵营中各种利益的冲突目前向苏联外交提出了活跃其外交政策的任务。对于和平事业来说，没有比认为战争问题已经解决更为危险的了。如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无疑将导致同稳定下来的资本主义发生武装冲突，那么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这场冲突一定会在1927年爆发，而不可能推迟到1930年。

2. 争取和平的斗争应当在两个方面进行：（1）加强我们同欧洲工人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联系；（2）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

3. 要动员欧洲工人群众，必须使各国共产党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就是说首先提出那些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问题。不解除各党内部的戒严状态，不结束派别争斗和中伤，这一政策是不可能实行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能够为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斗争创造一种相互支持的氛围，但应牢牢地记住，这一斗争的整个主动权将落在共产党的身上。还应当记住，在这些党内，站在前列进行斗争的将是左派工人。因此整个局势要求坚决

停止反对他们的斗争。

在东方，军事形势将会使英国资产阶级加紧行动，试图同民族运动的上层人物达成妥协。我们不应疏远他们，相反，应尽力与他们保持联系，但是应当记住，我们必须首先依靠工人和农民，因此应当增强东方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帮助它们站稳脚跟。

4. 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就需要抛弃自我孤立的倾向，就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只向英国的对手说一些好听的话而不给他们任何实惠，就不能阻止英国人建立针对我国的联盟的倾向。维护和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条件。即使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也会使我们在经济上倒退许多年。

5. 以阻止英国试图在欧洲建立针对我国的联盟为目的的手段有：有可能与法国和德国签订借款协定，因为法德两国都需要在稳定时期扩大销售市场。我们由于各部门争相申请而使德国的协定处于半停顿状态。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消除这一障碍并将德国提供给我们的贷款紧急利用起来，争取今后继续取得贷款，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应当同法国就债务问题达成协议，这是取得借款的必由之路。这些协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能加快我国的工业化、使我们得到一定的商品储备供应农民、增强我国的军事潜力，而且在于它们将为德国和法国独立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关系开辟前景。我们应当支持法德两国接近的倾向，以便减少波兰进攻的危险。我们应当持续不断地努力，以求同波兰资产阶级取得和解。我们应当从手工业式的、季节性的在波兰的采购转为同波兰保持经常性的经济关系。应当停止实行将波兰和德国同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隔离开的政策，给予它们过境运输的权利并同它们建立与近东进行贸易的混合公司。应当放弃抵制像国际经济会议这样一些同我们没有联系的机构的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只对英国有利。在东南欧应当通过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接近的政策来对抗意大利。

6. 在近东坚决地转而实行同广大商人群众接近的政策，帮助他们同苏联进行贸易。支持土耳其反对意大利和英国，力争使我们在土耳其的政策同法国和德国的政策一致起来。在波斯应提出加强同革命派的联系的任务，以获得力量反对礼萨·汗的亲英政策。

7. 在远东必须：（1）加强共产党、农民运动、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的独立性。同时要坚决地告诉中国革命者，他们取得胜利的条件是通过加强与印度支那即法国的睦邻关系、通过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具体协定的方式来孤立英国。为此目的他们应当做到在广东军队占领的省份里不触犯日本人，同意在一定时间内与张作霖划分势力范围，除了满洲，将直隶省和山东也交给他。为了促进这一政策的实行，我们应当放弃中东铁路，但必须得到我们通过满洲进行运输的保证。这一政策同时使我们得到了抵消英国最近所作的让步的手段，并在华南和华中提出中国的铁路属于中国人的口号。我们既要顾及美国人的明显利益，同时应当设置障碍阻止在中国出现英美联盟。

8. 想办法作出认真的努力争取使美国承认我们，可以提出承认克伦斯基所借债务的建议，如不成功，我们应当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通过巧妙的间谍活动激化当地与美国的冲突，以便把美国牵制在那里，使其不能自由干预我们可能同英国发生的冲突。我们的间谍应由得到充分信任的美国和西班牙的同志担任。

9. 必须立即对我们的整个军事和军工潜力进行检查并予以加强。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1月]

№07971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1月6日）

未发出^①

1927年1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即使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近来风气不正常的情况下仍然显得不同寻常。叛徒施瓦尔茨（他不是叛徒就是冒险主义者）在德国国会发表讲话，以著名的手榴弹事件为由支持反苏运动。中央机关报认为可以把施瓦尔茨的卑鄙行为同联共内的反对派联系起来，以图通过施瓦尔茨证明反对派的观点与张伯伦的反苏叫嚣有联系。如果不认为这篇社论是某一个年轻的官迷的不负责任的举动，那么就只能认为这篇社论别有用心，是企图把对反对派的迫害升级，而这将会长期毒化党内的氛围。我们认为必须提请政治局关注全党面临的巨大危险，这种危险深藏于上面指出的那篇社论所表现出来的新的作风之中。

我们指出了威胁着工人国家的富农危险和一般资产阶级危险，而这却被中央机关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成是我们恨不能宣布工人国家是富农国家。这样解释我们的观点是可耻地说谎和诬蔑。即使欧洲有人企图把反苏叫嚣（说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同我们反对派联系起来，那责任也不在于我们的观点，而在于对我们的观点日复一

^① 左上角有托洛茨基的附笔：“草稿看来是我写的”。

日地进行的歪曲、伪造和诬蔑。现在这种伪造已经向国际阶级斗争方面转变，一部分联共中央委员及其党内志同道合者（他们在与革命和工人国家休戚与共这一点上并不亚于任何人）的观点硬被说成与帝国主义的反苏叫嚣和策划武装干涉遥相呼应。这里采用的斗争手段比我们在所谓的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①的电报这一事件中所看到的还要粗暴和无礼。

我们认为，政治局应采取坚决措施制止这种宣传进一步发展。政治局不会看不到，提供新的斗争方法的人显然是要迫使持反对派立场的同志采取只会使党内形势激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造成新的破裂和引发新的斗争（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步骤。我们向政治局声明，既然事情与我们有关，那么恶意中伤的手段是不可能使我们放弃自己的立场的，这种立场部分地体现在我们10月16日的宣言中，这种立场表明，无论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对于全党来说，只有我们的党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领导者团结一致，才有可能战胜一切困难并免遭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危险。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6日

^① 罗曼诺夫，米·亚·（1878～1918）——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

这里指的是，据说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加米涅夫自流放地返回途中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打电报一事。

No07972

季诺维也夫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①

（1927年1月）

1927年1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提请政治局对此加以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伙同张伯伦^②的代理人，以著名的手榴弹事件为由日益疯狂地鼓吹进行反苏运动。叛徒施瓦尔茨（他不是叛徒就是冒险主义者）在德国国会发表讲话支持这一运动。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在这篇社论中竟然认为可以把施瓦尔茨的卑鄙行为同联共内持反对派立场的同志的观点联系起来！社论认为可以确定，施瓦尔茨的论据就是“已经完全溶入我们的反对派的思想原则之中的论据”（黑体是《真理报》用的）。

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这种针对联共党内持反对派立场的同志的“论战”在我们党的队伍中是不会得到支持的。任何企图把我们的观点同施瓦尔茨之流的先生们的行为和张伯伦的反苏运动“捏在一起”的做法只会给工人国家带来危害，而给张伯伦之流、谢德曼^③之流和施瓦尔茨之流带来好处，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迄今为止，中央机关报上掀起的针对我们的论战异常尖锐，但上述手法我们却是第一次见到。

^① 左上角有托洛茨基的附笔：“此草稿是季诺维也夫写的；他亲笔作了修改。”

^② 张伯伦（1863～1937）——1924～1929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③ 谢德曼，菲·（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8年十一月革命期间参加人民代表委员会，1919年2～6月任魏玛共和国联合政府总理。

我们党没有一个党员，共产国际没有一个成员会怀疑，在像反苏叫嚣和策划反苏武装干涉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全党将万众一心地反击资产阶级世界及其“社会党人”走卒。决不能容许发行量达几十万份、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外交部里也有读者的党中央机关报上出现上述文章里的那种“论战”手法。

我们请求政治局采取坚决措施杜绝这种只会损害《真理报》的声誉并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的手法。

附言：我们从《真理报》刊登的一份电报得知，路特·费舍派成员“极左”议员肖莱姆在德国国会发表讲话反驳施瓦尔茨。由此可见，连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肖莱姆、路特·费舍及他们的同道也同施瓦尔茨的卑鄙行为划清了界限。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1月]

No07973

托洛茨基：关于《列·托洛茨基全集》

第 14 卷第 1 册前言

（1927 年 1 月 8 日）

致埃利钦和巴甫洛夫同志

1. 应当加上进军华沙的年份和月份。

2. 第 2 页倒数第 2 段说：“从该书的最后两篇……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这里说的太不明确。我手头没有这卷书，但这里应当说得具体一些，倒数第 2 篇究竟为何而写。

* * *

在注释中必须指出前言中提到的下面一点，即提到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的地方。虽然我的提纲被一致通过，但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此外，还作了妥协性的修改，因而使提纲大为逊色。佩佩尔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扩大全会上由于疏忽而提到我采纳了他的修改意见一事。我记得，在我的初稿中极其肯定地预见到了局势向好的方面的转折，并得出了必须策略地利用这一转折的结论。佩佩尔及其一伙先是坚决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而后又同意作有条件的表述：说什么如果出现向好的方面的转折，那么就怎样等等。我好像记得，这一条就这样在被磨去棱角后大为逊色

地列入了提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瓦尔加^①同志在某些会上公开讲过这一点，极有可能是在“计划工作者”俱乐部作的报告中（或是在结束语中）。必须还这一事件以本来面目，并在注释中指出，佩佩尔的修改使提纲大为逊色，只是作为向左派的让步，加上由于委员会核心的动摇不定，才接受了他的修改。佩佩尔打着拉福莱特的旗号从美国回来后，在同我谈话时承认了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错误。在最近的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却企图重新评价他的错误，几乎把他的错误说成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胜利。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8日

① 瓦尔加，叶·萨·（1879～1964）——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生于布达佩斯，先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9年先后任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年移居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成为俄共（布）党员。此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

№07974

艾森贝格的便条和托洛茨基的批语

（1927年1月13日）

列·达·：

请审阅随函附上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注释，这一条注释对于第21卷《过渡时期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

艾森贝格^①

1927年1月13日

如果说列宁有时使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说法，而有时又弃之不用，那么这里应当寻找的不是实质上的矛盾，而只是在不同时间对术语的不同使用。当然，在工人阶级争取掌握过去的文化成果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时候，可以把过渡的文化时期称作无产阶级文化时期，尽管没有一个人提议将过渡经济称作无产阶级经济，而经济是文化的基础。然而这已经是纯粹术语上的争论了。托洛茨基同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当然不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文化建设的巨大意义，而只是要首先否定：（1）对文化建设问题的片面的小圈子态度和（2）错误的历史前景，根据这种前景认为在资产阶级文化时代之后将是无产阶级文化时代。

应当结合第5页所讲的内容对这一思想作某种形式的发挥，否

^① “红色教授”，我的全集的编辑之一。——托洛茨基注

则读者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列宁在一种场合下使用“无产阶级文化”的说法，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又弃之不用。

在整个注释的结尾：

很难想象还有比瓦普分子在这里给自己提供的贫乏证明更有说服力了。上面我们从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中摘引了一段文字，他在那里向岗位派的分子解释说，他们根本想象不出农民和所有非无产阶级成分通过什么样的经济和文化途径才能在不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现在，瓦普分子在部分地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之后，把自己过去的理解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

列·托洛茨基

No 18174

托洛茨基：对文章的几点说明

（1927年1月14日）

1. 也许在一开始就应谈一谈和平。应当这样说上几句：有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说，如果您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你要为和平而斗争，就应理解战争的历史的、阶级的本质等等……由于现在争取和平的任务（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极其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所以对我们来说深入领会列宁的战争学说等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我认为，应当在前言中对这一点加以发挥。

2. 1904年普列汉诺夫^①就已经是一个隐蔽的爱国主义者了。他多次重复盖得^②的话：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反民族的。他就这一题目同拉柯夫斯基进行了多次相当不严肃的谈话。因此我认为在谈到他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时应当谨慎一些（第4页）。

3. 在第8页上应当加上一两句话，以便同后面的短条目相衔接。

4. 第13页，关于是否可以“用武力带来”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应当作一些解释和“淡化”，部分是出于宣传的考虑，部分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只有在同该国的革命阶级紧密联系、同心协力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劳动者和受压迫群众确实把外来干预当作解放的干预而不是隐蔽的暴力的情况下，才可以“用武力带来”自由

① 普列汉诺夫，格·瓦·（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② 盖得，茹·（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建人之一。第二国际中派领袖之一。

和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上，“打着解放的幌子”企图施以暴力、侵占、奴役的事例层出不穷。因此，无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等等就应当更严谨，更不妥协，更加警觉。

5. 应当在这里，或最好在结尾，说明我们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为和平而斗争，既然我们一般来说是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列宁说，我们不能发誓不再进行革命战争。但这决不是说“革命战争”永远和在任何条件下都能随心所欲地解决革命的任务。在使民穷财尽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在使我国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内战争之后，和平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成长壮大和各国共产党得到培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爆发得越晚，我们苏联和与我们在一起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变得越强大。因此我们最大的革命利益是尽可能延迟战争的爆发，尽全力反对战争。最好的结局是，欧洲革命能赶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前爆发。一般来说，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的全部政策都应以此为基准。实行这样的“和平”（革命意义上的，而不是和平主义意义上的）政策后，如果资产阶级一旦将欧洲或整个世界拖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将能够比较容易地和因而比较快地把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这就是我们与和平、与维护和平、与巩固和平休戚与共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党真诚争取和平的原因。这就是与社会民主党人等的卑鄙谎言相反，我们同任何军国主义意图都格格不入的原因。

6. 第18页。由于这个原因应稍稍缓和关于战争的第二个时期“已为时不远”的预言，对此作出更有条件的表述，以便为“主观因素”留有余地。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14日

No07975

托洛茨基：对外政策的提纲

（1927年1月15日）

土耳其

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稳定程度如何（罗马尼亚的希望。）

罗马尼亚

由于王位继承人问题而产生的王朝困难。查问：罗马尼亚国王已经死亡，还是仅仅打算退位？

反对南斯拉夫的意大利—阿尔巴尼亚条约。

罗马尼亚

法国—意大利关系在罗马尼亚局势中造成矛盾：罗马尼亚保持着同法国的“亲密联盟”和同意大利的“深厚友谊”。

[波兰]

欧洲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一个国家状况的改善几乎总是以另一个国家的恶化为代价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国家对我们

的政策方面：矛盾极深，以至一个国家同我们的关系恶化几乎总是能减少另一个国家对我们的敌意。例如，德国在国际联盟（该联盟使德国同拉帕洛疏远）的胜利表明波兰在国际联盟的失败，从而能够减少波兰对我们的敌意。

然而在这方面自有其高潮和低潮。现在不得不指出，一些国家对我们的敌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另一些国家对我们的敌意的减少，所以说敌意有了增加。

皮尔苏茨基“既不要争吵，也不要战争”的声明（12月15日）。

波兰外长扎列斯基在日内瓦失败之后于12月12日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问题上需要意大利。但意大利反对法国，而罗马尼亚对法国的需要超过了对意大利的需要。

立陶宛

起初政变被认为是贾杰克（老爷爷）所为。然而斯梅托纳被认为是亲德分子。英国政变的领导人有可能用立陶宛来对抗布尔什维克，但却不把立陶宛交给皮尔苏茨基。

波 兰

法国现在对波兰的对俄政策牵制很大。英国对波兰的对德政策也有牵制。英法对抗对波兰的西方政策和东方政策带来麻烦，就像

意法对抗改善了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问题上的处境一样。

波兰需要美国的借款。美国反对的当然是在立陶宛的冒险行为，而不是在尼加拉瓜和墨西哥的冒险行为。

皮尔苏茨基会不会把走廊地带还给德国以换取立陶宛呢？这是决定包围能否成功的问题之一。

走廊地带问题——从目前欧洲的整个命运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但欧洲的问题全让这种小的死结缠死了。波兰的走廊地带这个凡尔赛思维的最高产物，只是最无耻、最愚蠢和最恶毒地反映了目前整个欧洲的混乱情况。

当然，意大利可以批准对比萨拉比亚的占领。当然，英国和法国可以强迫波兰接收立陶宛而让出走廊地带。每一个这样的矛盾都要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但这样的矛盾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一个都同另一个纠缠在一起并牵制着它。是否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呢？

罗马尼亚在同意大利接近。这使它同小协约国疏远并导致对南斯拉夫的合围。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15日

№07976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 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

(1927年1月26日)

抄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尊敬的同志们：

昨天的《真理报》刊登了雅罗斯拉夫斯基^①同志在第十五次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就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发表的讲话。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讲话中引用了“拥护托洛茨基同志的纲领的联共（布）党员和苏联列宁共青团团员小组”在敖德萨散发的秘密传单。在公布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讲话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断定这份传单是谁写的和谁散发的。传单的内容极其荒谬，以至使人怀疑这件事的背后是否有党的敌人插手。无须怀疑，白卫分子试图插手和挑起事端，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看一看白卫分子的刊物如《舵轮报》的报道就会明白这一点）。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没有提供有关传单来源问题的任何信息，就得出结论说：“这份文件表明人们完全转入了地下状态”。至于指的是哪些“人们”——则没有说明。此外，传单中提到了我的名字。

如果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是我所希望的——，那么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弄清传单的来源就将其发表，这里有没有挑拨之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米·（1878～1943）——1921年起为中央委员，1923年起为中央监委书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嫌。如果传单的作者确实是一些滥用我的名义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在讲话中指出所有这些据说已经弄清的情况呢？最后，就算这种极其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确信这样的传单肯定同托洛茨基的《纲领》有联系，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澄清这个问题呢？

我不能不提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关注这种明显不正确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只会给党内关系带来消极后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26日

No07977

索恩采夫：当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基础

(不晚于1927年1月28日)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而且激发了新的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具有特殊的性质，并且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产物。而且这些矛盾和困难似乎是对金融资本为克服其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部矛盾而采用的方法的回应。列宁写道：“矛盾的这种激化是自世界金融资本取得彻底胜利之时起开始的过渡性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生产的卡特化、自由竞争受到限制和高额卡特利润的出现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是银行把额外的卡特利润集中在自己手里。卡特稳定的高额利润促使资本从利润率低得多的非卡特部门流出。这样一来，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大量增加，从而加剧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所有这一切极大促进了用于积累目的的大量资本的形成。然而另一方面，卡特对供给的调节过程本身恰恰意味着对生产的限制。这种情况极大地阻碍对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的利用。可见，垄断的本质自身就阻碍资本的无限积累。摆脱这种新产生的矛盾的出路就是符合垄断的特殊本质的资本输出。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了下面的矛盾链：（1）为了创造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不得不在一定水平的集中基础上产生垄断。（2）垄断使得有可能打破利润率不断降低的规律，人为地规定了一定的利润率，从而使得有可能在这一利润率的基础上将剩余价值资本化。（3）这样，垄断就打破了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规律，导致社会资本的重新分配，

使资本从非卡特尔部门流向卡特尔部门，从流向轻工业流向重工业，从而造成资本在卡特尔部门的过量积累。

可见，垄断虽然部分地消除了一个矛盾，但同时却产生了一系列其他的矛盾，当然，这已经是在另外的生产结构的基础之上。垄断导致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为了认识所有这些矛盾，必须对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即所谓重工业中的积累过程的条件进行研究。众所周知，在工业繁荣时期大工业处于比轻工业有利的地位。但到危机时期，在此前时期吸足了资本的重工业由于固定资本占大多数而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而与此同时轻工业却能比较顺利地压缩生产并适应了变化的需求。由此可见，无论是上升时期重工业资本增加的过程，还是危机时期资本减少（限制资本）的过程，都具有越来越大的突变性质并加剧了生产中的不平衡关系。所有这些情况都使矛盾更加尖锐。对于卡特尔工业来说，资本输出是惟一一条能够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垄断所产生的资本输出成了垄断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正像希法亭^①所写的那样：“卡特尔本身在资本争夺投资范围的竞争中，在积累对价格形成的影响方面，什么也不可能加以改变，从而就不可能阻止不平衡关系的产生……因为比起非卡特尔部门的竞争来，卡特尔领域的竞争是在更高的利润率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无法输出资本的情况下，卡特尔的出路就是限制生产，但这样一来就使得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压力都落到了非卡特尔部门头上，一旦出现萧条，卡特尔部门和非卡特尔部门之间的矛盾就达到最尖锐的程度。资本输出也是卡特尔打开矛盾的结子，从而给自己开辟在有利于取得高额利润率的

^① 希法亭，鲁·（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魏玛共和国财政部长。

条件下利用新积累的固定资本的惟一方法。资本输出具有怎样的性质和规模呢？与商品输出不同，资本输出的规模不取决于资本输入国的商品生产水平。资本输出的限度取决于：（1）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2）输出国家的资本积累规模或生产资本的剩余量（资本输出通过这种方式超过了不发达国家进口的限度）。随着欧洲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资本从一开始就已经很少这样输出了。因此工业资本的输出越来越提到首位，同时工业资本还是平均各国利润率的手段。原料、金属在各国之间分配的不平衡（从这些国家发展水平的角度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输出运动的方向产生了影响。由于金属、铁、煤、铅、铸铁、石油以及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赶不上重工业的飞速发展，为销售和出口这些产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一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铁和矿石的出口和进口为现代经济联系打下了主要基础，并决定了资本向这些或那些市场运行的主要方向。这使新的市场资本化并扩大了这些市场的消费容量。由于力图保持利润的稳定和保护投入的固定资本，而导致世界市场的个别部分被纳入了国内市场。通过这种途径实现了对原料产地、殖民地等等的垄断统治，即对投资领域的垄断。这一过程导致作为金融资本基础的经济版图的扩大，并通过这种途径使世界经济各个部分的社会发展得到平衡。但这决不意味着在世界市场的这些部分中资本在积累和增长。尽管殖民地、落后国家的工业有了增长，尽管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达到了很高水平，但它们却越来越依赖更发达的国家的金融资本。因此，社会发展的同一决不意味着财富、收入等等的分配实现了同一即平均分配。事实是，世界金融资本的80%集中在4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手里——这一事实既说明了这些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垄断地位，也说明了附属国剩余价值分配的形式和途径。

超帝国主义问题

考茨基在其小册子《中欧的统一》中写道：“有人臆造了一条规律，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经济原因而使小国失去了政治生命力。”考茨基在这里是想对伦纳^①进行反驳。伦纳根据下述事实即“社会生产力不仅超越了小国，而且也超越了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大国”得出结论说，世界经济需要世界国家，“帝国主义通过一个民族统治受其支配的许多民族这种形式而实现了国际化”。考茨基对此回答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经济发展推动了国际国家的建立和民族国家的被取代这种事实。”（《中欧的统一》）无疑，考茨基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通过分析最新的资本主义结构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经济倾向是存在的。这种倾向的产生是由于存在下述事实，即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国内市场，集中垄断的增长早已给资本主义工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资本主义工业不仅已成为大规模生产，而且成为世界性的生产，也就是说，只有世界市场才能成为其销售产品和投资的市场。然而当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却没有给在当代世界经济范围内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一经济倾向形成纯粹形式的机会，并导致“几个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而这些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构成金融资本时代的历史内容。当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谈论跨国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可能性时，没有注意到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布哈林在其《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中完全正确地揭示了一种情况，他写道，世界市场上地位的平等（生产费用，这是竞争的主要因素），和经济结构的同一（因为力量

① 伦纳，卡尔（1870~195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8~1920年任奥地利总理，1945~1950年任奥地利总统。

对比的变化为反映往昔力量对比的协定的变化创造了基础)是缔结牢固的协定的条件。

由于一系列历史和社会条件,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中至今也没有出现。希法亭说的“全面的托拉斯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尽管历史和社会条件永远不会给已经出现的过程发展为全面的卡特尔的机会”,指的正是这一点。列宁也曾这样写道:“金融资本的统治没有削弱而是加剧了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状况和矛盾。”从我们所引的有关铁路建设和殖民地增长的材料以及各国家生产力增长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金融资本和托拉斯没有削弱而是加剧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增长速度的差别(顺便说一下,近来从石油工业的增长这一事实中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但这并不排除以下事实的存在,即“民族经济”现在是在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的(见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因此布哈林是完全正确的,或者说他至少有一定的权利把帝国主义看作世界经济问题。从这一观点来看,从世界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在资本现在所处的货币-商品阶段,——当代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并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提出更迫切的需求,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提高——对世界资本的再生产造成巨大的障碍。如果再考虑到重工业的跳跃式发展,那么就能明显地看到整个工业的不均衡增长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间、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之间的矛盾深化。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分配失调。原料和农产品价格昂贵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现象。我们已经知道,垄断只能加剧这种价格昂贵现象和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均衡状况。这样一来,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冲击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比例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以致这里数量上的变化已经超出了质量上的变化。这样一来,正是缩小了销售市场的那个过程(生产的大规模性质,世界的地域划分,资本向农业国的转移等等)

也缩小了原料市场。但是在世界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下这种变化导致采取了扩张政策的新方法。在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缩小、工业不均增长、农业和工业之间以及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资本财富如何进行国际转移呢？在布哈林看来，资本输出的起因在于资本的相对过剩，即增加后的资本带来的利润只相当于资本增加前的利润。这样就具备了向国外输出资本的条件。资本的转移体现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最普遍的规律，资本的转移作为资本主义关系的一极同作为一极的劳动力的转移是一致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转移的过程受各国利润率平均规律的调节；在第二种情况下，转移的过程受工资标准国际拉平规律的调节。像布哈林正确指出的那样，劳动力的流入流出构成世界劳动市场的一种现象。同时，资本再生产、积聚和集中的过程，以及生产力的增长同国家资本主义民族占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而且每一次集中就像垄断取代自由竞争中的每一个步骤一样，只能导致矛盾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交织成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可能的出路是：（1）消灭财富或者（2）根本改变斗争力量的对比。第二种出路的实现靠战争。因此，战争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配生产力的一种手段。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生产力的这种重新分配是否意味着原殖民地和其他对象分配中的不平衡状况以及金融资本的剥削被消除呢？无疑，这样的战争将会使这些对象在战胜国之间的分配更加平衡，因为战争将给予这些国家在这种重新分配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前进的机会。但最终战争将使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中原有的一切矛盾再次产生，从而使金融资本时代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在扩大的范围内再次产生。然而这些矛盾已经是在生产力在世界经济范围内作了另外一种分配的情况下发展的。战争可以将发展的重心移向完全不同的世界市场，它削弱了一大批国家并为迄今为止一直处于落后地位的一些国家的跳跃式发展创造了条

件。除此以外，战争无法阻止一大批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就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索恩采夫

[1927年1月]

No07978

托洛茨基致索恩采夫

（1927年1月28日）

亲爱的同志：

我粗粗（不得已）看了您的讲话，没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讲话内容丰富而有意义。

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情况下，“撇开国际因素”（用布哈林的语言来说）具有一定的危险。在我国的经济中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同价值规律既共处又斗争。斗争的结局取决于那些规定着国民收入在两种体系之间的分配的条件，其中包括政策。结果形成了平等地进行决战的局面。但我们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并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同“我国的”价值规律的决战受制于世界价值规律，这将极大地改变两种规律的力量对比，如果仅就经济范畴及其无限发展这一范围而言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撇开国际因素”即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危机和国际革命的话。

您对这一切当然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在您讲话的结尾对此也有暗示。然而这里光是暗示是不够的。否则，我国那些在《共产党宣言》问世80年之后才琢磨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战胜“自己的”资产阶级即“自己的”价值规律这样一个天才思想的哲学家们，就会抓住您对问题的提法做文章，尽管您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有一些哲学家也曾这样抓住我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的第1篇大做文章，而他们根本不知道第1篇同第2篇的联系。正

因为如此，当我在该书第2篇中提出旨在证明不能“撇开国际因素”的论据时，哲学家们就大叫大嚷起来，好像我背离了我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的观点。今后我们也免不了会碰到这些论据。

我记得，我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①，这位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大家，在《资本论》第3卷问世后认为，他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讲授给学生们的不是应当讲授的东西，他指责马克思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你们看，马克思所说的价格不是像它理应这样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产费用的基础上。“自己的”价值规律同“自己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的斗争是“第1卷”。把这一斗争纳入世界价值规律的体系是“第3卷”。第1卷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我们应当转而研究以后的几卷。

大约在3年前我们驳斥了我国的哲学家们，他们可耻地歪曲列宁的话，把我国的整个经济体系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社论和“学术”论文，甚至还出版了教科书（该好好清理这些教科书了！）。我们针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两个体系斗争的理论。现在这些哲学家勉勉强强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但是却要求我们“撇开国际因素”，以使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得到安宁。我们除下述可能性，即这些哲学家今后为了寻求救命稻草而抓住两种规律斗争的理论做文章并指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②放弃了自己的理论，而他们本来打算宣布他的理论是对一国社会主义的完美论证。当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这种

① 斯克沃尔佐夫，亚·伊·（1848～1914）——俄国经济学家、农学家，教授。

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1886～18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1920～1921年任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21年起先后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真理报》编辑等职。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解释没有多大责任，就像马克思对斯克沃尔佐夫教授（另一位，不是这位，——不过也包括这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不负多大责任一样。然而为了杜绝理论上的舞弊行为，我们自己还是应当不撇开“国际因素”，即使是在一个 20 分钟的讲话里。

您的 列·托洛茨基

附言：我想提醒您，除了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外，还有一个可敬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规律的现状。

1927 年 1 月 28 日

№07979

弗·米·斯米尔诺夫：联共（布）中央全会总结 基本建设投资

（1927年2月）

1926~1927年度的工业生产财务计划清楚地表明，中央的政策越来越把我国的经济引入死胡同。去年的总计数字就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总计数字如下：

1. 工业成本平均增长了2~3%。其中中铁矿工业的成本增长了23.4%，金属工业——11.5%，基本化学工业——9.6%，橡胶工业——16.4%，森林工业——29.5%，榨油工业——19.6%。成本大幅度下降的有：电机工业——6.5%，纺织工业——5.2%（质量也严重滑坡），食品工业——9.7%（主要是制糖工业——22.1%，而且是在制糖厂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和制茶工业——14.3%，原因是茶叶价格下降）。（见《1926~1927年度工业生产财务综合计划》）。

2. 原料价格的低下导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亚麻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2%，同时今年的收购量比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一，向日葵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7%，收获量减少了30%多。

3. 一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从10月至4月实际工资降低了12%，而后到10月提高到去年初的水平。

4. 失业的增长超过了工人的增长。全联盟产业工人的数量增长了14%，而在俄罗斯联邦，粗工的失业人数增加了32%，熟练

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增加了 29.5%（其中金属工业工人——39.5%）。（见《俄罗斯联邦劳动人民委员部 1926 年 11 月的报告》）在乌克兰，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失业人数一年中增加了 33%。（见《经济生活报》2 月 8 日第 31 号）

5. 商品荒的情况得到缓和的说法极不可信：工业品的零售价格直到 5 月份还在上涨，这一时期几乎回到了 1923 年 10 月危机时期的价格水平（99%），到 9 月份时降低了 3%，而到 1 月份又上涨到 1926 年 10 月的水平。在应季商品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过季商品和滞销商品的销售出现某种不景气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托拉斯转而生产滞销品种，以躲开畅销品种的标准价格。（2）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主要是纺织产品），以致廉价商品已无法用于消费，也找不到销路（关于这个问题，见 2 月 16 日《工商报》第 38 号上刊载的维什涅夫斯基的一篇极有意思的短评，题为《纺织工业的品种和质量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1925~1926 年度的工业发展不够理想，我国的经济困难不是得到缓解而是更加严重。

1926~1927 年度的计划存在下述不足：

1. 产量的增长放慢：去年增加了 42%，今年预计增加大约 20%（其中消费品的生产只能增加 17%）。

2. 据预测，1926~1927 年度的成本如果不考虑折旧因素的话将提高 1%。实际上，提高的幅度可能还要大：没有考虑到原料价格的上涨（例如，亚麻的价格最近每一普特上涨了 70 戈比），设备的磨损，劳动生产率增长（13%）看来也估计过高（去年为 11%），没有考虑到提高质量的必要性（在纺织工业方面，计划是从全年生产“简易”品种出发的^①，而转向“简易”品种只是在下

^① 也就是从差于去年的质量出发的。——斯米尔诺夫注

半年)。在恢复旧品种的情况下，纺织工业的成本最多能保持稳定，而达不到降低 3.3% 的目标。（见《生产财务计划——“生产成本”》。）在制糖工业方面，原来预计成本提高 8.3%，现在，在这一榨季结束后，提高了 12%。

3. 名义工资预计只比 1925~1926 年度的平均水平提高 9.9%。而由于这一平均工资低于 1925 年 10 月的水平，所以这实际上意味着工资将稳定在 1925 年 10 月的水平上。

4. 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不够：如果不算没有分配的后备金和次要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为 86400 万卢布^①搞得没有一点余地，而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自己也指出，某些指示（例如，关于减少商品和生产储备的指示）将无法完成。此外，计划的编制没有考虑到出厂价格将下降 5% 这样一个因素。

5. 劳动力的状况简直成了灾难性的。去年工业吸收了大约 38 万工人，今年预计只吸收 13.6 万人。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今年第一季度失业人数增加 20 万人，即增加了 20%，而去年第一季度失业人数只增加了 3.1 万人，即增加了 3%。

计划的严重不足甚至在中央全会上也不可能不暴露出来。这种情况在古比雪夫^② 同志的调门沮丧的报告中和许多发言人的措辞激烈的讲话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

1. 关于“合理化”及由此产生的裁减工人的问题被最尖锐地

^① 基本建设投资的总规模为 94700 万卢布；其中没有分配的后备金为 3000 万卢布，次要工程为 4300 万卢布，辛迪加（也就是说不是工业而是商业）的固定资本增加 1000 万卢布。除去这些开支，其中后备金和次要工程大概是完不成了，而辛迪加的固定资本增加跟工业没有关系——还剩 86400 万卢布。——斯米尔诺夫注

^② 古比雪夫，瓦·弗·（1888~1935）——1904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 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 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提了出来。古比雪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也不得不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和决定性意义”，“在这方面党应当制定极其明确的路线”，但他现在“还无法向中央全会提出极其明确的决议”，而政治局“也决定在这次全会上不对这个问题作决定”。在争论中这个问题是核心问题。乌雷瓦耶夫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实行合理化会导致“裁减”工人而且是熟练的工人。在回答斯大林关于“定出了哪些实际措施”的问题时，他也只能回答：“斯大林同志，实际结论还不多”。丘巴尔^①指出，在乌克兰的一些大工厂，由于实行合理化而辞退工人，但却无处安置他们。卡冈诺维奇^②主张必须实行合理化，毫无把握地提出了一项“措施”：为由于合理化而被辞退的工人设立专门的职业介绍机构。彼得罗夫斯基^③建议加强支援农业以防止工人从农村大量流出。洛莫夫^④说，在顿巴斯工人往新的挖煤机上抹的不是油而是大粪，他指出，“应当向工人说明，这样做（合理化）对生产是有好处的。只要向他们讲清这一点，他们就会去从事其他的甚至是收入减少的

① 丘巴尔，弗·雅·（1891～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3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7月～1934年任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先后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决，后平反。

② 卡冈诺维奇，拉·莫·（1893～1991）——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5～192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总书记。1930～1935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4～1925、1928～1939年为中央书记，1926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社委员。

③ 彼得罗夫斯基，格·伊·（1878～1958）——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任务人民委员，长期领导乌克兰的工作，1919～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④ 洛莫夫，阿·（1888～1938）——1903年入党。历任司法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7～1934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遭镇压。

工作”。只有托姆斯基和梅利尼昌斯基^① 试图采取比较乐观的态度：他们试图证明，可以靠裁减临时工人，也就是说靠增加不熟练工人的失业来安置由于实行合理化而被辞退的工人。然而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关于这一问题不仅没有通过任何决定，而且根本没提，这一问题完全成了悬案。

上面指出了失业人数的极大增长，这主要是熟练工人失业造成的。试问，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梅利尼昌斯基的讲话中找到了答案：“由于住房危机和一系列其他现象，我们的工厂如今变成了穿堂院。例如在维亚兹尼基，有一个企业的劳动力在1年之中更换了一又二分之一。还有，在与这个企业同属一个托拉斯的另一个企业，其领导人是乌雷瓦耶夫同志，我们看到这样的景况：“阿莫”工厂有1673名职工，在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10月1日的一年中，裁减了387人，后来又招收了515人”，等等，等等。我们的企业之所以变成“穿堂院”，不仅是“由于住房危机”，而主要是由于“一系列其他现象”，即经营管理者利用失业大军这一资源，宁愿要临时工人也不要固定工人，他们用不太熟练的工人来代替比较熟练的工人，用青年工人来代替中年工人，以便能够降低工资。

2. 基本建设投资和产品数量。柯秀尔（南方钢铁托拉斯）和苏利莫夫（乌拉尔）极其明确地指出，少量增加铸铁生产的计划意味着冶金工业生产将停止发展，因为增加的这一点产量全都用来填补废钢铁储备的消耗了。卡冈诺维奇说，1926~1927年度乌克兰有两座高炉因年久失修而停止生产，1927~1928年度有7座，1928~1929年度数量还要多，而计划中却没有规定改建一座高炉。梅利尼昌斯基对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同去年相比减少1000万

^① 梅利尼昌斯基，格·纳·（1886~1937）——1902年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候补委员。

卢布，而同五年计划的预计数字相比减少 5000 万卢布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这样做我们将很快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纺织品（不是棉花，而是纺织品）。洛博夫^①表示：“我担心，今年由于财政困难我们将无法完成预定数量的基本建设投资，也无法完成生产计划”。古比雪夫在他的结束语中对此没有作任何答复。

3. 住房问题。苏利莫夫（乌拉尔）表示，在他们那里住房问题比合理化问题还要尖锐。无法招收新工人，因为没有地方安排他们住宿。梅利尼昌斯基谈到纺织工人极其紧张的住房状况，说他们不得不住在离工厂 5~10 俄里远的地方，他对同去年相比大幅度削减这一工业部门的住房建设拨款表示反对。

4. 许多发言的人对古比雪夫的报告中只字不提农业原料和工业产品成本问题表示不满。古比雪夫以这一问题属于价格问题而敷衍了事。

总而言之，争论极其明显地证明：（1）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存在不足。（2）这一计划的完成很值得怀疑。（3）失业问题和住房问题尖锐到了极点。没有提出任何摆脱困境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来，对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讨论最好不过地揭示出中央政策是站不住脚的，这一计划也是对中央政策进行批评的好题目。以托洛茨基（惟一的发言人）为代表的反对派首领们没有作出进行这种批评的任何尝试——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是所有讲话中最平淡的。所有尖锐问题都被有意避开。只字不提失业问题，只字不提不足之处。相反，讲话的结尾强调指出，中央实质上接受了反对派的计划——4 月反对派建议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定为 10 亿卢布。中

^① 洛博夫，C.C.（1888~1937）——1913 年入党，1924~1937 年任中央委员。1926~1930 年任俄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0 年起任苏联副供应人民委员，1932~1936 年任苏联森林工业人民委员。

央通过的计划是 94700 万卢布（实际上只有 86400 万卢布，然而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对此还是不提为好）。讲话的开头是机会主义的声明，听起来简直就是在讨好中央：“关于价格问题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谁可以接受？）建议”。当布哈林在讲话中就提高出厂价格一事开始进行冷嘲热讽之后，托洛茨基则敷衍塞责说“不真实”，“这是你们硬加给我们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书中说的不是那样的方针”。“为什么你们不把我们关于价格的准确声明（首领们在声明中放弃了原先的立场）附于代表会议记录之后呢？”

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完全站到了中央关于 94700 万卢布决议的立场上。他声称，主要问题“在于将我们拥有的不多的资金在各生产部门之间作适当的分配”，之后他又对建设新企业的投资是否过多从而不利于旧企业的改建表示了含糊糊的怀疑。关于因实行合理化而“裁减”工人，他只能说这是由于过去几年“折旧出了问题”、“经济是糊弄不了的”。这样他就推卸了中央对于这种裁减应负的责任并将责任推到了“经济”头上。接着围绕我们同世界市场的联系远比中央所认为的要密切得多的问题进行了争论，皮达可夫则就人们在五年计划问题上对他的攻击作了辩护。辩护的基调是，指责皮达可夫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1926~1927 年度的计划比五年计划得出的结论还要悲观。至于说这个计划是中央政策的产物——仍然是一言不发。最后所有这一切归纳为“关于如何实际看待五年计划”的几点教条：

1. 目的不是在短时期内保持所谓的“独立”，而是加快速度。应当使整个工业在各个部分保持正确的比例的情况下得到最快的发展。

2. 不要一口吞得太多，以免延缓经济消化的过程。

3. 坚持加强而不是削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的方针。

4. 不要像古比雪夫同志打算做的那样大度地拒绝国家预算投

资，而要向全党全国解释，工业发展的初期必然要求预算上作出重大牺牲。

这就是反对派的领袖对于那个注定使冶金工业停滞，实行导致熟练工人被辞退的合理化，使失业人数猛增加和住房危机激化的计划所能说的一切。实际上这是在重复加米涅夫的口号（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放慢步伐”。在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对他投票赞成这个可耻的计划还会感到奇怪吗？难道他认为用这样的废话就能把党内的中间派争取过来吗？在他看来，反对派正是由于“不了解”党内的中间派而遭到了失败。根据这个讲话中间派无论如何也弄不清中央的政策和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中央在这次全会上通过自己的拥护者之口表明自己的政策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那么托洛茨基同志的“反对派的”讲话才极其清楚地表明，反对派的领袖们甚至没有能力根据著名的“10月16日方针”捍卫自己的“思想”观点，在组织上投降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思想上的堕落。

弗·米·斯米尔诺夫^①

[1927年2月]

^① 斯米尔诺夫，弗·米·（1887～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1～192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

№07980

托洛茨基：致卡普林斯基同志

(1927年2月2日)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3~24期合刊上载了米高扬同志的一篇文章，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比例失调的控制数字（50000万卢布）提出了批评。商业人民委员提出了与此相左的数字：37000万卢布。据作者说，在他的文章写好之际，实际的比例失调数字为20000万~25000万卢布。作者的这一论断完全是从预计价格或指导价格和实际价格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粮食收购价格的降低和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

可否以作者的叙述为基础（第29~32页），对比例失调的价值表现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预见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由于价格方面出现的上述现象）作出说明。我指的不仅是有关价格如何反映和“改变”比例失调的一般性看法，而且是过程的数字图表。一般性看法表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数字作为控制数字比与之相左的较小的数字在当时来说更接近实际情况。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日

No07981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7年2月7日）

第 631～68 号

绝密

致托洛茨基同志

抄送：联共（布）中央

尊敬的同志：

我从列宁格勒回来后看了您 1927 年 1 月 26 日就在第十五次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关于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所作的发言（我在发言中宣读了在敖德萨的联共（布）各支部流传的传单）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的声明。您表示困惑地说：“为什么没有弄清传单的来源就将其发表，这里有没有挑拨之嫌”。您问道：“如果说传单的作者确实是一些滥用我的名义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在讲话中指出所有这些据说已经弄清的情况呢？最后，就算这种极其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确信这样的传单肯定同托洛茨基的《纲领》有联系，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澄清这个问题呢？”

我是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从联共（布）中央书记处获得上述文件的，因为这份文件是分发给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同时，我所公布的这份传单的后面还附了一封编号为 1 号的信，这封

信就某一点上说是极力为反对派辩护的一种尝试。这封1号信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召开之前和在最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弄清的反对派的路线如出一辙。而且中央在分发这份传单时附了一个通知，说这份传单是“1926年12月末在敖德萨市各支部”传播的。我当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份传单来自白卫分子；而弄清谁是散发这份传单的罪魁祸首我一时当然还做不到，因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十分清楚，根据以往同反对派的地下派别活动斗争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查明谁是这些文件的散发者有多么困难。我索取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具体的材料。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规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无权向党报告由于散发这样的文件和存在这样的地下集团而对党的统一形成的威胁。我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发表声明，是因为我不仅有正式的根据，而且有许多其他的材料，有些材料您托洛茨基同志也是知道的。我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上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时还援引了前托洛茨基分子、工人、莫斯科党组织成员安德列耶夫同志的声明。这个声明指出：

“……在交换意见时（在巴卡耶夫的家里）明确了今后的行动。作为基础的是：今后要搞秘密活动，转入地下状态，只进行单个人的活动而且主要是保存好目前现有的干部，并尽可能逐渐吸收别的干部”。

安德列耶夫同志是1926年10月11日向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发表这一声明的（见1926年10月23~26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第15页）。

我在列宁格勒时看到过另一位安德列耶夫（A. 安德列耶夫）同志1927年1月21日给列宁格勒省委组织部的声明，这位同志在声明中说，他从“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利诺夫斯基同志那里得知“反对派目前的计划”，内容大致如下：“我们接到指示在任何地方

都不要公开行动，而要为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我们接到指示要把自己装扮成中央多数派百分之百的拥护者，以便取得信任并力图获得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在代表大会表决时一决雌雄。”

此外，前反对派活跃分子之一党员费多罗夫（前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曾于1926年12月1日向列宁格勒省监察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声明，说反对派在1926年10月16日声明之后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反对派的首领在会上似乎作过如下指示：“现在必须停止在各工厂的派别活动，但不要中断与各区的团体的联系，要打着探亲访友‘喝茶’的幌子，收集所有关于局势的信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重新恢复我们的活动了。”

所有这些声明使我作为中央监察委员有权在自己关于反对派活动的报告中向党发出警报。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表过认为这些传单或类似的传单来源于您的声明。在列宁格勒代表会议上，我在宣读这份传单时曾说：“这里没有一行文字是在指示如何更秘密地活动，如何更好地掩盖这一活动，但所有的人都清楚，这是企图继续开展这一活动。因此，首领们的声明（我指的是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说他们不再进行任何派别活动，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他们自己答应不再进行派别活动，但对他们的拥护者今后的行动则纵容放任，推卸自己的责任，等等。我们丝毫不能解脱他们的责任。”

由此可见，我认为我的行动中根本没有您所指责我的“错误的行为”，我认为我在自己的行动中维护党的利益是完全正确的。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

№07982

托洛茨基就注文问题致巴甫洛夫^①

(1927年2月15日)

如果可能的话，两个注文还应当再压缩一下，特别是叙述托洛茨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或是他对1923年事件的看法的地方，因为该卷已收入了相应的著作。此外，如果可以的话，应当淡化注释卷的论战性质。要删去的地方我作了记号。

在第4页上有一句话：“遗憾的是，在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这段话没有保留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是从速记记录中看到这段话的。“左派”躲在幕后叫嚷，说我以隐蔽的形式用不服从代表大会进行威胁，以自己的名义和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他索要了速记记录，读了相关的地方并认为声明是极“有诚意的”。也许是俄译本没有保留这段。但在德文速记记录中应当有，我认为代表大会的德文记录中也应当有。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15日

^① 《托洛茨基全集》的编辑之一。

No07979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 中央监委主席团

（1927年2月16日）

绝密

在全会上，我们在声明不同意关于价格的决议中说明理由部分的一些论点之后，投票赞成整个决议，并表示将全力以赴协助消除在争取实现中央委员会拟定的降低价格的计划方面所出现的一切障碍。

在2月15日《真理报》社论中，我们投票赞成中央的决议被说成是“为布尔什维克所不耻的政治投机行为”，并说这是反对派力图“成为叫喊得最响的降低价格的拥护者，而昨天他们叫喊提高价格也是最响的”。至于我们投票赞成政治局提出的决议；至于我们声明必须空前团结一致地试行降低价格——社论中只字未提。此外，任何一个看过社论的人都会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似乎我们要求降低的价格幅度大于政治局建议的和全会通过的幅度，即6月之前降低10%。其实，我们在讲话中对如此大幅度地降价能否完全全地落在消费者身上表示怀疑。对此表示怀疑的还有其他一些不属于反对派的同志。我们从未建议（无论是明说还是暗示）扩大降价的百分比。由此可见，一方面不告诉读者我们投票赞成中央的决议，另一方面断言我们要求马上实行幅度大于决议规定的降价并指责我们进行什么投机——《真理报》根本不说真话。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打算进行的运动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全体党员、所有机构和广大劳动群众在这件事上真正齐心协力地行动；第二，对采取的所有措施进行全面的和有原则的务实讨论——不要中伤，不要冷酷无情，不要毒化党内氛围。我们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才能在这一运动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不管党将把计划降低的多大部分落实到消费者身上。正因为如此，尽管许多为政治局的决议辩护的发言有明显的经济错误，甚至决议中说明理由的部分也有错误之处，我们仍然完全全地投票赞成最近这次全会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决定：力争将各种工业品的零售价格降低10%。

既然《真理报》认为必须对我们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它起码应当告诉读者我们投了什么票，我们在解释自己投的票时说了些什么。《真理报》2月15日的社论，在开展打算进行的运动这样一件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需要和应当努力保持完全一致的事情上，向全党隐瞒真相并毒化党内氛围。

不仅如此，《真理报》用潜言中伤和含沙射影来代替讲事实，必然会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那些记得列宁关于只有傻瓜才轻信人言的教导的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弄清反对派在全会上究竟说了些什么的念头。这样，出自对完整和可靠的信息的正常需求，由于中央机关报的歪曲报道，产生了一种不健康和危险的倾向即通过后门获取信息并把在当前本应成为全体党员共同财富的东西当作秘密文件传来传去。

我们对《真理报》散布的那些不仅根本违背我们的意图和做法，而且违背党的利益的流言蜚语表示坚决的抗议。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16日

№07984

托洛茨基：关于注释

（1927年2月16日）

注2。关于统一的军事学说。

我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这样详细叙述我对于统一的军事学说的不同意见？难道这些意见没有收入本卷吗？如果收入了，那么我建议把注释相应的地方压缩一下。

在第4页上有一段极不准确的引文。请将引文核对一下。

注148。关于婚姻——我觉得不符合目的。实际材料大概是可靠的（我没有对材料进行核实）。但思想方面完全没有弄清。把克拉西科夫^①和别洛博罗多夫^②划入了同一类。然而当时克拉西科夫维护错误的、实质上是富农的观点。根本没有提到在整个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的克雷连柯^③同志。我认为，这一注释中可以保留的只有实际的时间顺序。可以从克雷连柯同志文章中摘录一段文字取代一般性的议论，因为克雷连柯同志清楚地说明了，在关于婚姻的争论中贯穿着无产者和小业主的观点的斗争。所有这些在注释中根本没有说清楚。

-
- ① 克拉西科夫，彼·阿·（1870～1939）——189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起任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 ② 别洛博罗多夫，亚·格·（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任东南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内务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副人民委员。
 - ③ 克雷连柯，尼·瓦·（1885～1938）——十月革命后任红军最高总司令、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庭长、检察长、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党中央监察委员。

注 257。关于德国共产党。

显然，对布兰德勒^① 集团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并极力遮掩他们的错误。

注 261。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拉福莱特问题的决议是根据我的建议作出的，有文件为证吗？我不怀疑，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而且注释中所引用的决议也全部或相当大一部分是我所写。然而有没有这方面的正式论据呢？

附录 4。摘自“全国委员会”呼吁书的引文不完整。在这份呼吁书中我记得有一些更精彩的论述。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2 月 16 日

① 布兰德勒，亨·（1881～1967）——1898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1923 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1 年采取“左派”立场。1923 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 年被开除出党。

No07985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

（1927年2月21日）

关于联系整个形势即国内形势和世界形势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状况作出评价的问题，是在就改选问题进行争论期间提出来的，并引起了一些尚未完全暴露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必须弄清楚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心平气和地说明这个问题至少会消除一些臆造的意见分歧。

1.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并不总是一成不变。即使是在大致一样的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也会在世界性和全国性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政治方面的变化。

2. 10年前，我国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比现在要低得多。然而在当时，由于国内和国际条件的交织作用，无产阶级取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阶级都未曾取得过的革命进攻的力量。认为这种革命进攻的力量可以保持好多年甚至几十年则是荒谬的。这里的降低和提高，有时甚至是幅度很大和很急剧的降低和提高，是完全不能避免的——这取决于整个形势，取决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3. 无产阶级和我们一起期待着欧洲革命在1917年后马上爆发。1923年无产阶级期待着德国革命的爆发。1926年，在挖煤工罢工期间，无产阶级期待着英国事件的革命发展。1918~1926年是欧洲无产阶级遭受巨大失败的几年。对此假装看不见纯粹是愚蠢和怯懦的表现（由此得出所谓悲观主义的结论同样是愚蠢的）。我

国工人阶级为每一个这样的事件而焦虑不安——先是满怀期望，后是大失所望。这一经验使我国无产阶级对世界革命采取了某种新的态度（极其谨慎、克制，不耐烦的人——极大的怀疑，不成熟的阶层——公开的不信任），这难道不明显吗？

4. 国内的发展进程，即在第10年我们才勉强达到战前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不能不对整个无产阶级产生影响。无产阶级走向革命时自然是满怀希望，而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则充满了幻想。因此，特别是在速度缓慢的情况下，必然会对革命、对革命是否有能力在短时期内深刻地改变关系和生活流露出失望的情绪。根据这一点就说无产阶级对整个革命失去信心或者打算背弃革命，是愚蠢的或背叛的行为。然而如果看不到，革命在目前时期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使无产阶级集中意志和注意力，无产阶级的意志和注意力分散到了许多问题上，日常生活问题以及车间的、地方的和其他的需求不仅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遮盖住了整个阶级、整个革命的前途——看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变成了瞎子。

5. 50年代初，马克思根据整个世界形势首先是经济形势确认，革命暂时进入了低潮。马克思没有卷起革命的旗帜，但却同不愿看到这一点的主观主义者断绝了关系。马克思不怕直言不讳地提到低潮。

6. 1907年，列宁确认革命的形势有所低落并号召去那“肮脏的地方”即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等等。列宁不仅无情地与取消主义者，而且与不愿看到形势发生变化、工人阶级本身情绪发生变化的主观主义者（召回派、最后通谍派等等）断绝了关系。

7. 我们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认定，在德国1923年的失败之后，德国共产党逐渐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最近一年中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波兰共产党、瑞典共产党、挪威共产党等都衰弱了。在党的影响衰弱方

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是政治错误。然而作为衰弱的基础的是自1918~1923年之后在无产阶级群众自身中发生的更加深刻的过程。这种现象会长久吗？我们的时代是急剧转折的时代。但这不会改变对正在进行的过程的评价。英国的罢工实际上是在没有欧洲工人阶级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罢工的失败只会推迟新的高潮的到来。这就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事实，这就是明确规定了当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方法的事实。

8. 或许有人会说，所有这些对于欧洲来说多多少少是正确的，但跟我们没有关系。这就是民族的局限性，而且是最可怕的局限性。我们有时越过我国工人阶级看待德国的、英国的、中国的事件。这种不良习惯的表现是，我国的报刊告诉工人阶级的只是世界发展的片断，主要是让人高兴的片断。我国工人阶级为德国的、英国的、中国的事件而焦虑不安，而留在他们意识中的沉重感觉不是光靠漂亮话能消除的。

9. 莫洛托夫同志反驳说：那党10年来的工作往哪儿摆？——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阶级及其经验和结论不是党的机关工作的简单产物。我们大家知道，党在阶级的生活中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党不是惟一的因素。党无法消除整个世界形势的影响、世界工人阶级胜利和失败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等等。党可以而且应当削弱低潮的影响。党可以而且应当正视工人阶级中的一切过程并向先锋队解释这些过程，使他们做好适应形势新变化的准备。但闭眼不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

10. 布哈林同志在他的列宁格勒报告中说，我们党内存在黑帮分子。我们不想夸大他们的数量。但与他们并存的还有对黑帮宽容的分子。其次还有一些不愿积极反对黑帮的人等等。这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吗？难道无产阶级自身阶级积极性、警惕性和警觉性和警觉性的下降与这些现象不相符合吗？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党对

于没有帮助无产阶级确定正确的方向负有绝大部分责任。应当从这一点做起。但怎样做起——这取决于无产阶级在何种程度上响应或不响应警告、号召的呼声等等。

11. 敌视和半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集团觉察到无产阶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通过国家机关，而且通过经济和日常生活体现出来）有所减弱，因此，小资产阶级中政治上活跃的阶层的自信心得到增强。这一信心在不断增强，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压力和控制。无产阶级无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正在迫近的危险。在这方面我们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12. 非无产阶级的活跃必然使无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无产阶级将会奋起自卫，以便在情况变得稍好一些就转入进攻。这就是明天的前景。对此应当做好准备和培训工作。

13. 当代的主观主义者对这一切都不理解，他们认为党的官僚是惟一的因素。主观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就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与官僚主义者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官僚主义者说：“无产阶级诸事顺利，这一点通过我得到了反映。”主观主义者说：“无产阶级诸事顺利，只要官僚主义者不加干涉，这一点就会通过我得到反映。”二者都大错特错了。

14. 正是由于整个方针不正确，主观主义者从去年的十月事件中得出了毫无用处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同主观主义者走的不是同一条路。构成我们分歧的基础的是对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评价，其中包括在评价无产阶级自身的自我感觉方面存在的深刻分歧。

15. 可以说：所有这些多多少少都是正确的，但谈论这一点则是“不妥当的”。这样的理由是完全虚伪的。正是因为防止党和党的最有远见的分子悲观失望，才应当实事求是地说。当然，应当说能被别人正确理解，就是说，应当使人看到今天的错误明天将会得到克服的前景。这一前景应当既包括客观因素，也包括主观因

素。然而闭眼不看今天形势的基本因素，这不是我们的政策。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1日

№07986

托洛茨基就派遣皮达可夫出国问题 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7年2月21日)

致奥尔忠尼启则

在美利坚合众国以皮达可夫是“一个判处俄国优秀公民（社会革命党人）死刑的人”为借口不让他入境之后，派遣皮达可夫去加拿大是极不谨慎的行为。因为这一理由尽管是非正式的，但明天将成为美洲（当然包括加拿大）的共同财产。要知道，这一理由对于社会革命党人（全体白卫分子）实施恐怖活动来说绰绰有余。

我去过加拿大。早在1917年加拿大的警察局就塞满了流落到那儿的国际移民（其中也有俄国的移民）。我认为，在美国国内可以不费力地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说被禁止进入纽约的那个人钻进了加拿大。总之，这是一个极不谨慎的行动，尤其是如果考虑到，在莫斯科的外国记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的所有前因后果。我认为必须请您关注这件事。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附言：随信附上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当时寄给斯大林的信（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全会召开期间谈过）的抄件。

列·托洛茨基

№07987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雅罗斯拉夫斯基

（1927年2月22日）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抄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尊敬的同志：

由于中央全会的召开以及身体欠佳，未能及时对您2月7日的来信作出答复，一直拖到现在。

1. 从您的信中得知，敖德萨的文件分发给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由于我哪一个机构的委员都不是，所以我没有得到文件，尽管文件中直接点了我的名字。至于您说的什么1号信，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2. 对于“前托洛茨基分子”安德列耶夫同志及其所说的在巴卡耶夫同志家里发生的事情我没什么可说的。说实在的，我认为在这一极其紧张的时刻有人说出像安德列耶夫同志所叙述的那些想法^①和意见是可能的。但我认为，巴卡耶夫同志不会说出这些想法来。

3. 您引用了另一位安德列耶夫同志的话，这位安德列耶夫根据“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谈到了这样的指示：“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公开活动，要把自己装扮成中央多数派百分之百的拥护者，力争获得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委托书”等等，——

^① 限制、削弱 [季诺维也夫在页边上的附笔] ——季诺维也夫的笔迹。——列·托洛茨基 [列·托洛茨基在页边上的附笔]

这段引文本身就暴露了其内在的站不住脚。安德列耶夫同志和利诺夫斯基同志我都不认识。然而问题当然不在这里。您间接转述的“计划”本身就纯粹是荒谬的。至于说到我，那么我认为，每一个赞同反对派观点的同志都无权向党隐瞒这一点，而恰恰相反，应当利用党给他提供的一切途径，坚持自己的观点。

4. 所引费多罗夫同志的话，即关于反对派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似乎”指示“打着探亲访友喝茶的幌子……”等等，等等，同所引利诺夫斯基同志的一段话如出一辙。一般来说，我不怀疑，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特别是遭到批判的同志，会相互走访“喝茶”。我认为，您自己也明白，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不怀疑，他们在走访时会互通信息。为了防止这样做，就应当结束反对派集团和小组的隔绝状态。应当使反对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参加党的正常的日常工作，担负起自己那一份党的工作，列宁在世时和国内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一直是这样做的。

5. 用您的话来说，您没有发表过认为敖德萨的传单来源于我的声明。您要是发表这样的声明成何体统！您实际上说过：“这里没有一行文字是在指示如何更秘密地活动……”，这就够了。指示是谁下达的？关于这一点您没有直说。但在您宣读的文件中点了我的姓名。您用您所引用的利诺夫斯基同志和其他人的话引导您的听众顺着明确的思路往下想。这是含沙射影的手法，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使用这种手法尤其是不能允许的。

6. 接着您说，签署10月16日声明的人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才放弃派别活动的，同时却鼓励别人进行派别活动，您这又说错了，因为我们的声明的意思和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央委员会用纯粹党内手段根除分歧。如果您看看《真理报》就《中央委员会通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那么您就会发现，社论说10月16日声明是党的胜利，是“历史”事实等等。当然，两三天之后调子就来了个180度

大转弯，尽管在这几天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件。极有可能，引发这种急剧的和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转折的是您的通报和您所引用的“前托洛茨基分子”安德列耶夫同志的话等等。

7. 您认为可以在讲话中和报刊上对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作如下评价，即这条路线分析了“与苏维埃政权的冲突”问题并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行动”的问题出谋划策。您像往常一样，引用某位通常是您根本不认识的同志的证词来攻击您非常熟悉的一些同志，而这些同志的观点，不管您怎样横加指责，都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毫不相干，就像您本人的观点一样。这样的方法只能毒化党内和全国的政治氛围。

8. 您说要捍卫您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向党报告对党的统一形成的威胁”的权利。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不仅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且任何一个党员都有这样的权利。我丝毫不想对这种权利提出异议。我只是想说，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对于这种权利进行了最不正确的使用并以您的言论毒化了党内生活。我认为，利用您的言论可以不费力地编成一个有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能做什么的教科书。正因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并掌握着每个党员的政治生命，所以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特别是主席团委员，在公众场合发表事关某个同志的政治活动、政治名誉的讲话时要格外谨慎。而在您的言论中连一点谨慎的影子都见不到。

9. 在七月联席全会上，您在谈到有人向病中的列宁告斯大林的状态时喊道：“可耻！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把私人关系同政治搅在一起！”对于您所说的告状一事我不想多谈。但您的结论我却准备全盘接受。把私人关系以及人身攻击同重大的政治问题搅在一起是不能允许的。此外，这也是“可耻的”！然而，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对个别同志的人身攻击同与他们的观点的思想斗争搅在一起。

10. 1926年10月，您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的扩大全会上说：“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的租让总委员会编制庞大，将租让所得利润吃个净光。租让总委员会的同志们不去从事党交办的事业，而是在那里组织争论。”极有可能，租让总委员会的编制如您所说是“庞大”的。但全部问题在于这样的编制是在工农检查院的领导之下确定的，而工农检查院又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我决不是想让您对租让总委员会的编制承担责任。但在提出如此毫无根据的指责时还是应当对问题多少有些了解。政治局关于加强租让总委员会机构并在其内部设立新的部门（监督部门）的决定是在我到租让总委员会任职之前作出的。定编工作是在工农检查院的一位代表的参与下进行的，他认为确定的编制是不够的。如果您坚持不同的意见，您可以随时通过适当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

11. 在租让总委员会中，有数十名党内和党外的同志在工作，在非常勤恳地工作。为了反对反对派，或者为了反对我个人，说这些工作人员“将租让所得利润吃个净光”，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可以撤换机构的领导人或某些工作人员。但这样毫无根据地谈论国家机关自然会引起每个工作人员的不满并损害提出这种指责的人的威信。

12. 12月，您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代表会议上说：“你们知道，在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之后，许多反对派分子前往疗养地去养精蓄锐，而与此同时我们中的许多人却不停地努力工作。”我认为，这段话的含意用不着解释。

13. 不但如此，您在谈论租让总委员会和疗养问题时还提到了汽车问题，您在总委员会进行揭露之后紧接着谈到有些人占用了两部汽车，有些人应当受到法律追究，等等，等等。如果在这方面您查明有错误，那就应当实实在在地进行追究并发布决定，而不要进行笼统的中伤。我认为，这样的指示应当下达到每一个把人身攻

击搬上讲坛的普通同志。不但如此，中央监察委主席团委员也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定。

14. 关于一部分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党内工作人员享有其他工作人员所没有的特权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认为特权过多了。可以对特权进行限制。任何这样的措施，只要涉及到我，我都会服从的，我想，我不会比其他任何同志做得差。但由于就原则性问题进行政治争论而提出汽车问题，这就是谰言中伤，这种做法对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来说尤其是不能容许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由得想起了您所说的话：把个人因素同这样重大的问题搅到一起是可耻的。

15. 我根本不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应当成为某种调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不应该在斗争中坚持明确的观点。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它就是为这一任务而建立的）在于保障党的权利或者说党的活动在党内有一定的基础。当时，谁也没有像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那样粗暴地践踏党的权利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不同的意见——不仅在所谓的反对派分子那里，而且在中央多数派路线的拥护者那里，都一样。您的大多数言论就像是有意要搞成无法共同工作的局面。我不认为您会成功。至少，既然这取决于我，即多数情况下都成为您的讲话攻击目标的我，那么我是不会在这方面让您满意的。但您的讲话，即以我为例援引的那种讲话（这样的讲话非常多），将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很遗憾，对于这一点我没有任何怀疑。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2日

No07988

季诺维也夫致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3日)

列·达：

我又看了一遍。我犹豫不决。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没开始答复吗？也就是说——他会挑起纷争，把“证词”，“传单”、汽车、书记处等搅和在一起。

我们的信不给任何人看，而他的“信”却在全体党的积极分子中间传阅（不加批驳的）。

而且，他们还企图从您写信这件事中得出结论，似乎您写信是为了散发。

如果要写，就应再写上一两页热情洋溢的内容：关于形势，关于我们并不想“推翻”，关于危险来自右面，等等。

敬礼！

您的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2月23日

No07989

托洛茨基：札记

（1927年2月26日）

“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再一次重申，在国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积极性的增强推翻了反对派关于工人阶级阵地及其专政遭到削弱的许多论断。”

1. 这个批评是一个进步、对反对派的意见这一次表述得是正确的。反对派确实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阵地以及无产阶级专政遭到了其他阶级的进攻。

2. 这一点恰恰揭示了反对派的基本准则：为保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由此决定了必须对一切阶级危险保持警惕。仅此一点就说明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3. 决议这一次对反对派的观点的表述是正确的，但却对这些观点作了错误的批驳：

（1）国家经济的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也无法怀疑。但这是一个两面的过程。应当正确的评价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的政治力量对比；

（2）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的增长使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阶层（商人，熟练的专家，官僚，富农）的原始政治倾向得到复苏和活跃。

4. 目前阶段是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开展政治进攻的初期。无产阶级对形势及其中的危险认识得越清楚，无产阶级的一般阶级的、革命的积极性就会表现得越突出越明显。

5. 只谈论“活跃”、“积极性”等等，而不说明其阶级内容，就等于是在说废话。

6. 要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积极性，就不能掩盖现实危险，恰恰相反，要揭示这些危险。应当对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化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等等作出阶级评价，揭示它们的深刻的征兆性意义。谈什么“惊慌”、“悲观主义”等等是荒谬的，甚至是愚蠢的。但无产阶级应该做好保卫自己的政治阵地的准备，这些阵地近期内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保卫无产阶级的阵地——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将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和团结起来，并使工人阶级有能力在国内和国际条件一有利时就转入革命的进攻。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6日

№07990

托洛茨基致萨普龙诺夫^①

（1927年3月2日）

尊敬的同志：

我非常想同您作一次同志式的交谈。从您的信中看出，您现在正处于极其愤怒的状态中。我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交谈只会增加一些火气。我将动身去南方待几个星期。或许在这段时间内您的火气会消一些，我回来后我们就会在比您的信平静得多的气氛中见面了。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2日

^① 萨普龙诺夫，季·弗·（1887~1938）——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5月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主席。

No07993

奥尔忠尼启则就皮达可夫出国事致托洛茨基

(1927年3月11日)

致托洛茨基同志

尊敬的同志：

对于您1927年2月21日的来信^① 现答复如下：

1. 答复得迟了，因为我认为无论如何必须同皮达可夫同志谈一谈。

2. 实际上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皮达可夫去美国时您没有提到“不谨慎”，他在那里没有外交代表权利，而这一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我们的每一个同志，为什么派遣皮达可夫去加拿大您就可以说是不谨慎。

3. 借口“危险”等等来掩饰自己不愿意执行中央关于派遣皮达可夫同志的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我认为这样对待中央的决定是极不诚实的和没有分寸的。迄今为止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风气。

致同志的敬礼！

谢·奥尔忠尼启则

附言：鉴于皮达可夫同志是受政治局的派遣以及彻底解决问题

^① 见本卷文件No07986。

要靠政治局，我认为把您的信抄送政治局是必要的。

谢·奥尔

1927年3月11日

№07994

托洛茨基就哈萨克问题致索柯里尼柯夫

(1927年3月11日)

致索柯里尼柯夫^① 同志

格里戈里·雅柯夫列维奇：

现寄上一札记^②，这是我同两位哈萨克共产党员交谈后写的。

我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哈萨克斯坦内部的关系？至少您可比照土耳其斯坦的情况得出某些结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11日

① 索柯里尼柯夫，格·雅·（1888～1939）——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9月～1921年3月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1921年11月起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2～1926年任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1928年起任石油辛迪加主席。1929～1930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1922～1930年为中央委员。遭镇压。

② 见本卷文件№07995。

No07995

托洛茨基：哈萨克斯坦政策中的民族因素

（不晚于1927年3月11日）

哈萨克同志们在谈到自己的事务时提出以下几点考虑。

1. 边疆地区落后了。应当使这些地区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速度，以使这些地区接近莫斯科，而不是更加落后于莫斯科。我们从而在这里看到了对于发展速度这一普遍问题的独特看法。

2. 在苏联落后地区的基建投资不会很快产生结果。因此，中央机关对这种投资持消极反对有时甚至是积极反对的态度。

3. 哈萨克斯坦参加俄罗斯联邦领导机构之事“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看来，有一种分离出来成立独立共和国的倾向。

4. 对中央的移民政策表示不满：哈萨克群众当初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是因为土地革命；“企图侵占”哈萨克土地立即引起了恐慌。“我们不反对移民政策，但首先应当满足当地居民的土地要求。”

5. “当我们提出有关哈萨克斯坦的土地需求和其他需求的问题时，我们得到的答复是：你们这是想对沙皇政策进行报复。很少有人相信，我们作为共产党员是能够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6. 在各部门内占上风的是旧专家的观点，他们在解决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问题时用的还是过去的习惯做法。

7. 少数民族共产党人成长起来了，但中央派来的领导人对他们仍不放手。“他们认为我们还不成熟。”

8. 在欧洲人共产党员和哈萨克人共产党员之间存有隔阂。他

们老死不相往来。甚至都不在一起下棋。

9. 欧洲人共产党员推行的是中央的总路线。他们不存在原则性的争论和冲突，这可以用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来解释。

10. 少数民族则相反，他们情绪高昂。在少数民族中间出现了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得到了中央派来的领导人的支持甚至扶植。是什么目的呢？“第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第二，为了用内部分歧来转移人们对那些与中央政策有关的问题的注意。”

11. 在哈萨克人共产党员中间有三个集团：一个是以戈洛晓金^①为核心的集团，——这是些一切都按上边指示去做的人；另一个是“左派”集团，该集团也支持戈洛晓金，但是据我了解它多少有些独立性；第三个是“右派”集团，同我交谈的人就属于这个集团。顺便提一下，“左派”集团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赞同“右派”集团的观点。

12. 分歧表现在哪儿呢？“有人指责我们反对贫农支持巴依^②，然而我们愿意采取任何反对巴依的明智的措施，希望他们能给我们清楚准确地指出这些措施。”

13. 戈洛晓金在一次讲话中说：“应当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一次小规模十月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细说；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措施。在哈萨克斯坦的对内政策中，我们既看不到原则性的分歧，甚至也看不到实际的分歧。所有这些都是人为的，目的是掩饰同俄罗斯联邦的关系问题。

14. 同我交谈的另一个人说：“问题的核心在于戈洛晓金集团对少数民族村庄和俄罗斯人村庄持不同的态度。在戈洛晓金看来，俄罗斯

^① 戈洛晓金，菲·伊·（1876—1941）——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任乌拉尔州委书记、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委员、萨马拉省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共（布）哈萨克斯坦边疆区委员会书记。1933年起任国家总仲裁人。

^② 巴伊是中亚一带的大财主、大地主、大牧主。

富农已经相当软弱无力和俯首贴耳；巴依则很少受到触动。因此应当在少数民族村庄中进行十月革命。”换句话说，戈洛晓金是在鼓吹在俄罗斯人村庄保持内部和平，而在少数民族村庄则进行国内战争。

15. 我们受到官僚主义的压制，这种官僚主义由于欧洲人共产党员和哈萨克人共产党员之间存在隔阂而更加令人厌恶。恐惧、虚伪、告密起着很大作用。

对形势的这种分析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当然，关于俄罗斯人村庄和少数民族村庄的指示尤为重要。这里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右派”被指责有富农倾向。这是否正确呢？也许一些行政领导人根本否认有富农倾向存在是为了更容易地在落后地区揭露这种倾向，以使用这样的方法为自己挽回左派的声誉并有利于自己使用行政命令手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说，边疆地区的俄罗斯人共产党员应当成为帮手。有一些这样的帮手不让他们所“帮助”的人说一个不字。

总之，我认为，由于环境本身的小的分化，共产党员中间的思想派别必然具有不稳定的、多变的性质。这样就更容易划分“右派”和“左派”。然而，绝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同中央的官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地方上会出现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

最好是把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中的年轻有为的人派到境外去，以便能更好地了解阶级斗争。他们在我们这里能很快获得国家行政管理思想。

列·托洛茨基^①

[1927年3月初]

^① 日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根据戈洛晓金在哈萨克斯坦开始工作的时间确定。——列·托洛茨基注

No07996

托洛茨基就皮达可夫出国事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7年3月18日)

尊敬的同志：

1. 在预期皮达可夫同志将获得正式签证的这段时间，我没有说过派他去美国是不谨慎的。美国政府知道该发给谁签证。如果美国政府发了签证，那么在美国是不会发生任何反对皮达可夫的大的运动的。大资本主义报刊是非常守纪律的并且会考虑到皮达可夫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政府接待的苏联的非正式代表。

然而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美国政府拒绝发给签证。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此人是俄国白卫分子，提出拒签的理由（当然是非正式的）是：皮达可夫正是那个判处“俄国优秀公民”死刑的人。皮达可夫在美国拒绝发给签证之后去加拿大，会被美国政府和警察局认为是公开挑衅。因为没有人会当真认为皮达可夫被派到加拿大是为了处理加拿大事务。他会被当作政治走私者。在这种情况下报刊对皮达可夫的攻击不是反政府的行动，而是相反，是维护美国的“威信”。美国报刊会进行中伤，这一点已为1906年它们对高尔基的态度所证明，当时还无法指责高尔基判处“优秀公民”死刑。可以肯定，皮达可夫去加拿大——在美国拒绝发给他签证之后——会给在美国的俄国白卫分子掀起大规模中伤皮达可夫的正式活动造成极其有利的形势。

所以我认为，皮达可夫这种通过加拿大到美国的“走私”之行，只会使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恶化并有利于俄国白卫分子策划中伤

活动和暗杀活动。美国的舆论在这种情况下会掩饰他们的活动。

当然，苏联重要工作人员的每一次外交或其他旅行都有一定的风险。问题在于每一次这样的风险是否值得冒。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美国拒绝发放签证后造成的形势下以及在上面提到的拒绝理由的情况下去加拿大在政治上是不适当的，而且会大大增加个人的风险。

2. 您说我掩饰不愿意执行中央的决定，不诚实和没有分寸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和没有根据的。如果说我在给您的信中对我认为是错误的决定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或忧虑，那么这里怎么谈得上不诚实和没有分寸呢？

3. 虽然我绝对不认为自己的信具有正式的性质，但是你把我的信转交政治局，我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18日

No07998

托洛茨基：我们能取得经济独立吗？

(1927年3月19~27日)

首先应当取得共识的是对独立的理解：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经济，还是不可战胜的强大的经济？怎样理解独立或自主呢？不言而喻，对独立的这两种解释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工业的所有基本部门不得到发展，不实现电气化，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实力。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在近几年里建立起我们不需要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不需要我们的完整的和成比例的所有经济部门。如果我们走这条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积累在数量过多的新产品、新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这样就会把我们的发展速度真的降低到乌龟爬行的地步。走这条路我们必然会崩溃。衡量我们经济政策的基本标准应当是速度——积累的速度，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

然而说到底，这一发展应当使我们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即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完全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根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过这种独立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可能性更小，因为社会主义将建立在比资本主义技术先进得多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扩张的意图）意味着生产力在一个国家内受到限制，那么这种情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就更加严重。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反动，正是因为这一理论使我们从资本主义尤其是其帝国主义阶段已经达到的水平向后退。国际主义的基础不是空洞的

原则，而是新的技术同各民族国家范围的不适应。由此产生的结果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帝国主义战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人们有时将美国抬出来作为工农业平衡发展的例证。然而，第一，社会主义的任务不是城市和乡村的平衡发展，而是消除城乡的对立；第二，美国从来都不是封闭的经济，而现在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作为美国工业化的基础的是农产品的大量出口。现在在美国的金融资本和工业需要国外市场。美国在使世界各国不同程度上依赖它的同时，自己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依赖性。如果无产阶级在美国掌握了政权，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一发展往回拉即退回封闭状态。

有人试图说明，似乎最大限度地发展我们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是我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论据，这种说法不仅是荒谬和不诚实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对于这一问题我大约在两年前就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的我的题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作了相当明确的阐述。这里我不得不引用一大段能使我们一下子切入问题实质的话：“但我们‘长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不会包含其他的、更严重的危险吗？在发生战争或封锁的情况下我们不会面临无数的生命线随之中断的危险吗？不能忘记，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极端仇视，等等，等等。这种想法许多人都有。在生产者中间可以找到许多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封闭’经济的拥护者。应当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当然，借债也好，租让也好，对进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加也好，都有一定的危险。由此可见，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能掉以轻心。但还有相反的危险，而且一点儿也不小：这种危险就是延缓经济的发展，就是比积极利用一切世界资源所能达到的速度要缓慢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关于我们‘长

人’世界市场后会遇到战争危险或封锁危险的论据过于空洞和抽象。既然包括一切形式的国际交换会使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增强，那么这种交换也会使我们更有力量对付封锁或战争。至于我们的敌人还会利用封锁或战争来对付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然而，第一，我们国际经济联系的形式越多，我们的潜在的敌人就越难破坏这些联系。第二，即使最终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比在封闭经济下以及由此导致发展缓慢的状态下强大得无与伦比。”接下去说：“世界劳动分工不是一个可以不予考虑的因素。我们只有善于利用世界劳动分工的条件产生的资源，才能全力加快自己的发展。”我希望，这些话能对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其中包括布哈林关于我只谈我们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但忽略了我们力量的增长的说法作出极其准确的回答。

顺便说一下，布哈林反对我的论战几乎完全是按这个模式组织进行的。他取的不是我的思想即我所叙述的有内在联系的思想，而是使用一种只能称作文丐的手法：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里摘取一句话或片言只语，再随便补充几句什么，然后就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句话再加上布哈林自己的一些东西宣布为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从我的未经核对的速记记录中摘取个别词句——完全不顾我的讲话的明白无疑的涵义——然后从这些词句中造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充其量是布哈林本人颠倒过来的观点，但绝不是我的观点。

如果说同世界市场的不断增长的联系和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希望，那么关于超工业化、关于力图使我国工业超速发展的指责意味着什么呢？关于那种速度即一方面是“乌龟爬行速度”，另一方面是“超工业化速度”的整个争论意味着什么呢？远不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成功的争论，而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道路有望成功的争论。我之所以要提出和强调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是因为，第一，这种依赖符合现实情况，第二，只

有对这一现实情况有明确的认识才能理解速度问题。大约两年前我在《真理报》上写道：“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第2版第63页）。为什么反对不学无术的封闭经济的空谈就是悲观主义呢？为什么反对“乌龟速度”的反动昏睡理论就是缺乏信心呢？既然我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只有善于利用世界经济资源才能全力加快自己的发展，那又怎么谈得上向资本主义经济投降呢？

其实，说我们的发展将导致独立，即实现各经济部门全面的内部平衡并摆脱必须进出口的局面，这有什么根据呢？这根本没有任何根据。相反，这同世界经济发展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所有趋势是根本矛盾的。

我们并非很早就理解这一点的。我们根据这一观点评价最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并预言今后帝国主义战争仍然不可避免。我们根据这一观点在1923年接受了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欧洲联邦和我们苏联必将联合为一个经济整体。最后，我们认为，苏联是连接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和亚洲联邦的大桥。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认为自由的印度和社会主义的英国将会过封闭的、互不依赖的生活。它们之间的财富交换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这种交换在推翻英国资产阶级之后仍将保持并将在一个大联邦的范围内进行。这一点适用于我们的北印度——西伯利亚。开发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这是巨大的国际任务。德国和英国的技术、丹麦的农业经验都将在这里得到应用。然而这里所指的当然不只是一个西伯利亚。库尔斯克的磁铁矿藏，乌拉尔的钾矿藏，我们所有的巨大资源都需要使用国际积累和世界技术。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电气化任务。

我们并非很早就理解这一点的。可以说，斯克沃尔佐夫-斯捷

潘诺夫^①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别关注下所写的关于电气化的书，极其鲜明地表明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包括我国的电气化计划的国际性质。请看该书第六章的论述：

“仅仅在几年以前对问题还是这样看的。从那时以来，世界技术或世界经济发生了哪些足以使我们根本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把对我们的理想（我们大家四五年以前把它称作小资产阶级理想）的否定叫作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的变化呢？

但有人说，这些推测都是建立在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飞速发展的希望之上的。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的欧洲我们不需要任何“独立性”。同社会主义的欧洲的关系是建立在最有效的（能产生良好结果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兄弟合作。资本主义的欧洲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对它应当保持独立性。这样提问题表面上看似有说服力，实际上是错误的。对近几年的瞻望表明，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不断增长，不仅将绝对增大，而且将相对增长，就是说，同整个经济周转相比对外贸易额将不断增加。由此可见，最近的时期将成为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增加和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同步提高的时期。什么时候开始向封闭状态转变呢？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进行发展，“长入世界市场，以便以后转向封闭经济呢？欧洲能否做到提前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呢？为什么现在当我们在经济上极端落后的时候长入世界经济对我们却没有致命危险，而过5年或10年之后当我们变得相当强大的时候倒需要同世界经济保持独立呢？这有什么根据呢？相反，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将年复一年地提高我们对于国际交换的兴趣。这一交换

^①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伊·（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主义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真理报》副主编。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

将通过对外贸易垄断的方式得到严格调节。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内交换将具有计划性质。在这两种体制之间不会产生任何断层，即使产生断层，我国的经济在其各部门保持平衡的基础上也能运行。相反，同资本主义各国的进出口在正确调节下的增长，将为未来即欧洲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和生产时的商品和产品交换准备好条件。”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在列宁的指导下写道，一国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这是正确的。在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总是存在反动的倾向。把生产力赶入民族的范围——是根本反动的倾向。即使是沙皇俄国的生产力也超出了这种范围。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发展的条件下之上。

国有工业应当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然而对于我国目前还极其落后的工业来说，起主导作用的是世界工业。我们生产的产品比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贵 1.5~2 倍，我们必须赶上它们，学习它们的技术，而且它们的技术也不会停滞不前的。这就是速度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没有想过学习世界技术。我们还根本没有提出生产问题。当时的问题是在农村找到粮食，有效地利用一切储备，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卫自己。庸人们把这样的共产主义鄙夷地称作消费共产主义。但没有消费共产主义就不能拯救活的生产力，就不能保证过渡到下一阶段。

恢复过程初期，任务是让现有的技术设备满负荷运转，不管这些设备的有形磨损多么严重或结构多么陈旧。每开动一部机器就意味着前进了一步。

在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的机器都开动以后，折旧问题就提上了日程。为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必须购买新的机器来代替磨损的机器。此外，必须购买新型机器来代替老式机器。世界市场日复一日地控制着我们在整个生产中和每个单独的部门中的落后状态。通

过什么途径呢？通过价格的变动。斯大林同志企图把我关于世界经济控制着我们的思想说成是什么道威斯体系并问道，我是否是指以租让形式向外国资本所作的某些特别的让步等等。对于这样提问题只能表示惊讶。问题的解决不是靠道威斯体系，而是靠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列宁说，世界市场将对我们进行检验。我说的控制同列宁所说的检验是一个意思。其实这种检验是接连不断的，并且是不由自主的。如果在某个部门内资本主义技术取得新的和大的进步，而我们还停留在旧的方法上，那么这将表现为价格再次拉开，也就是说，表现为我们的比重减少，我们的阵地削弱，我们更易遭到种种干涉的损害。可见，我们必须赶上世界技术。

马克思把机器有形磨损的折旧同机器无形磨损的折旧区分开来。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机器在其有形磨损远未达到极限就不再使用了。当然，与先进企业并存的还有后进企业。但先进企业的资本家不得不对自己的机器的无形磨损进行折旧。这是对技术进步的支付。这种支付通过降低成本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果资本家不能及时更新无形磨损的设备，就会从一流水平退到二流和三流水平，而在某些情况下会被完全排挤掉。这一点也适用于某些国家的一大批工业部门和整个工业。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表现在我们不仅要向我们的发现和发明看齐，而且向世界技术的进步看齐，不仅要对我们的设备的有形磨损，而且要对无形磨损进行及时的折旧。

当然，不应当把这理解为我们应该立即在一年或者二年或者三年内解决这一任务。这样提问题是幼稚的，但我们的发展速度应当能使我们在技术上越来越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检验我们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否缩小或是扩大，就是说，我们所占的比重是否增加或是减少，最好的尺度就是价格的比较动态。由此可见，国际对此控制问题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是什么“乱扯国际因

素”，而是由我们的状况即我们是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所决定的，就是说，“我们服从于世界市场，同这个市场联系在一起，离不开这个市场”。

可见，当列宁谈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似乎把这一问题从国际革命中划了出去，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其同世界革命对立起来，就像部分同整体相对立一样，在这些情况下他指的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简单和狭窄得多但却非常迫切的任务：在国有化工业的基础上恢复经济过程，其中包括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保障，这一点对苏联尤为重要。过去斯大林也是这么理解的。

引文 [斯大林的]

这样一来就说明，试图引用这一类引文并证明在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然而还有另一类引文即列宁明确无疑地谈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的话。这样的引文为数不少。但它们的依据全都是这样一个前提，即世界革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近一个阶段同其会合，我们今后将在同其他更发达的，已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进行兄弟合作的情况下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列宁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场合都从未撇开无产阶级革命在其他国家的胜利这一决定性因素来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当他谈论完全和最终胜利时他指的不是避免武装干涉的保障，而恰恰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即无阶级社会，他一向认为这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内是不可能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传统是完全一致的。关于社会主义完全和最终的胜利，他提出：（1）夺取政权是第一阶段，（2）恢复城乡之间的经济周转即恢复国有工业是第二阶段。

把最终的或完全的胜利理解为免遭武装干涉的保障是毫无道理的：武装干涉的危险恰恰存在于最初的阶段，而到了完成社会主义

建设的阶段，武装干涉的危险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

列宁这样看待社会主义建设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实质上，列宁的每一个讲话同我们党的纲领、同党的共青团纲领一样，充满了这种前不久在我们中间还完全无可争辩的国际观点。如果说列宁没有随时随地、没有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都强调我们胜利的国际局限性，那么这只是因为列宁认为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因而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列宁1921年2月6日在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所以工会……正在建设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新国家，虽然它是少数，但它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因为我们得到千百万自食其力的人的支持。”^①

可见，这段引文是说，我们的工会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因为工会得到千百万农村贫民和全体农民劳动群众的支持。如果孤立地来看这段引文，它似乎对于证明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是相当有利的。至少这段引文在任何方面都不亚于为此目的而引用的其他引文。它认为工人同千百万劳动者的紧密联系是共产主义社会胜利的条件。但列宁在上述讲话的开头说道：

“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工人在国际范围内也必须共同行动起来。自从1917年我们同俄国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作斗争时起，自从1917年末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时起，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②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24页。

②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18~319页。

列宁紧接着这些已经将问题讲明的话说道：“三年多来，我们最主要的困难在于，西欧的资本家结束了战争，推迟了革命的爆发。”^①

讲话的以下部分全都用来证明资本主义毕竟患有绝症。世界革命在最近的将来就将到来，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工会如果能够带领千百万劳动者跟自己走，它就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列宁始终如一的思路。他可能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没有强调指出他在对服装工业工人的讲话中说的那类话，即“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更没有否定我们取得胜利的这个条件，他称其为根本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坚持这一点似乎让人甚至感到奇怪。列宁在1918年初所说的以月计算的喘息时间，在后来特别是从1923年秋天起即德国无产阶级遭受最沉重的失败之后，变成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列宁本人对喘息时间的看法随着事态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并日益具体化。他开始谈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应当保持10年、20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正确关系，认为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条件。发展速度的变化——是有巨大意义的事实。我们的所有困难和内部争论其实都来自速度的减慢。但发展速度减慢本身并未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同世界革命的总进程割裂开来。用列宁的话来说，我们仍然是一个环节，而不是独立的链条。

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中说：“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在一个国家内要完成这样的事业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②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第319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40卷，第2页。

是的，我们一向强调这一点。我们没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仍然不打算改变问题的提法：“在一个国家内要完成这样的事业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布哈林直到现在还认为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纯粹是形式问题。他没有放弃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提出的脱离实际的单独发展模式。他不明白，我们的发展速度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他不明白，除了军事干涉以外，还有依仗技术优势进行的力量要强大得多的低廉价格干涉。他不明白，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根据“足够的”国内发展速度在独立自主的结合的基础上制定控制数字，而是不得不使整个控制数字向对外贸易数字看齐。我们依赖于世界经济的这种现实意义，布哈林没有领会，没有考虑过，没有明白。当然，如果要布哈林作出回答，那么他会开始“承认”我们依赖于世界经济；但他的所有论据、结论和展望全都是建立在封闭经济模式之上的。

然而，关于似乎我没有看到的我们通过依赖走向独立的问题究竟怎样呢？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布哈林试图使人相信，似乎我的展望就是依赖性不断加深，也就是说毫无希望，也就是说怀疑一切，也就是说丧失信心及其他一切与此类似的说法。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该是抛弃的时候了！我在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明，我们恢复了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这种依赖将不断加深，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这条道路是惟一一条能使我们得到增强，使我国的经济比重得到提高，因而使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可能发生军事干涉和不断发生的以低廉价格进行“干涉”的道路。我解释说，在当代条件下关于民族经济独立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古老的中国方式得到解决，我以资本主义的德国为例作了说明：近几十年来德国的经济同欧洲和海外国家的经济最紧密地溶合在了一起，长期依赖于外国供货人和外国进货人，当德国遭到军事封锁，

同世界经济的一切重要联系一下子就被切断之后，德国表现出了罕见的生命力，同一大群形形色色的敌人对峙了整整4年。应当怎么解释这一历史奇迹呢？“德国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建起了强大的工业，并靠这一工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德国的外贸周转以及同国外市场包括海外市场的联系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战争一下子把这一切都切断了。德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几乎完全的经济闭塞状态。然而整个世界都亲眼看到了这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惊人的生命力和耐力。以前争夺市场的斗争培育了德国生产部门的高度灵活性，德国在战时有限的国内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这种灵活性。”（《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第63~64页）由此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世界经济的“独立”，而是高度的劳动生产率，而这样的生产率只有在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而快速发展又要求广泛而巧妙地利用世界市场资源。换句话说，我们的方针不是独立的乌龟爬行速度，而是尽可能快的发展速度。这种方针有什么悲观主义呢？如果说我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反对抛开国际因素这一反动透顶的观点的，我又怎么可能不承认我们通过国际联系和依赖会变得更强大呢？

我在另一个地方借用我国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一个例子阐述了我的思想。我国有大约12家托拉斯已经同著名的外国公司签订了技术援助合同。我国的托拉斯根据这些合同取得了专利、图纸和有关的外国公司的指导。这样一来我国的产品得到了改进并降低了价格，我国的企业为此而向自己的资本主义合作伙伴付出了很大的一笔贡款，然而这笔贡款同我国国有工业得到的好处相比要少得多。以前，机器制造托拉斯独立生产涡轮机，其中设计费用占涡轮机成本的7%。如今该托拉斯在按外国图纸生产涡轮机。资本主义公司的代表有权对生产进行监督，以防止生产其他型号的涡轮机并从每

台涡轮机上抽取贡款。这无疑是相当严重的依赖。但设计费用因此只占涡轮机成本的2.5%，而且涡轮机的质量得到了提高。怎么做有利：是独立生产质次价高的涡轮机还是依赖别人生产质优价廉的涡轮机呢？问题本身已经作了回答。这里所谈的托拉斯的道理可以而且应当适用于我国的整个经济。这种可以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依赖——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一种进步的依赖。那种让我们以乌龟爬行速度前进的独立，而且还洋洋自得，是一种反动的独立。这种独立的哲学是反动的哲学。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19~27日

No08000

托洛茨基：不肖徒辈

（1927年3月）

革命前的俄国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研究各个阶级包括统治阶级的某些民族部分的政治本性的试验场。在沙皇俄国各种形式的压迫交织在一起：农奴制等级压迫，官僚警察压迫，资产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其中民族压迫也同等级和阶级压迫形式交织在一起。被压迫民族也是社会历史阶梯中的一个完整的梯级。某些被压迫民族就其经济和文化水平来说不是低于而是部分地高于统治民族（芬兰人，波兰人，部分犹太人等等）。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高加索和亚洲有几十个民族还没有摆脱游牧生活，或者是刚刚步入定居生活的第一个阶段。

无论如何，按照常规可以说，除大俄罗斯民族以外的所有民族都处于错综复杂的压迫之下，因为这里除了民族压迫还有各种其他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如果抽象地推论，可以认为，沙俄帝国境内的波兰、犹太、亚美尼亚、德意志或鞑靼资产阶级要比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坚决、激进、革命。然而现实推翻了这种推测。而且不是偶然的。

问题在于民族压迫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民族压迫是通过阶级实行的。无疑，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更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并且首先走上了群众性斗争的道路。华沙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很长时间走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的前面。定居下来的犹太手工业

工人首先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早在1905年革命时期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斗争就具有最革命的气势。

然而正是这些情况麻痹了民族资产阶级。例如，可以说，波兰资产阶级因此才长期依附于专制制度，而波兰无产阶级则一直站在革命的前列。

由此而得出了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结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

No 08001

斯米尔诺夫：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总结 关于价格政策问题^①

（1927年3月底）

价格政策问题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不仅从这个问题在我国整个经济政策中的意义的角度来看是这样，而且早在1923年这个问题就是反对派和中央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主要之点。中央断定，反对派想通过工业品高价的政策从农民身上取得更多的资金，当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反对派的基本论据是，实行低出厂价（成本加上“最低利润”）的政策不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低廉的价格，只有增加工业品的数量（这是一方面）和在改进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降低工业品的成本（这是另一方面），才能真正完成降低物价的任务。没有这两个条件，降低出厂价就不能使零售价得到降低，而只是使资金从工业流向商业，不能给消费者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工业资金的缺乏既不可能足够迅速地扩大生产，也不可能改进技术和降低成本。因此，与中央的路线相反，反对派一直认为，出厂价应当根据市场的行情而不是成本来确定，所有的市场利润应当用来扩大生产和改进工业装备。

近年来的实践完全证明反对派的这些论点是正确的。尽管开展了“降价运动”，价格却没有丝毫降低，相反，零售价格从1925年7月起开始上涨，到1926年5月上涨了25%，这一时期的物价达

^① 看来，此件是弗·米·斯米尔诺夫写的（“民主集中派”。——托洛茨基注

到了1923年危机时期的水平。从1926年的5月到10月，零售价格降低了8%，而到1927年1月又上涨到了5月的水平。在这种上涨中还没有算上1925~1926年度下半年产品质量的下降，如果算上这一因素，那么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还要大。批发价格也在上涨，尽管速度不快：从1926年7月到1927年1月批发价格上涨了7%，这里甚至仍然没有考虑质量下降的因素。

最后，托拉斯的出厂价从1924年11月起一直处于同一个水平上，只是略有上扬，大约涨了1.5%。这里仍然没有算上质量的下降，质量的下降幅度为：在1号托拉斯的呢绒毛纺织工业中，毛织品中的人造毛数量变化如下：1924~1925年度的第1季度为16.6%；1925~1926年度的第1季度为32%；1926~1927年度的第1季度为36.2%。2号托拉斯生产的价值4卢布70戈比的呢绒在1925~1926年下半年之前含有6%的人造毛，而在同年下半年则为44%。该托拉斯生产的另一种价值为4卢布80戈比的呢绒在质量下降之前含有30%的人造毛，而在质量下降之后为50%（见1927年2月16日《工商报》刊载的《纺织工业的品种问题和质量》一文）。1926年秋天，由于原料涨价，许多产品的批发价格都直线上涨：马哈烟上涨19.5%，葵花油——[……]，阿斯特拉罕鲱鱼——75%，肥皂——24%。在工人的生活费中，这些东西的开支占20%以上（见柳比莫夫在全会上的讲话）。

后来真相大白，标准价格的政策当然不可能规定所有产品的价格，而只能涉及畅销品种，这样就导致托拉斯增加滞销商品的生产 and 减少畅销产品的生产，从而使畅销品种的商品更加匮乏并造成滞销商品的积压。上面提到的《工商报》上的那篇文章谈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低档品种质量的下降使得这些商品根本不能使用，于是众多的消费者不得不转向使用较昂贵的品种（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所谓高档纺织品需求

增加的原因，而那种认为这种增加是由于居民生活得到改善的虚假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在全会上的争论中得到了澄清。柳比莫夫认为品种完全不适应需求，他说：“亚麻双线布、粗帆布和麻布极其缺乏，可是手帕和其他桌布商品却绰绰有余。需要的是粗毛呢、农民商品，而提供的却是明显生产过剩的劣质的半毛半棉织物。”“消费者要买宽幅亚麻布，供给他的却是窄幅的”，“为了得到标准价格为 100 卢布的短缺商品如瓦垄铁，就得购买价值 350 卢布的其他商品”等等，等等，对“含硅制品”（玻璃器皿和瓷器）“销售”情况作过调查的罗伊津曼也指出了这种现象。“工厂开始限量生产日用必需品（杯、碗、壶）并靠压缩这些产品而扩大非标准价格的、利润较多的产品（灯具、瓶子、镜子）的生产，而这些产品本来就已过剩。”古比雪夫在全会上作的副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那些能带来较多利润的品种被置于优先地位并大量生产，尽管这些品种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市场上并无优势可言，即由于价格昂贵而无人问津。”不难看出，品种的这种变化打击的正是大众消费者，由于所有这一切，我国和国外在工业品价格上的差距大大超过了战前的差距，而最主要的是，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与战前相比，我国价格和国外价格的比例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米高扬报告中所引用的下面这些数字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苏联的价格为 100，那么最主要国家的价格为：

	1913 年	1926 年
英国	64	43
德国	55	35
法国	66	40
美国	59	42

《经济生活报》（3 月 9 日第 56 号）上刊载的捷连季耶夫的《纺织工业的发展》一文，提供了英国和我国在 32 支纱价格动态方

面的对比关系（每普特卢布数）：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苏联	47.84	41.04	41.04	41.04
英国	38.26	32.85	24.91	18.05

纬细平布的情况也一样（每米戈比数）：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苏联	32.01	27.5	27.5	27.5
英国	20.01	18.2	15.9	13.1

可见，在工业品的价格方面，我国经济不仅没有赶上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急剧拉大了同资本主义经济的距离。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价格政策是极其荒谬的，从米高扬开始，所有的报告人在全会上都认定，在我们以往的运动中，我们在降低价格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绩，谁都不否认，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在年复一年地扩大，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计，在出厂价格上的零售加价平均为：1923～1924年度——27.4%，1924～1925年度——43.4%，1925～1926年度——59.8%。^①然而，全会仍然明显地不愿承认我国价格政策的破产，决定继续实行

① 这是私营商业方面的数字。在合作社商业方面缺少系统的数字，而且提供这样的数字也极其困难，因为比起私营商业来，合作社商业的商品品种及其质量受价格政策的影响常常发生相当急剧的变化。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计（见《工业的生产财务综合计划》第109页），如果私营商业1925～1926年度的加价超过战前加价的两倍，那么，考虑到合作社国营商业的作用，整个零售商业的平均加价超过战前一倍多（43%）。根据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得出的也是与此相近的结果，布哈林在莫斯科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的结束语中援引了这个报告（《真理报》1月15日第12号）：“合作社价格仅仅比私营价格低13.6%。这就是说，如果私商在1925～1926年度以出厂价格160%的价格出售商品，那么合作社就是以出厂价格138%的价格出售商品，即合作社的加价几乎比战前多一倍。最近一个时期人们议论纷纷的合作社的巨额利润完全证明，合作社尤其是基层合作社，在加价方面并不比私商逊色多少。”——斯米尔诺夫注

原来的政策并通过了关于将出厂价格降低 5% 的决定。按这样的幅度降低出厂价格，据古比雪夫计算，将使工业损失大约 15000 万卢布，而通过的工业生产财务计划根本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古比雪夫担保，工业靠进一步降低成本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所有资料（例如见 3 月 24 日第 67 号《真理报》上刊载的洛博夫《成本应当降低》一文）都表明，降低成本的工作将比计划预计得要糟糕。因此，这一损失必然导致一方面建设工程无法完成，另一方面对工人构成新的降低计件工资的压力。对于这样一个实际上破坏了本来就不足的基建计划的决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都投了赞成票。

除了工业品价格政策问题，在日程的这一项中，关于粮食收购问题也值得讨论。米高扬在报告中声称，以往几年在这方面出现的困难已经得到克服，而在结束语中他竟说什么：“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已经转到列宁（1921 年）5 月的立场上，即实行自由的地方商品流转，但在全俄范围内我们没有实行粮食的自由买卖”。确实，他在报告一开头本应承认一点，即在某些方面我们向后退得比 1921 年还远。在西伯利亚，有 3500 万普特潮湿的粮食未运出来，而且在春天之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运出来。米高扬说：“我们开动了所有的烘干设备，但这未必能够保藏好所有的粮食，使其不致腐烂。自建立粮食人民委员部以来我们第一次面临大批粮食腐烂的危险。”这个问题在全会上没有引起任何争论，只有斯米尔加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正确地指出，这方面并非尽如人意。如果说我们今年得以大幅度降低粮食价格，那也只是由于下列原因：（1）毫无疑问，我们今年收购的余粮要少于去年。例如在北高加索，尽管又一次获得了好收成，但到 3 月 1 日，收购的粮食甚至比去年还少，今年收购了 12300 万普特，而去年是 12900 万普特。结果，粮食都集中到了富农的手里。3 月 23 日的第 66 号《经济生活报》上写道：“对

二月局势作过观察的人无一例外都强调指出一个事实，即剩余的商品都集中到了农村的富裕阶层手中，这些阶层还靠收买抛到市场上的粮食扩大自己的储备。”农村中的富农充实了自己的粮食储备。(2) 我们的计划是 68000 万普特，从我们对粮食的需求来看，特别是如果考虑到粮食都集中在像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样的地方，从这些地方把粮食运到消费市场非常困难，而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可能运出来，所以这个数字是不足的。这一点从下面的情况中就可以看出来：(a) 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原定为 5000 万普特，现商业人民委员部预计削减为 3000 万普特，就这还得拿西伯利亚的潮湿粮食来顶数，而且产地远离铁路线。(b) 消费市场一直处于极其紧张的状况。粮食收购价格与去年相比有相当大的降低，但与此同时消费地区的粮食价格甚至有所提高。这就是米高扬成功的秘密：他成功的原因完全在于对有利形势的掠夺性利用，即在大丰收时制订低的收购计划并以此来迫使贫农按低价出售粮食，而城市消费者则按高价来购买粮食。他对粮食市场实际上究竟控制到什么程度，从下面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个垄断者尽管自夸他消灭了“全俄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降低亚麻种植地区的粮食价格，虽然为此作出了一个又一个决定。

这个掠夺农村（低价收购）和城市（高价出卖）的运动能否取得成功，现在很难说。从 3 月 1 日到运动结束还要收购大约 9000 万普特。由于西伯利亚的一部分粮食极有可能遭到损失和在全苏范围内粮食收购任务的分配不顺利，所以可能不得不提高收购数量，而实际上二月和三月的收购数量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收购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但农民手里有粮食，价格明显地呈现出上涨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人民委员部有可能为充实粮食储备不得不提高价格，从而破坏整个粮食低价政策，并且使富农得利。

由于这个政策，工业的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进一步扩大，就像米高扬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由于自己的价格政策，中央在这里也得到了与自己的本意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对一些特殊的农产品（亚麻、葵花籽、大麻、油料、鸡蛋、羊毛、小型皮张）产生了尤为有害的影响，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收购量低于去年（拿亚麻来说，我们的收购量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二），而私商的收购价格高于国家收购部门 30~40%。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农业原料价格的这种上涨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一样，是通货膨胀即过量发行货币的结果，今年的通货膨胀由于低廉的粮食价格而有所遮掩，而粮食价格低廉是由于又取得了丰收和上面所指出的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政策。除了粮食以外，说实在的，价格的上涨具有普遍性。米高扬在这里也宣称，消灭这种剪刀差只能靠降低工业品价格，但绝对不能靠提高农产品价格。但这显然行不通，因此这个愿望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甚至国家的农业原料收购价格也在上涨。收购价格已经上涨的包括葵花油、鸡蛋、烟草、亚麻（上涨了两次——第一次涨了 30 戈比，现在，三月份，又涨了 70 戈比），这样一来，能把亚麻保留到 3 月的比较富裕的农民和收购商得到了好处。同时，由于面临完不成生产计划的危险，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 3 月 8 日承认，“必须提高所有经济作物的价格”（见 3 月 9 日第 56 号《劳动报》上刊载的《缺少工业原料》一文）。这样一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提高农业原料价格，但它不得不正视自己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后果并走上提高农业原料价格的道路。

我们现在存在着缓慢的通货膨胀，这从出口问题中看得最清楚。米高扬的报告确认，在我国的全部出口货物中赢利的只有 56.5%，亏损的有 29.6%，不亏不赢的有 13%。据米高扬统计，亏损的是：鬃、黄油、鸡蛋、肉制品及其他农产品，铁矿石、火柴、木材、瓷器、废布、纺织品、罐头。赢利的只有粮食、石油和

猛。我国的价格即使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发指数也在上涨（从1925年9月至1926年5月我国的指数从174上升到194，即上升了11个百分点以上，而后来由于降低粮食价格，又有所回落，到7月为182），但世界指数在同一时期几乎不断地下降（从1925年9月的148.2下降到1926年7月的133.4即下降了6个多百分点）。这样一来，如果说1925年9月我国的1卢布按世界黄金计算约合85戈比，那么到7月1卢布只值76戈比，而4月，在降低粮食价格以前，降到了71戈比。（见3月5日《经济生活报》上刊载的考夫曼的《降价和出口》一文）。

因此，米高扬声称今年在我国的出口方面发生了转折，纯粹是说大话。他所说的今年第1季度的出口额（21200万卢布）超过去年同期出口额（18100万卢布）完全是由于粮食出口的增加。相反，农业原料的出口却年复一年地急剧下滑。在同一次全会上卡敏斯基援引了下列数字：1924~1925年度农业原料的出口额为11500万卢布，1925~1926年度为9300万卢布，1926~1927年度预计只有6900万卢布。

因此，中央价格政策的结果将是：

(1) 提高全部工业品价格——出厂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结果工人的生活费不断增长，而中央在面临提高名义工资的问题时总是要求工人等待价格的降低。与此同时工业品的成本也在提高。

(2) 工业品的质量下降得极为严重，实际上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冒牌货和对消费者的欺骗。这种下降的政策不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政策，而是小商贩的政策——挂羊头卖狗肉，以便从消费者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

(3) 除了粮食以外，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

(4) 农村富农的粮食储备增加。

(5) 出口的亏损不断增加和特殊农产品的出口减少。

(6) 我国的价格和世界价格拉开距离。

(7) 存在缓慢的，但却是不断的通货膨胀。

反对派领袖根本不打算对中央的政策进行比较系统的批评，也不打算发挥自己的正确的纲领。相反，他们尽可能地掩饰自己的立场。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方法相当简单和相当笨拙：反对派保证，他们从不支持提高价格的政策，同时却闭口不谈他们指的究竟是什么价格——是出厂价格还是零售价格，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他们同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任何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声称：“在这种形势下谈论某某人有意或打算坚持提高价格的方针，无异于说胡话或竭力引诱别人说胡话。”这样做是否意味着放弃反对派 1923 年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对于这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托洛茨基避而不答，而是给自己留下一条小小的后路：他对降低出厂价格能否惠及消费者表示怀疑。他接着说道：“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和合作社（请看，多么不容争辩的权威机构）却一致认为——能够惠及消费者。让我们完成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的试验吧。”（仿佛这种试验是第一次进行，仿佛这种试验的荒谬性还没有在实践中暴露无遗。）如果说托洛茨基在这里似乎只是耍了个没有欺骗任何人和没有放纵任何人的外交手腕，那么季诺维也夫则明显地同反对派 1923 年的观点划清了界限：“我从不支持提高价格的政策，我一向支持降低价格的政策。”对他的这个声明只能理解为季诺维也夫现在仍然站在他原来据以同 1923 年的反对派进行斗争的立场上。当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言不发的“外交手腕”时，那么试问，这是什么意思：是转向季诺维也夫的立场还是根本没有原则性呢？在“10月16日”基础上保持统一的反对派是否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在这里采取了某种统一的立场呢？

在基本建设费用问题上反对派领袖也同样决定装作他们站在中

央立场上的样子，并试图从中央立场出发对此问题提出尖锐批评。这一故作姿态的可怜表演也遭到了可怜的破产。托洛茨基决心保护农民使其不受中央政策的侵害——结果误入歧途：他援引了一组完全脱离实际的数字即农民购买工业品比战前多付出 20 亿卢布，从而在这方面同自己最亲密的志同道合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统计数字相去甚远。这一数字是用极其简单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他确定农民购买的工业品总额为 40 亿卢布，并以工业品的卢布价格上涨了一倍为根据，认为一半的钱都是多付出的。接下去他确定农民减税，从免交地主土地租金上得到 5 亿卢布的好处，从而他认为革命使农民每年总共损失 15 亿卢布。雅柯夫列夫没费多大气力就证明这个统计数字是荒谬的，因为这个数字没有考虑到农产品的价格和农民的报酬同样高于战前，如果加上这个因素，那么农民的平衡表上只有 4 亿卢布的亏损。而米高扬则教训托洛茨基说，要振兴工业不能只靠工人自己，一部分开支应当由农民负担，不能把农民看作统一的阶级，而忘记其内部的阶级分化。企图站在中央委员的立场上去打击中央，结果却以中央委员们从反对派的观点出发猛烈抨击托洛茨基而告终。过分“狡猾回避”的策略一般都是这样的结局。

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改选的讲话标志着反对派机会主义者的彻底破产。他在力图把自己装扮成忠实可靠的人时过分强调自己的作用，以致无法弄清这一荒谬的表演何时收场，以及何时开始真正靠近中央委员会。在争论前反对派正确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央的政策对工人的打击越来越大。现在，托洛茨基显然过于欣赏自己关于“不理解”中农的理论，他断定错的不是中央而是……工人阶级。他宣称：“无产阶级并非总是始终如一的。当它具有向心力时，当它感到自己首先是一个阶级时，当小团体的、民族的、地方的东西退居第二位和第三位时，它是积极的。相反，也有团体的、地方的、外省的情绪和倾向占主要地位的时期。现在，离心的倾向暂时

有所加强，这些倾向甚至在这次全会上也有表现，尽管不那么强烈，不那么明显。离心倾向靠向心倾向的削弱而得到加强，这无疑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的积极性。当然是暂时的下降。也许，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在来自右面的危险的影响下已经开始恢复，如果基洛夫同志关于列宁格勒的讲话是正确的话。”

这种费解的胡说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中央偏离无产阶级路线不是小资产阶级阶层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结果，而是“工人队级离心倾向的反映”。原来中央实行的虽然是小团体的，但却是无产阶级的路线。这显然意味着，第二，工人反对合理化、反对低廉的计件工资等等的一切行动，在托洛茨基看来是“离心倾向的反映”，而不是对中央将工人利益同发展生产的利益对立起来的错误政策的反动，尽管这种行动有时采取了荒谬的形式。难怪他声称，这一冲突是“缓冲失败”的必然结果。这已经是斯大林的直接帮凶，因为斯大林要求工人为中央政策的一切矛盾牺牲自己的所谓“小团体的利益”。托洛茨基以自己的威望给斯大林借以掩饰自己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的那个口号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在这之后对托洛茨基在讲话结束时宣布真正停止反对中央的斗争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请看他给反对派规定的应当遵循的方针。他预言：“阶级关系的发展将在一定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并不遥远）使党的多数派不是去反对子虚乌有的左的‘危险’，而是去反对正在迫近的来自右面的现实危险……到那时党、党的无产阶级基本核心、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将采取反对确实在步步迫近的阶级危险的战斗方针，我们对此没有丝毫的怀疑。反对派将在这个共同阵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托洛茨基能够给党和反对派提出的建议只有一条：等待，——等待“候补的革命掘墓人”（他在争论前不久对斯大林的称呼）在救命的右的危险的影响下（这里他甚至既不是指加里宁，也不是指李可夫，根本没有。当加里宁认为这是在说他时，托洛茨基喊道：

“不，我说的是反对来自右面的危险，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开始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到那时再同他并肩战斗。在这之后已经无法说10月16日的举动是一种策略而不是投降了。

10月16日反对派是否被自己的费解的策略彻底弄昏了头，现在还难说。但是，反对派确实确实是误入歧途，看一看反对派在全会上的所作所为，对这一点就不会有丝毫的怀疑了。

弗·米·斯米尔诺夫

[1927年3月底]

No 08003

托洛茨基：德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问题

（1927年4月2日）

亲爱的同志：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德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情况通报》1927年3月1日第5~6期合刊）。这一期使人对马斯洛夫、费舍、乌尔邦斯集团的总面貌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1. 不能不指出，那种认定这一集团宣布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并从事反对苏联的叛卖活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该团体极其尖锐地提出反对威胁苏联的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该团体在给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说：

“我们无疑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支持苏维埃俄国，但支持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改良派阵营的‘朋友们’。”

在给党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说：

“同时我们的确不赞成卡茨、科尔什^①或施瓦尔茨在俄国问题上发表的错误的、非共产主义的观点。”

“我们认为苏维埃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我们不赞成任何关于俄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科尔什），以及在俄国策划“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施瓦尔茨）的言论，我们认为

^① 科尔什，卡·（1886~1961）——1919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1925年任德共机关报《国际》主编。1926年与团结在《共产主义政治》杂志周围的一些人组成极左集团，被开除出党。后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活动。

这是取消主义言论。我们现在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支持无产阶级的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进攻和反对孟什维克的诬蔑运动，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不言而喻的义务。”

公开信援引了左派代表在议会的有关讲话，同极左派明确划清了界限。

诚然，可以认为，这些左派的总方针给世界革命因而也给苏联的国防带来了危害。这种说法没错。这已经是总的政治评价问题了。但列举事实应当实事求是。左派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过去和现在同极左派坚决划清了界限，并提出了一系列目的在于更具体地同威胁苏联的危险作斗争的建议。我认为，从现在或以后有无可能恢复这一团体在共产国际中的席位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实是主要的。

2. 在左派提出的反对干涉的措施（召开运输工人、海员、军工工人代表会议等等）中有这样一个建议：

“立即召开英俄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中的改良派成员——不言而喻——肯定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对‘自己的’、得到他们支持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那时便利用这一点揭露这些叛徒并因此而补上在英国总罢工期间未做的工作，使英国无产阶级认清‘左的’和右的改良主义。”

这个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适宜的。在我国刊物的倡议下，所有共产主义的刊物在最近时期都大谈特谈干涉的危险性。

就像有人先诉我们所的那样，英俄委员会并不是“一具僵尸”，却始终一言不发。英苏两国政府频频交换措辞严厉的照会，英方的照会是对和平的公然威胁，英俄委员会对此一言不发。英国炮轰南京，英俄委员会对此一言不发。如果该委员会还在，它为什么一言不发呢？而如果它已不复存在，为什么对它的灭亡避而不谈呢？我们看到，俄国反对派在英国总罢工失败之后揭露过的、英俄委员会的英方成员在掘煤工举行罢工的整个时期内每天都鼓吹的那种政

策，在这里又一次拙劣地再现。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反正我们现在是扮演了包庇英国孟什维克的角色，列宁曾说他们比俄国孟什维克要坏得多。

3. 在为即将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埃森代表大会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形势作了如下评价：

“改良派对无产阶级影响的增强反映了德国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不仅最近时期的所有国会选举，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工会选举，都表明了这一点。”

接下去我们看到，这篇文章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对德国“稳定”的特殊性作了说明：

“事实上，左派在这次党代表大会^①上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他们没有毫不留情地向党说明 1923 年失败的严重性，没有进行必要的选举，没有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趋势，没有根据这种情况提出当前时期的斗争纲领和口号，而这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同时强调指出纲领性的观点也是完全正确和绝对必要的。”（黑体是我加的）

我认为，这一表白实质上是正确的，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表明左派通过这个问题学到了许多东西。早在 1923 年 11~12 月间就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革命形势的最尖锐时期已经过去；低潮已经开始；这个低潮将月复一月地变得日益严重。布兰德勒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是制订导致无产阶级遭到严重失败的政策罪魁祸首之一。他说，革命形势“在发展”。克拉拉·蔡特金也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左派当时也没有看到失败的严重程度，因而没有预见到整个政治形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转折的必然性。不仅如此，他们由于一

① 在 1924 年春天召开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左派从布兰德勒分子手中夺过了权力。

时冲动而打算把一些人打入“取消派”之列，这些人在当时就已指出这种转折是不可避免的，并提醒人们防止那种在1923年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但在1924年这个绝对稳定的时期却有可能是极其危险甚至是毁灭性的政策的人。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完全正确地指出，由于失败，一方面人们对失败的意义及后果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另一方面在左派阵营中对“当时条件下什么是‘左倾’”出现了——在我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完全错误的理解。”例如，许多左派——按照文章的说法，而我们认为是整个左派——当时都认为“谈论放慢革命的速度是根本不允许的”。这可真是一针见血。“左”倾表现为浮躁不安，不愿意“容忍”这样一个事实即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形势这一次已经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和布兰德勒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当然是殊途同归。布兰德勒力图掩饰失败的规模，指责我们对1923年的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并把自己打扮成对明天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者。左派则继续作出直接革命的展望，因而不得不过低估计1923年失败的意义，并且认为1924年的政治形势不是急剧转折的结果，而是过去的直接继续。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兰德勒猛烈抨击托洛茨基对形势的评价，左派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纠正他的错误。相反，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即在稳定和革命低潮开始一年半之后，谈到群众向左转(!)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产生了错误的总方针，从而导致德国的左派领导屡犯错误并促成左派领导的迅速灭亡。说我们赞同布兰德勒1923年的政策或他对失败之后形势的评价，这是错误的。我们同他存在着重大分歧。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接受左派的行动纲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治形势已经发生的急剧转折。

在从那时起的三年多时间里，布兰德勒没有学会辨别革命的正面和背面。他在德国和俄国问题上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说到左

派，那么正像上面所引的几段文字指出的那样，他们学会了许多东西。

说左派（马斯洛夫、路特·费舍、乌尔邦斯等人）否认所谓的稳定，这是错误的。相反，正像上面所引的几段文字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明确地承认稳定——和完全正确地——把稳定看作是已经变化的阶级力量对比，而不是看作某种机械的过程。他们完全正确地认为稳定的基本政治标志是改良派对无产阶级影响的增强。他们完全正确地认为原因就在于1923年秋天革命的失败，当时党未能利用无可怀疑的革命形势并带领无可怀疑的革命群众去夺取政权。经过巨大考验和希望之后遭到的这次巨大失败不可能不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降低，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转变。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巩固使它有可能推行旨在巩固其经济阵地的政策。其中最有可能的是采取一系列为经济“稳定”开辟道路的国家措施。

指责俄国反对派否认经济稳定是没有道理的。1923年（德国的）经济混乱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巩固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调整，而经济上的调整又会使资本主义阵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在这种集中发生变化的时代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确地认识到，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存在辩证的依赖关系。我们同庸俗的宿命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宿命论认为稳定的到来（怎样？从哪里？为什么？）打断了德国革命的发展。打断革命的并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共产党没有驾驭形势的能力。全体无产阶级、全体人民亲眼目睹了党所经受的考验和遭到的失败。由此开始寻找通过其他途径摆脱不可救药的危机的方法，再说领导作用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什么也不明白。

我们看到，左派明白1923年末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本身就是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我们的时代与战前不同，是政治急剧转折的时代。应当学会及时对这些转折作出判断和评价。在低潮开始一

年半之后说群众“向左转”，这就意味着要犯重大的错误。现在左派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至于他们进行这种评价时说错的话，只具有次要意义并且来自他们昨天的认识。他们明白了最主要一点，即在1923年是正确的手段和方法，在1924~1925年就可能是极其有害的。他们明白，“根本不允许的”(!)不是谈论放慢革命发展的速度。相反，根本不允许的是不考虑事实，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德国“极右派”的情形则完全相反。他们完全否认相对稳定(见他们1927年3月1日的机关报《共产主义政治》)。他们认为，关于随着这种稳定的发展会出现新的革命形势的说法，纯粹是自欺欺人。他们问道，在稳定即资本主义得到巩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革命形势呢？他们对稳定的分析同机会主义者一样充满了宿命论——只不过是另一端。在他们看来稳定是资本主义巩固的独立过程。在我们看来，稳定首先是阶级斗争的过程，阶级力量对比不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稳定的每一个新阶段都在各阶级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矛盾，而且始终具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倾向。正是在这一辩证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革命动荡和战争风云。只有可怜的庸人才会认为只有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下才需要共产党。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目前的帝国主义时代要关心的是革命形势健康发展。现在需要的只是德国共产党利用目前的稳定时期进行相应的准备。在布兰德勒看来胜利遥遥无期，在左派看来胜利必然到来。

4. 左派在给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驳斥了指责他们破坏共产主义原则的论调，指出他们从来没有破坏过“关于革命的代议制、关于在改良主义的群众组织中首先是在工会中开展革命工作，关于建立工人苏维埃等的基本原则，就如它们（这些原则）在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上被通过时那样，而在大会以后它们越来越遗忘了”。这段话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它会被理解为好像对共产国际纲领策略的表述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完成的。如果回想起左派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是反对派，那么这种印象就更深刻了。谣传左派中的一些人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他们不想把1923~1924年间的教训搬到1921年。战后直接发生的混乱无序的群众高潮不可能取得胜利，原因是没有一个同这些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真正革命的党。而当党形成以后（当然只是个雏形），在群众中低潮已经开始。由此产生了党在1921年三月战斗期间的错误。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作了权衡和评价并提出了迎接新的战斗时期的纲领。理解1921年的转折同样是必要的，就像理解1923年的转折一样。这两次教训都同样成了革命时期的战略及其急剧转折政策的组成部分。

5. 在使国际无产阶级对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作好准备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项指示：必须“孜孜不倦地和坚持不懈地宣传列宁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国内战争”。（见《给党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这一表述是不确切的。很可能，这里只是表述上有缺陷——没有别的意思。但不确切的表述会使人得出错误的政治结论。列宁说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会被理解为老一个套：以战争对抗战争，等等。一般来说，如果形势已经非常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能够用国内战争对抗帝国主义战争，那么资产阶级未必有可能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如果形势使资产阶级能够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强加于人民群众，那么无产阶级未必能够简单地用国内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是在以后的进程中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恰恰说明和平主义鼓吹者提出的“拒绝”战争、新兵罢战等口号是愚蠢的。如果由于叛卖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的存在和由于我们的错误，资产阶级能够重新把国家拖入战争轨道，那么共产党就不能简单的“宣布”进行国内战争，而应把自己的整个宣传

和组织工作转到战争轨道上来，以便在某个时刻，在形势发生急剧转折的情况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就是列宁的口号的意思，仅此而已。

6. 我们认为，总的来看，1923年左派对于德国“国防”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是布哈林……在1926年奇怪地提出来的。左派完全正确地认为，战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同战胜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样，在战争中成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俄国资产阶级在1917年被打得一败涂地。然而，我们的党没有实行民族和解的政策。德国左派完全正确地指出，比利时社会党人完全有理由以他们的中立的祖国被毁灭来为自己辩护。然而，我们认为王德威尔得是一个不亚于谢德曼的叛徒。不言而喻，如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国战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帮助它医治好创伤，而在它表现出有能力扼杀别人的时候与它分道扬镳，那么这样做纯粹是愚蠢的行为。

关于工人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可能的协议的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显然，苏联不能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结成永久或长期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联盟，因为它们的政策的目的截然相反，所以阵线的暂时一致只能是一种例外，而不是通例。但例外是可能的：例如，与边境缓冲国达成不允许外国干涉军过境的协议。这样的协议如果有可能达成，哪怕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完全允许，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完全适宜的。边境缓冲国的共产党应当拥护这样的协议，当然在批评本国资产阶级方面也丝毫不能缩手缩脚。这里说的不是支持“自己的”被压迫的资产阶级，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哪怕是弱国）的民族战争，而是利用该帝国主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所处的特殊条件，以利于工人国家防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

最近进行的那场建立在谎言和诬蔑之上的手榴弹事件，始终

是在为干涉做准备工作。但我们完全有权提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工人国家能否和一个由于环境所迫而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共同生产武器弹药的军事技术协议呢？如果这个工人国家很落后，如果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它可以通过签订这样的协议而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那么它当然有权并且应当签订这样的协议。列宁在一次同布哈林争论时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没有拒绝法帝国主义提供的军事技术援助，以反对向我们发动进攻的霍亨索伦^①。一个正直的人能否从强盗那里得到左轮手枪呢？——列宁向布哈林通俗地讲解了他的观点的错误。如果强盗准备向一个正直的人供应左轮手枪时只有一个条件，即他这个强盗同时也得到为自己生产左轮手枪的可能性，那么事情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一个处于强敌四面包围之中的工人国家有权与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签订有可能增强工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暂时协定，否认这一点是荒谬、可鄙和可耻的。德国每一个革命的和只要是正直的工人都会理解，不签订这样的协议工人国家早就灭亡了。只有像科尔什、施瓦茨之流这些可怜又可鄙的饶舌者才会认为这是背叛，恰恰相反，这是在履行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义务。

我关于我所收到的这一期左派刊物的评论就写到这里。总的结论我已经在前面作出了。布兰德勒在这些年中什么也没有学到，左派则学到了许多东西。所以我认为，左派将为自己找回在共产国际中的位置。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2日于加格拉

^① 霍亨索伦，指威廉二世（1859～1941）——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

No 08004

季诺维也夫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①

(1927年4月)

绝密

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担忧。在整个东南部，到处都在捣毁工人组织和大批枪杀工人。汉口方面看来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据得到的消息说，帝国主义者集中军舰的目的正是要对付汉口。北方人看来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正在向蒋介石的竞争对手唐生智发动进攻。蒋介石从外国帝国主义者那里获得了大批钱财。失败显然是极其惨重的。

果然不出所料，中国革命的失败在目前国际形势下不可能不对我们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有消息说，张作霖占领了（或打算在最短时间内占领）中东铁路，当然，这一行动不会不得到英国政府的怂恿，极有可能还有日本政府的赞许。由于我们在目前形势下不能以武力回击张作霖的这种放肆的挑衅行动，所以张匪的不受惩罚只会使我们的其他敌人也蠢蠢欲动。世界所有报刊，特别是英国报刊，对我们就我国全权代表处被捣毁一事给北京政府的照会的评论，腔调完全一模一样：我们热爱和平的举动被视为软弱可欺。世界帝国主义报刊暗自窃笑，说苏联无论如何也不会应战的，今后也许可以对苏联采取更加放肆的态度。

^① 这份声明稿无疑是季诺维也夫在1927年下半年写的。草案是否得到赞同和呈送给了中央，我无法肯定。——托洛茨基注

在袭击我们驻北京代表处时得到的文件以及文件的复制品还没有公布。毫无疑问，正在策划对我们的打击。帝国主义者现在完全有可能伪造任何反对我们的“材料”并将任何武器交给张伯伦之流。很有可能，下一个步骤就是将张伯伦不久以前在照会中提到的威胁付诸实施。

从波兰和罗马尼亚传到我们这里的消息少得可怜，但完全不能排除这两国的政府从今年春天开始就遵照伦敦的指令策划某些对我们的进攻行动。

由于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认为形势是紧张的，极其严重的关头已经到来。

我们深信，中央应当立即对下述方面的一系列措施进行最仔细的讨论：

1. 外交人民委员部方面。必须在日本、法国、德国、波兰、巴尔干采取一系列措施。

2. 共产国际方面。必须立即开始在共产国际最重要的几个党内进行准备，但要极为隐蔽地进行。必须使共产国际最主要的几个党的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应当现在就开始筹备召开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对运输工人等予以认真的关注。应当在一些国家中召开专门的会议。应当认真考虑一下，采取哪些措施可以使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也能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

3. 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方面。必须对波兰和罗马尼亚边境以及芬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边界予以特别认真的关注。应当对军事部门的一些最重要环节进行整顿和检查。也许，眼下应当秘密任命一批我们的老军人共产党员到最主要和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应当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准备工作上。党和政府当然要尽一切可能来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但同时现在也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我们的战备工作。

4. 对内政策方面。首先应当把目前形势全部如实地告诉工人阶级。不能避而不谈中国失败的意义，不能避而不谈我们面临的危险在增加。当然，不允许表现出丝毫的惊慌失措。当然，以什么形式和怎样向最重要中心的最先进工人通报情况，这是需要中央进行斟酌和思考的。然而最糟糕的莫过于工人阶级对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一无所知。

应当利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来纠正以前在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出现的错误，使农村中的雇农和贫农以及最接近他们的中农阶层在政治上感到充分满意，坚决打击富农、耐普曼、官僚主义者。应当尽一切可能和力量使工人和失业工人等感到满意。对于我们来说，国际形势越紧张，战争的危險越大，我们的阶级路线就应当越坚定。

5. 党内方面——按顺序而不是按重要性的最后一点。

既然严重的危险正在迫近，那么我们尤其需要马上和无论如何都要百分之百地恢复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党内统一。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决不能容许只满足于表面上的统一，应当实现真正的列宁式的统一。甚至像布哈林同志这样的人都说（在最近的中央全会上），完全的统一已经实现，似乎只有几个人在同党相对抗。时局十分严峻，不能陶醉于漂亮的空话之中。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列宁一贯追求完全的统一，对表面上的统一不屑一顾。现在的做法则常常相反。列宁追求真正的统一，但他拥有的常常不是百分之百的真正的统一——因为实现真正的统一是一件比实现表面上的统一困难得多的事情。我们现在拥有超过百分之百的表面上的“统一”，但整个形势要求现在在联共和整个共产国际内建立真正的统一，必须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向所有的人表明，我们正在恢复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统一。至于采取哪些措施——这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进行讨论。首先需要改变刊物的调子。在共产国际

系统，应当立即恢复那些被错误开除的（由于派别因素）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左派工人的党籍。

为了所有这一切，我们建议召开——趁中央委员还没有离开——严格保密的中央全会会议（当然，是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合召开）。政治局可以事先为这次会议做好准备工作。党面临着一些无法在某些局部会议上或范围过窄的委员会内进行讨论的问题。只有中央委员会全会能够而且应当对整个事情负起责任。当然，讨论这些问题时应当排除任何派性，不再追查过去是谁的过错，也不要重提不久以前的尖锐斗争。

没有人会相信，全会只用了三四个小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任何人都会认为，除了在全会上，在其他地方也讨论过中国问题。没有人会相信，在这种形势下全会不讨论整个国际形势就会闭幕。

以下签名者请求政治局能尽快召集我们讨论本声明。在我们看来，中央秘密全会应当于两三天之内召开。在我们看来，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应做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以便恢复列宁生前我们党在危险关头总是表现出来的那种真正铁一般的统一，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

№08005

托洛茨基：关于农业任务的提纲

(1927年4月11日)

关于农业任务的提纲基本上是对加米涅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在去年四月全会上提出的有关修正案的淡化的叙述——只是晚了一年。提纲转向当时被否定的修正案，这一点当然是好的；提纲淡化这些修正案，这一点不好；提纲晚了一年才提出，这一点更不好。

1. 关于价格问题

托洛茨基的修正案说：[……]

[……]说明了工业对农业的主导作用，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对农业的巨大好处，认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对结合有危险的尾巴主义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2. 在速度问题上，修正案认为我们的发展速度处于世界经济的或多或少的控制之下，结果在去年的四月全会上遭到了否决，在宣传中，粗暴地和不明智地企图把修正案同道威斯体系的预言相提并论。然而，现在实践已经完完全全地证明这些话中表述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一思想意味着，第一，我们在价格政策上应当越来越同世界市场接轨；第二，为此我们应当越来越向先进的资本主义技术看齐，包括让折旧提成和投资政策服从于这种看齐。

所谓世界市场的或多或少控制是直接通过进出口渠道实行的。请看《计划经济》月刊1月号第27页关于这一点的论述：

“在制订本年度的控制数字时，在方法上必须将我们的进出口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出发点，根据进出口计划制定一系列工业部门

以及整个工业的计划，包括根据进出口计划来协调新企业的建设等等。”

由此可见，不存在任何独立自在的、“充分的”速度，只有受到国际因素制约的速度。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我们的四月修正案无疑是正确的。

3. 计划原则

关于计划原则我们的修正案认为，随着由恢复时期向所谓的改造时期的过渡，计划应当具有周期性质——5年—8年—10年，而不是年度性质。这是由独立建设和经营新企业的条件所直接决定的。顺便提一下，我们的修正案关于这一点写道：

“年度计划应被看作五年远景计划的固定部分。年度计划应当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相应任务。”（第167页）

这一修正案被否定。结果，在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上我们得到的不是计划，而是有关各个工业部门的形形色色的纸上年指标。二月全会责成政治局在适当考虑基本建设工程的情况下“加快制定初步的五年计划”。显而易见，这里至少浪费了一年时间。浪费一年时间就等于浪费物质资源和损失速度。

4.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四月的修正案说明如下：

“制定整个经济政策时应当保证明年（1926~1927）能够实现总额不少于10亿卢布的工业基本建设工程规划。”（第166页）

这一修正案遭到了否决。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数字直到今年二月即施工季的前夕才确定下来，总额为94700万卢布。如果我们的修正案当时能被接受，从10亿卢布中划出数额为1亿卢布的准备金，那么本施工季的条件就会有利得多。

在谨慎的幌子下极不谨慎地浪费了时间，损失了速度并因此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数额达几千万卢布的不必要的损失。

5. 关于节约制度

我们在去年四月提出的修正案要求改编预算，以便给工业提供比现在多得多的资金。修正案提出：[……]

这一修正案遭到了否决，五个月之后，由李可夫、斯大林和古比雪夫签署的著名的十月宣言指出，某些同志想要剥夺农民，宣言反其道而行之，郑重提出将国家预算中的非生产性开支减少3~4亿卢布。

6. 关于农产品收购

关于农产品收购和价格问题，我们的修正案（由加米涅夫同志签署）警告说：

“在粮食和工业所必需的农业原料市场上，自发因素、私人资本和农村富农上层人物的作用比原来预料的要大。”（第161页）

这一修正案被说成是所谓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的一种表现，因而遭到了否决。今年的粮食收购运动完完全全地证明这一警告是正确的。

7. 关于第聂伯河建设工程

去年的四月全会认为，关于第聂伯河建设工程，不言而喻，其近期建设计划理应被否决。第聂伯河建设工程被比作留声机等等。在去年的四月全会之前，许多负责工作人员和一批像交通人民委员部这样的部门，都对近期搞第聂伯河建设工程的想法予以谴责，认为这是空想。这使得进行全面经济核算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并且导致在交通人民委员部方面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谨慎有余变成了不谨慎和浪费时间。

8. 关于潜力

无疑，去年的经验证明，我们在我们修正案的附件中提出的关于经济潜力的意见是正确的。

9. 关于工资

说我们去年四月提出的建议是蛊惑宣传的指责已经像脱皮一样自行消失。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是惟一正确的和现实的。

10. 关于住房建设

关于住房问题，我们的建议是争取在最近时期内至少让工人的住房面积不会减少，结果在去年遭到了否定，理由出人意料，说这个规划太小，必须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

然而事实证明，工人的住房面积从1923~1924年到今年（包括今年）发生了如下变化：从每人12平方俄尺递减为11.5~10.8，目前为10.6（见4月8日《真理报》）。根据所有资料判断，明年工人的住房面积比今年还要少。由此可见，我们的建议完全是从现实条件出发的。否定我们建议的理由是不符合实际的。

* * *

上面所举例子都来自去年四月我们就经济问题决议所提出的修正案，现在，修正案正以某种方式庆祝它的周年纪念日。假如提到其他方面，那么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这些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和现实评价中提出来的无疑是正确的意见和实际建议，先是在整体上被否定，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然后再被部分地、零敲碎打地、姗姗来迟地加以吸收。这就是对经济发展和领导问题的尾巴主义态度。尾巴主义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意味着速度的损失。速度的损失则意味着某些资源从社会主义轨道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1日

№08006

托洛茨基就速记记录事致托夫斯图哈^①

(1927年4月14日)

二月全会的记录中记下了您的一封信，您在信中说没有发生过拒绝给我速记记录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七月全会上。当时担任秘书工作的不是您，而是另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同志。请您告诉我在七月全会上接替您的是谁，这位同志现在何处？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4日

^① 托夫斯图哈是斯大林的秘书。

No 08007

托洛茨基：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

（1927年4月15日）

致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①

《真理报》编辑部

有人企图说明，对于我来说，我国同世界市场联系的必然发展，似乎是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论据，这不仅是荒谬和不诚实的，而且简直是不明智的。我过去和现在对那些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封闭经济”的理论家一向持反对态度，这些理论家“抛开”国际因素考虑问题，而国际因素在他们看来只是武装干涉。我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国际因素”首先表现在使我们依赖（列宁说是服从）世界市场的进出口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在近期进出口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将会增长。我过去和现在都证明，这种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会加快我国的发展速度，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它增加了我国的实力、我国的比重、我国的抵抗能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抵抗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抛开国际因素的荒谬理论和乌龟爬行哲学的否定，但决不是对有可能通过发展我国同世界市场的联系即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来增强我国经济的否定。对于这一问题我大约在两年前就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的我的题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作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了相当明确的阐述。这里我不得不引用一大段能使我们一下子切入问题实质的话：“但我们‘长入’世界的过程不会包含其他的、更严重的危险吗？在发生战争或封锁的情况下我们不会面临无数的生命线随之中断的危险吗？不能忘记，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极端仇视”，等等，等等。这种想法许多人都有。在生产者中间可以找到许多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封闭”经济的拥护者。应当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当然，借债也好，租让也好，对进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加也好，都有一定的危险。由此可见，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能掉以轻心。但还有相反的危险，而且一点儿也不小：这种危险就是延缓经济的发展，就是比积极利用一切世界资源所能达到的速度要缓慢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关于我们“长入”世界市场后会遇到战争危险或封锁危险的论据过于空洞和抽象。既然包括一切形式的国际交换会使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增强，那么这种交换也会使我们更有力量对付封锁或战争。至于我们的敌人还会利用封锁或战争来对付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然而，第一，我们国际经济联系的形式越多，我们的潜在的敌人就越难破坏这些联系。第二，即使最终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比在封闭经济下以及由此导致发展缓慢的状态下强大得无与伦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德国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建起了强大的工业，并靠这一工业发展成世界经济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德国的外贸周转以及同国外市场包括海外市场的联系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战争一下子把这一切都切断了。德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几乎完全的经济闭塞状态。然而整个世界都亲眼看到了这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惊人的生命力和耐力。以前争夺市场的斗争培育了德国生产部门的高度灵活性，德国在战时有限的国内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这种灵活性。

“世界劳动分工不是一个可以不予考虑的因素。我们只有善于利用世界劳动分工的条件产生的资源才能全力加快自己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第63~64页）我希望，这些话能对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其中包括布哈林关于我只谈我们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但忽略了我们力量的增长的说法，作出极其准确的回答。

在上一次全会上，我在插话时已经向布哈林作了解释，指出不是应当抛弃对世界的依赖，而是应当意识到这种依赖，并在这种意识到的依赖中找到提高我国的比重和增强我国的实力的资源。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将走向独立自在的经济状态。决不。我国的对外贸易不仅将绝对增长，而且将相对增长，而与此同时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也将增长。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成本和我国的价格向世界靠拢，那么这种依赖将不会产生任何危险。

我在解释自己的思想时举了技术援助的租让作为例子。昨天托拉斯独立生产了涡轮机，但质次价高。今天托拉斯在外国公司的指导和直接监督之下生产涡轮机，并向外国公司支付相当大一笔贡款，但是生产的涡轮机质优价廉。我国的依赖性是否增加了呢？增加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增强了。我用这个例子说明和解释了发展我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由此产生的不是我对社会主义的不相信，而是我对独立自在经济（“抛开国际因素”）在封闭状态下的乌龟爬行哲学的极端仇视。

尽管我的这个简短的解释依据的是事物和思想的最起码的逻辑，是非常准确的引文，是我所捍卫的政策的整体方针，而且还可以再找出10条同样有说服力的引文来充实它（解释），但我对于我的解释能否对《真理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战方针产生任何影响丝毫不抱幻想。布哈林同志还会像从前那样把不是我说过的话用引号圈起来，摘引片言只字，而且完全“抛弃”我在给我限度的最短时

间内想要表达的明确思想。

* * *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对外贸易方面有许多东西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还取决于西欧资本家的行为，而且我国的进出口越发展，我们就越依赖资本主义的西欧，我们就越容易遭受敌人的打击。”（《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9页）

这些话完全承认了依赖性的增长，斯大林认为摆脱依赖的良方就在设立准备金——一个重要的但决不是基本的问题上。他的这一错误来自他关于我国的发展速度这一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我们有“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快上加快的速度”，因此在这里不应当“乱扯”国际因素（见斯大林在1926年四月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我国的速度够不够快只能用世界经济的规模来衡量，因为我国的发展速度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忘记这一点就意味着忘记基本的东西。但至少可以用斯大林、布哈林和其他人对我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不断增长的言论的指责来回敬上面所引的斯大林的话。

我希望，我将有机会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哪怕是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也好，正像米高扬等同志再次指出的那样，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思想混乱到了极点。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5日

№08008

托洛茨基：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提纲

（1927年4月15日）

1. 在战后英国工人群众向左转的影响下，一部分英国自由派工人政治家（议员和工联主义者）向左迈进了一步。这就使得有可能建立英俄委员会作为我们同向前迈了一步的改良派的暂时联盟。这样的联盟——在对暂时的同盟者有充分的批评自由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

2. 群众运动向公开的革命阶段（总罢工）的转变把自由派工人政治家（议员和工联主义者）抛进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阵营。他们蓄意和公开地出卖总罢工，后来又破坏和出卖挖煤工的罢工。从这时起保留同他们的联盟就会犯下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政治错误。改良主义总是包含着背叛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改良主义和背叛行为在有的时候都是可以划等号的。当改良派向前迈进一步时可以同他们达成暂时的协议。当改良派被运动的发展吓破了胆而背叛运动时，保留同他们的联盟则意味着纵容叛徒，掩饰背叛行为……

3. 关于保留还是解散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在总理事会出卖总罢工之后立即就提了出来。当时大多数人决定保留英俄委员会。理由是什么呢？（1）我们过去是通过英俄委员会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的；（2）英俄委员会是反对干涉和一切战争的最重要的工具；（3）英俄委员会是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形式；（4）英俄委员会是争取世界工会运动统一的工具。

4. 自英国总罢工以来过去快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保留英俄委员会的策略经受了充分的实际检验。应当根据过去一年的实际情况来评价所执行的政策和指出今后的道路。

5. 英俄委员会没有把我们同群众联系在一起，而是把我们同群众分开。我们不顾总理事会的反对并绕过它对英国罢工者给予了帮助。我国的报刊没有向我国群众公布总理事会重要成员（西特林、希克斯）的声明，同样，总理事会的刊物也没有向英国群众公布我们的声明。

我们承诺不干预，这已意味着我们已经原则上和公开地拒绝利用英俄委员会来维系同群众的联系。

6. 在张伯伦向苏联政府发出威胁性照会期间，英俄委员会一声不吭。现在，当远东的事件具有国际武装冲突的形式时，谁也没有想到去召开英俄委员会会议。莫斯科委员会关于英俄委员会是反对干涉的工具的纲领性声明是根本错误的。列宁曾经正确地警告说，根本不要指望英国孟什维克能开展真正的反战斗争，用他的话来说，英国孟什维克比俄国孟什维克还要坏。在所有的重大事件中（总罢工、挖煤工的罢工、英苏冲突、中国革命），总理事会或者是公开地、或者是暗地里一声不吭地出卖无产阶级和我国革命的起码的利益。

7. 由此可见，所谓通过英俄委员会实现统一战线的说法是一句空话，口是心非，是必然把苏联和英国工人引入歧途的政治谎言。战线——这是一个战斗概念。怎么能够同那些在所有的斗争中都同我们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站在同一条战线的人结成统一战线呢？

8. 指望利用英俄委员会来实现工会运动的统一同样是错误的。彼此密切相连：总理事会的背叛行为一个接着一个，它当然不可能对召开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表现出任何真正的主动精神。对这个问题

抱任何幻想都只能意味着帮助人所不齿的叛徒悄悄地、逐渐地从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从总理事会代表们的嘴里喊出来的世界工会运动统一的口号，就像从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那些恶棍式的领导人嘴里喊出来的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的口号一样，现在听起来完全是卑鄙无耻的骗人鬼话。

9. 因此，最近一年的实践表明，我们保留同总理事会的政治联盟是极大的错误，导致我们的政策越来越走下坡路。

10. 事情的过程表明，企图说英俄委员会不是政治联盟，而只不过是参加了一个工会组织而已，这是拙劣和可怜的诡辩。身为我国工会领袖同时也是英俄委员会苏方领袖的托姆斯基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评价英俄委员会时不得不根据事情的进程确认：（1）在以往的会议上通过的所有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2）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3）相互理解；（4）在阶级统一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这是紧密的政治联盟的语言。一个加入工会的工人共产党员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提到希克斯、西特林、普塞尔以及其他叛徒的。托姆斯基同志的用语不是一个因为形势的需要而同资本家的代理人进行组织上的接触的工会工作者的语言，而是政治同盟者的语言。否认、掩饰或淡化这一点是犯罪行为。

11. 借口这里即使存在联盟那也是工会联盟，而不是政治联盟，来证明保留英俄委员会是正确的，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普塞尔、希克斯、西特林等人在这一年中不仅是工会方面而且也是政治方面的领导人。对他们来说，工联只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工具，他们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都同工党领袖步调一致。所谓争取中国自由委员会是由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这个和平主义的奴颜婢膝的委员会维护的是英国国旗的尊严，并提议将英帝国主义扼杀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交国际法庭。我们关于相互理解、意见完全一致和亲密无间的关系的声明掩盖了普塞尔之

流的这种政策，并为这种政策承担了责任。

12. 最初的打算是，保留同总理事会的联盟不排除对其叛卖性领导人的“无情批评”。布哈林同志的六月提纲和语气更缓和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六月呼吁书就是据此制定的。然而，事态很快就证明，不能一方面将他们称作工贼和叛徒，另一方面又同他们保持建立在亲密无间的关系、相互理解和意见完全一致基础之上的联盟。必须在批评和保留联盟之间作出选择。在1926年7月30日的巴黎会议上，批评变成了说服。在出卖挖煤工罢工和神职人员同盟罢工的叛徒破坏巴黎会议之后发表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呼吁书，比起六月呼吁书来在表述上要谨慎、克制和圆滑得多。在1926年8月23日第一次柏林会议之后，总理事会代表的表现更加厚颜无耻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却干脆一声不吭。最后，在最后一次柏林会议上，我们的代表在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投降主义立场，并且承认英俄委员会以往所有会议包括有名的巴黎会议（英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就像是矿山主的雇佣代理人）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和完全经得起考验的。六月提纲所宣布的无情批评是隐蔽地保留联盟，至此这一批评已完成了其自身发展的一个周期，变成了对同那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英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人相互理解、亲密无间和意见完全一致的确认。

13. 这一年的实践同时也是对斯大林所宣布的理论的检验，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必须留在联盟内，谋求联盟并同“领袖们”保持联盟，直到他们被本国工人群众推翻为止。这种“不跳越阶段”的尾巴主义哲学，在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必须公开地承认，这种哲学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和我们的所有传统。正是为了帮助英国群众从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才不允许我们自己从一个阶段滑向更低的阶段，从对叛徒进行所谓的“无情批评”滑向公开地和赤裸裸地同他们称

兄道弟。

14. 尾巴主义的阶段论不可避免地理所当然地会引导人们走向阿姆斯特丹国际，仅从整体大于其部分这一点来看，阿姆斯特丹国际在工人阶级的发展中就是一个比总理事会大得多的阶段。同时，这一年的实践表明，如果我们不仅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英国部分，而且同整个阿姆斯特丹国际开始谋求亲密无间的关系、相互理解和意见完全一致，那么我们会因此而使欧洲和世界工人运动倒退几个阶段，并在实际上奉行消灭共产国际的方针。

15. 我们的方针与此截然相反——取消同阶级敌人的代理人联盟的政策，也就是解散英俄委员会。应当立即纠正柏林会议的巨大错误，这一错误是以往所有错误的必然后果。应当推动革命的工人组织首先是红色工会国际要求英俄委员会在关于中国革命和英帝国主义政策的问题上立即采取旗帜鲜明的政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应当制定旨在保卫中国革命、世界和平和反对资本家的统一战线明确的行动纲领。拒绝这一纲领或拒绝讨论这一纲领，可以利用来立即和公开地同叛徒决裂。

毋庸讳言，现在决裂比起去年五月实行决裂，政治上的好处不知少了多少，但应当明白和承认，继续拖延决裂将会使我们的状况越来越恶化，而且实际上将意味着保留这个现在就已经毒化国际工人运动的脓疱。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5日

№08009

托洛茨基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决议草案

(根据托姆斯基同志关于1927年3月29日~4月1日
召开的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的报告)
(1927年4月16日)

1. 中央全会断然拒绝和谴责英俄委员会最近召开的柏林会议的决议，指出这些决议建立在外交手腕、吞吞吐吐和相互赦免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根本违反整个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原则的基础上。

2. 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的决议中承认必须“以更大的积极性进行互相帮助和支持”，这些话从总理事会投机分子的嘴里说出来就像是卑鄙的嘲讽，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总罢工期间总理事会拒绝接受苏联工会的“该死的钱财”，而在巴黎会议上委员会中的英方成员同神职人员一道履行矿山主的委托，甚至对讨论援助矿工的问题大加阻挠。

3. 决议中指出，这一“积极性”在英国的“惟一代表”应当是总理事会，这实质上意味着全苏工会中央事理会有直接的义务在今后不向那些将被总理事会这个工贼所出卖的罢工者提供帮助。

4. 不“允许一方干涉另一方的内部事务”的义务，意味着我们要向被我们多次宣布为资本主义外交的欺骗和伪善、根本敌视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原则投降。

5. 决议说英苏委员会是两国工会组织之间兄弟关系的“化身”，这只有一个意思：工贼是被他们破坏和出卖的英勇的罢工的一

“化身”。

6. 决议中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旧决议和预见是完全正确的说法是不能允许的含糊其辞，因为总理事会的行动始终都是同这些决议和预见完全相抵触的。

7. 决议指出，对英国矿工的进攻证明英俄委员会的“及时警告”是正确的，这真是莫大的嘲讽。我们的责任现在就是及时警告英国工人对总理事会领导集团今后还必将进行同样令人震惊的背叛行为保持警惕，而决不能借口这一集团对资本的进攻（现在这个集团正尽全力对此提供帮助）作了“及时和正确的预见”而为其遮遮掩掩。

8. 西特林之流指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政策构成了对和平的特殊威胁”，却不提英帝国主义匪帮所起的领导作用，他们这种伪善的、口蜜腹剑的、卑鄙的空话纯粹是为了不让工人知道总理事会和麦克唐纳议会党团所奉行的卑鄙无耻和背信弃义的政策，他们甚至拒绝要求从中国撤出英国军队。

9. 总理事会所发出的“集中全力……防止发生新的自相残杀的战斗”，包括防止发生进攻苏联的危险的号召，听起来更坏、更虚伪、更恶劣。这些政治骗子是资本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代理人，他们抛出成打的这种和平主义破烂货来麻痹工人，以便能在危急关头随意进行背叛。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英国骗子们即西特林、普塞尔之流，在英俄委员会声明发表的当天，对革命的中国人侮辱英国国旗一事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的痛心感情并提议将关于由英国强盗扼杀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交由同一群强盗组成的国际法庭审理。

10. 中央全会认为必须提请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希克斯、萨乌埃利斯、西特林等一班先生为代表的“保卫工会权利委员会”在目前恰恰没有能力为保卫工联的最起码权利做任何事情，只会跟在麦克唐纳的后面亦步亦趋并准备靠牺牲工人的利益同保守党

人达成卑鄙的交易。只有瞎子才会认为，这样的胆小鬼、奴仆和爪牙能够保卫中国革命或苏联，根本不可能！列宁在1922年正是在谈到他们，而且是他们中间最正直的人时写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工会工作者和合作社工作者——托洛茨基注）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意外的时刻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多少能够采取适当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

如果不无情地揭露这些先生的虚伪、软弱、庸俗和公开卖身投靠的行为，而是沉醉于他们的虚伪的和平主义空话，就意味着消磨工人的意志，模糊他们的意识，从而帮助帝国主义者打击中国革命，打击苏联和全世界工人阶级。

11. 中央委员会对像“编纂”过去那些一个都没有实行的决议、许诺在适当的时机重提世界工会运动统一问题这样一些官僚主义的陈词滥调不予理睬。从事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等于是在开空头支票。

12. 中央委员会确认，把保留英俄委员会同公开地和无情地对总理事会的领袖开展革命批评结合起来的尝试，没有产生预想的后果，而完全走向了反面。实际上不是批评、揭露和抨击，而是辩解、庇护和张目——例如，他们关于“意见完全一致”的声明，关于“相互理解”和关于同那些我们认为昨天和明天的叛徒、决议发表时恰恰正在为资本的利益而从事最肮脏的勾当的人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的声明。

13. 柏林会议的决议是对工会少数派运动的公然打击。如果革命者在基本问题上确实能做到与总理事会“相互理解”和“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英国少数派反对总理事会的斗争的正确性就无以证明了。总理事会在赞同召开英俄委员会会议的同时，声称不允许一

个国家的少数派参与它的工作并在英国公开掀起了反对工会运动的左派代表的斗争。然而，左派的工作恰恰在当前应当得到不断加强。工会的革命宣传应当具有新的规模，以适应资本进攻的激烈程度和整个世界形势的危险性。

14. 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坚决取消同总理事会的联盟，因为这个联盟同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是根本相反的。应当推动革命的工人组织首先是红色工会国际要求英俄委员会在关于中国革命、英帝国主义的行动等问题上实行旗帜鲜明的行动和斗争政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应当制定旨在真正维护中国革命、苏联、国际和平和无产阶级反帝统一战线的明确行动纲领。总理事会不可避免地会拒绝这一纲领或拒绝讨论这一纲领，这对立即和公开地同叛徒决裂和无情地揭露他们应当是有利的。

15. 中央委员会认为本决议是从最近一年的整个实践中得出的不容争辩的结论，同时责成联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兄弟党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政策作相应的修改并使这一政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完全的一致。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6日

№08011

托洛茨基致中央书记处

(1927年4月18日)

绝密

1. 我请求让我看看安德列耶夫同志在讨论英俄委员会问题时摘要宣读的来自中国的那封信。

2. 4月15日和16日,我多次试图得到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讲话的速记记录,但都没有结果。现将查询的备忘录附后。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8日

附:

布托夫:《备忘录》^①

(1927年4月16日)

现将12~13点之间就斯大林同志今年4月5日在莫斯科积极

^① 这一备忘录是由我的前“办公室主任”(“党证部长”)布托夫工程师所记。内容是关于斯大林讲话的速记记录,对这个记录斯大林拼命加以隐瞒。——托洛茨基注

分子大会上关于中国问题所作讲话的速记记录一事几次电话查询的结果记录如下。

（1）托夫斯图哈同志说：“速记记录没在我这里，也许是在斯大林那里或在莫斯科委员会。”

（2）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处办公室主任阿法纳西耶夫同志作了下述答复：“速记记录没在我们这里，当天即4月5日速记记录就被马霍韦尔同志拿到中央委员会去了。”

（3）马霍韦尔同志回答说：“我没拿速记记录，这是误会，应当去问托夫斯图哈同志。”

（4）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书记柯恩同志说，所有速记记录都被布哈林同志拿走了。

（5）布哈林同志秘书处的技术秘书科罗特科娃同志否认收到了所查询的速记记录：“速记记录没在我们这里，不过，也许一会儿能送来，现在我还说不准，等布哈林同志的秘书蔡特林同志来了我告诉你，现在他不在。”

（6）第二次打电话给阿法纳西耶夫同志并告诉他，马霍韦尔否认他拿了速记记录。阿法纳西耶夫说：“那我现在问一下。”

确实，10~15分钟以后阿法纳西耶夫告诉说，所有速记记录包括斯大林同志讲话的速记记录在4月5日都打成一包秘密送到中央书记处去了。

今天，4月16日，白天，托夫斯图哈同志就我们的电话询问答复说，他将于晚6时把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送来。

晚6时未见速记记录送来，于是再次询问托夫斯图哈同志，答复是他没有送出而且也不会把速记记录送来。

托夫斯图哈同志说：“为了不致造成误会，请列夫·达维多维奇亲自同斯大林同志谈一下。他们在全会上会见面的。”

“那速记记录在您那儿吗？”

“在我这里，但我没有见到斯大林同志，因此没办法问他。”

“速记记录已经整理过了吗？”

“是的，好像整理过了。”

布托夫

1927年4月16日

No08012

托洛茨基：关于对外政策的提纲

（1927年4月19日）

1. 毋庸置疑，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伦敦的代理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春天或在其他时间发起敌对行动，也许是向我们发动直接的进攻。

2.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方面。应当从我们面临的危险和削弱这些危险的可能性的角度对欧洲和全世界的政区图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各国内部以及联合体和集团内部的对抗等）。只有吸收所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参与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3. 在共产国际方面。针对战争危险的国际宣传应当更系统、更协调一致地展开，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真正集中领导之下进行，另一方面，应当更具体地即结合每个国家的情况和形势进行，及时公布相应的文件、情报、议员的讲话等等。

应当向国际工人阶级包括社会民主党工人十分具体地提出重蹈1914年覆辙的危险性问题。应当更系统地同时也要更具体地揭露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在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问题上的政策，使工人们时刻保持警惕。

4. 在党内方面。对于你们来说，同志们，大概人人都知道，党以及紧跟党的工人阶级现在深感不安，这不仅是因为客观形势变得极其错综复杂，而且也由于同领导问题有关的一些原因。最近几年党在英国总罢工和中国革命问题上既抱过巨大的期望，也曾大失所望。在这两个事件中，英国和中国的斗争领导人，这些曾被认为

是我们的盟友的人，现在却变成了叛徒和敌人。这些巨大事件在工人群众中引起的不安也许还不十分普遍，但却深藏在人们心中。只有消除这种内心的不安才能把工人阶级政党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应当使党清楚地认识发生的事件并对面临的斗争保持清醒的头脑。

5. 在军事方面。谁也不能否认，一些负责同志近几个月以来发表的有关战争危险的前后矛盾的声明，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军队的情绪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应当对这方面的情况尽快加以改进，方法是进行明确和协调一致的宣传，口头和书面宣传并用，为此应当把党的所有力量都动员起来。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9日

No09425

托洛茨基：不要倾倒垃圾！

（1927年4月21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

昨天，4月20日，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作为“原则”论据提出了以下历史性看法和观点：

1. 反对派建议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然而（?!）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曾反对在德国建立苏维埃。这个有力的论据已在许多地方提出过，看来它也注定要遭到同其他一些论据，即所谓反对派号召退出工会、认为英国共产党是工人运动的障碍、害怕丰收等等论据相同的命运。大家都知道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里有一个小城市的居民总是向每堵新围墙倾倒垃圾。我们党内某些政论家、雄辩家和“理论家”也是这样，每当提出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借此倾倒一堆垃圾。就算托洛茨基1923年曾反对在德国建立苏维埃，那也由此根本得不出1927年在中国不应建立苏维埃的结论。苏维埃不是超历史的组织形式。要想澄清托洛茨基在1923年是否正确，必须对当时的德国形势作具体分析。即使托洛茨基当时不对，这也丝毫不能说明在当前革命的中国不应建立苏维埃。

其实，所谓我在1923年曾反对在德国建立苏维埃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建立苏维埃，而在于如何建立。在1923年的德国，工厂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苏维埃的职能和作用。当时的问题在于：是在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工厂委员会存在的

同时另建立苏维埃呢，还是将现成的工厂委员会形式发展成苏维埃。我当时出于一系列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考虑（要说明这些考虑太费时间）主张第二种解决方案。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政治局在经过全面讨论之后通过了我的建议，即将工厂委员会变为苏维埃，等武装起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再公开建立苏维埃。

总之，当时没有一个人怀疑，仅靠共产党或共产党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来领导1923年的革命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有选举产生的，同车间、工厂、城市、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的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对此谁也没有异议。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作出共同决定：必须把工厂委员会发展成苏维埃，以便以后起义全面展开时公开举起苏维埃的旗帜。

2. 在那次支部会议上宣读了蒋介石的信，即简单引用了蒋介石所谓他赞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而不同意斯大林和李可夫的意见的口头声明。这个消息（“文件”）显然会加深未来的红色教授们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对类似蒋介石“赞同”反对派的观点这种可笑的蠢话大概是不值一提的，如果这种蠢话没有同某些人力图向每堵新围墙，即每个新的重大问题倾倒的垃圾掺和在一起的话。

蒋介石是否真的说过或写过上述那些话，我不知道。就算是他说过，那么他究竟赞同反对派的什么观点呢？原来他想分裂国共合作。对此，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全弄明白。蒋介石从我们的报纸上看到，似乎反对派想破坏国共合作，想使国共相互敌视，想使国共之间发生战争，想使共产党放弃对革命的领导而去做一些“小事”。这种对反对派观点的面目全非的歪曲无疑会受到蒋介石的欢迎。可见，如果说蒋介石赞同什么，那他赞同的不是反对派的观点，而是强加给它的胡说八道。我们所说的不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即同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同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进行战争，而是同国民党进行这样一种形式的合作，在这种合作中共产党应保持无产阶级政

党应有的那种完全的独立性。当中国要求与其他国家签订平等条约时，帝国主义分子便叫嚷说中国剥夺他们的权利。当我们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平等协商（联盟）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便叫嚷我们号召无产阶级背叛革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结成紧密联盟绝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应失去独立性并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这一点我们在其他文件和讲话中已多次解释过，诚然，这些文件和讲话未曾公布，这就使人有可能向全世界（其中包括蒋介石）说什么反对派赞成中断同国民党的合作。

然而，问题可以扩大，对反对派的其他批评也确实把问题扩大了。这些批评说，我们的政策完全“在帮助右翼”。那个红色教授支部详尽地证明和解释说，在有关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反对派支持分裂英俄委员会的托马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派迎合分裂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说，我们的政策是为右派服务的。

3. 听到这样的论据，真使人感到惊讶不已：按照这种论据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岂不是要成为泡影，因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是在孟什维克的指责声中发展的，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是为反动派服务的，说布尔什维克帮助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帮助所有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帮助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帮助右派孟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国际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指责列宁，说他以自己的政策向谢德曼提供了最好的帮助。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以自己的不调和的策略帮助了列诺得尔。列诺得尔指责法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帮助彭加勒。要知道，这种指责不仅是陈词滥调，而且令人极其厌恶！一个革命者怎能如此不知羞耻，竟然检拾从孟什维克的破烂口袋里掉出来的、丢在街上没人要的这种指责呢？

法国共产党人指责法国社会党人同激进党人联盟。“塔恩”则日复一日地指责激进党人同社会党人联盟。“塔恩”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机构力图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激进党人同社会党人的联盟。激进党人回答说：我们不想把社会党人向左推入共产党人的怀抱，他们指责彭加勒的做法“有利于莫斯科”。社会党人回答说，他们不想把激进党人推入右派阵营，并指责共产党人的做法有利于反动派。事实是，反动政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同样力图（从不同方向）破坏激进党人同社会党人的联盟。这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政策的论据吗？

如果我们的苏维埃工会现在决定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服从它的纪律，全世界的资本家报刊就会疯狂叫嚣反对阿姆斯特丹领袖同莫斯科共产党人联盟。对此至少没有人会怀疑。而马尔丁诺夫派则会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就是为全世界资本服务。

众所周知，欧洲的一般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平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党过去最信任、现在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信任国际联盟。而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政党、公开的帝国主义政党（大概只有直接操纵国际联盟的英国除外）则对国际联盟持怀疑的或公开敌视的态度。例如，德国纳粹党人就是这样。他们公开赞同我们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反，欧洲社会民主党则不止一次指责我们，说我们不参加国际联盟，就是为纳粹党人和所有帝国主义分子服务。

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欧洲各国政府要求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将国际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等等从党内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列宁则要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社会爱国主义政党无情地决裂。考茨基分子指责列宁，说他分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是在执行帝国主义分子的旨意。

可以再稍微往前回忆一下社会民主党还完全是反对党的那个时期，当时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票反对“自由党”法案，而且在计

票时它的票与同样反对自由党中央的提案的极右派的票算在一起。旧议会的速记记录充满了对持反对派立场的社会民主党的指责，说它与反动派沆瀣一气。

而1905年呢？1917年呢？从4月到10月李伯尔、唐恩之流在政治上靠什么生活呢？就靠对布尔什维克指责，说布尔什维克孤立了无产阶级，使它同“革命民主派”相对立，说布尔什维克这样做是对反动派最大的效劳。列宁回答说，布尔什维克以独立的阶级政策使无产阶级先锋队“离开”社会护国派上层以后，为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农民结成真正的联盟铺平了道路。

说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帮助反动派这种陈腐的、反动透顶的、庸俗的抱怨，在自由派和当今的社会民主派口中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无产阶级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不执行独立的政策，同意自愿支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么后者就会感到自己坚强得多，对反动派斗争就会勇敢得多。这是正确的。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但是全部“不幸”在于：有无产阶级存在，而且它认为历史绝不仅仅是“民主派”同反动派的斗争；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巨大得多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知道，如果它的独立政策能够削弱中间的“民主派”，群众就会团结在它的周围，领导着这些群众，它就会成为反动派的可怕的敌人，比所谓的“民主派”可怕得多。谁没有掌握这一革命政策的基本原理，没有学会把它运用于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具体形势，他就必然会倾向“革命民主派的统一”这种陈词滥调，这是曾盛行一时的策列铁里精神。这种情形现在随处可见。或许上述看法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外的所有国家？或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异族压迫比阶级关系逻辑更具有力量，因此它促使中国的党和无产阶级执行一条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发展和行动路线？对此首先应回答，这种抽象引用中国民族“特殊性”的做法一点也不“特殊”。孟什维克在维护自己1905~1917年的策略时就是以俄国的

特殊性为借口的。现在，马尔丁诺夫^①同志的学派又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借口，把这种被俄国事态进程踏烂了的策略推荐给中国。（我们认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流派的根据是，民族压迫使阶级矛盾减缓，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极左的“极端行为”，阶级矛盾才又加剧。孟什维克为纪念1905年革命而出的一部五卷本著作中的哲学就是这样。）那里借口沙皇制度，这里借口帝国主义压迫。但结论一模一样，毫厘不差。只是20年前用的是专制制度一词，现在用的是帝国主义一词。英国帝国主义与专制制度当然不同，但孟什维克对它们的引证却没有丝毫区别。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难道这在革命后的今天还不清楚吗？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帝统一战线的全部理论现在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他退出了统一战线，而且不是一般地退出。如果愿意，可以称他是“叛徒”。对革命来说，他不仅是叛徒，而且是刽子手。但对本阶级即资产阶级来说，他不是“叛徒”，而是仆从和执行者。这个阶级不愿同日益抬头的无产阶级和起义农民联盟，尽管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认为应该联盟。非常希望红色教授学院支部的教授们能牢牢吸取中国事件的教训，因为中国革命，别的且不说，对我党年轻一代来说是一所不可替代的学校。过去有现在仍然有不少人，他们对各种原则背得滚瓜烂熟，可一接触实际就四处碰壁。应当学会在行动中领会原则。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21日

^① 马尔丁诺夫，亚·（1865～1935）——俄国经济派领袖之一，孟什维克。1923年加入俄共（布）。

№09426

托洛茨基：提交瓦尔金的意见

（1927年4月26日）

1. 扎卢茨基^①在声明中耍滑头。他谈到观点接近时模棱两可，让人弄不明白，是扎卢茨基接近了中央的观点呢，还是中央接近了扎卢茨基的观点。

2. 必须更尖锐地提出问题：既然分歧已不存在，既然指导政策向左偏，那为什么要粉碎左翼？通过右派即根本反对左的或半左的决议的人之手执行这些决议，也是最近一个时期极其严重地困扰党的一种内部矛盾。

3. 所谓阶级敌人赞成分裂英俄委员会的结论没有得到充分评价。资本家当然反对英俄委员会。但他们也完全反对现时的总理事会。我们反对改良主义路线，是要用革命路线取而代之。资本家反对改良主义路线，是要控制改良主义者。

4. 我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指出，英俄委员会问题不是托姆斯基的个人问题，他的职责是在其中推行总路线。以后会尝试让他负责的，这无可怀疑。不要促使这样做。

5. 第14页上写道：“关于工人问题”。这种说法会给挑剔提供合法的理由。在我国，工人问题是指国际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您所指的是工人当前的物质状况问题。

^① 扎卢茨基，彼·安·（1887～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革命党，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后从事党和行政领导工作。

6. 每一个“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意识到了政策的摇摆。这听起来有点贵族味道。重要得多的是，每一个没有文化的人都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摇摆。

7. “苏维埃主义”一词听起来很不舒服，就像是外语中生搬过来的。

而总的来说很好。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26日

No09427

斯米尔诺夫：谁在说“高烧胡话”^①

（1927年4月）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期社论和刊登在该期上的米高扬同志的文章郑重宣布，反对派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放弃了自己先前关于价格政策问题的观点，甚至宣布这些观点是“高烧胡话”。除了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两篇文章把笔者也归入在这个问题上维护“高烧胡话”思想的经济学家之列。我没有参加全会，也无法作出评判，对在全会上发言的反对派同志是否真的宣布自己先前的立场“不复存在”尤其无法作出评判，为什么两篇文章都没有引证这些同志的发言。因此我认为，无论什么人在全会上作过什么发言，我有必要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我过去就这个问题说过的话，并再次通过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检验一下，我是否真的说了“高烧胡话”。

1. 问题的总提法

我对价格政策问题的观点，我在几乎一年前就在《论我国的经济困难》一文中作过详细阐述，该文刊登在1926年的《红色处女地》杂志第5期上。我当时依据的基本论点可简述如下：

“在各种商品（粮食、布匹、铁器、煤炭等）处于目前这种比例的情况下，这些商品的价格范围已经确定，并且不由它们的

^① 我想，这是弗·米·斯米尔诺夫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可以根据《红色处女地》杂志1926年第5期来验证，因为作者引用了自己发表在该期杂志上的文章。——托洛茨基注。参见弗·米·斯米尔诺夫《论我国的经济困难》。

价值决定。反过来，由于这种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就有可能（也有刺激因素，但主要是可能性）使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生产部门比价格低于价值的生产部门发展得要快，从而使价格与价值由于新的商品总量比例而趋于一致”。接下来我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利用客观形成的有利于工业的市场行情来发展工业，并且我们应当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要根据市场行情，而且要根据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更深刻的分析，对我国经济进行有计划的而不是自发的调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市场的盲目性为我们服务，并最终克服这种盲目性。我们只有通过改变商品总量比例，才能实际改变价格，而我们只有依靠每个具体时期形成的价格水平，才能改变商品总量的比例。”（《红色处女地》杂志 1926 年第 5 期第 172 页）

这种观点同作为我国价格政策基础的那种观点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在我看来，商品价格是根据当年的生产关系自动（虽然很复杂）形成的。既然我们制定了国有企业生产计划，既然我们大体正确地预测到私人经济，特别是农民经济的产量，我们就不能再自由规定某些产品的价格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预测这些价格将如何形成。不管我们多么希望规定另外一种价格，但是从实行工农业间比较公正的等价交换来看，如果不改变生产，那么在这方面的一切尝试都注定会遭到失败。只有改变生产比例，我们才能实现另外一种即我们更希望的等价交换关系，而要改变生产比例，我们还是只能依靠我国现有的资源。在这些资源范围内我们可以随意制定某种生产计划，但是既然计划已开始实施，我们就不能随意规

定我们想要的那些市场价格。^①

我们现在的政策完全是基于另外一种前提。它不管生产规模大小，仅依据理想的价格关系，主要是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就力图规定市场价格。由于这种关系即使同战前相比至今也不利于农业，所以由此产生出无论如何要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

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期发表了米高扬的文章后，已可以确切地概括出作为区分上述两种观点的基础的那种比较深刻的分歧。我认为，只要存在着商品流通，只要产品由生产者手里转到消费者手里不是以计划方式实现（就像“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那样，当时消费品凭证分配，而生产资料按“利用委员会”的调拨单分配）^②，而是以购买方式实现（购买数量由购买者手中的资金多少来决定），只要是这种情况，市场规律就会保持自己的全部作用，尽管绝大部分商品流转是通过国有和合作社商业企业进行的。市场规律只能随着市场的消亡而消亡，随着商品经济的消灭、包括国有企业中的“经济核算”的消灭而消亡。因此，

① 对商品总量的比例和市场实际价格的评估当时使我得出结论：在工业产品匮乏的情况下工业品价格不能不在总体上大大高于我们规定的出厂价。我关于提高出厂价格的建议就是由此（而绝不是由于工业品高价的原则要求）而产生的。这种状况今年是否改变了，下面将要谈这个问题。这里我只想指出，我关于提高出厂价格的建议是根据具体形势提出的。如果是在另一种形势下，在另一种商品总量比例下，我们可能就须降低出厂价格，哪怕降到价值以下。两年前商业人民委员部认为不能降低麻织品的价格，因为不能降低成本，尽管这些麻织品当时没有销路，这种做法同商品匮乏时企图保持低价一样荒诞。——斯米尔诺夫注

② 也许有人因此怀疑我想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我引用这个例子只是想用具体的、虽然是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分配经验来证明同我国现存的分配制度的区别。——斯米尔诺夫注

要取得实际结果只能依靠这些规律，而不能忽视它们。^①

米高扬同志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他说：“过去，在价格形成过程中自发的市场规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现在，由于国民经济中的社会化成分——合作社和国有商业（黑体是我用的——斯米尔诺夫注）——占据了大部分工农业产品销售市场并且已成为市场的主要决定因素，市场规律的力量和作用范围受到大幅度限制”。^②（黑体是我用的——斯米尔诺夫注）就是说，米高扬同志认为，既然国有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占据了大部分市场，那么（尽管两者仍然是商业）市场规律就在相应程度上失去了作用。

当然，这完全是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我不准备就这种提法同米高扬同志进行理论争论。我只想指出，在这方面他不仅同我有分歧，而且同党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在转向全面的新经济政策时、在将我国企业转向经济核算以及实行货币贸易形式时作出的决议有分歧。1921年12月的代表会议决议指出：“目前俄共在经济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

① 显然，柯恩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新经济学》一书中（他在该书中发明了“二位一体的调节者”这个具有浓厚的僧侣主义味道的术语）就是针对这一观点断言，似乎他“坚持认为价值规律是我国经济的惟一调节者”，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谓孟什维主义和不懂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公正指责”应该是对我说的。当然，我从未说过强加给我的那些蠢话，因为我同柯恩同志相反，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价值规律是调节者，哪怕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者是市场，说价格规律是调节者就像说蒸汽锅炉是蒸汽机的调节者一样荒谬。天真的柯恩同志没有料到，他宣布价值规律是调节者，就是滑向了丘普罗夫教授所坚持的最庸俗的劳动价值心理学理论，这种理论以下述论点为价值规律的根据，即谁也不愿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与劳动含量较少的产品交换。这种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然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的不是人们对自己劳动的个人评价，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柯恩同志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如此之差，他根本不该指责任何人不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斯米尔诺夫注

②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期，第19页。

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决议接着说：“集中于工人国家手中的国有化工业必须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方法，以争取决定性的统治权”。^①

如果说米高扬同志还记得这个决议，那么按照他的观点，该决议当然是完全过时了。的确，既然“市场规律的力量和作用范围受到大幅度限制”，何必“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米高扬同志的这种提法终于为我们价格政策方面的实践找到了理论根据。遗憾的是，米高扬同志没有进一步指出，现在代替市场规律的究竟是什么力量或规律？是不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②？

至少，米高扬同志的理论具有无可争辩的优点：它就像弥涅耳瓦的猫头鹰一样，是在付诸实践三年多后冒出来的。既然实践是对一切理论的最好检验，所以下面我们谈谈这个实践。

2. 我们是否在降价？

总之，米高扬同志和我的第一个分歧在于，按照米高扬同志的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137、143页。

② 顺便说一下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问题。发明这个术语的坏名声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已经几乎不记得，其他人当然更是完全不记得我那篇提出这一术语的小文章。该文好像是谈劳动军问题的，它还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写成的，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毫无关系。这个术语后来被布哈林同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接受并在其《过渡时期经济学》和《新经济学》两本书中反复使用，从而广泛流传开来。不久前布哈林同志引用了列宁同志对我的这个术语的尖锐意见。我读了这个意见，对每字每句都感到心悦诚服。我对自己这个倒霉的发明感到懊悔不已，但是我觉得使我略感安慰的是，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使用过这个术语，也没有以它为基础制造任何“理论”。难怪列宁同志的意见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布哈林同志的，并且仅仅是对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的尖锐批评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只能指责我诱惑“这些小人物”。大家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但是，凭良心说，无论是布哈林同志还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我都不能把他们算作“小人物”。——斯米尔诺夫注

意见，我们可以不依赖生产来确定价格，我则认为，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让我们看看“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的结果如何？这种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年多，有时甚至还具有突击运动的性质，但其结果如何呢？

让我们看看那种最容易受国家影响的价格——国有托拉斯的出厂价格。我们从1923年秋天至1924年11月曾经大幅度降价——降了整整36%。但是从那时起，也就是在2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作任何降价——出厂价格只有微小的波动，平均保持在一个水平上。现在无论如何已不能把这列入“降价”的概念，最好的情况，可以说价格稳定，如果不考虑一种特别广泛的情况，即在纺织工业中没有相应的降价，而纺织工业，大家知道，占整个日用消费品的40%以上。为了举例说明商品的质量降低了多少，我们从刊登在今年2月16日《工商报》第38号上的瓦西列夫斯基的文章中引用一些材料。

在一个制呢纺织品的托拉斯中，美利奴羊毛和人造毛在混纺织物中的比例变化如下：

	1924/1925年 第一季度	1925/1926年 第一季度	1926/1927年 第一季度
美利奴羊毛	30.7%	29.3%	23.7%
人造毛	16.6%	32.0%	36.2%

另一个托拉斯的情况更加惊人。价值4卢布70戈比的呢绒所包含的人造毛在质量下降以前为6%，在质量下降以后为44%。质量变坏的情况在棉纺织工业中也出现了，尽管比例的变化不像这里那么惊人。例如，坯布的重量从1925/1926年度的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降低了6.5%。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承认，在这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们甚至没有降低出厂价格，反而出现了隐蔽的涨价，也就是以质量下降的形

式涨价，因为商品的质量完全接近于伪造商品。

至于零售价格，降价幅度不大，在1926年5月到10月间降低了3%，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在1月份价格又达到了5月的水平，低于1923年秋天的价格，当时曾发生某种销售危机——总共降低了1%，在最近一年半内，零售价格上涨约25%。^①而这种结果也不能认为是降价。

运用“大幅度限制市场规律的力量和作用范围”的理论的实践就是这样，这一实践包括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它毋庸置疑地证明，市场规律依然存在，并给予想忽视市场规律的人以痛击，1921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决议提醒我们应当“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它的规律，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方法”，这一决议一点也没有过时，今天仍然应当将它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的有益的指导方针。在第一个问题上——按照我们现在竭力采用的方法降低价格的企图是毫无指望的，实践完全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3. 我们切尔文卢布的购买力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低出厂价格的政策（在高的和日益增高的零售价格情况下）从国家手里夺走了它为增加工业产品，为重新装备企业和建立新的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但是由于整个经济环境要求超过我们在现行政策情况下拥有的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更加有

^① 这些材料涉及的是私人商业的价格，为此通常有人叫喊，为什么你不考虑合作社价格的意义？可惜的是，合作社价格的统计才刚刚开始，现在还不得不依据现有的材料。同时必须考虑到私人商业的作用，如果不是按照国家机关卖给它的商品数量，而是按照消费者从它那里购买的商品数量来评价它的作用的话，它的作用是很不小的：甚至在大城市，不少于1/3的消费者是从私人那里购物，例如在乌克兰，工人的支出约有一半是用于从合作社购买商品，而在顿巴斯，“私商供应矿工的商品多于合作社”（见2月7日《劳动报》第39号《可怕的结论》）。至于合作社，关于它的低附加费的神话已被商业人民委员部最近的调查彻底埋葬。如果由于缺乏材料而难以对前三年合作社的价格变动的情况作出明确的判断，那么这种变动无疑也是很高的。——斯米尔诺夫注

力地发展工业，就开始为了发展工业过分利用预算资金，从而导致一方面预算过度紧张，另一方面开始发行长期信贷。结果，就发生切尔文卢布购买力逐渐降低的情况，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种降低在当时还只是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差，造成了我们出口的困难，但是还没有引起我们国内市场发生多少严重的震动。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论点的正确程度。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1925~1926 年度预算执行的结果：它在收入部分有 1.69 亿卢布没有完成。这种没有完成的结果是，预算计划中预定的 1 亿卢布的国家后备未能形成。^①而这种后备从货币流通的观点看有如下的意义，也就是从流通中可以吸取部分发行额：因为这种后备并非以货币的自然形态保存，而是进入国家银行的往来账户的。因此，这一后备的缩小意味着发行紧张程度的加剧。这种紧张程度的加剧，也是由于没有完成去年的预算。

这一年的预算完成的情况怎样呢？根据布留哈诺夫同志的同一个报告，这一年的预算“是非常紧张的”。对此是不能不同意的。的确，根据预算说明材料，1925~1926 年度的预算，与 1924~1925 年度相比，增加了 31%（从 29.35 亿卢布增加到 38.5 亿卢布）。今年的预算被确定为 50.05 亿卢布，也就是比去年增加了 30%，——几乎与上一年的增加额相同。但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指标，今年却比去年低得多。去年的工业品增长了 42%，今年预计只能增长 20%。^②去年的农产品增长了 23%，今年预计只能增长 5%。农产品的商品部分预计的增长额要稍高一些，但也只有 8%，而去年的增长额则是 20%。我国经济整个商品生产的总的增长额，

① 见布留哈诺夫同志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3月22日《经济生活报》第43号。——斯米尔诺夫注

② 见《工业的生产财务综合计划》第20页和28页。——斯米尔诺夫注

再加上进口，今年为15%，而去年的增长额为32%。最后，居民收入的增长额今年为8%，去年的增长额为27.5%。^①这样，在国民经济基本指标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预算的增长则和去年一样。这显然构成预算再次难以完成的威胁。而这次不能完成，正如上面已经指明的，必然要加剧发行的紧张状态。

至于说到我国卢布购买力的变动，这里初看起来情况似乎还不错。中央统计局1、2两个月的批发价格指数低于去年同期的指数。这两个月的指数分别为93.9%和92.2%。行情研究所的指数略高于去年——102.6和101.3，预算指数也略高于去年，今年一月份，预算指数比去年高2.8%。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良好状态只是由于（特别是对批发价格指数来说）粮价低（比去年低15~20%）^②。粮价低是又一次获得丰收的必然结果，因为丰收总是大大增加商品余粮的数额。^③如果排除这种能使价格变动总的趋势出现假象的情况，那么，这里存在上升的趋势也是毫无疑问的。

① 见《1926~1927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291, 299, 301和210页。商品总量的增长那里确定为12%，我向增加方面作了修正，根据是，工业产品的增加额是在控制数字制定之后被定为20%，代替预计的只把增长额定为15%的数字。——斯米尔诺夫注

② 见奥布霍夫的文章《上半年的粮食收购》（1月11日《工商报》第8号）。——斯米尔诺夫注

③ 米高扬同志根据自己的理论，在这里也好像把粮价的低水平不是归于客观原因的影响，而是归于商业人民委员部的政策，仿佛这个部能够实行从我们的利益的角度看来最合理的粮价。毫无疑问，他在这里也是错的。商业人民委员部依靠自己基于相对少的粮食收购数额和加强东部收购来弥补南部的政策，只能把这种降价的趋势固定下来。当然，在垄断情况下总是能够暂时加强这种或那种趋势，至于其后果如何，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种加强目前使在西伯利亚收购的部分粮食受到毁灭的威胁，并产生了粮食消费市场处于紧张状态和粮食储备集中于富农手中的后果（见3月23日《经济生活报》第66号《二月份的地方市场》）。我非常担心，我们可别为此付出更严重的代价。至少国家计划委员会二月份的市场行情一览，对我们的粮食收购运动所作的描绘并不太妙，它明确指出了粮价上涨的趋势，粮价的上涨现在当然有利于富农。——斯米尔诺夫注

像去年一样，我国卢布购买力的这种降低，在保持战前我国卢布和外汇平价的情况下，必然迫使我国的出口降低和世界价格的对比始终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请看考夫曼同志在《降价和出口》（3月5日《经济生活报》第53号）一文中所列举的材料。

	苏联的总指数	世界的指数	世界的指数与我国 指数的百分比
1925年9月	174	148.2	85.3
1925年10月	175	145.9	83.5
1925年11月	178	145.1	81.7
1925年12月	182	144.3	79.5
1926年			
1926年1月	188	144.1	76.7
1926年2月	192	142.2	74.2
1926年3月	195	139.5	71.6
1926年4月	197	138.9	70.6
1926年5月	194	139.1	71.8
1926年6月	186	138.8	74.6
1926年7月	182	138.4	76.0

去年写文章时，我还没有这些材料，这些材料再一次证明我当时作出的推测是正确的。我国卢布的购买力按世界黄金价格计算1925年9月为85戈比，到1926年4月已降至71戈比，就是说降低了16.5%。不错，这之后它又有所提高，到7月达到76戈比。但是那篇文章还指出，卢布的这种购买价值的提高，是“靠农产品价格的降低，而农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主要是靠粮食产品”。正因为如此，结果才是，尽管有这种改善，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除了粮食以外，出口都出现亏损，从而造成出口减少。《经济生活报》（3月11日第58号）的社论指出：“油、蛋，亚麻，今年在出口方面是无利可图的商品，但是这三种商品对于

出口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此应予以极大的重视。”上面引证的考夫曼同志的文章说，“出口的增长，是靠粮食产品的出口；其他商品的出口或者有所减少，或者是增加的数量不大”。因此，卢布购买力的降低对于我国出口形势的恶化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影响。对于出口来说，显然只有粮食和石油产品才是有利的。因此，我们的价格政策忽视市场规律，不只是在降低价格方面遭到了失败；由于这种忽视，我们在我国的出口恶化方面也遭到了额外的打击。

但是如果说在去年，卢布购买力的降低只是在我们的外贸市场方面表现明显，那么从秋天开始，它在内贸市场上也已经表现出来。它最明显地表现在农产品的收购方面，不过粮食仍然除外。我们显然已经不能保持去年的收购价格，势必要加以提高。如油的收购价格与去年相比——乌拉尔从 14 卢布提高到 20 卢布 60 戈比；西伯利亚从 15 卢布提高到 22 卢布；不仅如此，收购进行得很不顺利。蛋的收购，只是二月份进行得比较顺利，一箱鸡蛋的收购价为 63 卢布，去年为 52 卢布。小型皮张的收购大大落后于计划，^①而私人支付的价格高于国家收购者 30~40%。葵花子的价格也大大提高了，尽管如此，收购情况却非常不好，致使植物油工厂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计划。亚麻的价格提高了两次，先是提高 30 戈比，不久以前又提高了 70 戈比，但收购量比去年低 33%，甚至比 1924~1925 年度同期的收购量还低 11%。情况相当严重，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 3 月 8 日的会议上承认，

^① 见《国家计划委员会二月份的市场行情一览》（3 月 27 日《经济生活报》第 69 号）。——斯米尔诺夫注

“必须提高几乎所有技术作物的价格”。^①而在这里我们的不考虑市场情况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导致我们又受到了一次打击——表现为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原料危机。

4. 成本提高

今年秋天又一种新的现象将看得非常明显，这种现象从我所坚持的观点来看完全可以理解，但在去年这种现象还没有暴露出来。我说的是日用工业品成本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卢布购买力的降低，结果是原料价格和名义工资上涨。^②与此同时，生产条件的恶化也起着大的和日益增大的作用（这种恶化是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南方钢铁”公司管理委员会委员斯维岑同志在全乌克兰工商界代表大会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南方

① 见《国家计划委员会二月份的市场行情一览》（3月27日《经济生活报》第69号），见3月9日《劳动报》第56号刊登的《工业原料不足》一文。必须指出，除了卢布购买力降低影响到所有农作物价格以外，我们的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对某些农作物（如亚麻）也有直接的影响。亚麻的价格在去年降低了27%，目的是为了使亚麻纺织品的价格有可能降低，部分地是为了使出口有利可图。结果，我们今年亚麻的播种面积没有增长，而各地区为工业和出口而进行的亚麻的收购甚至降低了5~6%。——斯米尔诺夫注

② 但我们的报刊上总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工资的增长很不相称。通常都引用一些数字：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1%，工资提高了25%。这是很不正确的。首先提高了25%的是名义工资。实际工资只提高了13%。而这种提高也只是在拿1925~1926年度的年平均工资同1924~1925年度的年平均工资相比较的情况下得出的。问题在于，1924~1925年度的头三个季度的工资非常低，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83%左右。只是在第3季度末期，工资才开始提高，到9月才大致达到战前水平。因此，1925~1926年度的平均实际工资低于1924~1925年度第4季度的平均工资。（日工资为124.5戈比，上年第4季度为128.3戈比）。但是1925~1926年度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1924~1925年第4季度的劳动生产率（1925~1926年度人均日产量按战前戈比计算为6卢布41戈比，而上年第4季度平均为5卢布76戈比，也就是说提高了11%）。可见，劳动力开支增加的原因不是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差别的扩大，也就是卢布购买力的降低。（以上数字都是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材料计算出来的，引自《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第203页）。——斯米尔诺夫注

钢铁”所属各炼钢厂，除了以李可夫命名的彼得罗夫斯克炼钢厂和以伏罗希洛夫命名的的迪尤莫炼钢厂以外，负荷量都大大高于战前的负荷。在目前的设备情况下，它们的负荷都已达到可能的极限。由于各工厂拨出的补充设备资金不足，冶金企业装备的磨损度更加增大。与1926年1月1日相比，斯大林工厂、第聂伯罗夫斯克工厂以及绍杜阿尔和班特克工厂中的一些车间的大部分电动机都已不能用，需要更新。因此，有些钢铁厂里冒着大批车间报废的风险在进行工作。^①瓦西里耶夫在题为《蒸气动力设备磨损严重，灾难每天都可能发生》的文章中谈到科斯特罗马纺织厂的设备状态时描绘了类似的图景。文章说：“各纺织厂的机器已经极度磨损，最老的锅炉是1889年制造的，最“年轻的”是1899年制造的，因此，锅炉的最小的炉龄已有28年……蒸汽机已非常陈旧……机器不能承受负荷，需要常常维修。虚假的功率加上机器的磨损（它已使用42年）严重妨碍工作。这种蒸气动力设备的严重状况在所有工厂绝对都是这样。^②去年，我们已不得不对磨损严重的设备进行更新，今年更是如此。可以想见，这对成本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因此，毫不奇怪，与前些年相比，去年的成本已经提高，今年无疑还要提高。《国有工业1926~1927年度的综合计划》预计成本

① 《工商报》3月2日第50号。——斯米尔诺夫注

② 《劳动报》3月6日第54号。——斯米尔诺夫注

提高1%。^①并且，工业的某些部门提的还要高得多：煤炭——2.33%，石油——6.5%，硅酸盐——2.25%，铁——1.6%，木材——5%，造纸——5.2%，食品——7.1%。然而这些预测显然过于乐观。^②

第一，假设的纺织工业成本的降低（3.3%，在国外棉花大大降低价值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降低实现的条件是，假定纺织工业维持1925~1926年度下半年已经降低的质量。“预计在1926~1927年度改善质量（更正确地说，是回到1925~1926年度上半年的质量。——斯夫洋诺夫）是靠提高纺织品的平均重量，这种质量的改善可能吞没上述的成本的降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脚注中作了这样的附带说明。^③在计算亚麻制品的成本时，同样没有考虑，也不可能考虑最近的亚麻价格的提高。今年已经过去的几个月的材料所说明的完全是预算成本的超出：“今年上半年的初步材料说明，——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通告信中说——许多工业部门没有完成政府规定的任务。”

“根据现有的材料，煤炭工业头四个月的成本不仅没有低于工业财务计划预算规定的降低5%，而且还稍稍高于它。”

① 这里还有个所谓的“补充折旧”问题。没有“补充折旧”成本可降1%。但是没有“补充折旧”是不行的。“补充折旧”是由于在估计固定资本时是按战前卢布计算的，而折旧的数额构成这一价值的一定百分比，但是这是按切尔文卢布计算的。当然很清楚，这种估价在计算成本时没有考虑建筑和设备的实际磨损，从而必然导致在工厂必须改建或大修时造成大量赤字。但是就是用切尔文卢布重新估价而得到的“补充折旧”，显然也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在设备处于重新估价时的状态，而1925年10月1日的状态，就不是按最初的价值，而是按扣除磨损之后的价值进行设备估价的。这样一来，折旧的扣除甚至加上补充折旧，也仅仅能够在现有的设备报废时和1925年10月1日磨损的旧设备同样磨损的设备来替换，而不是用新设备来替换。——斯米尔诺夫注

② 《生产财务综合计划》，第85、285页。——斯米尔诺夫注

③ 《综合工业计划》，第93页。——斯米尔诺夫注

“在采矿工业，工业计划预定的成本为每普特铁矿 9.5 戈比，而南方矿业托拉斯预定的成本大大高于此数。”

“在基础化学工业，预计到 7 月 1 日成本降低 6%，而不是计划规定的 9%。”

“在苯胺染料工业，预计到 7 月 1 日成本降低 5%，而不是工业计划原来规定的 16%。”

“在化学—制药工业，预计只能降低成本 4%，而不是计划规定的 6%。”

“在印刷工业，第一季度的资料说明，在铅字铸造方面，只提高了 9%，而不是工业财务计划规定的 41%。在铅印及平印厂，提高了 5.5%，而不是 17%，在壁纸工厂，提高了 2%，染料，提高了 5% 而不是 40%。”

“在火柴工业，西北托拉斯第一季度工厂成本提高了 11.3%，而不是原来期望的 3.8%。在维亚特卡托拉斯，提高了 3.7%，而不是降低 1.4%。”

“在乌拉尔，为金属工业采购木材的实际价值达到 1 立方米 2 卢布 50 戈比~2 卢布 75 戈比，而不是计划规定的 2 卢布 40 戈比。在乌拉尔，根据金属工业总管理局的材料，金属成本暂时还没有任何降低的征兆。”

“大多数其他工业部门，在最好的情况下，成本保持在工业计划预先规定的水平，没有按照政府指示的幅度降低。

“水泥的成本——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洛博夫同志报告说——与 1925~1926 年度第 4 季度相比，水泥托拉斯提高了 13%，新罗西斯克水泥厂提高了 20”。^①（根据计划，整个水泥工业的成本应该降低 1%。——斯米尔诺夫）。黑色冶金预计降低幅度

① 《水泥的成本应该降低》，《真理报》3 月 24 日第 67 号。——斯米尔诺夫

不大——0.6%。但是南方钢铁公司管理委员会委员比尔曼同志报告说：“可惜，应该说，去年影响成本提高的原因现在仍在全部起作用……托拉斯管理委员会现在掌握的对第一季度成本的估价表明，与1925~1926年度的实际成本相比，成本又有一些提高，尽管提高得不多。^①制糖工业“不得不认定——卡尔马诺维奇同志说——砂糖的工厂成本在已经过去的榨季里与去年的成本相比，一公担提高了2卢布50戈比到3卢布。”^②这意味着提高了10~12%，而不是计划预定的8.3%。

成本的提高已经持续到第二年，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現象。它显然同“恢复过程”的结束，同在旧的生产骨架上开展生产的过程的结束有关。正因为如此，它才从“恢复”时期的结束之际开始。现在不增添设备已经不能扩大生产，已经不能靠旧的储备来进行工作，现在没有技术的改进已经不能较多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估价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基本设备必要的折旧，结果立刻暴露出这种估价毫不中用。“降低生产费用不应该从转瞬即逝的市场成绩着眼，而应该从我国经济力量的恢复和发展的远景着眼。按昨天的虚价计算原料的成本核算同降低成本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应该被当作浪费国家资财而严加惩办。靠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来维持的暂时的廉价政策，同样是完全不正确的和致命的政策”。——这是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我们由于忘记这些指示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指示最终应当成为我们工业政策的指导原则。

执行这些指示需要资金。这些资金在国民经济中是存在的，我们应当最终学会从那里提取。基本的资金来源之一，是利用市场行

① 《论重工业产品成本的降低》，《工商报》3月15日第60号。——斯米尔诺夫注

② 《甜菜制糖运动的总结》，《工商报》2月26日第47号。——斯米尔诺夫注

情，也就是“从存在市场出发，考虑到市场规律”而采取灵活的价格政策。现在应该是学会按照列宁的指示，而不是按照米高扬同志的指示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造成的成本的提高，意味着产品价值的提高，意味着为获得同样产品而付出的人的劳动量的扩大。它是我国生产力向后退的无可争辩的征兆。

我不属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拥护者，我认为没有在技术方面先进的国家的物质援助，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是不能从新经济政策过渡到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在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的情况下，工人不再是生产的要素之一即劳动力，而是变成了生产的主人。这样想的人，在我们这里通常被称为悲观论者。但我并不认为，一般来说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我国生产力的水平注定我们要向后退。我们可以有充分的信心说，在新经济政策的形式下，我们有可能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改善工人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状况。这里的问题只是这一发展和改善的速度。当人们一方面要我们相信，我们不仅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即不要技术先进国家的帮助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实行这样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在降低，同时又要人们相信，我们不能实行更大程度的工业化政策，因为我们这里有客观界限——而这已不是悲观论，而是用关于社会主义的漂亮的空话掩盖自己的政策——不仅无力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无力建设社会主义。口头上讲“一国社会主义”，谈论什么市场规律不是为我们写的革命的空话，实

实际上是由于恐惧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①不会和不能利用在我们面前无疑存在的那些潜力。

成本的提高，是对我们的价格政策的无情宣判，因为它向每一个人证明，我们的“降低价格”政策是建立在腐朽的基础上，它只能取得——而且可能性也很少——转瞬即逝的市场成绩。只有那种基于降低价值，基于在技术进步基础上实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才是认真的降低价格的政策。那种不能为技术进步寻找资金的政策，只能说自己的这种政策毫无用处。

5. 我们的商品荒在减轻吗？

从今年秋天开始，市场上出现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使我们有根据断定，商品荒在减轻。^②有些人甚至开始谈论销售危机的威胁。

让我们仔细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购买者开始更“挑剔地选择”商品。消费者要求得到较为高级及贵重的商品（对纺织品方面的要求尤为明显）。但是从一开始就必须注意到，远非所有的购买者都“挑剔地选择”。《工商报》的一则通讯指出：“广大的城市消费者——工人和职员，现在远不像农村消费者那样挑剔。……城市的广大消费者现在还不买罐头食品和水果糖。肉的价格在城市1俄磅卖25~30

① 而这是毫无理由的。我们的那种总是被人企图描绘成工农结合的政策，实际上总是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工业发展不足，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价格的差别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如果拿行情研究所按工业品零售指数（而农民购买工业品并不低于从这一指数得出的价格）计算的工业品价格同国家计划委员会按农产品批发指数（农民出卖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这一指数）计算的工业品价格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就是在这里，从1925年5月开始也是在向后退：1925年5月农民为购买工业品而付出的农产品不得不比战前多11%，而到1926年5月已经多42%。1927年1月，这种差别已经达到74%，而1926年1月46%，1925年1月是55%。“剪刀差”的情况比两年以前要坏。1924年1月的差别是92%，我们现在离这个数字已经不远。——斯米尔诺夫注

② 例如，见《真理报》12月24日第298号。——斯米尔诺夫注

戈比，广大消费者用各种粮食的子粒，蔬菜和牛奶来代替肉。^①“城市消费者的需求变得更加简单，他们买最便宜的商品，买最便宜的纺织品。”^②可见，“挑剔的”需求来自“农民”。“农村的婚嫁季节就要到了——《工商报》驻萨拉托夫通讯员写道——农民中出现买8~14卢布1米的细呢绒的需求，例如，在去年还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对于22~25卢布的好的毛毯，对于15~20卢布的披肩等等需求很大。农民对于简单的裤料已不满意，而是要求绒布的，尽管绒布要贵4倍。”但是这种“挑剔的”农民提出的需求不仅是针对质量而且是针对数量的。“农民走进商店，——同一通讯员继续写道——常常要给自己扯上100~150卢布的纺织品。”而《工商报》驻基辅通讯员的报道更最终确定了这种“挑剔的农村消费者”的面貌：“农村市场要求高档商品和城市消费的商品（铬鞣皮靴、胶皮套鞋、呢绒织品、拉绒衬衣等），这些农民属于个别经济发达的地区，属于农民中的富裕的上层。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大多数农民今年甚至连必需品也不买，因为收成不好，粮价几乎和战前一样，工业品价格太高，赋税增加。”^③

因此，消费者的挑剔完全不是由于市场饱和，无论如何，也不是由于下层居民的福利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像某些人试图断定的那样，而是由于农村资产阶级需求的扩大。对贵重商品需求扩大的第一个原因就在于此。另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下面再谈。

下层居民需求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农民今年的收成接近去

① 《农村需求的特点》，《工商报》11月6日第256号。——斯米尔诺夫注

② 《消费需求的新特点》，《工商报》11月4日第254号。——斯米尔诺夫注

③ 《农民谈农村市场》，《工商报》11月24日第271号。

年，^①农民今年出卖自己的粮食产品价格比去年第一季度低 16~17%，整个农产品收购的价格比去年第一季度低 8.9%。此外，经济作物的绝对收获量今年比去年低。1926~1927 年度第一季度的农业税为 2.16 亿卢布，而 1925~1926 年度同一时期的农业税为 1.16 亿卢布。手工业产品的销售不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今年的购买基金自然未必高于去年。^②而按两个合作社机关的计算，甚至低于去年。

城市的需求同样处于限制因素的影响之下。集体合同的签订延至第二季度开始。同时，从 1926 年 10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提高房租、增加税率、消费税等等也对城市的需求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粮食酒的消费的增长——从去年第一季度的 9500 万卢布增加到今年 1.95 亿卢布——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必然会对工业品的需求产生一定的限制。^③

因此，今年的市场行情的形成基于三个因素：（1）工业商品产量的某些增加。^④（2）农村资产阶级（显然还有城市资产阶级）购买力的提高。（3）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购买力比较稳定。第一个因素

① 所引的文章忽略了再一次收获必然会扩大商品余粮的数额；当去年收获的一部分用于补充由于上一年收获不佳而耗去的粮食消费储备时，今年的收获必然要有商品储备增长的后果。正像上面指出的，这些储备集中在富农手中，因此富农手中就掌握了以粮食为形式的补充的潜在购买力，这种购买力在年底可能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必须考虑，但在分析年初的市场时，自然没有意义。——斯米尔诺夫注

② 这里自然需要作上一注释所指出的修正。——斯米尔诺夫注

③ 《工业品市场》，《工商报》2月17日第39号。——斯米尔诺夫注

④ 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在 1926~1927 年度第一季度，根据萨布索维奇的计算（《工商报》11月23日，第44号）增加了23%。根据扎尔金德比较保守的估计（《工商报》3月15日，第60号），增加额为20%。同时，扎尔金德正确地指出，在作商品量的计算时应该考虑到今年进口商品大量减少的情况。例如，按照他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作的计算，棉织品今年第一季度的商品量只增加了10%。——斯米尔诺夫注

应当在缓和市场竞争状况方面产生作用，第二个因素应当在加强市场方面产生作用，第三个因素是中性的。这三个因素的合力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总的方面看，行情观察家们总是说行情会降低。他们这样说的根据，一方面是批发周转额的缩减，另一方面是部分工业品存在积压。但是，与此同时，可以看出对所谓畅销的季节性商品有着尖锐的需求，而夏季稍微降低了零售价格，从9月开始又有回升。^①至于积压商品的总的数额，同一个扎尔金德指出：“劳动人民委员会经济管理处按照价格方法对合作社的零售商品所作的初步计算表明，基层合作社，无论如何，都扩大了自己的周转额，这种周转额接近于日常消费品市场产量的增长。”^②

这就是今年行情中的一些互相矛盾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我们研究行情的专家们称今年的行情让人“眼花缭乱”。批发周转额的降低和价格的提高，基层环节的销售是同从生产部门批发来的商品相当的，然而又出现了商品积压现象。这些矛盾的现象又是怎样互相联系的呢？

我们对今年特有的一种现象的意义很不重视，这就是商品的品种和市场需求不相适应，而它正是解开上述矛盾现象的钥匙。对这种不相适应的现象的抱怨，几乎在每篇关于市场情况的通讯中都能看到：例如《经济生活报》（3月23日，第66号）驻北高加索的通讯员写道：“不论对于皮革商品还是对于纺织品来说，在销售不畅方面起巨大作用的是商品的品种不能满足需求，缺乏较大数量的应季商品。在有大量棉花储存的情况下，对于细料内衣和服装面

①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夏季降价方面，私商走在了合作社前面。这明显地表明，价格的降低带有暂时的行情性质，是夏季需求通常减弱的结果，完全不是我们五月的降价运动的结果。——斯米尔诺夫注

② 见他引用的刊登在《工商报》第60号上的文章。——斯米尔诺夫注

料的需求最多只能满足 40~50%。今年二月份细呢绒和毛织品的供应情况是灾难性的，对它们的需求的满足不超过 15~20%。……从品种的意义上说，部分含硅制品的情况还要糟，精制玻璃器皿要多少有多少，瓷器却很少，茶壶也很少，农村需求的商品很少。”《经济生活报》2月19日第41号上刊登的阿尔克的文章指出：“一方面，许多应季商品非常缺乏，最重要的纺织类商品（特别是线条分明的呢绒商品）非常缺货，另一方面，一些次要的纺织品，首先是精梳毛织物，在销售方面同样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商品滞销同今年出现的市场需求和商品品种不相适应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因此，商品滞销只涉及那些“不畅销的”商品，至于畅销的商品，商品不足的情况和去年同样尖锐。在这种情况下看得非常明显：另一个矛盾从何而来，为什么在**基层销售网的商品销售同商品量的增长相适应的情况下**，却在批发方面发生滞销。畅销商品的推销随着向消费者推进的程度而自然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托拉斯可以比较容易地把自己所有的品种销售给购销联营组织和合作社的上层环节，而它们要把自己的所有品种推销到中层就比较困难，推销到下层商业点就更加困难，私商照例只买畅销商品。结果，**滞销必然要集中在中层环节**。阿尔克的文章正确地指出，这种情况会使畅销品种的商品荒愈演愈烈。

他说，“中层商业渠道无疑会堆满不畅销的商品，这会阻碍这一中层网络采购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品种和消费需求的不相适应不仅会积压大量所谓的不畅销商品，**而且会妨碍向消费者推销需要的和畅销的品种**，因为积压了非畅销产品的商业网不得不缩减采购量，遏制自己的需求，从而也就不能起到基层消费需求传导者的作用”。结果，在中层商业环节非畅销商品滞销的情况下，在下层商业环节会形成更大的畅销商品的匮乏。文章作者所作的结论完全正

确：“商品滞销常常只是商品缺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会造品种和需求之间的这种不适应呢？某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在年初，企图也用消费者的“挑剔”来解释这一点：消费者好像现在要求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品种，而工业还来不及作出反应，仍然照旧生产。

但是这种不相适应，并不总是按照“挑剔”的路线发展。上面我们已经列举了对含硅制品的抱怨，即贵重的精制玻璃器皿要多少有多少，茶壶却非常缺乏。这里不能满足的并不是“挑剔的消费者”，即农村和城市的资产阶级，而恰恰是“不挑剔的消费者”，即工人和农民大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要知道，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这类购买者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要求：“城市消费者买最便宜的商品，买最便宜的纺织品”，而“大多数农民甚至连必需品也不买。”《工商报》的一篇短文《关于调整玻璃工业制品》回答了这个问题。

“最近一年，玻璃瓷器制品的品种大大恶化了；生产了一系列在市场上销不出去的商品。虽然上级经济机关对1926~1927年度托拉斯的生产计划作了相应的调整，但是托拉斯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卫生瓷器，各种灯具，药房用的大型器皿，贵重的高级玻璃，整套的餐具和瓷器制品，生产的数量还是比调整后的计划所规定的数量要多。”

因此，可以看出，并不是消费者改变了自己的需求，而是托拉斯改变了自己的品种。但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难道我们的托拉斯就这样愚蠢，就这样顽固，竟然不顾上级机关的指示，硬要扩大生产在市场上找不到销路的产品，缩减生产市场所需求的商品吗？当然，不是这样。还是那篇短文，虽然是以掩蔽的形式，但指出了问题的所在：“需要及时调整某些制品的价格，以便刺激供不应求的商品的生产。”这一句简单的话说明了一切。

规定标准的出厂价格，首先恰恰是针对那些属于大众日用消费品的商品，也就是供不应求的商品。因此，正是那些供不应求的大众化的商品，对托拉斯来说成了最无利可图的甚至是亏本的商品。^①托拉斯实行经济核算，但它不是同市场打交道，而是同按照规定价格付给它钱的购销联营组织打交道。于是，托拉斯不是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是考虑广大消费者，而是根据这些规定的价格，开始转产那些按照这种规定的价格成为最有利可图的商品。茶碗、茶壶、玻璃杯——这些广大消费者所需要的东西，对托拉斯来说，尽管提高了市场价格，仍然无利可图，故缩小了对它们的生产，并依靠对它们的生产的缩小来扩大精制玻璃器皿的生产，这些东西市场不要，但它可以从中得到有利的价格。生产脱离市场，与此同时，恰恰是那些规定了标准价格的大众化商品的短缺变得越来越严重起来，而那些为有钱的购买者准备的有规定标准价格的商品却日益过剩。

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含硅制品方面。“生产的品种和市场的要求不相适应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华西列夫斯基在上面引用的《品种问题和纺织工业的质量》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生产联合组织竭力回避‘法定’的亏损价格，停止生产规定了标准价格的纺织品，改产没有规定标准价格的纺织品。另一方面，是由于虽按规定的价格生产，但质量不好。”后一种方式也是转而生产不畅销品种，但只是形式比较隐蔽。

我已经在上面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了关于毛纺织品质量大大恶化的材料，也就是人造毛从6%扩大到44%。“结果，——华西列

^① “对半亚麻的（也就是最便宜的）商品所规定的价格有时还低于成本”。——题为《亚麻制品和丝织品的价格降低》的短文报道说。（见《工商报》2月11日，第34号）——斯米尔诺夫注

夫斯基补充说——顾客避免购买精梳的半毛纺织品，因为它们甚至外观上还不如类似的棉纺织品。”托拉斯在这里生产“这一品种”，但是第一不能使它有利可图，第二把畅销品变成了不畅销品。

同一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意见：“在目前便宜的和贵的纺织品质量变坏的情况下，便宜的短袜比贵的短袜结实程度更差。因此，消费者争购结实的商品。”换句话说，正是便宜的大众化的品种变成了不畅销的商品，而广大消费者——工人和农民——不管愿意不愿意，不得不对商品表现出“挑剔”，转而购买“好的”品种，这些品种完全不是由于质量好，而只是由于比较贵。这就是对贵的商品需求急剧增长的第二个原因，这同消费者的挑剔毫无关系。

在这里，我们的价格政策也导致了与它本来的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商品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本来想使这些商品在价格上成为广大消费者能够接受的商品，但这种价格政策却只是使这些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的数量更加缩减。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得不或者由于竞争而支付贵三倍的钱，或者不要这种商品，因为质量绝对不好，转而购买比较贵的商品。我们的政策本来是想帮助广大消费者，但由于方法不对头，实际上恰恰是首先打击了广大消费者。

至于说到好像使我们遭遇销售危机的总的行情，那么对它只有赞扬：它的情况和去年大致一样。但是我们的价格政策，使生产脱离市场，导致了新的反常现象：在好的行情下，我们却遇到了销售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去年的价格政策所作的所有具体结论，自然完全适用于今年。

6. 零售加价和“商业资本不公道的收入”

当我去年写文章的时候，我手头只有说明了批发价格水平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发指数的资料，而没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批发价格指数。因此，在计算“商业资本不公道的收入”时，我不得不从零售加价超过1923年10月的零售加价多少出发。我当时得出

结论说，这种附加加价在1923~1924年度为14.2%，在1924~1925年度为20.4%，在1925~1926年度上半年为批发价格的25.7%。从这一点出发，从1925~1926年度日用消费品预计产量为31亿卢布出发，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工业全年由于让利给商业而受到的损失约8亿卢布。

现在我们有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批发价格的资料。正像我假定的那样，零售价格变动和批发价格变动的对比得出了更不利的动态。1923~1924年度的加价，同1923年10月相比，增加了不是14.2%，而是17.8%；1924~1925年度增加了不是20.4%，而是32.7%；1925~1926年度上半年增加了不是25.7%，而是43.6%；下半年增加了51.9%；1925~1926全年增加了47.7%。日用消费工业品的总数确定为35亿卢布以上。

如果我们采取合作社的计算，只有大约1/3的商品周转额^①是通过私商进行的，那么通过私商销售的商品的附加加价则是：

$$\frac{116600 \text{ 万} \times 47.7}{100} = 55000 \text{ 万以卢布以上。}$$

至于合作社，现在甚至连马列茨基同志也不能断定，像他同迈兹林同志^②争论时断定的那样，好像合作社不把市场交给私人资本，就不能降低自己的加价：现在已经正式承认，合作社毫不

① 这一点相当可疑，因为1/3的商品通过私商到达消费者手中甚至是在像列宁格勒这样的一些大城市，而在外省，对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工人开支计划的调查表明，工人通过私商进行的开支，在乌克兰为48.2%，在北高加索为46.6%。见《劳动报》2月17日第39号《严峻的结论》和3月15日第60号《我们的合作社的出超》。——斯米尔诺夫注

② 顺便谈谈迈兹林同志。布哈林同志不止一次地书面和口头声明，好像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我从布哈林同志如此大吹大擂的轰动一时的发现中没有看到任何别的意义，只不过是企图从他那一方面把这篇文章的政治责任加在我身上，但是在这里布哈林同志踢开的只是空门；我完全同意迈兹林同志的所有基本结论，并且不推卸，也不想推卸我对他的文章所负的政治责任。——斯米尔诺夫注

费力地就能在去年把加价降低 10%。如果通过合作社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日用消费工业品确有 20 多亿卢布，那么降低 10% 的加价就是 2 亿多卢布。实际上，在合作社存在大量利润（这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的情况下，已不用说合作社臃肿庞大的机构，合作社的超额加价自然就构成了无比庞大的数额：难怪降低 10% 被认为是最低的。因此，在这种大量缩小计算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认定，在对消费者毫无利益，对工业有损害的情况下，我们白白地在去年把 7.5 亿卢布转移到了商业领域，其中一部分用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一部分用于私商的消费和臃肿庞大的商业机构的开支……这个数字是无可争议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计算时所作的种种缩小，那么，毫无疑问，它会增长到 10 亿卢布的数额。

这种计算对今年有什么意义是不难设想的：日用消费品总的产品数额今年增长 17%，在私商的加价超过去年年初加价的情况下，我们今年一开始就使批发价格的加价增长了 12%。^①

这样，我的最后的结论也得到了证实。在工业产品增长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消除商品荒，为了吸收自由劳动力^②甚至为了保持这一增长不足的速度，我们不得不加强预算的货币发行的紧张程度，从而降低卢布的购买力，使工人名义工资的不大的增长化为乌有。当工业的基

① 1925 年 10 月 1 日，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算，整个批发价格的加价为 51%，1926 年 10 月 1 日，根据同一计算，为 63%。——斯米尔诺夫注

② “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 12 月对 256 个职业介绍所的统计资料，以及前几个月的统计资料，失业人数在继续增长，1927 年 1 月 1 日为 1271000 人，比 1926 年 12 月 1 日增加了 3%，比 1926 年 10 月 1 日增加了 19%。去年同一时期（从 10 月 1 日到 1 月 1 日）失业人数的增长额为 3%，失业人数的绝对数字在这一年的第一季度增加了 20 万人，而去年为 31000 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就 1 月份国民经济形势给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的材料》，见《经济生活报》2 月 25 日第 46 号）。——斯米尔诺夫注

本建设开工如此不足^①，以至不能阻止工业设备的恶化和磨损——这时我们却把大量的资金白白浪费在商业领域，从而一方面促使私人资本的资金和非生产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促使商业合作机构变得越来越臃肿庞大。米高扬同志的“商业社会主义”导致了社会主义主要基础——国有化工业增长的这种停滞，而这是同倒退运动联在一起的。

7. 总 结

进行总结并不困难。

(1) 在批发价格方面，我们的情况不是批发价格的降低，而是隐蔽的提高。

(2) 在零售价格方面，既有明显的提高，也有隐蔽的提高，而且这种提高不仅包括工业品，而且包括农产品。

(3) 在出口方面，大多数商品是亏本的，集约农业产品的出口有明显的缩减。

(4) 在工业品的生产方面是成本提高。

(5) 在销售方面是高行情下非畅销商品积压，对广大消费者的供应恶化。

(6) 在商业方面，有大量的利润，在工人和下层农民的消费至多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居民中的非生产阶层的消费在不断增强。

(7) 在工业产品不足的情况下，失业人数却有很大增长。

① 今年的工业基本建设开工也同样不足。不消说，工业计划必须考虑这种紧张程度，计划本身就未必能够完成，最近一次的降低批发价格更加使它缩减：这次降低使工业损失1.5亿~2亿卢布。在总的财政拨款为15.61亿卢布的情况下，基本建设开支计划为9.47亿卢布（其中不可分配的准备金为3000万卢布，次要的工程为4300万卢布，这些工程由于资金不足未必能够完成）。这样，由于这一降低而造成的工业资金的缩减超过了整个工业拨款的10%，约占基本建设工程投资的20%。预计，批发价格的这一降低将从再一次的价值降低得到补偿。但我们从上面看到，这种降低毫无希望，相反，它倒可能提高。因次，批发价格的最近一次降低，对本来就非常不足的基本建设工程计划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打击。——斯米尔诺夫注

问题在哪里？

我们显然不能沿着笔直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不退却，再沿着新经济政策的迂回的道路进攻。但为了使这条道路走成功，自己必须完全明确，我们退却了多少，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情况下采取行动，我们不能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关于我们已接近社会主义的任何甜蜜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党在列宁领导下过去这样做了，列宁始终以最坚决的形式警告说不要存在这种幻想，始终以最明确的形式揭示我们退却的程度——从军事共产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从国家资本主义到调节贸易。^①最近我们不再走这条惟一正确的道路了。

有一种越传越广的理论，认为我们现在就要跨进社会主义的大门，市场已经开始消亡，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雇佣工人”这个术语对国有工业的工人已不适用。我们还在用它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术语。^②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把我们只是刚刚面临的任務说成已经解决的任务。现实决不会由于理论而改变，正因为如此，现实才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在这方面经验实在太多了。彻底结束“革命空谈”的时候已经到了，在革命空谈的后面掩藏的始终只是机会主义的内容，应该站在现实的基础上，在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只有那时我们才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克服它。

至于说到关于“高烧胡话”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患这种病的人已经丧失了正确接受周围事物的能力，总是把自己的幻想当成现实。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究竟是谁患了这种疾病。

弗·米·斯米尔诺夫

1927年4月

^① 见他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18卷，第399页。——斯米尔诺夫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8页）

^② 见布哈林《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信徒卡尔·考茨基》第64页。——斯米尔诺夫注

№09428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 通过决议后发表的声明

(1927年5月初)

反对反对派的新决议，是对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毫无疑问、毫无争论的右倾路线的加冕。

这一倾向出现的客观原因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失败，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速度缓慢。

由于一系列的失败——在不正确的尾巴主义的领导下——右倾得到了成长和巩固。这一右倾加深了工人阶级失败的后果，使工人阶级对胜利的准备发生了困难。

德国无产阶级在1923年的失败，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失败，英国大罢工的失败，最后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这一系列的失败不仅暂时加强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共产党，而且加强了共产党内部的右翼，削弱了左翼。对这一国际过程，联共也毫不例外。而右翼又利用自己的强大机关专门向左袭击，机械地，通过镇压、流放、解职、开除等手段，使力量对比朝着更加不利于左翼的方向改变。

这就是总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左翼反对派就成了少数派，而像马尔丁诺夫、什麦拉尔、佩佩尔、台尔曼等等一类的共产党人就以多数派的名义向我们发动大肆攻击。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全会批准了前所未闻的对工贼和叛徒的柏林投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向阿姆斯特丹靠扰的路线。不仅如此，如果这

条路线再继续下去，在共产国际内部必然产生向第二国际架桥的意图。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这些倾向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对此提出警告。我们预先宣布要对它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指望利用英国改良派上层的帮助来反对战争只是可怜的幻想。总理事会和工党领袖们在外交破裂之前和破裂之际的行为都表现得非常胆小和卑鄙。这两种特点随着战争的真正临近只会不断增长。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全会通过了批准过去的错误路线、准备将来的新的失败的决议。汉口的国民党领导人如汪精卫之流，同资产阶级调情，阻碍农民和工人运动，如果阻碍不成，他们就会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农。在这种条件下谁反对苏维埃，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即服从汪精卫，谁就是在准备中国革命的新的，也许是更惨重的失败。我们声明，这条路线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在共产国际内部为改变这一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而全力进行斗争。

你们没有让季诺维也夫同志到这里来，他在7年时间里都是共产国际的主席。我们的发言和文章不印发。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工作完全被沉默所包围，难道就是这样训练工人阶级去对付战争危险吗？但是现在光是不能让反对派的言论和文章发表已经不够了。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掩盖事实。每天都向党和工人阶级隐瞒来自中国、英国及世界各地的电报，只是因为事变进程违反了领导的错误路线。这样，党就被解除了武装，错误越积越多，从而孕育着新的失败。

那种把同反对派的斗争说成是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企图，特别是从中国事件的角度看，不过是对右倾的可怜的胆小的伪装。你们企图人为地复活托洛茨基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早在大多数与会者加入布尔什维主义之前就被托洛茨基取消了。这种复活分歧的企图完全是白费心机！马尔丁诺夫在这里对中国问题上的官方路线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他在三次革命中都采取了积极的

反革命的立场。他现在在中国问题上重复着在1905年和1917年说过的一切。孟什维主义的领袖唐恩认为马尔丁诺夫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是真正孟什维主义的。你们把列宁对革命的基本观点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以证明马尔丁诺夫反对它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在思想堕落的情况下，这种伪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无济于事。我们所坚持的观点是被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所检验过的布尔什维主义观点。

约有一百名老布尔什维克，我们党的基本建设者，近来向中央递交了自己支持反对派的基本观点的声明。这个事实彻底摧毁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弄虚作假的引证。在签署声明的人们当中，来自其他政党的人的百分比大大少于这些人在共产国际或联共党的领导人中的比例。

企图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开除托洛茨基和武伊奥维奇同志，是对共产国际章程的骇人听闻的践踏，这和不许季诺维也夫同志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一样。二者都是思想软弱和官僚主义专横的表现。二者都最明显地表现了斯大林的路线，对于这一路线的危险性列宁曾在自己的遗嘱中发出过警告。斯大林不是去改正给党和国际无产阶级造成如此重大损失的十分明显的领导错误，而是想摆脱那些较早发现这些错误并提出警告的人。不许季诺维也夫参加会议以及企图开除托洛茨基和武伊奥维奇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此后还应当从联共中央开除反对派，目的是为了在相应准备好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听不到任何一点批评的声音。这种卑鄙的手段只能破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威信。同时，执行委员会昨天不经讨论又突然决定把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再推迟整整一年（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四年）。这种延期的目的是为了使其共产国际面对既成的事实，特别是在对反对派的关系上，是为了要求共产国际只是在事后阐明已经发生的事情。照

列宁的说法，这只是那种粗暴的、不忠顺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想使党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途径来改正路线。但是这是无济于事的。路线将得到改正。只是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为这种改正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

在等待我们的决议期间，正在筹划进行新的、更加粗暴的镇压。你们的决议会把这些镇压神圣化。但是这一步也不能推动事业前进。真理在我们方面。我们正在进入的国际震荡时期，将每天都表明我们是正确的，将把一切虚伪和两面派手法彻底粉碎。在我们递交的文件中我们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你们对我们提出了责难。但是国际工人阶级有权知道你们为什么责难我们。只有在明显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会隐瞒我们的文件。可以把文章隐藏起来，但是不可能把事实隐藏起来。你们不得不重新审查你们的决议。我们准备着明天。我们保卫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性。在这次全会后，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将取得胜利，因为除了它，就只有因动摇产生的不知所措，孟什维主义的复发和遭受失败。

第三国际万岁！

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万岁！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初]

No09429

格季耶就治病问题致托洛茨卡娅

(1927年5月4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

您要到巴黎郊区治疗疟疾的计划，坦率地说，不合我的心意。不合心意，是因为我不知道，第一，您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利于健康，第二，您将碰上一个什么样的医生。的确，我也不能在列维科给您介绍一个医生，但是您如果去那里治疗慢性疟疾，我想那里可以很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医生。至于列维科的季节，那么，它从旧历4月1日正式开始，接着，到5月，您会找到足够数量的医生。找谁呢？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就不会在到达列维科后急于马上去找医生，而是花上两三天时间就这件事去访问病人（决不是饭店的职员!!）。我自己和我派到疗养地的一些病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应当说，效果相当好。我所以如此固执地主张您尽快到列维科去，是因为这个疗养地是最著名的治疗慢性疟疾的地方，还因为我希望您痊愈归来，最后，希望您能尽快回来，而去巴黎郊区，我想，只会浪费时间。

请原谅，我如此固执地赶您到列维科去，但是请您相信，我这样做完全是由于我对您和您的家庭的真诚的关怀，并希望看到您早日恢复健康。

昨天（5月3日）我见到了列夫·达维多维奇。他看起来很好，比旅行前气色更好，更精神。体温有时升到37.0~37.1，但已不会使他身体变弱：已经快到夏天，快变暖了，我非常希望他能很快

完全恢复健康。有趣的是，他打猎打得身体很疲倦，待在非常新鲜的空气里，坐在窝棚里等等，但这对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害处。

再见，亲爱的纳塔莉娅·伊万诺夫娜。请不要生我的气。焦急地等待着您从列维科的来信。

忠实于您的 费·格季耶^①

1927年5月4日

附言：我今天就和费·尼·彼得罗夫商量。请放心，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① 格季耶，费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1863～1938）——著名的内科专家，莫斯科几家医院的负责人：巴斯曼医院的主治医生，后来是博特金医院（过去的索尔达琼科夫医院）的创建者和首席主治医生。从开始组建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起，他就被邀请到那里工作。他是列宁一家和托洛茨基一家的医生。

No09430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1927年5月16日)

1. 政治局5月12日决定不印发我的文章。显然，这里涉及到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这篇文章我送给了《布尔什维克》杂志，另一篇文章是《正确的道路》，这篇文章我送给了《真理报》。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没有叫我参加，尽管哪怕是出于表面的诚意也应该这样做。

2. 不登载这些文章的原因表明，这些文章在批评中央，具有争论性质。换句话说，制定了一种规则，由于这一规则，所有党员和所有党的报刊对中央只能随声附和，而不管它说了什么，不管它做了什么，不管情况如何。

3. 我认为中央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是根本错误的，正是这一根本错误的路线保证了中国反革命四月政变的成功。与广泛散布的所谓“反对派利用困难投机”的谎言与诽谤相反，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建议在秘密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在中国的今后的路线问题和我们政策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们打算从实质上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作速记记录，因而，也就没了“利用”的企图。政治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①拒绝召开这样的全会。因此，由于像以往一样自然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支持的政治局的过错，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认真讨论问题的办

^①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任何一个起码的党员权利问题上，都没有对政治局、组织部，更不用说对书记处表现出一点儿独立色彩。——托洛茨基注

法来纠正根本错误的、带有毁灭性后果的路线的愿望未能实现。

4. 在这以后，突然抛出了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这一提纲巩固和加深了根本错误的政策的一些最错误的方面。最后，为了完成这一切，政治局拒绝同我们一起在秘密的中央全会上讨论中国问题（当然在“局部的”即没有我们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批准了斯大林的提纲，随后又禁止任何人在报刊上提出如下的问题：为什么蒋介石如此容易地取得了胜利，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表现得如此没有准备，为什么我们的党可怕地陷入了马尔丁诺夫主义的罗网，为什么斯大林的提纲能把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推入机会主义的泥潭，为什么《社会主义通报》杂志如此坚决地在昨天赞同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在今天又赞同斯大林的提纲（1927年5月9日）。

5. 难道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整个路线是可以装入瓶子中的小事？难道这样就能帮助培养中国共产党？难道这样就能使共产国际的外国支部得到发展？难道我们的党可以这样生存下去？这种官僚主义的空想怎么能够出现呢？

6. 政治局的决议说，我们想要把一场争论强加于党。如果把争论理解为预先准备好的“队伍”在机关内部起哄，吹口哨、尖叫，用专门迫害反对派的战斗队员充斥各个支部，用关于分裂的威胁和尖叫把工人支部搞得震耳欲聋——那么，我们当然不想要这样的“争论”。但是我们党的生活恰恰充满了这样的争论。我们想要的是在党内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讨论，至少先从理论上，从党的中央机关开始进行讨论。

7. 是的，我们是想讨论中国革命的命运问题，从而也是我们自己的命运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讨论在列宁健在时的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上被认为是正常的？难道有谁会认为，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颁布的提纲对于党来说，在每一个这样的时期，是历史发展的定论？是的，我们是想讨论这些问题，为了向党证明，为了说

明，这些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执行这些提纲会使中国革命受到致命的威胁。

8. 中央不想进行争论。但问题是要对中央本身提出批评。可以说，根据一般规律，哪一个中央越是不想进行争论，它的路线就越会犯错误，这条路线就越是会鲜明地、严厉地被事实本身所推翻。我不希望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类似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问题上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所犯的那样的错误。但是问题不是在昨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准备使这些错误不再发生。但是这些错误却以命令的方式，变本加厉地转移到明天。我要说的正是这一点。至于政治局“不想”进行争论，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政治局有权禁止对涉及政治局本身在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所犯的根本错误进行讨论吗？

9. 政治局不想进行争论。为什么？显然是“不想打扰”党。但是政治局却在臆造的非党会议上臆造的季诺维也夫反党言论开展了人为的、由上面制造的争论。只字不向党说明季诺维也夫同志都说了什么（至于说到我，我可以在他说的每一句话上面签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没有发表。事情被说成似乎会议是非党的会议，而实际上整个会议都具有党的性质，尽管也许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参加。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正在全速进行。中央监察委员会默不作声。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进行干预。当“争论”以传送带的方式进行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就会作出自己的“判决”。

10.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专门召开了党支部的公开会议，目的是不让任何人就革命领导的错误发言，并有可能对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追究他在非党的会议上发表反党言论的责任。这是一套系统。这是由上面组织的一套系统。这是由上面组织的一套窒息党内思想的系统。可以真的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没有迫切的需要就中国革命的问题交换意见，特别是现在已经弄清

楚，政治局不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以命令的方式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选择，每一个诚实的党员都应该说：“如果我对党掩盖我自己的批评，那就会比违反我的意愿，让一些非党人士听到我的批评，有更大得多的危险。”

11. 我们想让党讨论上海灾难的情况和原因。为了妨碍这一点，中央把季诺维也夫同志极端平心静气，极端温和的发言变成了党的“灾难”。不顾这是危急时刻，不顾种种困难和危险等等，有人从上面把党吊上拷刑架，使党受到干扰，用恐怖手段对付党，分明虚伪地向党叫嚷说，季诺维也夫动员非党人士起来反党。有人想借助对人为扩大的口实进行单方面的、残酷无情的、令人厌恶的争论来妨碍党就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在单方面的机关争论制造流言飞语、进行喧嚷叫骂的情况下，我们的文章却被禁止出版。为什么禁止？因为斯大林无从答复它们。因为他的提纲中的可怜的、毫无思想的、匆忙编造出来的、使唐恩如此满意的词句在批评的微风吹来时就会化为乌有。

12. 禁止对最根本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借口是形势困难，有外部危险，战争威胁临近。对于这些无疑存在的危险，反对派的不同之处只是它更早地预见到了它们，更深刻地重视它们。危险存在，而且巨大。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危险却会由于领导错误而变得危险百倍。危险的主要来源在于中国革命的失败，而中国革命是在没有必要的革命的阶级基础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崛起的。我们用错误的政策妨碍了及时建立这种基础。这在现阶段使革命处于窘境，并且打击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如果沿着斯大林提纲的道路继续前进，中国革命的形势，自然还有我们的形势将变得更坏（见陈独秀的发言）。那时就可以借口加倍恶化的形势，加倍地禁止一切批评的声音。领导的错误越大，在这种方针下对它进行批评的可能性就越小。

13. 这里的问题与正常情况相反。在有利的条件下倒还可以沿

着错误的路线继续推进。困难的形势则要求正确的路线，而且形势越是困难，越是强烈地要求有正确的路线。如果路线不正确，如果领导顽固地坚持错误的路线，用新的失败和震荡威胁工人国家和国际革命，那么，对错误保持沉默——如果你看到和意识到了这些错误——那就只有可怜的、失去独立性的官僚或卑鄙的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才能做到，而这些人，顺便指出，在我们周围还不少。用人为地制造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采取的叫骂、起哄或哄孩子睡觉的方法压制对争论问题进行原则上的政治讨论，就是对普通党员进行恐吓，使其失去独立性，就是更加提高压在他们头上的机关权势分子的地位，就是容许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像水里的鱼一样自由地游来游去。

14. 我对一切都直言不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半吞半吐无济于事。可以用机械的手段暂时地把一切——批评、怀疑、问题和愤怒的抗议——都压制下去。但这些方法列宁称之为粗暴的、不忠顺的。这些方法之所以是粗暴的、不忠顺的，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形式令人感到不快，而是因为它们内在地同党的性质根本不能相容。不能把中国革命赶到瓶子里去。这一点谁也不能做到。秘密地准备的摧毁反对派的做法只能在表面上机械地获得成功。我们所维护的路线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变战火中经受了考验，被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经验所巩固，现在又为，尽管是从反面，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悲惨经验所证实。要镇压这条路线是不可能的。但是给党和共产国际造成无可补救的危害则是完全可能的。

这就是我要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明白地、准确地所说的话。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09431

托洛茨基：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①

（1927年5月16日）

1. 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反战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政治继续。懂得这一思想就等于找到了机会主义在战争问题上所有错误的关键。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独立自在的外在因素，而是其主要倾向的最高表现。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最高工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整个政治的最高表现。机会主义或蜕化为机会主义的激进主义，一贯主张把战争看成一种要求排除革命政治的主要原则的特殊现象。中派主义容忍革命方法，但不相信它。因此，在紧要关头它总是借口形势特殊、情况特殊等而主张用机会主义的方法代替革命的方法。中派主义或虚假的激进主义在政治上的这种特别急剧的转变自然是由战争的危险所引起的。应当用这块试金石毫不妥协地审查共产国际的主要方针。

2. 现在，大家都已经清楚，英俄委员会不应当被看作共产党员为了影响群众而参加的工会组织，而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其目的首先是抵制战争危险的特殊的政治联盟。因此，应当根据英俄委员会的经验和榜样，以十倍的注意来审查反对战争的方法，以便公开地和准确地告诉革命的无产阶级，如果我们不想毁灭共产国际和帮助

^① 布哈林于1927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月全会前提出一种新理论：英俄委员会不是在工会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表现，而是为保卫苏联而斗争的一种外交工具。本件是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提交的。——托洛茨基注

帝国主义反对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的血腥的勾当，不该做什么。

3. 布哈林同志在5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我们在柏林向总理事会投降提出了新的解释。据说，不应当把这种投降看作是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斗争方面的投降，而应当看作是“在外交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方面的投降。我们拥有各种国际行动的工具：党（共产国际）、工会、外交、报刊等。我们在工会方面的行动应当跟着阶级斗争的任务走。但这只是“按一般原则”。在某种情况下，作为例外，我们不得不（照布哈林的话说）利用工会运动的机关，就像利用外交行动的工具一样。英俄委员会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向总理事会投降，并不是投降总理事会，而是投降英国政府的代理机构。我们不是在党和政治方面，而是在国家方面不要进行干预。对柏林的投降的新解释的实质就是这样，这种解释，正如我们现在所指出的一样，使投降变得更加危险。

4.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同总理事会的柏林交易曾在我党中央不久前的四月全会上讨论过。在会上为柏林会议的决定辩护的有托姆斯基、安德列耶夫、梅利尼昌斯基同志，他们是我国最著名的工会工作者，而不是外交家。所有这些同志都为柏林的投降辩解，并指责反对派不了解工会运动的任务和方法；称断绝同机关的关系就无法影响大多数工会工作者，断绝同机关上层的关系就无法影响机关；我国工会工作者在柏林的行为正是出于这些考虑。

现在，布哈林同志解释说，相反，为了暂时而尖锐的外交任务，柏林会议的决定是布尔什维克影响工会运动的原则方法中的一个例外。布哈林同志为什么不向我们解释这一点，而在我们中央最近一次全会上单独告诉托姆斯基同志呢？要知道，四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作为指导性的材料将在全党传阅（但愿如此）。布哈林同志的新理论大概至少将成为党的干部们的财富。所以，我们将有两种同样正式的、同样有权威的解释：按照其中的一种解释，我们的柏林政

策是工会运动中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性政策；而按照另一种解释，我们的柏林政策是暂时放弃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政策。

5. 这种骇人听闻的矛盾在几星期之内从何而来呢？它是由于不能够坚持四月全会的立场（哪怕一个月）而产生的。我国代表团前往柏林时，还不知道布哈林对它们未来行动的解释。布哈林同志本人当时也未必作过这一解释。至少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东西里面，都没有发现这种解释。布哈林同志在四月全会上一言不发。尽管给反对派的时间很短，但是它仍然得以说明我们的柏林政策同布尔什维主义最起码的原则完全不相符合。报告人（托姆斯基同志）甚至不打算在结束语中回答我们的论据。四月全会的速记记录还未来得及出版（但愿它早晚会出版）^①，可是我们已经拥有对我们柏林的投降的新的、刚出笼的解释。十分清楚：这种解释是后来杜撰出来的。

6.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问题的起源，那问题会更加清楚。在总理事会（“左派”工联主义者同右派在其中互相竞争）最卑鄙地破坏了总罢工以后，联共（布）的反对派要求立即同总理事会决裂，从而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容易地和迅速地从叛徒们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中央的多数用这样的观点来反对我们，即尽管总理事会在罢工期间执行了反革命的政策，但保持英俄委员会似乎是我们对英国无产阶级施加革命影响的利益所需要的。斯大林正是在这时提出了“不能逾越的阶段”论。在目前情况下，所谓“阶段”指的不是群众的政治水平（各阶层的水平不同），而是反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和同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进行不调和斗争的保守的上层。

与此相对立的是反对派断言，在英俄委员会公然背叛从而结束

^① 事实上记录没有印行，为的是不暴露可耻的错误和矛盾。——托洛茨基注

了以前的“左倾化”时期以后，保持英俄委员会将因它的必然后果不容许我们减轻对总理事会的领袖们，至少是对其“左”翼的批评。有人反对我们（首先就是那个布哈林），说什么这是可恶的诽谤，组织联系决不会限制我们的革命批评；我们决不会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英俄委员会对我们来说只是同群众进行联系的组织桥梁。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以所谓暂时放弃革命的路线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来证明保持英俄委员会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如果反对派中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他就会立刻遭到近来越来越司空见惯的粗暴的恶毒的“批评”，同时用一些思想上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对付你。

7. 反对派用书面的形式预言，保持英俄委员会将日益巩固总理事会的政治阵地，将会使其从被告必然地变为原告。这些预言被宣布为我们的“极左病”的成果。曾经炮制出一种特别的，而且十分可笑的理论，好像要求脱离英俄委员会等于要求工人退出工会。从而保持英俄委员会的政策应当具有原则上非常重要的性质。

8. 但是，很快就发现，必须在保持同总理事会的组织联系和称叛徒为叛徒的权利之间进行选择。政治局多数派愈来愈倾向无论如何要保持组织上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然没有“逾越阶段”，然而在政治上不得不从一个阶段退到另一个阶段。根据英俄委员会的三次会议（1926年7月于巴黎，1926年8月于柏林和1927年4月再次于柏林）可以最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们对总理事会的批评一次比一次谨慎，完全避开“左派”即工人阶级最危险的叛徒。

9. 通过不断施加压力，总理事会感到，它已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它从被告变成了原告。它明白，如果布尔什维克在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意义的总罢工上不破裂，那么他们以后也不会破裂，也不会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我们看到，总理事会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压力下，愈来愈坚决地攻击全苏

工会中央理事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退却了，让步了。这种退却是出于工会运动中的革命战略的考虑而决非外交上的考虑。只要读一读托姆斯基、安德列耶夫等人的报告和我们中央全会及政治局的争论就足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刊物就我们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极左病”发表的成百上千的文章，我们就不提了。应当从这些演说和文章中选出一部分以文选的形式加以出版并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

政治局的路线自然而然地和必然地以英俄委员会4月初的柏林会议而告终。可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上的投降既不是意外的举动，也不是突然的手段，——不，投降是必然的，它是我们事先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终结。显而易见，借口外交手段是牵强附会。

10. 布哈林同志在1926年6月初炮制出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反动工会中工作的必要性（我们也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导致仿佛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留英俄委员会。布哈林当时不顾明显的事实，完全否认英俄委员会是一个政治联盟，而不是一个“工会组织”。

现在，布哈林又创造了一种新理论，根据这种新理论，我们不惜以毫无原则的投降为代价而留在英俄委员会内不是出于“工会组织的”需要，而是为了外交的目的而保持同总理事会的政治联盟的必要性所要求的。

布哈林今天的理论同他昨天的理论截然相反。它们的共同之处只有一点，即二者都是百分之百的虚假，都是牵强附会，都是为了以后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证明从布尔什维克路线滚到妥协路线是正确的。

11. “右派”在战争的情况下将会背叛，就连布哈林也承认这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左派”，那么他们“大概”会背叛。但是，

如果他们背叛的话，那么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背叛”（按布哈林的话说），即不支持我们，但对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一种负担。不管这些想法多么可鄙，但还是应当对它们进行一下分析。

我们暂且假设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要知道，如果“左派”“以自己的方式”即不如“右派”积极、但比“右派”隐蔽地背叛我们，那么这不是由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的眼睛雪亮，而是由于英国的工人。这就是“左派”在所有问题（国内的和国外的）上的总的政治路线：背叛，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背叛。这种政策对他们自己有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为了他们那种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反正要执行的政策而答应“左派”放弃我们的政策呢？

12. 但是，“左派”在什么意义上将是政府的一种负担呢？显然，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曾是一种“负担”，或者是现在，在英国同革命的中国开战期间，在保守党人攻击工联主义者时，他们是一种“负担”。“左派”在不妨碍政府履行其剥削者和强盗角色的范围内批评政府。“左派”表达群众的不满是为了阻止群众参加革命活动。当群众的不满公开爆发时，“左派”竭力加以控制，使这种不满化为乌有。如果“左派”对资产阶级不批评，不揭露，不攻击，他们就无法“以自己的方式”为资产阶级效劳。

由此可见，必须承认，如果“左派”是一种负担的话，那也是一种有益的、适宜的、必不可少的、能救命的负担，没有它，英帝国主义的轮船早就沉入海底了。

的确，死硬派对“左派”暴跳如雷。不过，这是为了让他们服服贴贴；不让他们越雷池一步；对自己的“负担”不花多余的钱。像“左派”一样，死硬派是帝国主义机制中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13. 但是，要知道，“左派”在群众的压力下也能够越过资产阶级为他们划出的界线！这个理由也被加以运用。群众的革命压力可以破坏张伯伦—托马斯—普塞尔的把戏，这是不容争辩的。但

是，争论根本不在于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运动是否对工人国家有利，而在于我们是用自己的政策帮助它还是妨碍它。

群众愈担心战争的前景，愈不指望总理事会和相信“左派”叛徒（“以自己的方式”背叛的叛徒），群众的压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就愈有力。我们同总理事会代表团共同“一致地”签署了关于战争的可鄙的、骗人的、虚假的宣言，并以此来安抚群众，减轻他们的忧虑，麻痹他们，从而降低他们对“左派”的压力。

14. 柏林的投降可能维护“苏联的国际利益”！布哈林的这个错误是最令人发指的。苏联的利益正是由于政治局对总理事会的错误政策受到最大的和最直接的损害。任何东西也不能带来像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中的虚伪和谎言给我们带来的害处。我们骗不了敌人，即那些老练的，洞察一切的帝国主义者。虚伪将使动摇的和平主义者今后继续动摇。幻想和虚伪的政策只能够欺骗和削弱我们真正的朋友——革命工人。

正因为如此，列宁在给出席海牙和平大会（在这里必须同那些工联主义者、合作社工作者等打交道）的我国代表团的指令中写道：

“如果我们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中有几个人会用几种外语发表反战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意外的时刻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多少能够采取适当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①

列宁的这些话追求什么样的利益：苏联的国际利益还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列宁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把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13页。

一个同另一个对立起来。列宁认为，我们对工联主义者和平幻想的些微纵容，就会给真正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造成困难，从而给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带来同样的害处。列宁当时指的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而不是打上烙印的内奸，他们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在1926年5月以后注定要进入背叛徒的下一个环节。

15. 布哈林对此说道：如果我们只通过工会来行动，柏林的决定就是不能容许的。但是要知道，我们可以用党的手段来补充和修改在柏林做的事情。请看：我们正在《真理报》的文章中，在英国共产党人的演说等等里批评总理事会。

这个论据对革命的意识来说是真正有害的东西。布哈林的话只意味着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总理事会，而后者“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现在“批评”总理事会，在目前条件下是对我们支持总理事会、我们同它结成政治联盟的必然掩饰。

英国工人没有看到《真理报》的文章（关于普塞尔之流的问题谈得极其含混不清）。全世界的报刊都发表了柏林会议的决定。现在只有少数英国无产阶级知道英国共产党人的文章。而每个英国工人都知道普塞尔同托姆斯基的“真挚关系”、“相互理解”和“完全一致”。作为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代表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的行为比英国共产党人的演说重要得多，因此，人们不同意他们其实极为不够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自由也被英俄委员会限制住了。

总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为了同普塞尔结盟而投降是目前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事实。《真理报》的“批评”文章，布哈林的一批又一批新“理论”只不过是这一事实的餐具而已。

16. 同已经被我们一致宣布为英国无产阶级的“惟一代表”的叛徒玩弄腐朽透顶的假和平主义勾当怎么能巩固我们的国际地位呢？怎么能呢？要知道，柏林会议是在英国政府对中国公开进行军事行动并准备对我们也进行这种行动的时期举行的。我国的国际地

位的利益首先要求公开地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些事实。然而，我们对此只字不提。张伯伦知道这些事实，而且需要知道这些事实。诚挚的工人和平主义者面对这些事实可能转到革命路线上来。总理事会中卑鄙的和平主义的惟利是图者不可能公开说出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揭穿了他们同张伯伦反对英国工人、反对中国、反对苏联、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毋庸置疑的、心照不宣的阴谋。

我们在柏林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用工人国家的整个威信帮助帝国主义的走卒即“和平主义者”保守他们充当窃贼的秘密。而且，我们还要承担保守这些秘密的责任。我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在反战问题上同张伯伦在总理事会的代理人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削弱了英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力量，扩大了张伯伦的行动自由，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应当说得更具体一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柏林对总理事会的投降给张伯伦对苏联驻伦敦机构进行可能造成各种后果的攻击大开方便之门。

17. 不应忘记，由于英国是一个岛国，其边界不会受到直接的威胁，英国的改良主义者在上一次战争中得以比他们的大陆叛友具有较多的言论“自由”。但是，总的说来他们起的作用是一样的。现在，改良主义者，特别是“左派”由于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力图在发生新战争的情况下，比1914~1916年更起劲地欺骗工人。十分可能，如果苏联驻伦敦的机构遭到袭击（他们的全部政策就是为了策划这一行动），“左派”的抗议声将高过自由派。但是，如果英俄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的不是张伯伦，而是我们，大概双方就会在最初的24小时内达成谅解，敲起警钟，向群众解释形势的严重性。可是没有这样做，将来也不可能这样做：英俄委员会在总罢工时不知去向，当时总理事会拒不接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万恶的金钱”；英俄委员会在掘煤工罢工时也不知去

向；英俄委员会在炮击南京时也不知去向——因此，英俄委员会在英国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将不知去向，应当向工人说明这种残酷的真实情况。应当真诚地提醒他们。这样做将使苏联得到加强！

18.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既然允许我们对资产阶级让步；而如果把现在的总理事会看作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机构，那么为什么不会出于同样的考虑在我们对资本主义作出让步的同时对总理事会也作出让步呢？——有些同志开始在这个公式上兜圈子，这个公式是伪造者为了推行机会主义政策篡改列宁主义的典型例子。

我们在不得不对阶级敌人作出让步时，我们是对主人本身而不是对其孟什维克奴仆作出让步。我们从未掩盖和粉饰自己的让步。当我们对寇松^①的最后通牒让步时，我们向英国工人说明，目前，我们同他们还不够强大，无法直接接受寇松的挑战。为了应付最后通牒，即避免外交的破裂，我们用鲜明提出问题的办法揭示了实际的阶级关系，削弱了改良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地位。

我们在柏林从张伯伦那里毫无所获。我们为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作出的让步（总理事会新的扎根、不干涉原则等），不是为了交换对方的任何让步（不断绝关系，不发生战争），而是单方面的、遮遮掩掩的，并把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描绘成工人阶级团结的胜利。张伯伦无偿地得到了很多东西。总理事会的叛徒们也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得到的是名誉扫地。国际无产阶级中间产生了混乱和纷争。英帝国主义由于柏林会议强大了。我们却被削弱了。

^① 寇松，乔·纳·（1859～1925）——英国保守党人。1919～1924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19. 但是，据说，在如此尖锐的时刻断绝同总理事会的关系意味着，我们甚至不能同英国的工人组织和平共处。这会使帝国主义者得到一张王牌等等。

这个论据本身就是错误的。当然，在总理事会背叛总罢工以后，立即断绝同它的关系会有利得多，这也正是反对派所要求的。那样一来，这一年就不会对叛徒们客客气气了，而会无情地揭露他们。去年这方面的论据足够了。这样的政策会迫使总理事会的“左派”投降主义者在维护其残存的信誉的斗争中同“右派”划清界线，半真半假地揭露张伯伦，总之，向工人证明，他们“左派”完全不像莫斯科人把他们描写的那样坏。这会加深总理事会的分裂。而当改良主义的骗子们在争斗时，很多秘密都公开了，于是工人们赢得了胜利。同总理事会的这种斗争是同张伯伦在工人运动中的政策斗争的最佳形式。在这一斗争中，英国革命的工人骨干就会在一年内学会非常机敏地戳穿总理事会的骗子们和揭露张伯伦的政策。英帝国主义今天就会遇到多得多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反对派在去年6月提出的政策被接受，苏联的国际地位现在会更加强大。**

姗姗来迟的这次分裂至少应当在掘煤工罢工期间发生，无论是百万掘煤工，还是数百万受骗的总罢工的参加者都完全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关于这一点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说是同国际工会运动的利益不相容。后果是众人皆知的：它们在柏林得到巩固。今天有人硬说，对于已经带来如此多害处的根本错误的路线，由于**国际形势的困难**，今后也应当予以支持，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掩盖领导的错误而牺牲苏联的国际地位。布哈林的整个新理论没有其他的含义。

20. 现在纠正错误虽然晚了一年，但仍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当然，张伯伦会说，布尔什维克甚至不能同英国工联主义者和睦共处。但是，诚实的、多少有点觉悟的英国工人会说：“极有耐性的

俄国布尔什维克即使在我们罢工期间也没有同总理事会决裂，但在总理事会拒绝同破坏中国革命的行径作斗争时，就不可能继续维持同它的友谊了。”英俄委员会的腐朽的宣言将被屏弃。工人们将看到实际的事实，实际的关系。到时谁受损失呢？是帝国主义，它需要腐朽的宣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

21. 我们还是再来谈谈布哈林的最新理论。正如我们所知，布哈林的看法与托姆斯基相反，他认为柏林决定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由特殊情况造成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例外。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战争的危險，这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仅此一个事实就应当使每个革命者警惕起来。结果是：革命的政策适用于比较“正常的”条件；当我们面临生死存亡问题时，只好用妥协政策取代革命政策。

考茨基为第二国际在1914年垮台进行辩护，他后来发明了一种理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换句话说，考茨基宣布，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在和平时期是正常的，但是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只好作为例外，同资产阶级政府缔结联盟，同时仍在报刊上“批评”它。

现在，对国际无产阶级来说，问题不仅仅是像1914年那样同资产阶级国家作斗争，而且是直接捍卫工人国家。但是，正是为了捍卫工人国家，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在战争危險的条件下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对无产阶级来说，要防止或延缓战争危險，只能让资产阶级面对变这种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实际危險。换句话说，战争危險不是要求从革命政策变为妥协政策，恰恰相反，要求更坚定、更坚决、更不妥协地执行革命政策。战争把所有问题都十分尖锐地提了出来。战争比和平情况下更不容许摇摆不定和含糊不清。如果在和平时期同出卖总罢工的普塞尔结成联盟是一种障碍，那么在战争危險的情况下就是挂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磨

盘。如果认为在工人国家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从布尔什维主义者倒向机会主义是正确的，就等于原则上投降机会主义：因为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的革命政策还有什么价值呢？

22. 总之，是否可以说这一次利用工会是为了国际阶级政策的利益，而下一次是为了某种特殊的外交目的呢？是否可以让联共、共产国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一些代表在一种情况下说总理事会是叛徒和骗子，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说它是志同道合者和朋友呢？以后是否只要秘密地说明，对第一种情况应从革命的阶级意义上去理解，对第二种情况从外交意义上去理解就行了呢？是否可以认真地对待这样的政策呢？是否可以认真地对待提出和捍卫这样的政策的人呢？

在柏林会议以后，“叛徒”一词对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代言人来说变得分文不值。而且像“真挚的关系”、“相互理解”和“一致”（托姆斯基同志的话）这些词也变得同样分文不值。这些非常狡猾的阴谋手段是对付谁的呢？它们一分钟也骗不了敌人。它们只能给朋友们造成混乱，减轻我们自己言行的分量。

23. 布哈林的新理论不是孤立的。一方面，有人对我们说，同显然背叛的总理事会的无原则的交易巩固了苏联的国防。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工农苏维埃的建立意味着威胁苏联的国防。这不是等于攻击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础吗？中国工农苏维埃标志着大大延长了苏联战线和巩固了我国的和平阵地。相反，同总理事会的交易实际上缓和了英国的国内矛盾，使张伯伦更容易对中国和我国采取强盗行径。

机会主义的例外（“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新的原则可以得到广泛的运用。越来越多地用避免武装干涉的必要性来说明向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上层靠拢的理由。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成了为“不干涉”原则辩护的理由。于是从各个方面编织可以套死布尔什

维主义革命原则的圈套。必须永远结束这种做法！

必须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必须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的、政治上旗帜鲜明的国际运动。我们同总理事会的联盟现在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障碍，就像我们同蒋介石的联盟是中国工农革命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一样。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反革命利用它来反对我们。国际形势变得越尖锐，英俄委员会就越发会变成英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的工具。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只有不愿意了解的人才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如果再失去哪怕一天也是犯罪。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No09433

托洛茨基就提纲事致皮亚特尼茨基

（1927年5月18日）

致共产国际苏联代表团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鉴于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在最后时刻被分发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随信附上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的批评，它完全适用于布哈林同志的新提纲。结尾部分我是用俄文写的。请采取措施把这个结尾部分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8日

附：^①（1）《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德文本（没有结尾部分）。

（2）结尾部分（跋——《陈独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演说》和《必然的结局》）没有译成外文。

^① 附录没有发表。

№09434

托洛茨基就提纲问题致中央书记处

(1927年5月18日)

1. 我今年5月11日向中央书记处提出请求：告诉我何时何地可以看到近两个月政治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至今没有回音。

2. 我今年5月11日请求及时告诉我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以便进行修改，至今没有回音。

3. 鉴于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重复斯大林同志提纲的所有错误，我把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的提纲送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中包含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的批评。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8日

№09435

托洛茨基就提交提纲致
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委主席团

（1927年5月18日）

在争取和平的问题上，我将捍卫随信附上的提纲。

我试图得到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5月11日会议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就像我试图得到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以及其他许多尝试一样，但都没有结果。但是，布哈林同志的论据的实质我已了解得一清二楚。我的提纲正是针对这些我认为根本错误和极其有害的论据的。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8日

附：提纲《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①

^① 见本卷№09431。

No09436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①

（1927年5月25日）

同志们：在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导致了沉重的失败，只有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才能摆脱这种失败。在讨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时发生的极不正常的情况在党内造成十分紧张的形式。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进行的片面的“争论”和对反对派观点的故意歪曲（例如，认为反对派要求退出国民党），证明中央领导集团试图通过中伤反对派来掩盖其错误。所有这一切正在把党的注意力引向错误的道路。

鉴于这种情况以及中央在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路线，我们认为，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份声明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职责。

1. ……

2. 而英国去年的总罢工由于总理事会的出卖遭到了失败。掘煤工罢工也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千百万群众大大向左转；尽管改良主义的背信弃义和卑鄙无耻从来没有像英国大罢工时暴露得那样充分，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有组织的革命派都极少赢得胜利。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这方面的领导不够坚决、彻底、明确。苏联工人给予英国掘煤工的金钱支持是最多的。而中央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策略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总理事会的叛徒们在总罢工和

① 即所谓《83人声明》。实际上在文件上签名的有84人。

矿工罢工期间最危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维护了他们的威望。我们帮助他们站稳了脚跟。结果，我们在最后一次柏林会议上向他们投降，承认总理事会是英国无产阶级的惟一代表（甚至是无产阶级观点的惟一代表），并在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的内部事务的“原则”下签了字。

在发生中国的事件的情况下，英俄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决定具有特别恶毒的意义。托姆斯基同志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其他代表在所有国际报刊上声明，柏林会议具有“真诚的性质”，所有决定都是“一致”通过的，这些决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等等。

这些谎言和假话只能把世界工人运动引向新的失败。

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只字未提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扮演的强盗角色，甚至未提要求帝国主义军队撤出中国。在中国爆发帝国主义者直接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时，英俄委员会罪恶地保持沉默，而这正是英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

毋庸置疑，谁现在在世人面前甚至在像英国工会自由问题上公开出卖英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明天，在爆发反苏战争的情况下，谁就会扮演这些先生们在1914年曾经扮演过的那种卑鄙背叛的角色。

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和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错误路线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现在，在共产国际的整个政策方面正奉行同样的路线。在德国，成百上千的左派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只是由于他们同俄国反对派观点一致而被开除出党。右派分子在各党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优势。右的极大错误（在德国、波兰、法国等）仍然没有受到惩罚。“来自左面的”最微弱的批评都被隔断。于是联共和十月革命的威望被用来推动共产党离开列宁主义路线向右转。所有这些使共产国际失去了按列宁主义方式准备和进行反战斗争的可能性。

3. 对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容辩驳的是，在中国问题和

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错误路线不是偶然的。它是国内政策上的错误路线的继续和补充。

苏联的经济大体上结束了恢复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工业、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我们或者接近，或者超过了战前水平。在合作化方面也取得了成绩。这些成绩是对列宁宣布的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和对十月革命的敌人的最好回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完全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最初的成就，从而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起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作好准备。

但是，在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恢复时期也出现了很多困难。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和我国的经济落后而日益增长的这些困难，由于向广大党员群众隐瞒而更变得加严重。不是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把一种不正确的、小资产阶级的、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塞给了党。这种粗暴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径使党很难看到正在进行的经济过程的阶级内容。然而，正是在对无产阶级不利的阶级变动里和人民群众的艰难的状况里包含着我們目前所处的革命时期的消极现象。

工资问题和失业问题越来越尖锐。

错误政策使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富农、耐普曼、官僚主义者加速增长。这导致不可能在应有的程度上和通过应有的方式利用国家现有的物资来发展工业和整个国有经济。大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商品荒、高价、失业）和整个苏维埃制度（国防）对它提出的要求，这种状况导致苏联的经济中特别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加强。

工资停止增长，一些工种的工人的工资趋于下降。前不久取消

了根据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工资的办法，现在规定通常只有劳动强度提高工资才能提高（见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定的第2节）。就是说，从今以后苏联工人可以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但不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改进，而只是由于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和体力。这样提出问题还是第一次，其实现在的劳动强度总的说来已达到战前水平，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这样的政策侵犯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失业人数的增长不仅仅由于来自农村的人，而且由于骨干工业无产阶级。实际失业人数超过了登记失业人数。失业大军的增加使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工人的住房条件无论就住房面积，还是就使用房间的条件，在许多地方仍在继续恶化。

童工权利的减少和实行无薪学徒制使青年工人的状况急剧恶化。

由此而产生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关系对工人国家的命运来说是决定性的。

工业品价格的降低极其有限。尽管反对派在中央二月全会上投票赞成降低物价的决议，但所有官方的宣传都在责难反对派，仿佛他们不愿意降低物价。这样的宣传使党产生误解，使党的注意力离开我国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这使降低物价的问题寸步难行。同时，城乡消费者的不满和急躁情绪在增长。

农民分化的速度日益加快。中央的领导核心从“发财吧”的口号，从号召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转而对农民分化避而不提，并对这一分化估计过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转而在实际上指望殷实的农民。十月革命快10年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300多万农村雇农在苏维埃、合作社、党支部中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贫农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帮助。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农

业的决议完全不提农村的分化，即农村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在削弱我们在农村的支柱，给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同中农的联盟造成困难。这个联盟只有在不断反对富农的剥削欲望的斗争中才能发展和巩固，而我们则低估了富农的发展和作用。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这种危险逐渐聚集起来，有可能突然爆发出来。然而，所有的官方机构，不论是党的还是苏维埃的，都把打击矛头指向左面从而为真正的即来自右面的阶级危险敞开大门。

让50%的农户即贫苦农民和穷家小户免交农业税的建议遭到中伤。然而，这个建议越来越被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证明是正确的。从50亿预算的角度来看，几千万卢布算不了什么。然而，向穷家小户征收这个数目却是加速农村分化过程和削弱农村无产阶级专政阵地的因素之一。“善于同中农达成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农”（列宁语）——这应当是我们农村政策的基本路线。

去年9月，我们看到了三位居于最负责岗位的同志（李可夫、斯大林、古比雪夫）签署的号召书，说什么反对派即我们党的一部分和其中中央的一部分打算“掠夺”农民。号召书则许诺通过节约制度每年减少非生产性开支3亿~4亿卢布。实际上，遭到官僚主义歪曲的建立节约制度的斗争使工人们受到新的搅扰，没有带来多少明显的好的结果。

工业的合理化带有偶然的、不协调的、欠考虑的性质，结果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推入失业者队伍，同时也没能使成本降下来。

必须废除最近两年使工人状况恶化的所有决定并坚决地认定，不经常地和有计划地改善（哪怕起初很慢）工人阶级这个“基本生产力”（马克思语）的状况，在目前情况下，既不可能振兴经济，也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国内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国外敌对势力对苏联的攻击增强、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的情况下，解决目前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所面临的问题的主要条件，是恢复党内的民主和加强党同工人阶级的真正有效的联系。

我们必须有铁的党的纪律——像列宁在世时那样。但我们也必须有党内的民主——像列宁在世时那样。

全党从上到下应当成为一个具有布尔什维克思想和坚强组织的紧密团结的集体，应当吸收所有群众真正地、而不是徒有虚名地参与解决党、工人阶级和全国面临的所有问题。

最近规定的党内制度大大降低了党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的积极性。对于广大基层党员群众来说，自觉地参与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问题的可能性被大大缩小和降低了。

这不能不对工人阶级对党的态度和对整个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产生影响而且正在产生最消极的影响。

党内规定的制度完全被搬到工会中来。俄国工人阶级拥有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进行三次革命的经验，是由自己的优秀儿女的鲜血凝成的苏维埃国家的坚强基石，表现出了奇迹般的英雄主义和组织性，具有最广泛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组织力的一切先决条件。但是，现在规定的制度妨碍工人们发挥自己所有的积极性，妨碍他们把全部力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无产阶级专政自身的阶级基础正在遭到削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告诫全党，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正确地选拔人才，然而，现在的方针直接违背这些指示。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常常把最有独立精神的党员熟练工人和最有主动精神的管理人员推出工厂，代之以一些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向顶头上司大献殷勤的人。可见，党的制度的严重错误影响到千百万群众最切身的利益。

4. 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战争的危險日益增加。联共和国际

无产阶级所有先锋队的中心任务现在就是防止（或者哪怕只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拖延）战争，就是坚持和尽一切可能捍卫只有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才能彻底执行的和平政策。

苏联的事业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防止苏联面临的新战争危险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任务。但决不能采取同总理事会的叛徒们联盟的办法来防止。同普塞尔和西特林之流联盟不可能进行任何像样的防止战争的斗争。只有越过这些叛徒领袖并同他们进行斗争，才能接近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和非党工人，吸引他们参加反战斗争。

我们坚决要求我党中央帮助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根据文件详细地、认真地和公正地调查中国最近的事件（吸收维护我们观点的同志参加这一工作），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充分地提出中国问题和英俄问题，要求在我们党的刊物上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刊物上全面地和详细地讨论这些根本问题（当然，要保守必要的秘密）。

加强苏联的国际地位需要在苏联国内加强革命无产阶级路线。拖延增加工资、工人们恶劣的居住状况和日益增多的失业人数削弱了我们。对贫苦农民的错误政策削弱了我们。经济政策中的错误削弱了我们。英国工人和中国革命的失败削弱了我们。不正确的党内制度也削弱了我们。

我们党的整个政策受到右倾方针的损害。如果现在准备向左对反对派进行新的打击，这将彻底使右派、非无产阶级分子和反无产阶级分子放开手脚，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就在我们自己党内，但大多数在党外。对左派的打击将不可避免导致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的胜利。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了新的新经济政策早就要求对反对派进行这样的打击。乌斯特里亚洛夫是布尔什维主义最彻底的、最根本的和最不可调和的敌人。自负的行政首长、看上司脸色行事的官吏、谋

到一官半职后盛气凌人的小资产者越来越感觉到立足点十分坚实，于是越来越趾高气扬。这就是所有的新的新经济政策。在他们的背后站着乌斯特里亚洛夫式的专家，而下一排则是打着殷实农夫幌子的耐普曼和富农。真正的危险就是从那里来的。

国内问题上的变动不像国际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明显，因为国内的进程比英国总罢工或中国革命的发展慢得多。但政策的基本倾向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是一样的，这些倾向在国内的发展越慢，也就表现得越严重。

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存在官僚主义畸变的工人国家。这是在1921年初说的。列宁的定义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生命力。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城乡的新资产阶级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反对派的打击不是别的，而是试图在捍卫统一（恩格斯说“任何搞分裂的人都会高声叫喊统一”）的虚伪叫喊声中破坏我们党的左翼无产阶级列宁主义派的名声，摧毁他们……这种摧毁意味着联共右派将不可避免地迅速地得到加强，意味着将同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使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于其他阶级的利益的前景。

5. 我们永远需要党的统一，特别是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大家在列宁的学校里经过学习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应当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达到统一。在最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在地下活动年代，以及后来在1917年，我们在战火中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在1918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解决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在列宁生前的最后几年，党公开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并找到了通向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统一的正确道路。这样就在比现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拯救了我们。

主要危险在于，向党和工人阶级掩盖了分歧的真正内容。向党提出有争议问题的任何尝试都被宣布为对党的统一的破坏。自上而

下采取机械的办法将错误的路线固定下来，形成了表面上的统一和形式上的安定。实际上，这削弱了党在工人阶级中的阵地和工人阶级在它同阶级敌人斗争中的阵地。这种状况给党的政治发展和对党实行正确的列宁主义领导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从而必然使我们党一遇到急转弯、一遭到国内的和国际的严重打击就面临极其严重的危险。

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危险，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醒中央注意这一危险——正是为了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基础上实现党的队伍的团结。

* * *

怎样根除分歧，怎样拨正阶级路线，同时又丝毫不损害党的统一事业呢？

要像列宁生前始终做的那样。

我们建议中央解决以下问题：

(1) 最迟在十五大召开前的3个月召开专门的中央全会，以便事先讨论十五大的所有问题。

(2) 这次全会应当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作出一致的決定，这样能够最有力地保证最大限度的统一和真正消除党内斗争。

(3) 这次全会应当委托联共政府^①在共产国际内倡议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使被开除的同志中向共产国际提出请求并站在共产国际立场上的人回到党内，使各兄弟党实现完全的统一。（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像卡茨和科尔什那样的人。）

(4) 如果在这次专门的中央全会上还是暴露出一些原则性分歧，那就应当及时予以说明和公布。每个同志都应得到在党面前维护自己

^① 原文如此。似应这“代表”。

观点的机会——在报刊上和在会议上，列宁生前总是这样做的。

（5）争论应当严格限制在同志式的、实事求是的范围内，不应加剧和夸大。

（6）中央、地方组织、个别党员和党小组的提纲草案，应当在十五大召开前的大约2~3个月发表在《真理报》（或《真理报》附刊上）以及地方党报上。

（7）党的出版社也应当及时为那些迄今为止在党内不占多数、但希望向党阐述观点的党员出版小册子、书籍、文集等。

（8）十五大整个筹备工作的主要口号应当是联共的统一，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

* * *

附言：当然我们的声明由于征集签名而耽搁了，我们将声明提交出来时，上头借口5月9日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所谓非党会议上发表讲话而掀起了反对他的运动。我们当中听过季诺维也夫同志讲话或有机会看过讲话速记记录的人毫不动摇地在这个讲话上签了字，该讲话以审慎的和无可指责的党的形式表达了党内广大阶层对马尔丁诺夫方针在《真理报》上的专横的担忧。当然，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讲话只是对他进行迫害的表面借口。从我们的整个声明可以看出，反对反对派的运动的直接准备工作是在中国革命遭到第一批众所周知的失败时开始的。

据我们所知，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运动的直接目的是试图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和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以便少一个在筹备十五大期间和在代表大会上批评错误路线的人。明天对担任中央委员的其他反对派成员同样会这样做。对党来说这种手段有百害而无一利。

政治局坚持不让季诺维也夫同志——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和

根据列宁建议当选的第一任主席——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讨论世界工人运动最重要的问题时，不让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参加，对此我们只能用那些用行政命令代替思想斗争的人**缺乏政治勇气**来解释。这个事实除了它的政治意义外，也是对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选举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正式权利的粗暴破坏。对列宁主义者采取停职和污辱的办法对**共产国际**来说不是实现统一的办法。

完全可能，我们这份声明将为指责我们进行派别活动提供借口。那些无所不为的官吏和“新”“青年”学派中的“著作家”尤其会大做文章。顺便说一句，我们的信也是针对他们的。他们当中的另一些人在危急时刻首先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事业。我们提出这个声明，是履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通常理解的革命者和党员的义务。

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数十名老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声明上签名。我们相信，现在住在苏联许多地方和国外的其他老布尔什维克一旦知道这个声明，也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相信，这个文件所阐述的观点一定会得到我党大多数人的赞同，特别是得到工人党员的赞同。谁了解工人和我们党的党员的真实情绪，谁就会对此深信不疑。

亚历山德罗夫，A.H.——1917年加入联共（布）

阿夫拉姆松，A.Б.——1914年加入联共（布）

阿尔斯基，A.C.——1917年加入联共（布）

阿尔沙夫斯基，З.——1915年加入联共（布）

别洛博罗多夫，亚·格·——1907年加入联共（布）

别利亚伊斯，扬·亚诺维奇——1912年加入联共（布）

布津斯卡娅，P.И.——1914年加入联共（布）

- 瓦巴汉，Н.——1917年加入联共（布）
- 维斯涅夫斯卡娅——1905年加入联共（布）
- 沃罗比约夫，В.——1914年加入联共（布）
- 瓦连廷诺夫，Г.——1915年加入联共（布）
- 维连斯基（西比亚科夫）——1903年加入联共（布）
- 武伊奥维奇——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1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
- 弗拉切夫，И.Я.——1907年加入联共（布）
- 瓦西里耶夫，Ив.——1904年加入联共（布）
- 瓦尔金，Ил.——1907年加入联共（布）
- 格尔季克·阿尔乔姆——1902年加入联共（布）
- 赫尔茨贝尔格——1917年3月加入联共（布）
- 格森，С.М.——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执委会委员，1916年加入联共（布）
- 古拉利斯基
- 戈尔东，Ник.——1903年加入联共（布）
- 叶梅利扬诺夫，Н.А.——1899年加入联共（布）
- 叶尔科维奇，Н.А.——1917年加入联共（布）
- 叶夫多基莫夫，Г.Ер.——1903年加入联共（布）（中央委员）
- 叶若夫，П.С.——1917年3月加入联共（布）
- 茹克，Алекс.Вас.——1904年加入联共（布）
- 季诺维也夫，格·叶·
- 佐林，С.——1917年5月加入联共（布）
- 扎克斯-格拉德涅夫——1906年5月加入联共（布）
- 伊万诺夫，В.И.——1915年5月加入联共（布）
- 科斯佩尔斯基，И.——1917年3月加入联共（布）

- 卡塔, М.——1917 年加入联共 (布)
- 库克林——1903 年加入联共 (布)
- 卡纳特奇科娃——1914 年加入联共 (布)
- 科斯特里茨基, И.
- 科瓦连科, П.——1911 年加入联共 (布)
- 科罗廖夫, А.——1916 年加入联共 (布)
- 卡夫塔拉泽——1903 年加入联共 (布)
- 科兹洛娃-帕谢克——1917 年 9 月加入联共 (布)
- 列列维奇, А.Г.——1917 年加入联共 (布)
- 洛巴绍夫, Г.——1917 年加入联共 (布)
- 利夫希茨, Б.——1915 年加入联共 (布)
- 拉济科, М.——1905 年加入联共 (布)
- 利兹金——1892 年加入联共 (布)
- 穆拉洛夫, 尼·伊·——1903 年加入联共 (布)
- 米尼切夫——1911 年加入联共 (布)
- 马列塔, В.——1916 年加入联共 (布)
- 马尔采夫, Б.——1917 年加入联共 (布)
- 马滕, Г.——1917 年 5 月加入联共 (布)
- 瑙莫夫, И.К.——1913 年加入联共 (布)
- 纳济莫夫, А.Е.——1917 年 7 月加入联共 (布)
-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Н.——1903 年加入联共 (布)
- 彼得松, А.——1917 年起任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 波兹杰耶娃——1917 年加入联共 (布)
- 普里马科夫, В.——1914 年加入联共 (布)
- 皮达可夫, Ю.Л.——1910 年起任联共 (布) 中央委员
- 普萨尔莫佩夫涅夫——1916 年加入联共 (布)
- 拉维奇, О.Н.——1903 年加入联共 (布)

- 拉狄克，卡·——1902年加入联共（布）
- 列姆，М.С.
- 谢列布里亚科夫，Л.П.——1905年加入联共
- 斯米尔诺夫，伊万·尼基，——1899年加入联共
- 谢尔盖耶夫，А.Н.——1914年加入联共
- 索柯洛夫，А.А.——1914年加入联共
- 萨法罗夫，格·——1908年加入联共
- 斯米尔加，伊·捷·——1907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
- 萨姆索诺夫，М.——1903年加入联共
- 索斯诺夫斯基，Л.——1903年加入联共
- 萨尔基斯——1917年加入联共
- 萨多夫斯卡娅——1917年9月加入联共
- 捷尔-瓦加尼扬——1912年加入联共
- 图曼诺夫——1917年4月加入联共托洛茨基，列·达·
- 费多罗夫，格里·——1907年加入联共（布）
- 冯贝尔施泰因，——1917年加入联共（布）
- 福什金，Ф.П.——1917年加入联共（布）
- 哈里托诺夫，莫·马·——1905年加入联共（布）
- 察图罗夫，А.А.
- 沙罗夫，Я.——1904年加入联共（布）
- 舒雷金，А.С.——1914年加入联共（布）
- 舍普舍列娃，М.И.
- 舒斯特尔，А.——1912年加入联共（布）
- 齐布利斯基，З.С.——1904年加入联共（布）
- 埃利钦，В.——1898年加入联共（布）

[1927年5月25日]

№09437

叶夫多基莫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5月25日）

现在附上的这封集体信^①，从其正文来看，是在蒋介石政变和英俄委员会的柏林决定暴露了中央多数派在具有国际意义的基本问题上执行的政策完全错误之后写的。正是这种错误的政策除了在国内问题上导致急剧变化外，还大大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这封集体信是我们在英国保守党人利用我们在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上的政策的动摇，把事情弄到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候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因此，我们深信，业已形成的极其尖锐的形势使这份党的文件平添十倍的意义。

正确的路线永远需要。但是，形势愈严重，就愈需要正确的路线。在目前条件下，正确的路线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现在掩盖错误就意味着在悬崖边上闭目行进。面对所谓我们在断绝同英国的外交关系时溃不成军的叫喊，或者我们试图“利用困难”的更恶毒的叫喊，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叫喊，我们镇定自若，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在列宁的学校里学过屏弃所有有条件的、虚假的、矫揉造作的、同无产阶级的政策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面临的任务和困难愈严重，它们就会愈迅速愈坚决愈尖锐地向党提出国内的和国际的政策的所有基本问题。在革命和战争这些问题上，耍小聪明、等待观望或以权威自居，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所

^① 见本卷文件№09436。

帮助。

这里无须重复，我们需要和平政策。但是，一旦战争真落到我们头上，一方面，每个工人、每个雇农、每个贫农，另一方面，每个富农、官僚、耐普曼，都会尖锐地提出问题：什么样的战争，为什么的战争，战争将用什么办法和手段进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争的威胁尖锐地提出了政治的所有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应当给予明确的回答——在口头上或行动上。国际无产阶级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些回答，同样，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也都需要它的援助。能够毁灭我们的是模棱两可、玩弄诡计、在各阶级之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能够而且一定能够拯救我们的是明确的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党的不幸在于，它在最近时期被人为地剥夺了正确讨论和集体解决事关工人阶级与工人国家命运的问题的机会。据说有人为他们的命运、为党操心和作决定。在最危机的时期，这样的制度是绝对不能容忍和不能允许的。一批布尔什维克——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说明了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可以而且应当使党摆脱危机，从而使党能够完全有准备地迎接日益临近的危险。在这条惟一能够得救的道路上，我们准备用全部力量和一切手段帮助中央委员会。

Г. 叶夫多基莫夫

格·季诺维也夫

伊·斯米尔加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25日

№09439

拉狄克：热月危险和反对派

(1927年6月)

1. 什么是热月危险？

苏联的热月危险就是资本主义胜利的危险，而且这种胜利的取得不是通过世界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推翻工农政权，也不是通过资本主义分子的暴动，而是通过苏维埃政权从无产阶级政策的轨道慢慢地退向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道路。在把这种蜕变危险称作热月危险时，谁也不会认为会重演法国革命时期发生的事件。这种比较着重指出的是，在法国革命中，阻止革命发展的势力来自领导革命的雅各宾党内，正像在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可以找到企图扭转历史车轮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势力一样。

2. 是否可以指出热月的危险呢？

当然，如果这种危险存在的话，那么不仅可以指出它，而且指出它也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直接责任。我们队伍内首先开始指出这种危险的是列宁。列宁借乌斯特里亚洛夫1922年春天发难之机就“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的问题提出以下看法：

“路标转换派这样提出问题：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

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①

列宁指出的事实和可能性，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资产阶级报刊也经常指出。他们和列宁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指出这样的倾向（意图）是为了从中汲取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而列宁指出蜕变的危险，为的是警告无产阶级和动员一切革命力量同这种危险斗争。谁反对指出蜕变危险的共产党人，谁引证孟什维克的报刊来证明反对派同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相似，谁就只能证明，他自己就是热月的帮凶。俄国革命中的热月分子比法国的热月分子更得掩盖自己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径，以易于实施。无产阶级革命已经10年了，列宁学说的广泛传播使人民群众的注意力更加敏锐，因此必须引证列宁的话来掩盖任何背离列宁主义、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径。只有在革命词句的掩盖下，热月倾向才能得逞。

3. 联共（布）内的热月倾向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热月倾向的第一个标志是竭力鼓励生产力的发展，不管它们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贫穷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现在变得更加贫穷了。它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因此，很多人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在短时期内通过社会主义经济使它富裕起来，那就应当鼓励任何振兴经济的愿望。例如，如果我们没有力量相当迅速地建立国有工厂，那就应当尽可能把许多建设工厂的租让合同交给外国资本家。这是否正确呢？如果外国资本家建设的工厂比工人国家手中拥有的工厂还多，那么他们在苏联的经济实力就会强大无比，以致可以摒弃工人政权，或者至少可以迫使工人政权完全考虑他们资本家的利益。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如果苏联收取巨额贷款，就会受资本家的奴役。列宁教导我们说，租让制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好处，但他只允许在不威胁工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91、92页。

人政权的范围内实行租让制。他对贷款的态度也是这样。

经验表明，外国资本家不会急于得到我们的租让合同和给我们贷款。但是，由于租让企业的过度发展和贷款的金绳索而可能威胁我们的危险，现在由于苏联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威胁着我们。富农是苏联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基础。苏联的富农有几百万。富农不是大资本家，而是小资本家。但是，小资本家可以成长为大资本家。富农使千百万雇农、小农依附于他们，从而成为威胁工人政权的力量。与此同时，城市里的耐普曼、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在增长。如果富农不遇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坚决反击，那么他们将对工人国家造成威胁。因此，谁想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谁就是在为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做准备，这不取决于准许富农发展是否是为了扩大出口，或者是否希望富农把钱存在我们的银行里，从而“长入社会主义”。凡是对党内的富农危险估计不足、反对消灭贫困的叫嚷、要求鼓励“善于经营的庄稼汉”和“生产商品的庄稼汉”的人，凡是称贫农为懒汉的人，都是我们党内自觉或不自觉的热月倾向的代表。

(2) 那些虽竭力发展国有工业，但不关心无产阶级参加工业领导和不注意不断改善工人状况的人，也是热月倾向的代表。我国的国有工业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因为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无产阶级国家。我国工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基础。因为只有工业提供的拖拉机、电力等物资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农业，也就是从小私有者的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耕种土地。但是，只有当所有的工人群众，而不仅仅是少数被派往工人国家的经济机关和被提拔到红色经理等等岗位的工人群众代表参加到这一建设中去时，社会主义工业的真正发展才有可能。谁不重视生产会议，不去发展它，谁排挤工厂委员会，谁在工厂迫害批评工厂制度的工厂通讯员，谁就是在扼杀工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关心。这样做

不仅减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且削弱了工人阶级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工人判断我国工业的性质不是根据一般的定义，而是根据他的感觉即他觉得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还是缺乏意志的工具。工厂里没有工人民主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工厂。

不关心工人的状况具有同样的意义。国家还很穷，它的生活水平低得可怜。对此我国工人非常理解。但是，他们不理解的是，节约劳动保护方面的投入，节约制度不是表现在节约汽车、行政经费上，而是表现在通过降低计件工资、榨取血汗而人为地减少工资上。工人们要求他们的福利随着工业的增长而提高。他们的这种要求维护的不是什么“车间的”特殊利益，而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因为没有健康的和有文化的工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业。

那些认为自己是工厂的主人、不了解只有同工人群众一起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管理人员，那些忘记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为发展工厂的工人民主制、为工人的健康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而斗争的工会工作者，那些追随和附和工厂行政机构的工会工作者，都是热月倾向的代表，因为他们正在破坏工人阶级同发展国有工业这个工人政权的经济核心的密切联系。

（3）谁允许富农、耐普曼、路标转换派知识分子的代表进入我们的政权机关，谁就是热月的代表。富农在我国人口中占的百分比很小，但是，尽管如此，决不能允许他们进入苏维埃，因为他们是富人并使相当一部分贫农依附于他们。他们有可能夺取我们最基层的政权机关。路标转换派知识分子对苏维埃说尽甜言蜜语，但他们的目的是慢慢地把权力一部分一部分地夺过去，以便把我们的政策引向资本主义轨道。允许他们参加苏维埃机关意味着使他们有可能同富农相勾结，有可能代表富农的利益。

是否存在允许富农、路标转换派等进入我们机关的倾向呢？是的，这种倾向是存在的。只要指出扩大富农在村苏维埃的选举权和

反对“消灭贫困”的叫喊就足够了，这些做法在反对派的批评下才被取消。只要指出工人老党员叶夫多基莫夫和萨普龙诺夫被赶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富农政客、立宪民主党的合作社工作者萨德林却被请进去就足够了。

(4) 在联共内部消灭党内民主的人也是热月倾向的代表。联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者和主要工具。没有先进工人和贫农的组织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捍卫专政，人民群众需要领导人。但是，联共并不是委员会的总和，而是善于思考、能够分析各种事物的工人群众，他们不是根据激情行动的。上百万党员不可能成为按照上面的命令而开动的一部机器。如果联共党员都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推论和决定，党就会存在和发展。谁想用修改领导机关在没有群众参与下通过的决定（而群众只是研读这些现成的决定）来取代这种经常性的思想和感情工作；谁禁止在联共内开展批评，谁就是把生机勃勃的联共这一专政的捍卫者、争取社会主义的战士变成名存实亡的组织。这样的联共不会给自己的中央以任何关心。这样的党在投票时意见高度一致，但优秀的工人将离它而去，它将成为由钻营者、阿谀奉承者和把党证看作避免失业的保证的人组成的乌合之众。这样的联共不仅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无能力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缺少在危急时刻能够领导工农群众前进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精干力量。因此，争取党内专政的斗争是反对热月倾向的斗争。

(5) 谁把党的机关置于党之上，谁就是在为热月扫清道路。

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战斗组织。只有它能够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机关，即县委、省委和中央委员会拥有的革命力量就是党内现有的革命力量。即使党的领导机关毫无例外地都由优秀的共产党员组成，光靠它们也无能力进行革命事业。如果党的领导机关脱离了党，那么，这已经预示将出现巨大的危险。为了捍卫革

命，没有理由脱离党，把自己置于党之上。脱离党意味着它们企图用向其他阶级让步的政策、同其他阶级妥协的政策来代替捍卫工人专政的政策。我们党是执政的党。不存在脱离阶级的政党。如果政权脱离工人阶级政党，那么政权就会落入其他阶级之手。

我们党内是否有这种企图呢？是的，这种企图是有的。这种企图表现在，支部书记和地方组织的书记依靠中央要比依靠党员群众多，他们压制党员对他们的任何批评，党代表大会不按党章规定每年召开，党的政治局使党中央在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上面对既成事实，党的总书记拥有甚至列宁也从未为自己要求过的权力。这些倾向在党的总书记斯大林的声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撤除党的领导干部。如果把这个声明当真，而不是当作官僚主义的胡言乱语，那么，它将意味着，党不能更换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不是工人先进分子的机关，它操纵党的政策，党是不存在的。而如果党不存在，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失去了利剑，失去了保护，政权的性质将任由党的领导人决定。那时政权蜕变的道路将敞开，因为列宁说过：“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①

（6）谁牺牲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同国际资本相勾结，谁就是热月企图的帮凶。列宁教导我们要懂得，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灵活机动，即对国际资本主义作出一定的、暂时的、局部的让步，但他知道并指出了这些让步的界限。这样的界限就是专政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苏联不仅会承认债务，甚至会支付一定的债务利息，以避免战争或得到贷款。但是，谁要以苏联的名义提议支付的债务利息导致我国国有工业增长的延缓，谁就是热

^① 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92页。

月分子，因为没有我国国有工业的发展就不能捍卫工人政权。

为了克服商品短缺现象，苏联可以允许进口一定数量的外国商品，哪怕这些商品是我国工业可以生产的，但是，谁建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谁就是热月分子。因为对外贸易垄断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捍卫者。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成本比外国工业高1~2倍。应当通过合理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尽力降低成本，但是，谁使我国的工业丧失对外贸易垄断的保护，谁就是扼杀我国的工业。

谁为了同外国资本家保持和平而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借助红色恐怖进行自卫，或者为了同外国资本勾结而要求扩大非劳动者的选举权，谁就是促进我国政权的蜕变。

我们党内有这样的分子。

(7) 谁削弱我国革命的国际性，谁就是热月倾向的帮凶。苏联是在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的国际危机中诞生的。我们只有借助西方的胜利革命给我们提供的大量的技术力量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西方革命取得胜利以前，我们只有借助全世界工人和东方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才能保住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支持这些运动，我们才能从外部保护无产阶级专政。谁劝我们放弃支持东西方革命，谁试图以放弃这种支持为代价而达到同资本主义的和平，谁就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为资产阶级蜕变敞开大门。把无产阶级革命限制在一国范围内是热月的明确无误的标志，不管它以什么言词作掩护。

4. 我们党是否已经发生热月蜕变？

我们指出了我们党内存在的热月蜕变的主要倾向，这些倾向反映了对我国政权蜕变的指望，它们存在于我国城乡小资产阶级中间并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支持。我们党的哪一部分受这种热月的影响最厉害呢？在夺取政权以后加入我们党的小市民受这种影响最厉

害。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人曾真诚地为反对地主政权、反对武装干涉而战，但是他们没有同工人阶级完全打成一片，不愿意真正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不愿意为国际革命而拿自己的幸福冒险。而有一部分人则是为了升官发财和拥有特权而归附于党即执政的党。这些倾向是在我们国家的官僚中间，甚至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官僚中间产生的，他们鼠目寸光，把资本主义给予我们的暂时的喘息时机当成了和平，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包围。这些倾向在同耐普曼有密切接触和热衷于生产力（不考虑其阶级性）的发展的经济管理人员中间日益增长。这些倾向正在向一部分工会官僚蔓延，他们被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困难吓破了胆，放弃了争取实现这一目的的斗争并成为经济机关的一部分。这些倾向正在寻找走向国家农业领域一部分党内官僚的道路，因为在农业中没有城市无产阶级，在像西伯利亚或北高加索那样的地方，控制、纵容富农比反对他们更容易。这些倾向正在小资产阶级青年当中增长起来，青年们不了解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对形形色色的浅薄的社会主义理论情有独钟，认为本国富农只要不举行暴动就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综上所述足以使人清楚，热月蜕变的危险来自我们党内多达数十万的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并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工会的和部分党的官僚中得到最强烈的反映。

我们党是否蜕变了呢？没有，它还没有蜕变。我们党的基础是无产阶级的，它还没有同热月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它甚至还没有充分看到这些倾向，因为这些倾向还不敢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还不敢发表广泛的纲领，它们还是分散的偷偷模模的倾向，还未成为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倾向。如果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了解了这种危险，他们一定能战胜它。我们党的中央应当领导这一斗争，可它没有领导，因为热月倾向在中央的右翼部分中找到了保护者。

5. 应当同热月危险进行十分坚决的斗争。任何以所谓不是普

遍的倾向，而是一些局部错误的说法来安慰党的企图只能增加危险，因为它麻痹工人群众的警惕性。普遍的倾向就是局部错误、各种意图和意向的总和。危险刚开始时最容易克服。当危险发展起来，有了意识，制定了纲领，那么，在热月倾向的代表在我们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的岗位和地盘产生作用的情况下，可能就太迟了。富农运动突然施加压力或战争的危险可以一下子使热月的危险大大加剧。反对派号召进行的斗争，只有依靠广大工人党员的联合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个斗争的旗帜上应当写上下面的口号：

无产阶级同贫农和中农建立反对富农的联盟。

争取工厂的工人民主制。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

捍卫党内民主。

捍卫我国革命的国际性。

捍卫列宁主义。

卡·拉狄克

[1927年6月]

No 09440

八十三人声明和我们的任务^①

（1927年6月）

签署83人声明的最著名的一位老同志说他不愿意让人认为似乎他不赞同声明，或认为他有可能同签署声明的人划清界线，但他仍表示担心，提出这个声明是不是“一个仓促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步骤，一个不是促进、而是给党反对中央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制造麻烦的策略错误”。

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和至关重要，因此应当全面地即联系我们党的发展的目前时期的整个形势加以分析。

1. 首先令人担心的是，提出集体的声明有可能加速党内危机的到来并促使派别统治集团采取某种不可挽回的步骤。当然，提出集体声明的这种结果是极其有害的。反对派希望有机会向党阐明自己的观点，把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或其大部分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从而防止分裂。

集体声明是否加剧了党内的局势呢？现在已经有了客观的检验，因此应当根据事实来说话。由于最近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国革命的失败，英俄委员会的作用，英苏关系的破裂等，使党内局势变得极其紧张。

斯大林集团的方针是不许季诺维也夫留在执行委员会内，是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执行委员会，是宣布他们为瓦解后方的破坏者和张

^① 看来是季诺维也夫所写。——托洛茨基注

伯伦的帮凶，总之，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和采取最坚决的手段从组织上摧毁反对派的上层。

提出集体声明不仅没有加速问题的解决，而且相反，给解决问题带来了一些“阻碍”因素。反对派的问题决不是一批中央委员的问题，而是几百名吓不倒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问题。斯大林集团不得不同意“分期”完成自己的计划。一些过渡“阶段”正在形成。这是党的因而也是反对派的胜利。遭到失败的是蓄意制造分裂的分子。

2. 一个不大但有象征意义的极重要事实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指责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破坏党的纪律，但没有指责他们签署集体信一事。不仅如此，奥尔忠尼启则和扬松同志对“被告”的直接质问解释说，按照他们的意见，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意见，每个党员和每个党组织都有权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任何个人的或集体的声明。如果想想当初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于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言而对他进行追究，那么这个“宪法”说明就特别富有深意了。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对章程的说明，而在于对事实所作的政治评价。同虚构的“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遭到了一些团结在一起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抵制。这使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党知道，问题不仅仅关系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武伊奥维奇，而且关系到几百名做过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的党员。共产国际确信，反对派的骨干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斯大林集团反对反对派的决定关头，全世界看到反对派不是“国际革命的宣传员”（麦克唐纳语）的上层集团，而是一个拥有坚强而有威望的骨干的广泛的党内派别。胜利完全在党这一边，也就是在反对派这一边。斯大林集团遭到了失败。

3. 现在对反对派来说，政治进攻是惟一有效的组织防御形式，也就是说，首先保住自己在党内的立足之地并加以扩大。在党的多

数派得以弄清反对派的意图以前，它应当能感觉到，问题是可能决定党多年命运的极端严重和深刻的分歧。83人声明可以极大地促进这个最近的目标的实现。党和共产国际头一次得知，反对派中有几十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最著名的活动家，他们的名字为全世界所知。关于粉碎反对派的问题不再是砍掉“前领袖集团”（斯大林的哲学）的问题。反对派最终成为拥有坚强的骨干的广泛的党内派别。即使斯大林最终真能砍去脑袋（离此尚远），反对派也将存在下去并继续自己的事业。这种现实的前景不会促进，相反，会阻止危机按斯大林的意图解决。

4. 但是，如果认为83人声明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某些主要的问题，或者使我们免遭哪怕只是直接的危险，那是幼稚的。不，83人声明当然没有这样的力量。83人声明目前虽已成为300多人的声明，但仍然是反对派上层的党内宣言。分歧十分深刻，只有基层才可能解决。因此必须从骨干发表一次宣言转而向广大基层党员系统地、不断地、耐心地解释我们文件的政治内容。

5. 现在各地已着手征集十月革命后入党的同志的签名。运动的这个新阶段也像第一个阶段那样，遇到了某些人的怀疑和反对。

这些反对意见主要是：（1）老党员的签名所起的作用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分量，——不要“冲淡”这种作用；（2）在党所处的目前情况下，在失业威胁着每个人等等的情况下，决不能指望我们在近期能征集到大量的签名；人数不多将被解释为反对派软弱的证明，从而有利于斯大林集团；（3）基层反对派分子可能因签署声明而比老党员更容易遇到迫害，而且党还不知道这些迫害。等等，等等。

我们现在结合党内的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考察一下这些主要的反对意见。

6. 完全正确，老党员的签名能否发挥作用不在于数量或不仅

仅在于数量，而主要在于分量。但是，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每一个看到这些签名的人都一定会说：数百名老布尔什维克在如此危急和严重的时刻站到反对派的旗帜下，决不会是偶然的；毫无疑问，这数百名布尔什维克代表着党内和工人阶级内一种深刻的、有形或无形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潮。这种论断是否正确呢？当然正确。但是，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逻辑的结论，而是事实。反对派的骨干应当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骨干，也就是说，他们应当真正表达党内和无产阶级内的广泛情绪。否则，签名的“分量”只能体现为派别。只限于由骨干发表一次宣言，意味着把纠正党的路线看作某种一次性的而且是上层的行动。事实上，我们正面临着长期的党内斗争。只有普通党员才能解决。从争取影响普通的党员群众，即我们的基本任务来看必须吸引更多年轻的党员来签署83人的声明。

7. 把现在签名者还不多解释为反对派的软弱，这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反对派不能而且也不想夸大自己的实际力量。反对派的力量在于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路线靠发展的事实来加强，并因此而争取到群众。但是，如果夸大今天的实际力量，将是错误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处事态度。故弄玄虚的政策是官僚机关的政策，而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能把任何东西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任务在于：（1）显示我们的自觉的和勇敢的拥护者的真正数量；（2）为增加这个数量而斗争。那些不发表意见，不投票，不签名的反对派分子在政治上不能叫作反对派分子。积极的反对派分子每个支部都有。他们的数量正在统计。在这方面，机关堪称行家里手。即使我们愿意，我们在反对派的数量上也骗不了机关。但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如果我们企图欺骗机关，那我们就是在欺骗我们自己。我们不应当夸大力量，而应当用经常的、坚定的、耐心的解释工作来真正加强自己。

8. “很多人由于害怕受迫害不敢签名”。这是对的。但是，谁今天还不签名，那么谁今天就根本不敢斗争。反对派的骨干应当教育党员群众，从其最优秀的、最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开始。征集签名的运动首先应当服务于这个目的。要知道，问题不仅仅在于消极地统计现有的拥护者的数量，而首先在于通过支部内的公开发动和个人交谈增加自觉的和勇敢的反对派拥护者的数量。数百名老党员的签名如果不能成为更年轻的党员的榜样和对他们的号召，就等于放空炮。

9. 说对基层党员的迫害在很多情况下比对反对派“上层人物”的迫害更坚决更隐蔽，这也是对的。但是，这不仅仅是对签署声明而言，而且是对党内整个反对派的活动而言。越来越多的工人党员在其支部内坚持反对派的立场，尽管他们脱离其他所有支部和反对派的“上层”。迫害照常在进行。当工人支部中的“普通的”反对派分子把自己的签名汇入数千名党员的签名，从而意识到自己是同全党一致的派别的一分子时，他们将会更坚定，行动更有信心。

10. 迫害（而且不仅仅限于党内）是当前党的制度的最重要的工具。争取改变党的制度的斗争要求经常地和顽强地进行反对迫害的斗争。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没有因为签署 83 人声明而受到追究这件事，以及奥尔忠尼启泽和扬松关于根本不能追究签署声明者的责任的解释——应当在征集签名的运动中更广泛地利用这两件事实。

当然，决不能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真正履行对过去和现在签署声明者不加任何迫害的义务抱任何幻想。公开的迫害或隐蔽的迫害已经在进行，将来也一样。应当详细地把它们记录在案，并告诉奥尔忠尼启泽。

11. 当然，官僚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是，它能够相当长的时期内用纯机械的手段使党发生内部变化。最近，党的整个发展显然

造成反对派的思想积累（它的理论观点，政治预见、策略建议）同反对派在党内明显的、业已形成的、组织上表现出的影响极不相称。党员群众不知道反对派的意图。更糟的是，机关企图使党员群众相信反对派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危险已经来到，并且还将再次来到。事件的客观进程正在打破机关的神话，或至少敲打了它一下。这将为宣传反对派的观点创造比较好的环境。但是，整个工作的展开还有待时日。应当经常地、耐心地 and 坚定地每个支部和每个党员解释反对派的意图。

12. 老党员们的集体声明只有成为向党员群众灌输的工具才能获得政治评价。应当在作为党的政治工具的83人声明的帮助下，从党内反对派骨干的一次性政治宣传转到争取普通党员的斗争。而且，如果认为几千人签名意味着反对派的“失败”，则是根本错误的。只有对我们斗争道路上的困难和长期性抱有幼稚幻想的人来说，这才是失败。实质上，几千人签名已经意味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把这几千人同上百万党员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我们党被官僚制度弄得极其松散，被镇压搞得人人自危。现在敢于在反对派声明上签名的人的行动表明，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群体。如果签署声明的老布尔什维克能否产生影响主要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分量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相对年轻的党员可以说，他们能否产生影响既在于数量也在于分量，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政治人物，而不是无个性的号码。他们中用集体声明武装起来的每一个人都会寻找进一步深入党员群众的道路。这也是现在筹备党代表大会的正确的、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13. 反对派正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路线。近一年来发生的事件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党和工人阶级中间，在他们的经验中，在他们的感觉、思想和情绪中，已经存在反对派总结的所有因素。但是，从这些“因素”到政治的总结，即使党员群

众也不能一跃而过。应当帮助群众走完这段路程。这是否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取决于目前的形势。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最近时期工作的主要内容都应是：经常地、坚定地、耐心地、把我们党的总结同党的、首先是同党的无产阶级部分的日常经验联系起来。如不进行这一工作，尽管反对派的理论观点正确，政治上也将一事无成。不应当沉醉于党的过去、党的传统、声名显赫的反对派上层人物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有它的意义，但不解决问题。必须采取行动，就当我们面临的任务是重新争取有上百万党员的党。反对派中的懒人主张只由骨干进行故作声势的表演。但是，这样做行不通。必须卷起袖子真正地干。83 人的文件是最近时期这种工作的主要工具。不把这个文件灌输到党员群众中去，任何关于代表大会前的争论和整个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言论都将是空谈。

14. 已有 300 多名老党员在声明上签字。签名正在不断送来。从我们面临的巨大任务来看，如果签名者把他们捍卫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整个斗争只局限于签署文件，那么签名者就起不了多大作用。所有签名者都应当成为反对派的不倦的宣传员。如果可以提出集体的声明，那就是说，也可以征集签名，即劝说人们签名。现在应当争取这种权利。每个签名的老人应当吸引 10 个或者至少 5 个青年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最短期间内应当提供大约 500 个签名。每个签名者必须研究文件，必须尽可能在党的一切会议上宣读文件，必须征集新的签名。

所有这一切不是上层的工作，而是真正的、严肃的、布尔什维克的争取党的舆论的工作。应当从各个方面着手这一工作。

[季诺维也夫]

1927 年 6 月

№09441

托洛茨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两次发言^①

(1927年6月)

第一次发言

托洛茨基：在我发言之前——我不知道我是作为被告，还是作为原告来讲话——我坚决要求撤销扬松同志的审判员资格，因为他过去的活动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你们大家当然非常清楚，自1924年起，除我以外，全体政治局委员曾组成一个派别性的“七人小组”。我的职位被你们的前主席古比雪夫接替，本来按其职责而言，他应当带头捍卫党的章程和道德，但实际上他却带头破坏和践踏它们。这个七人小组是个秘密的反党机构，它背着党决定党的命运。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曾点名指出扬松参加过反党的七人小组的活动。没有人反驳这一发言。扬松本人哑口无言。尽管还有一些人犯有同样的罪行，但是关于扬松的证词是记录在案的。现在扬松竟要来审判我有反党行为。我要求撤销扬松的审判员资格。

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这是不可能的。您大概是在开玩笑吧，托

^① 这两次发言经删节并略加改动后，刊登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中，见第132~164页。在为该书专供译成外文的版本所作的俄文注释中，托洛茨基就所作删节作如下说明：“下面刊登的是本书作者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起着法庭作用）上的两次发言。在这两次发言的速记记录中，作者对那些不做具体解释外国读者就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作了很多删节。另外，这两次发言是按原讲话稿发表的，只作了一些修辞上的改动”（1929年）。

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我没有在重大严肃的问题上开玩笑的习惯。我承认我的建议可能使主席团的处境有些尴尬，因为在主席团成员中恐怕还有其他人参加过七人小组的活动。但是我的本意决不是要把我的建议变成玩笑。事实是，如果这叫做“规定议程”的话，那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当时对这些会议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在这些会议上精心策划了反对我的各种办法。特别是规定政治局委员不准彼此论战，而要一致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论战。这一点党不知道，我就更知道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是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是七人小组的成员，但他参加过这个七人派别小组的活动。

奥尔忠尼启则：可能是扬松，而不是奥尔忠尼启则，您搞错了吧？

托洛茨基：请原谅，不过我认为这一错误纯属形式上的错误。我说的确实是扬松。我不是说扬松同志是这个七人小组的成员；他不是，但他参加过这个七人派别小组的活动，这个派别小组不符合党章规定，违反了党的章程和意志，否则就用不着隐瞒了。如果发现在座的还有其他同志像扬松一样，参加过七人派别小组的活动，那么我恳请把他们也包括在我的撤销要求之内。

斯米尔诺夫：我认为……

奥尔忠尼启则：请托洛茨基同志发言。

托洛茨基：由于扬松同志试图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恢复党内较正常的关系和恢复较协调的工作的方法和途径这个问题所做的解释同我的解释对立起来，所以我就从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最后提案开始讲起。

现在一些同志想把事情说成是：由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事件、由于季诺维也夫的广播讲话和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行为”，所以必须把我们开除出党。假使没有我们反对派早在去年7月初提

交给中央的声明的话，这一切看上去颇有道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清楚和明确地预言过你们反对我们的一切步骤；预料到你们将利用一切借口来实现改组党的领导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你们的派别首领在很久以前，也就是在七月全会之前，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已经设想好了的。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召开联席会议之前，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突然提出建议将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这是因为幕后派别活动还没有准备就绪，对有些人还得做说服工作，或者说强迫他们将“所有的线索”都从拉舍维奇案件转移到季诺维也夫身上。我们在关于“拉舍维奇事件”的声明中是这样写的……（读）。

当时还没有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但我们已预感到会有这个车站，因为当时有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扬松：车站早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之前就有了。

托洛茨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政治因素之前就有了。而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们早就说过：如果你们想知道斯大林在半年之后想得到什么，那你们就去参加会议，去听听雅罗斯拉夫斯基说些什么。

现在我来谈一下七月声明：“根据6月24日政治局的决定，提交给本次全体会议的关于拉舍维奇‘事件’的问题，在最后时刻突然以7月2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议的形式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事件’……所有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不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中，而是在由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派别小组中得到解决的。”

现在你们是想让老实人都以为，由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一事，我们都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们进入了实现早已制定并且正在系统实施的计划的新阶段。

十四大闭幕后不久，党内比较广泛的干部中反复流传着一些议论，说必须改组政治局，即便撤掉一批列宁时代就参加了领导工作的干部，用那些可能成为完成斯大林同志领导使命的可靠支柱的新一代干部取而代之，这些议论的源头在中央书记处。这个计划得到了由斯大林同志最亲密的拥护者组成的、紧紧抱成一团的小组的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另外一些决不参加任何‘反对派’的人的反对，其中也包括你们这一方扬松同志的反对。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领导集团才决定分批实施计划，为此需要利用每个适当的时期。扩大政治局，同时将加米涅夫同志从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这是预先制定的彻底改组党的领导的第一步。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留在扩大后的政治局中，把加米涅夫同志留在候补委员中，应该说这就使党表面上保持了原有的基本核心，解除了人们对中央领导的素养和能力的担心。代表大会闭幕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后，在继续同‘新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同时，各地首先是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就像是接到了信号，掀起了反对托洛茨基斗争的新篇章。这一时期，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多次在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说，最近该打击托洛茨基同志。其余那些同‘反对派’毫无瓜葛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表示不赞成莫斯科组织领导人的这种行为，而且人人都知道莫斯科领导人的后台是中央书记处。这一时期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在党内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对将把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拉舍维奇同志提起的诉讼实际上并没有给改组党的领导的基本计划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但促使斯大林集团对实施计划的方法作了某些改变。如果说不久前还计划首先打击托洛茨基同志，而把季诺维也夫的问题放到下一阶段，以便使党逐渐习惯于新领导，使党面对一个个成为既成事实的新的局部性变化，那么拉舍维奇、别连基等同志的‘事件’，由于他们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关系密切，促使领导集团改变了打击

顺序，决定先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最近关于将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建议是在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指使下提出来的，这是用新的斯大林的领导取代党内老的列宁主义的领导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计划依旧在分批实施。托洛茨基同志暂时还留在政治局内，目的首先是让党确实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真的是由于拉舍维奇事件被解职，其次，为的是采取这些突然措施不致在党内引起过度恐慌。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就是对托洛茨基同志的问题，如同对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一样，斯大林核心早已事先决定将他们赶出领导集团；完成这部分计划剩下的只是组织技术工作和寻找适当理由——真正的或者是臆造出来的。”

现在这个组织技术工作就委托给你们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所谓组织技术工作就是要寻找适当理由——真正的或者臆造出来的。你们没有真正的理由，你们只能去找臆造出来的理由。

“问题在于彻底改变党的领导。在拉舍维奇同志‘事件’被变成季诺维也夫同志‘事件’之前我们所作的重要声明中，已对这一改变的政治意义作了全面评价。

这里只需作一点补充，如果斯大林集团改组领导班子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明显脱离列宁路线的现象就会获得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的发展。列宁在以‘遗嘱’著称的文献中，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和列宁一样，我们根据近几年的经验深信，斯大林及其一伙的组织政策使党面临进一步分裂主要骨干，进一步脱离阶级路线的危险。事关党的领导，党的命运。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绝不接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这一派别性的、危害极大的建议。”

同志们，这一切现在听起来多么新鲜，多么轰动！可以认为，这是以前写好的，我们不是推测，而是事后研究了你们的所做所为。我非常希望你们在仔细看过你们所有的声明和发言，并将它们与事实加以对比之后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你们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

是你们预见到的……我们的这个推测对你们来说成了过去和现在你们仍然据以行动的指南。

你们对我提出的指控，也可以说是“适当理由”，这是你们根据委托给你们的技术工作找出来的，完全符合我们一年前所作的推测。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不是第一个阶段，但也不是最后一个阶段。

你们指控我的罪名有两个。第一，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对我所说的扬松同志只说对了一半。他认为，我一向拒绝对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行为作出解释。我准备向党的所有会议，向所有支部，特别是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声明作出解释。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审查我在作为上级机构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如果扬松同志到现在仍然理解不了，那他就应当再好好想一想，重读共产国际的章程和我们党的章程。那时他就会明白我是正确的，正如我否认省监察委员会有权追究我作为党中央委员的发言一样，是绝对正确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因我的几次发言而对我进行了谴责，但并没有将自己的权利转托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是我们国际党的中央委员会。我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该机构全体会议上发言，主席团却作出决定谴责我，这个决定你们都知道。而你们就因为我的这个发言再次对我进行谴责。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当我向扬松同志指出这一点时，他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委托联共中央采取措施反对反对派继续搞派别活动的。”原来如此。但是，要知道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而且这里说的是继续搞派别活动，而绝不是说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几次发言。况且，我再说一遍，当时我已经心甘情愿地进行了解释，如果时间充

足的话，我现在也可以作出说明。你们可以再读一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文件。这几个星期发生的一切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正确地证实，我所叙述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也是整个所谓反对派在执行委员会本次全会上的观点。（会场上一片喧闹声。）我再说一遍：对于我所讲的全部内容我没什么可要修改的，而斯大林同志4月5日，也就是蒋介石政变前夕的讲话至今还瞒着党。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斯大林同志发出挑战：如果您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也是正确的（决议说执行委员会的所有预见都已得到证实），那么请您谈谈，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不是个人政变，而是阶级政变的前一个星期您都说了些什么。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我就不用了，他们说什么难道穆拉维约夫没有背叛吗？莫非我们自己的党内就没有人背叛吗？等等。简直是一派胡言！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那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阶级变化，再说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利用它，然后像挤干的柠檬一样把它扔掉，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利用了我们。我们帮助资产阶级跨上了马，可它却一脚把我们踹开，夺走了整个政权，血腥屠杀无产阶级。而在此之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却对蒋介石的政治路线承担了责任。这是对党最恶劣的欺骗，在我党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恶劣的欺骗行为，说中央委员会“预见到了一切”，但事实上正相反。列宁说过，对党诚实就要弄清事实，正如以前所做的那样，揭露党的领导人犯下的所有错误。我们把所有的提纲、所有的文章都带到了执行委员会。可斯大林却把速记记录藏了起来。我敲了所有的门，拨通了所有的电话，为的是得到这个速记记录，斯大林却不给。当我在共产国际向斯大林提出挑战时，当我对他说，请拿出你的速记记录时，他站起来说道：“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人身攻击，我将不予答复。”这算什么人身攻击？为了维护个别同志的威信你们不惜牺牲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命。这是革命党党内一般

可能犯的最严重的罪行。

再来谈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执行委员会对我的主要指控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正在同攻击苏联的叛徒马斯洛夫结成联盟。我再强调一下，这既是在欺骗我们的党，也是在欺骗工人阶级。马斯洛夫集团没有攻击苏联。去年秋天，根据《真理报》的报道，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了这一点，当时我还不知道马列茨基之流及其背后和上下左右那些人的全部作用，我对此信以为真，并在指出马斯洛夫集团攻击苏联的10月16日声明上签了名。但这不是实情！我这里有该集团最近一期的《共产主义旗帜》杂志（1927年6月2日）。为使全体党员了解情况，请把该杂志打印出来，好让大家看看他们是如何攻击苏联的。《真理报》一篇题为《反对派的道路》的卑鄙社论也提到了他们，说他们是张伯伦的走狗。而他们自己在最近的一篇题为《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社论中说：“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的新十字军讨伐正在策划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阻止这种战争。当然不是通过类似英俄委员会等这种不堪一击的组织。……既然已经很清楚，只有真正的、革命的、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共产国际才能够击退对苏维埃俄国即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那么现在所有这些不堪一击的委员会面对备战和进攻只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地观望。……因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方法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对任何形式的改良主义哪怕是最左的改良主义抱有一丝希望都是幻想政策，所以必须纠正犯下的分裂罪行，确切说就是把所有左倾分子都开除出共产国际。”

他们要求恢复他们在共产国际中的席位，目的是要捍卫他们称之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的苏联。“……现在不是躲躲闪闪考虑某个人的威望的时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的东西比领导人的声望更重要，而领导人的整个政策如果得不到改变，将导致与第二国际同样的破产。”你们指控他们背叛，而我认为他们当中的一些革

命者要比指控他们的许多人强得多。“……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这话说起来容易。这一口号要求进行艰苦的、火热的、国际性的宣传和组织方面的工作，然而这些工作甚至还没有着手进行，尽管对越来越尖锐的冲突早已了如指常。”

除了其他要求，文章还提出一个要求：“运输部门、军工厂和化工厂的工人们应立即在“不让一条船”和“一列火车载有士兵、武器或装具去反对苏维埃俄国，不让一兵一炮、不让瓦斯和飞机用来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口号下实现国际间的团结；在有人残酷地隐瞒现实情况（即苏维埃俄国的所有左派‘改良主义派朋友’都按兵不动）和组织革命反击的情况下，应立即以列宁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精神进行国际性的反战革命宣传。”

“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我们向全体工人发出了立即行动起来”的号召。”

我只引了文章的一部分。这份刊物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自始至终采取的都是这种精神。马列茨基之流欺骗党和工人阶级，毒化工人阶级的意识，使他们敌友不分，说什么可以对普塞尔和其他人抱有希望，同时又断言乌尔邦斯、马斯洛夫和其他人等是叛徒。

第二个罪名是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为斯米尔加送行的示威。你们把斯米尔加放逐到哈巴罗夫斯克。我再一次坚决要求你们对这项放逐作出某种统一的解释。施基里亚托夫在委员会里叫嚷道：“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可以工作！”如果斯米尔加是按正常程序调往哈巴罗夫斯克工作，那么你们就无权说对他的集体送行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如果这是对一个现在需要留在负责岗位即苏维埃战斗岗位的同 志实行行政流放，那么你们就是在欺骗党，就是在耍两面派。你们还要再说送斯米尔加去哈巴罗夫斯克是正常的工作派遣吗？同时，你们还要指控我们搞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吗？这种做法是两面派行为。

再来看看《真理报》6月22日的社论。我的时间有限，我不可能把关于这篇社论应当讲的都讲到。我只引几行，是关于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声明，我说当前最大的危险是党的制度。题为《反对派的道路》的社论就是根据这一点写成的，遗憾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没时间读这篇文章，尽管……这篇文章在审判我们之前就写好了——审判现在正在这里进行，尽管现在大家都在说：读读马列茨基的文章，你们就会知道明天奥尔忠尼启则将说些什么。这篇文章说：“反对派在政治上利用这些困难，从而使人怀疑他们在危险时刻是否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因为断言最大的危险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在重复苏联阶级敌人的论调。”我不准备理睬在座的马列茨基追随者的，也不准备对这个人作道德评定。我将从政治角度提出问题。文章说，反对派使人怀疑他们在战争时期是否忠于革命。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外交岗位上，即最具战斗性的阵地上（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应该利用这个阵地保卫苏联）工作的是：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越飞——此人现不在外交岗位上，但他是一位可能用得着的老外交家……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巴黎，不久前赖因霍尔德也在那里；柯普在斯德哥尔摩；你们把萨法罗夫从中国派到了君士坦丁堡；姆季瓦尼在波斯；奥谢姆在君士坦丁堡；乌菲姆采夫和谢马什柯在维也纳；索克里尼柯夫从日内瓦回国；卡纳特奇科夫在布拉格；柯伦泰在墨西哥；克拉耶夫斯基昨天从阿根廷回国。要知道这些人全都是反对派，而且还远不止这些人。同志们，我来问你们，如果反对派使人怀疑他们在战争时期是否忠于革命的国家 and 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对把“叛徒”或准叛徒放到负责的指挥岗位上的革命军司令部又该如何论处呢？我就曾受我们党的委托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对这样的司令部，我会把他们全部枪毙的。你们是不是拿这样的指控开玩笑？

如果你们有勇气支持马列茨基之流和今天别的坏蛋所说的一切，那么你们应该枪毙或者至少开始孤立那些你们所指控的人；你们还应该解散中央委员会，因为目前，在帝国主义的绞索威胁我们的时刻，中央竟然还把反对派放在战斗性的岗位上。

为什么你们没有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你们清楚马列茨基扯谎是为了欺骗党。这一点你们清楚，因而默不作声。你们知道，他在有意用恶毒的谎言为斯大林开辟道路。你们默不作声，还要包庇他。这里有一封塔斯社“不供发表”的电报，说拉柯夫斯基如何“捍卫苏维埃”，按资产阶级报纸的说法，他如何为维护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而奔走呼号。但是这封电报“不供发表”。而供发表的却诬蔑说反对派使人怀疑他们是否忠于无产阶级。

罗伊津曼：他们没有在83人声明上签名。

托洛茨基：别着急，罗伊津曼同志。克列斯廷斯基已经把自己的签名送来了。今天你们发表了维护拉费斯的不成功的言论。拉费斯是佩特留拉政府的一个部长，他传唤过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罗伊津曼同志，您所维护的都是些不该维护的人。我知道您是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您指责的是无辜的人，维护的却是有罪的人。请您等会儿再谈拉柯夫斯基。我这里有一个党员的声明，他叫波兹南斯基，我本人并不认识他。他是1904年入党的，是个排字工人，我听说，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曾英勇地参加战斗。（插话：我们了解。真够“英勇”的！）

季诺维也夫：（冲着莫罗兹同志）我们也了解您。1918年是我把您逮捕的。

莫罗兹：1918年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

季诺维也夫：我说的是担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莫罗兹同志。（笑声）

托洛茨基：正是这个波兹南斯基同志6月22日给中央委员会

寄来了下面这封信。（插话。）我再说一遍，我本人不认识他，而且也从未听说他是反对派分子。这封态度明朗的信引起了我对他的极大兴趣，过后我进行了调查，并从一些绝对可靠的党员那里得到了一些情报，这些材料我也带来了。下面我读一下这封信。“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我看了《真理报》今年6月22日题为《反对派的道路》这篇社论后，就在5月25日同志们的声明（所谓的83人声明）上签了名，目的是维护党的统一和建立真正列宁主义的党的纪律。1904年加入联共（布）。党证号码0019773。Я.М.波兹南斯基。”

我认为，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之流是有恃无恐地胡作非为，今天那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或陷入形式上的而不是革命的纪律的真正老布尔什维克就会越认为反对派是正确的。

现在我想撇开那些指责性的诽谤，谈谈主要的政治问题。

关于战争危险。我们在去年7月发表的声明中说：“在日益发展壮大红军与我国和全世界劳苦大众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是保卫苏联和维护和平最有利的条件。一切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作用、加强工人阶级同雇农和贫农的联系并且巩固工人阶级同中农的联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措施，都能使红军更强大，保证苏维埃国土不受侵犯，并加强和平事业。”

这本身就表明，一年以前我们就呼吁你们关注战争危险问题和战争期间苏联国内的种种危险问题。这些都不是特殊问题。这是我们的阶级政策问题，我们的整个方针问题。当时，国家形式上的元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在特维尔发表演讲，说我们需要健壮而有力的士兵，而只有中农才能成为健壮有力的士兵，贫农是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士兵的，因为他们中间体质瘦弱的人多，因此，这是公开依靠强壮的“中农”的方针，而所谓的“强壮的中农”不是别的，正是富农或准富农。加里宁忘记了我们所完成的十月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正是那些瘦小体弱的人战胜了身高体壮的人。为什

么？因为他们当时和现在在人数上要多得多。你们会说：尊敬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说的还少吗！可是你们制止过他吗？没有，你们没有制止他，而当我们对他灭贫农志气长富农威风的路线进行批判时，你们却制止我们，出席本次会议的雅柯夫列夫玩弄统计花招以掩护富农。雅柯夫列夫应该受到审判，可是他却要来审判我们。

马列茨基之流说我们反对派正在利用战争危险。

现在是你们在利用战争危险迫害反对派，并准备将他们彻底消灭。请看：你们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们讨论战争危险问题、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问题的全部文献中，只发表了这本作为党内资料的小红册子，而且还是为了对付反对派才发表的。不仅如此，怎么说呢，你们甚至借口我“未修订讲话稿”而把我的讲话从速记记录中弄掉了。这恰恰说明，你们现在利用战争危险首先是反对我们。

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之流现在在干什么？《真理报》上一一直在说些什么？说实在的，《真理报》哪怕提出一个与国际形势、与我们的总路线有关的问题呢也好。《真理报》的理论水平真叫人惭愧，现在从这份报纸上真是没什么可学的！关于战争危险的整个问题被人利用纯粹是为了用最恶毒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

同志们，不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同统治集团混为一谈。

我们声明：只要你们没有从生理上封住我们的嘴，我们就要继续批判斯大林制度。只要你们没有堵住我们的嘴，我们就要继续批判斯大林制度，否则，它将会破坏十月革命的一切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像对你们一样宝贵。早在沙皇统治时期就有一些爱国者，按谢德林的说法，把祖国同统治集团混为一谈。我们完全不同于他们。谢德林说：“他们随声附和，一再附和，结果附和没了。”目前，我们党内有许多“随声附和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随声附和。但愿别把十月革命也给附和没了！我们要批判斯大林制

度，因为它是一个不好的制度，一个倒退的制度，一个思想浅薄、心胸狭窄和目光短浅的制度。我们要加倍批判斯大林制度，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危险性，就是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爆发战争时会加重十倍、一百倍。

扬松同志说，我们把1914年的战争同现在的战争混为一谈。这真是信口雌黄！对这两次战争的区别我们比你们清楚。但是，这两次战争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这两次战争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战争。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一翼有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无产阶级有苏联。苏联在战争中保卫世界无产阶级，世界无产阶级也在保卫苏联。但战争是同世界帝国主义打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对待普塞尔呢？普塞尔何许人也？普塞尔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现在的表现比1914年坏得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对待普塞尔的态度应该比1914年坏得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对待普塞尔的态度应该像1914年列宁的态度那样，因为我们是列宁学校的学生，因为我们看清了普塞尔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及战后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而你们的立场呢？请听听莫斯科委员会是如何教导的：

“英俄委员会在同矛头指向苏联的各种干涉进行的斗争中，可以而且无疑应该起（请听！）巨大作用。（请听！）这个委员会在同国际资产阶级挑起新战争的各种企图进行的斗争中，是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中心。”（请听！）（研究联共中央七月全会总结的材料。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

整整一年，我们都试图使你们的思想在英俄委员会这个问题上开窍。我们对你们说过：这个委员会正在危害英国无产阶级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在此期间，你们的全部威望，积累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列宁主义的威望——所有这一切，你们都用来支持普

塞尔。你们会说：“可我们也批评他！”这不过是堕落的布尔什维克支持机会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你们是“批评”普塞尔，可是无比温和，少得出奇，而且你们仍然同他勾结在一起。而当普塞尔本国的革命者指责他是张伯伦的走狗时，他能对这些革命者说些什么呢？“请看！给英国罢工工人捐款的托姆斯基本人是政治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批评了我，尽管如此，他现在仍旧同我携手共进，你们怎么能说我是帝国主义走狗呢？”他说得对不对呢？他说得对。你们用狡猾的手段让普塞尔支配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机制。我们谴责你们的正是这一点。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谴责，远比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为斯米尔加送行严厉得多。

你们通过英俄委员会利用我们党的巨大革命威望来为普塞尔服务。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借口“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对反对派进行猛烈抨击，并鼓动说，英俄委员会在同矛头指向苏联的各种形式的干涉进行的斗争中，应该起无比巨大的作用，它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中心……同志们，所有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正是因为这类事情必须把你们交付法庭审判。

你们利用布尔什维主义做了些什么？你们在这几年当中利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威望，它的全部经验即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等这一切做了些什么？你们曾对全世界的工人，首先是对我们莫斯科的工人说，一旦战争爆发，英俄委员会将是组织反帝斗争的中心。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一旦战争爆发，英俄委员会对于假朋友中的所有逃兵和投向苏联敌人阵营里的所有叛徒来说，将是一条现成的堑壕。托马斯公开支持张伯伦，而普塞尔则支持托马斯，这才是最主要的。托马斯靠资本家维持自己。普塞尔则靠欺骗群众维持自己，并且支持托马斯。而你们却支持普塞尔。你们谴责我们支持张伯伦。根本不是这样！正是你们通过右翼同张伯伦勾搭在一起。你们既同支持托马斯的普塞尔，又同支持张伯伦的托马斯一起站在一条

战线上。这是经过政治分析的判断，而不是诽谤。

鬼晓得在各种会议上特别是在工农基层组织会议上关于反对派都谈了些什么，据说提出了反对派进行“活动”的“经费”问题。可能是一些没有文化和没有觉悟的工人，也可能是你们暗中派来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递上这类黑帮才递的条子的……还有充当报告人的卑鄙家伙竟敢对这些条子做含糊其词的解答。如果你们是真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就有责任制止这种肮脏、可恶和卑鄙的纯斯大林式的反对反对派的勾当。我们并没有造谣中伤，而是发表公开的政治声明：张伯伦和托马斯站在一条战线上，他们得到普塞尔的支持，没有他的支持，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而你们却在支持普塞尔，因而正在削弱苏联和加强帝国主义。这是一个严正的政治声明！对这一声明的分量到现在你们自己才有所感觉。

现在来谈谈中国革命。雅罗斯拉夫斯基说，马尔丁诺夫成了一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好极了！紧随其后的还有唐恩。唐恩在4月23日和5月9日先后在两期《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声明，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唐恩说我们的观点“左倾幼稚”，说拉狄克的路线完全和你们一样是“隐蔽的取消主义”。你们为什么要掩盖这一点，为什么向党隐瞒这些事实？你们说马尔丁诺夫曾经是孟什维克，但是要知道唐恩到现在还是个孟什维克。为什么他声明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赞同马尔丁诺夫和斯大林的观点？而你们又为什么要掩盖这一点？

我认为，对英俄委员会的方针是分裂共产国际的方针，因为这一方针正倒向阿姆斯特丹。总理事会是阿姆斯特丹的一部分，而阿姆斯特丹又倒向第二国际。现在幼稚地（或者说狡猾地）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与第二国际之间划分原则性区别是可笑的；从工人运动的性质方面、政治路线方面和领导方面来看，这两者完全一样，——参加者是同一类人，结成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对阿姆斯特丹的路

线就是对第二国际的路线。你们说这是“诬蔑”。这不是“诬蔑”。这是根据你们的立场得出来的政治结论。你们也正朝着这个结论迈进。最近一个时期乌杰格斯特同我们的代表团成员在日内瓦大概进行过什么谈判。有没有这回事？我在问你们，我是中央委员，在你们还没有“开除”我之前，我有权知道与党有关的一切，我在问你们有过没有过这样的谈判？最初乌杰格斯特声明说有过，还说布尔什维克现在对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态度与一两年前完全不一样。荷兰报刊对此作了报道。很多报纸进行了转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看到了。为什么你们不敢说这是谎言？为什么你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都看到的这一报道不予以驳斥？为什么你们在塔斯社“内部”通报上向党隐瞒这一切？难道在列宁时代可以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向全世界声明，说我们正在同他们进行联合，而我们却不讥讽他们，也不声明这是卑鄙的谎言吗？这一切为什么被隐瞒起来？这里似乎有什么奥秘。乌杰格斯特在发表了最初的几个声明之后，开始巧妙婉转地“否认”谈判的事实。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昨天塔斯社的“内部”电讯说：“虽然矢口否认，但是《Де Стрид》还是刊登了荷兰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人斯坚盖斯的文章。文章说：‘乌杰格斯特和茹布在日内瓦国际经济会议期间，在日内瓦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了谈判。对工人运动来说这次谈判的意义至少相当于本次经济会议。但是，当时显然决定对这次谈判不作任何报道。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国际间的团结对欧洲工人运动来说有着非常大的意义。欧亚无产阶级的联盟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同俄国工会结成联盟。我们不准备在西欧采用俄国的策略，也不会在任何条件下都同意结盟。我们也反对为‘后排观众’举行的谈判。如果茹布和乌杰格斯特确实同苏联代表团进行过谈判，那么就完全不能排除谈判取得实际结果的可能。应该让工人运动了解这一切。组织起来的大多数工人要求同俄国工会团结一致。应该告诉我们，同苏联代表团的谈判是否促进了这种

团结，如果没有那么为什么这次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塔斯社）

奥尔忠尼启则：索柯里尼柯夫可以说明这一切，是他进行的谈判。

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或者别的什么人是否进行过谈判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进行谈判，必须有中央的授权。如果没有进行，那么必须公开说明这是谎言。

奥尔忠尼启则：任何授权都没有。

托洛茨基：那我倒要问：为什么塔斯社就这个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电讯——其中一份我在工作委员会中已宣读过——为什么向全党隐瞒塔斯社这些关系到国际布尔什维克生死存亡的电讯？为什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在各种报纸上都看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正在倒向阿姆斯特丹，却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为什么要隐瞒这些？谁都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奥尔忠尼启则：我声明，没有这回事。

托洛茨基：那么必须立即也就是明天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明整个这件事都是假的。因为现在还在利用这些报道教育全世界的工人。国际无产阶级认为，由于战争的临近，布尔什维克正在接近阿姆斯特丹。（插话）难道可以相信你们，能使他们尽早地认为这是谎言吗？总理事会比阿姆斯特丹强在什么地方？阿姆斯特丹其他部分也仅仅是在最近一年里没有像总理事会出卖总罢工和矿工罢工那样，愿意无耻和卑鄙下流地出卖自己的工人。英国总理事会目前是阿姆斯特丹最令人憎恶的一部分。而你们在写信时竟称其为“亲爱的同志们”。既然你们自己都保持沉默，那么为什么世界无产阶级就该真的以为你们没有倒向阿姆斯特丹呢？莫非你们现在得到了这种信任？在列宁时期党从来都不希望得到盲目的信任，而是一贯对谎言（如果确是谎言）进行驳斥。而现在你们不是一面隐瞒电讯，一面利用这种盲目信任进行投机活动吗？我看这么做不对

头。你们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不会巩固列宁所争得的对党的信任，而是在破坏这种信任，践踏这种信任。

你们若是真像自己所说的那样认真关注战争危险，怎么还会进行疯狂的而且目前正在日益加剧的党内镇压呢？怎么能在目前排斥第一流的军事干部呢？他们被解除军事工作，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的现行政策是错误的，是招致毁灭的政策，尽管他们准备并且能够为社会主义祖国而战。你们有很多像斯米尔加、姆拉奇科夫斯基、拉舍维奇和巴卡耶夫这样的军事干部吗？我听说你们打算将穆拉洛夫开除出军事检察院，原因是他在83人声明上签了名。你们与普塞尔及其他同类的“反战士”难分难舍，却要把穆拉洛夫开除出军事检察院。（场内一片喧闹声。有人喊道：谁向您报告的？）谁也没有向我“报告”，但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奥尔忠尼启则：您抓紧点。

托洛茨基：你们说得对：我正要指出你们在48小时之后即将做的事情，正如去年7月我们事先端出了你们反对我们的全部预谋一样。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要开始了。

军事学院和空军学院的学员情况怎样呢？你们正在开除那些参加了反对派的优秀学员。我已经弄到了4名学员的简历，就在即将毕业时这4名学员前几天被你们开除了。第一份是奥霍特尼科夫的简历，第二份是库兹米切夫的，第三份是勃罗伊多的，第四份是卡佩尔的。请听第一份：奥霍特尼科夫，生于1879年，父母是农民（比萨拉比亚人），自己没有土地，为地主种地。小学文化程度，1915年以前，跟着父亲干农活，曾受雇当马车夫。从1915年起，在沙皇部队当兵。二月革命期间，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由后备炮兵队选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但在5月份因有布尔什维克倾向而被调往前线第4集团军，在那里由第14炮兵旅选为师委员会和军委员会的代表。十月革命期间作战负伤，入院治疗。1917年

12月出院后，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同罗马尼亚占领军作战，一切行动听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1918年，他在比萨拉比亚加入地下组织，任捷列茨克乡地下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游击队队长。他曾因进行这种活动，受过罗马尼亚战地法庭两次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但都逃脱了。1919年，他率领游击队到达乌克兰，加入红军第45师。担任过不同的指挥职务。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战争结束后多次参加反对白匪的斗争。1924年进入军事学院，因未受过普通教育起初被编在预科班，以“良好”成绩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1927年2月，因持反对派观点第一次受到党内处分。后因参加“为斯米尔加送行”被开除出军事学院。

像这样的简历我这里有4份，内容基本相同。他们都是革命战士、党的战士，负过伤，荣获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奖状和红旗勋章，是久经锻炼的革命者。他们会永远忠于十月革命，为十月革命斗争到底。而你们却在把他们赶出军事学院。难道应当这样来准备革命的军事防御工作吗？

大家知道，有些人指责我们悲观和缺乏信心。“悲观”这种指责从何而来呢？看来，这种蠢言恶语来自斯大林。其实，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正需要大大增强对国际革命的信心，才能像我们那样反潮流而进。而缺乏信心这种指责又是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臭名远扬的理论。我们不相信斯大林的这种理论。

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则1925年曾对我说：“你去写文章反对斯大林。”

托洛茨基：我们不相信这种试图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新发明。我们不相信这种新发明，因此，我们就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

但是，你们知道斯大林这位“乐观主义者”的前辈是谁吗？

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份重要文件，如果想要我愿发给你们，这是

福尔马尔在1879年写的一篇文章。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文章标题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并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当然也要发给全体党员。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已经看过了。

托洛茨基：啊，看过了，那就更糟，说明你们也向党隐瞒了这一点。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习惯这样干。当马克思和列宁在老一辈思想家、空想家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找后来成为马克思或列宁观点萌芽的某种说法时，他们是怎样做的呢？他们怀着感激之情发掘自己的前辈的思想，写有关他们的文章，宣传他们。你们也有前辈。为什么你们对前辈没有感激之情，为什么你们不出版你们奠基人福尔马尔的书？顺便提一句，他更严肃、更有道理、经济上更适当地论证了现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引以自豪的“思想”。福尔马尔这本书的内容实质是什么？这本书是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福尔马尔没有同他们进行公开论战，因为他们的威望太高了！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绝对明白，他的话是针对谁的。他没有指名道姓，而是说“某些人”。斯大林开始时也是同“某些人”和“有的人”进行论战，他的讲话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智慧。福尔马尔写道：“问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计划，社会主义一定要同时在整个文明世界（所有经济上先进的民族）取得胜利吗？按社会主义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可以单独存在吗？”

接下来福尔马尔引用了“某些人”所谓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的观点。他写道：“我持相反的观点。我认为——并且以后还要努力证明——社会主义在一个（最初）国家取得彻底胜利不仅具有历史可能性，而且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绝对不会有任何障碍。”（《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黎世1879年版第54~74页）

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早在1879年就已发展了民

族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他的门徒斯大林只是在1924年才开始创立他的“独特”理论。为什么是在1879年呢？因为当时是一个反动年代，是欧洲工人运动普遍退潮的时期。法兰西公社在1871年遭到破坏。直到1879年止，法国未曾发生革命运动。在英国，自由派工联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全面取得胜利。这是英国和大陆革命运动最为严重的低潮时期。而此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迅猛发展。由于这种矛盾，福尔马尔便得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论。你们知道福尔马尔的结局吗？他最后成了极右的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成了一个沙文主义者。你们会说今天的形势不同了。当然，今天总的形势是不同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遭到了重大的失败。今天，国际革命及其直接胜利的希望，不像1918~1919年那样大，已经离我们远了，而一些“乐观主义者”大多对此已不抱希望，因而正在得出没有国际革命也能生存下去的结论。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到堕落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福尔马尔主义，其前提也正在这里。

不论与这种理论有没有联系，你们一味指责我们悲观和缺乏信心。我们反对派是“一小撮”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而党是团结一致的，党内全是乐观主义者和充满信心的人。这种描述未免太过于简单了吧？请允许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一个野心家，即追求飞黄腾达的人，现在会参加反对派吗？除非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参加进来然后立即退出，为的是马上被封为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优秀代表”。但是，可以说这是极端卑鄙的个别人物。如果以野心家为例，那么，请问，这种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投靠反对派来谋求个人发迹吗？你们知道，是绝对不会的。当无产者布尔什维克因参加反对派活动正在被赶出工厂而落入失业者队伍的时候（这些人在需要时都能进行战斗，不会亚于在座的全体与会者），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反对派吗？利己主义者是决不会参

加的。通过工人反对派的实例我们看到，尽管遭到各种镇压，党的队伍中仍保持着为自己的观点而战斗的勇敢精神。一个革命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敢于反潮流，能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我再问一次：庸人、官僚和追求私利的人会参加反对派吗？不，绝对不会。那些家庭负担重、对革命悲观失望、留在党内混日子的工人会参加反对派吗？不，绝对不会。他们会说：制度当然不好，但是让他们去为所欲为吧，我管不着。具备什么样品质的人才会在目前情况下参加反对派呢？他必须对自己的事业，即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真正革命的信心。但是你们所要求的只是一种涂了保护色的信心，是按长官意志表决的信心，是把社会主义祖国和区委会等同起来跟在书记后面亦步亦趋的信心。如果你是一位经济部门领导人或行政负责人，你就必须投靠区委会或省委会的书记来保护自己。

你们的伟大信心经受过什么考验呢？经受过百分之百投赞成票的表决。那些不愿参加这种强迫表决的人，有时就想法子悄悄溜掉。但是书记不会放过你，你必须投票，而且必须按照指示投票，谁要是不投票，他就记下谁的名字。怎么，你们以为这一切能瞒得过无产阶级吗？你们在糊弄谁？我再问一次：你们在糊弄谁？你们是在不高明地糊弄自己，糊弄革命，糊弄党！那些跟着你们投百分之百赞成票的人，昨天奉命“斥责”托洛茨基、今天又奉命“斥责”季诺维也夫，明天一定会“斥责”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些人在革命的艰难时刻决不会成为坚定的战士。但是，反对派在倒退和镇压最为困难的时期没有投降，并且把既不受利诱，也不怕威胁的最可贵的战士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正是以此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勇敢。

扬松：反对派中也有野心家和追求私利的人。

托洛茨基：请您说出名字来！只要您说出名字，我们就同你们一起坚决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在哪儿？反对派的基本核心是由那些

既不怕威胁，也不受利诱的人组成的。

党的制度压制、窒息和束缚着党，掩盖着国内正在发生的深刻的阶级变化过程。在战争危险的谣传刚一出笼的时候，我们就已面临这个过程，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它还会更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雅罗斯拉夫斯基：简直就像是在1910年。当时您也是这么说的。

托洛茨基：几个星期以前，您在党支部说，冯玉祥是真正的革命者。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对。

托洛茨基：您在说谎，就像您对1910年的情况说了谎一样。你们既提出这一问题，那我声明如下：我是犯过反对列宁、反对党的严重错误，但是任何时候，即使在过去反对列宁的斗争的最尖锐时刻，我都没有像雅罗斯拉夫斯基现在这样与列宁格格不入。

目前的制度正在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失去本色，因为它不容许开诚布公地说出危险的根源，而现在无产阶级正受到来自非无产阶级方面的危险的威胁，最近整个时期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其他阶级却在扩展势力。我认为，谁不想了解这一点，就应该立即把谁“开除出”领导机关。这种无所作为和扩展势力的现象比比皆是。每个专家、每个官员、每个官太太，不管是苏维埃的还是半苏维埃的，他们都很清楚，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1918年的工人了”。这一点你们无论在小铺子里、大街上，还是在电车里都能听到。男工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女工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乌斯特里亚洛夫是资产阶级暗中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思想家。我们召开过几次学者代表大会，也召开过一次化工工程师代表大会。大会充满新意。一位工程师在发言中说：“地方政权不在地方。”与会者对他报以掌声。另一位工程师谈了地方上的一些腐败现象。有位共产党员安慰他说：这只不过是办事马虎。对此工程师回答道：“是呀，

可倒霉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在这次化工工程师代表大会上，还有一位工程师从讲台上对一位经济部门领导人的共产党员说：“请开除那些红色共产党员厂长。如果您为此被赶下台的话，两天之后我们就会把您重新放在您原来的岗位上。”这些事实比任何议论都更能说明形势已发生变化。

去年秋天，我同一位高加索游击队员进行过一次谈话。他诉说了游击队员们的不满情绪。“他们有什么不满的，吃不饱吗？”“不是，不是吃不饱，我们那里富得很，而是不让我们掌权。”“那是谁在掌权，难道是富农不成吗？”“不是，还轮不到富农掌权，而是一些不伦不类的中间人物。”这位游击队员一字一板地继续说道：“富农也不满”，他们说：“力量已经是我的，可政权不是我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哪位游击队员对我说的这番话。同志们，这就是北高加索形势的写照。而这种情况莫斯科也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工人国家问题。有许多恶毒谎言正在通过《真理报》系统地传播，其一就是所谓我说过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这是通过歪曲我的一次未经修订的发言速记记录而捏造出来的。我在那次发言中只是叙述了列宁对苏维埃国家的看法，并将列宁的看法与莫洛托夫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列宁说，我们从沙皇机构中接收了许多坏东西。而你们现在怎么说呢？你们正在塑造工人国家的偶像，企图把这个国家当作一种“秉承天意”的特殊国家加以神化。谁是这种神化最出色的理论家？是莫洛托夫。那是他的贡献。我再把他的话给你们读一遍。你们隐瞒了我对莫洛托夫的批评，而《真理报》则歪曲了批评。但是请看，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省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针对加米涅夫所说的话：“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是有人向我们提出，说必须使工人阶级更加靠近我们的国家才最正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使工人

更加靠近我们国家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谁的国家？难道不是工人的国家吗？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那么怎么靠近国家，也就是说，怎么使工人自己靠近执政的和管理国家的工人阶级？”（1925年12月13日《真理报》）这是莫洛托夫的原话。同志们，这是对列宁关于工人国家的概念进行的最拙劣的批判。列宁认为工人国家只有在完成了批判、纠正和完善等大量工作以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完全的工人国家。但是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这种国家成了工人的某种绝对化的东西，不可能再进一步接近群众了。我的反驳，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对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分析所作的叙述，正是针对这种官僚政治拜物教的。而关于我，有人对党说，我否定我们国家的工人性质。这样说不对。（插话）

这次会上有人问：“需要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们真是认为对我所指出的各种现象束手无策，那就是说，你们承认革命必然灭亡。因为，革命在目前这条道路上必定会灭亡。这就是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尽管你们都是些自满自负的人。然而，这种局势完全可以通过改变政策得到挽救。但是，在决定该做什么之前，必须对现状做出说明，指明各种进程发展的方向。你们如果看一看像住房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会发现这里正在发生的两种过程，它们反映在很容易核查的数字上：无产阶级的住宅面积正在缩小，而其他阶级的却在扩大。至于正在大面积进行建设的乡村，我就用不着说了。当然，建造房子的不是贫农，而是上层分子，即富农和殷实的中农。城市的情况又怎样呢？所谓“手工业者”即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商人和专家，他们今年每人的住房面积都有所增加。而工人的住房面积今年却比去年有所减少。在谈论做什么之前，必须老老实实地指出事实。正如在住房问题上一样，在日常生活、文化、剧院和政治等方面也是如此：非工人阶级日渐发展，而无产阶级则受到挤压，无所作为。

插话：怎样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托洛茨基：如果你们再给我一小时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奥尔忠尼启则：您的时间快到了。

托洛茨基：我再要15分钟。（通过）我再说一遍：正如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在物质领域进行扩张那样（你们从街道、店铺、电车和公寓都能观察到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现在整个无产阶级都受到挤压，而我们党的制度则在加强对无产阶级的这种阶级压制。这是基本事实。这种打击的威胁来自右派，来自非无产阶级。我们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无产阶级去认识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别以为政权到手就永世不变，万事大吉了，别以为苏维埃国家会绝对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是工人国家。必须让无产阶级懂得，苏维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领导实施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可能会变成使政权脱离无产阶级基础，而接近资产阶级的机构，然后资产阶级会彻底撕掉苏维埃这件外衣，使自己的政权变成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在错误的路线下，这种危险是非常现实的。

没有国际革命你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要是没有指靠国际革命的正确政策，要是指靠普塞尔的支持，非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反而会断送苏维埃政权。必须使无产阶级懂得这一些。我们反对派的错误，我们的罪过就在于我们不想麻痹自己，不肯“乐观地”闭眼不看我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危险。

现实的危险来自右边，不是来自我们党内的右翼，因为我们党内的右翼不过是一种传动机构，真正的危险，根本的危险来自正在抬头的各种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家是那个聪明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分子乌斯特里亚洛夫，过去列宁常注意听他发言，并警告大家要提防他。大家知道，乌斯特里亚洛夫不支持我们，他支持斯大林。

1926年秋，乌斯特里亚洛夫写道：“现在需要一种新的策略、新的动力，比方说，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政策。从这个观点来看，必须承认，最近党向反对派所作的一些实际让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忧虑。”接下来他又写道：“要是反对派领袖的悔过声明是他们单方面无条件投降的结果，那么光荣应该属于政治局。但是，如果这个声明是与他们妥协的产物，那政治局就该死。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斗争一定会再度爆发……取得胜利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抵抗反对派瓦解性毒药的内在免疫力。它必须从反对派的失败中得出一切结论……否则，这将是我国的灾难……”乌斯特里亚洛夫继续写道：“因此，这项工作必须由俄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专家以及主张演变的而不是主张革命的思想家来进行。”

乌斯特里亚洛夫得出结论说：“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不仅反对季诺维也夫，而且明确地支持斯大林。”乌斯特里亚洛夫反对你们修改选举法细则中的“错误”。他主张彻底粉碎反对派。

而你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你们企图把反对派清除出中央委员会——暂时还仅仅是中央委员会。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个通晓法国大资产阶级历史的资产阶级分子，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这位反映新资产阶级情绪的代言人懂得，只有布尔什维克本身的倒退，才能最顺利地为新资产阶级掌权作好准备。这个支持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写道，必须保护（什么？）不受反对派的瓦解性毒药的毒害。可见，他同你们也是一致的，认为反对派是瓦解性毒药，必须清除这种毒药，否则它将是“我国的灾难”。这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说的话。这就是他不但反对我们，而且支持斯大林的原因。请你们好好想想这一点。现在你们所面对的不是无知的群氓，他们有头脑，不轻易上当受骗，他们不会相信反对派是靠英国的金钱进行活动的，不会的，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一个颇有意识的人，他清楚该说什么，该朝哪个方向走。那么，他为什么支持你们？他同你们

一起要维护什么呢？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周报《统计学家报》在6月11日这一号上说了些什么呢？请大家听听：“……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斯大林政府要么粉碎极端分子，彻底制止国外的宣传，要么自己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集团粉碎！！”这些话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机关报说的。该报写道：到了必须决定谁赶走谁的时刻了。现在也请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有人告诉我说，索尔茨同志在与一位曾在反对派83人声明上署名的同志交谈时曾拿法国革命做比喻。那有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法，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应当把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它最后阶段的事实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对它的解释重新刊印出来，供党阅读。这是个挺不错的警告。（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插话。）只要大家没有让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停下来，我就一直等着，否则我会说出什么反党的话来，谁也打不断我的话。

扬松：我们能打断。

托洛茨基：打断不了，无政府主义的警告对我无效，我需要主席的经常性警告。

索尔茨同志与这位同志谈了有关他在83人信上签名一事……顺便说一句，这里有个谜：索尔茨点了一个签名者的名字，并提出各种各样的严厉警告，可不知为什么你们却没正式指责我们在83人信上签名。怎么能说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一事是犯罪行为，说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也是犯罪行为。我在共产国际是以国际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工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归你们管。如果没有雅罗斯拉夫尔车站，那么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没有车站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插话听不清……甚至连你们也没有。）我知道你们也会无中生有地来煮出指控的汤，你们比那个用斧子煮汤的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不

提那个 83 人声明？索尔茨同志点了那个同志，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沃罗比约夫。（席上插话：是情报员吗？）你们真的想给党套上嘴套吗？不是情报员，而是同志，这些同志揭露了党内的丑恶行为，他们做得对。那么你们为什么没把 83 人声明作为指责对象呢？如果你们认为这个声明完全是忠心耿耿和开诚布公的表现，也就是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可以由一部分党员发表这样的声明，那就太好了，我欢迎这样做。可是对去年七月宣言你们完全不是这样做的。请问：你们是不是认定我有罪，是不是认为我们的集体声明是犯罪行为？或者你们不这样认为？我担心你们的派别中央还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请求在速记记录中不要有遗漏，要准确无误地记下：既然没有指责我们在 83 人声明上签名，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目前的领导集团准备在党内建立一种更健全的制度，以使党员可以向中央提出声明、宣言和建议（这样就不会有这种审判了），而是因为领导集团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您所做的一切实际上使对问题的辩论和讨论变得完全不是所希望的那样了……

托洛茨基：不正确之间和不法之间（这个不必由我向你们做解释，因为你们要维护的正是合法性），以及不正确与不法之间有很大区别。比如，我认为你们此时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我不能说这是不法的。你们实施的是一条错误路线，审判的是不该审判的人，然而你们的审判是根据党的法规进行的。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认为 83 人声明实质上，即政治上是错误的，但从党章的角度来看又是合法的？我是这样理解你们的。

有人说我说话尖刻等等，难道我缺少同志式的态度不成，我再次提醒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并请他读一读《反对派的道路》这篇文章，该文最先提出反对反对派，说反对派超越了“同志式的（！）批评”，因此以“同志式的态度”劝诫他们，说反对派在战争中充

当了张伯伦的帮凶。如果你们不纠正这一点，你们将很难用正确的同志式的口吻劝诫我们这些反对派，虽然我们完全准备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劝诫。索尔茨同志在同这位同志交谈时，正如前面所说，曾拿法国大革命做比较。

索尔茨同志现在就在这里，他最清楚他都说了些什么，要是我把他的话转述错了，他会纠正我的。索尔茨说过：“83人声明意味着什么？它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逮捕和断头台。”同索尔茨同志交谈的沃罗比约夫同志问他：“怎么，你们打算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索尔茨在回答时作了冗长的解释。他说：“您难道认为罗伯斯比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时，他不感到惋惜吗？而后来罗伯斯比尔自己也不得不走上……您认为这不可惜吗？当然可惜，但是不得不……。”这就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认识法国大革命。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从克鲁泡特金开始。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比饶勒斯更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内幕和阶级内幕。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人被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枪决了许多人。但是，法国大革命中有两大篇章，其中一章是这样的（向上指），另一章是这样的（向下指）。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当篇章这样（向上指）时，法国的雅各宾派，即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曾把许多君主派和吉伦特派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伟大篇章，当时我们反对派同你们一起成为枪手，枪毙了许多白卫分子和吉伦特派，我们同你们一起都成了枪手。而后来当法国的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和准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雅各宾派右翼中的热月派和波拿巴派——开始放逐和枪杀雅各宾派左翼即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在法国便开始了另一个篇章。我倒希望索尔茨同志彻底思考一下他的比较，首先让他自我回答：索尔茨准备按照哪一个篇章来枪毙我们？（场内议论纷纷。）这不是开玩笑，革命是严肃的事

业。我们谁也不会被枪毙所吓倒。我们全是老革命家。但是必须知道枪毙谁，按照哪一个“篇章”枪毙。我们枪毙人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是按照哪一个篇章枪毙的。但是，索尔茨同志，你们准备按照哪一个篇章来枪毙人，你们现在清楚吗？索尔茨同志，我担心你们正准备按照乌斯特里亚洛夫篇章，即按照热月篇章来枪毙我们。

当我们中间使用“热月派”这个词，大家都把它当作骂人话。人们都认为热月派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派，是君主制政权的自觉拥护者，如此等等。决不是这样！热月派是雅各宾派，不同的是他们变成了右派。雅各宾组织——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在各种阶级矛盾的压力下，很快决定必须消灭罗伯斯比尔集团。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们会在热月9日的第二天对自己说，现在我们已经把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了吗？决不是这样！请查看当时的所有报纸。他们说：我们消灭了一小撮扰乱党内安宁的人，而现在，把他们消灭之后，革命将彻底取得胜利。如果索尔茨同志对此表示怀疑……

索尔茨：您确实是在重复我的话。

托洛茨基：这就更好了。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的话，索尔茨同志，那将大大有助于我们解决你们准备通过粉碎反对派展开什么样的篇章这个问题。对下面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理解，就是如果不照应当做的那样着手纠正党的阶级路线，那么党不得不奉行乌斯特里亚洛夫指定的路线，即对反对派实行残酷斗争的路线。如果你们坚持斯大林的路线，那么你们就应该沿着这条路线走到底。

布里瓦尔是雅各宾派的右翼分子，热月派分子，下面我把他的话读给你们听听。他在报告关于国民公会开会期间将罗伯斯比尔和其他雅各宾派分子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的情况时说：“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阴谋家、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自由；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他们，这些人是：罗伯斯比尔、库通、圣茹斯特、勒巴和小罗伯斯比尔。您的意见如何？——主席问我。我回答说：凡是在立法议会和

国民公会中总是按照山岳派的原则精神投票的人，都投票赞成逮捕。我更是极力赞成，因为我是这项措施的提议人之一。此外，我作为秘书，立即签发了国民公会的这项法令。”

这就是当时的索尔茨或扬松做报告的情况。罗伯斯比尔及其同伙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凡总是按照山岳派的原则精神投票的人”，按当时的话等于是说，“谁总是布尔什维克”。布里瓦尔自以为是老布尔什维克。“作为秘书，立即签发了国民公会的这项法令”。今天也有立即“签发”的书记。今天，也有这样的书记……

再听一听法国国民公会在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被处决以后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公民们，正当取得战胜外敌的辉煌胜利的时候，共和国受到了新危险的威胁……如果法国公民在祖国和少数个别人物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刻犹豫不决，国民公会的工作就会化为泡影，军队的勇敢也将失去一切意义……响应祖国的号召，不参加万恶的贵族和人民的敌人的队伍，你们将再一次拯救祖国。”

他们以为在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实现的是“少数个别人物”的利益；他们不懂得这些“个别人物”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最低层的革命自发势力的情绪。这些“个别人物”反映的是反对“新的新经济政策”和反对波拿巴主义的自发势力的情绪。热月派以为这件事所涉及的是几个人的更换，而不是阶级的变动。“响应祖国的号召，不参加万恶的贵族的队伍。”罗伯斯比尔的朋友都成了贵族。而我们今天不是也从扬松口中听到称我为“贵族”的同样喊声吗？

我可以向你们引证许多篇把革命的雅各宾派说成是当时的张伯伦即皮特的走狗的文章。这个比喻实在令人吃惊！现今袖珍版的皮特就是张伯伦。请你们看看奥拉尔的《革命史》：“敌人不满足于杀死罗伯斯比尔和他的朋友，还对他们进行污蔑，把他们说成是法国人心目中的君主派和卖国贼。”这是原话。而今天，《真理报》上以《反对派的道路》为题的文章不也正是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吗？凡是

读过《真理报》最近一篇社论的人都会嗅到它的气味。这种“第二个篇章”的气味正在钻进人们的鼻孔。第二个篇章的气味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这个主义正是在我们党的制度压制每一个反对热月的人的时候，渗入了我们党的官方机构，解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武装。在党内，群众工作者受到压制。普通工人默不作声。

你们是想用新的“清洗”达到进一步的沉默。这就是党的制度。请回忆一下雅各宾俱乐部的历史。那里有过两次清洗的篇章。当浪潮像这样（向上指）时，温和派受到排斥；当路线开始曲折向下时，革命的雅各宾派则开始受到排斥。这样一来雅各宾俱乐部作出了什么反应呢？俱乐部中建立起一种恐吓和无个人独立面貌的制度，因为强迫大家沉默，要求百分之百地投赞成票，放弃一切批评，强迫按照上面的命令进行思考，使大家不敢再认为党是生机勃勃的、独立的组织，而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时执行同你们一样的各种职能的机构——同整个革命一起完成了两个篇章。在第二个篇章时期，它使党员丧失了思考的习惯，迫使他们盲目接受上面的一切东西。雅各宾俱乐部，这个革命的发祥地，变成了培育未来的拿破仑官吏的温床。我们应该向法国革命学习。但是，难道真需要历史的重演吗？（插话）

说这些可不是开派别玩笑。没有人愿为区区小事而拿大事去冒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在这种场合对这些问题的最后解释。我不知道你们将怎样迅速地执行我在发言开头时提到的那条路线。但是，我并不想用给我的这 80 分钟来驳斥你们向我提出的各种卑鄙无耻的无谓指责，而是要提出分歧的基本问题。

请你们再读一读列宁谈分歧的那些讲话，你们会发现，关键时刻他用三言两语就把党内斗争中常出现的无关紧要的分歧一扫而光，并十分尖锐地提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根本问题：

为了避免分裂应该做些什么呢？分裂可以避免吗？如果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和革命以前的条件下，生活在各种矛盾相当缓慢地积累的条件下，我认为，分裂要比保持团结的可能性大得多。要是对深刻分歧抱有幻想，那就是犯罪。

我曾在三人小组中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生活在从前的、革命前的条件下，即各种矛盾缓慢积累的条件下，分裂要比保持团结的可能性大得多。

但是，现在的局势不同了。我们的分歧已经尖锐到了可怕的程度，各种矛盾变得异常尖锐。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分歧再次变得极为严重起来。但是与此同时，第一，我们党内拥有巨大的革命潜力，拥有从列宁著作、党的纲领和党的传统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这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你们大量浪费了这笔资产，很多都被你们用目前党的报刊上占统治地位的“新学派”毫无价值的东西取而代之。但还是留下了很多纯金。第二、目前正处在充满着急剧转变、重大事件和大量教训的历史时期，从中应当并且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事件，我们的态度也不会变得如此激烈。比如，我们对工人的工资问题展开了争论。当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除了直接实际意义以外，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种预示意义，指出了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何处，迫使我们去检查领导中的多数派对我们赖以维持的工人阶级最起码和最迫切的要求是否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当然所有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对评价路线来说则主要具有预示意义。而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中国革命最近的事件，我们的态度今天也不会如此激烈。但是，中国革命及其现在发生的事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态度也就变得极其激烈：存在两条路线。但是，同志们，这里正好用上一句话：碰得越疼越要治。

目前有许多重大事件正在使两条路线经受考验。但是你们无权隐瞒这些事实，它们迟早总会大白于天下。不应该隐瞒无产阶级的胜利与失败。党可以使了解和接受这些教训的工作做起来更容易或更困难。你们正在增加这些困难。因而我们，只有我们才是乐观主义者。我们说我们正在纠正党的政策，使其不要分裂。我们正在为十月革命的路线而战斗，而且还要继续为它战斗。我们现在深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毫不怀疑这条路线将会深入到我们党的大多数无产者的意识之中。

那些用镇压来反对这一路线的人，那些和《真理报》同唱一曲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造成了分裂，他们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是好造谣中伤制造分裂的人，他们被历史赶进了死胡同。他们已无望取得思想上的胜利，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被驱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责任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的责任应该是在这个急剧转折时期建立一种比较健全而又灵活的党内制度，在不发生动荡的情况下让两条对抗的路线去经受各种巨大事变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党的有用之才。但是必须使反对派也有可能进行自我检验，当然是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同时要维护为此而制定的所有党章条文。必须解除分裂分子的职务，使他们无法分裂。必须保证党能在各种重大事变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批评。如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党的方针在一、二年内一定会纠正过来。当然不是所有在座的人都能和现在一样在那些机关参加会议。但是党会保持住自己的统一。我再说一遍，我在三人小组说的那些话，现在又可以用来反驳索尔茨同志的哲学：不要仓促从事，不要通过事后无法补救的决定。当心不要搞得以后说：我们抛开了应该保留的人，而保留了应该抛开的人。

奥尔忠尼启则：现在我们开始讨论。请萨哈罗夫同志发言。

第二次发言

托洛茨基：这是党的一位负责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一份“起诉词”。不论是在群众大会上，还是在小型集会上，或是在别人给雅罗斯拉夫斯基起草的发言稿中，只要是反对反对派，说什么都行，可是在党的最高机关中……“起诉人”也是这么说的……但事实毕竟比你们更有说服力。党的高级机关当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事实比你们更有说服力。今天，我参加完早晨的会议回来时，正好收到两份“不供发表”的电讯稿，这两份电讯稿再一次推翻了你们的观点。像是有意作对似的，一份是关于英俄委员会的，另一份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两份电讯稿都是瞒着党的。第一份电讯稿写道：“伦敦6月22日电（塔斯社）。工会总理事会今天分析研究了希克斯和西特林6月18日从柏林发来的他们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会见的消息，并决定将这一消息以及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来往书信的摘要作为报告一并转交给国际联系委员会”。

原来，我们的代表已经会见过总理事会的代表。有关这次会见的情况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已作了报道，可我们现在却一无所知。

彼得斯：怎么会一无所知，各报都登出来了。

托洛茨基：是登出来了，可说的是将要举行会见。现在整个欧洲人们所谈论的已经是这次会见本身的情况了，通报也出来了。而塔斯社的电讯稿却“不供发表”。请继续往下听：“此外，总理事会还讨论了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将由该理事会在下一次会议上通过。总理事会的例行会议在正常情况下应于7月份召开，工会人士认为，这是总理事会不同意召开英俄委员会的征兆。在同塔斯社的代表会谈时，接近总理事会右翼的研究工运问题的一些报社记者认为，目前出现的形势是在向俄国人宣战。”

因此，决定将召开英俄委员会的建议作为报告提交给国际事务委员会。这种暗中破坏行为被看成是“向俄国人宣战”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今天从伦敦发过来的电讯稿的内容，但电讯稿却被宣布“不供发表”。怎么，难道我们没有权利知道这一切吗？究竟是什么样的“贵族”向百万人的党隐瞒这样的电讯稿？中央委员会必须向党作出答复，究竟是谁隐瞒了这些电讯稿？为什么要隐瞒？而更重要的是，在对英俄委员会的整个评价上谁是正确的？一年前莫斯科委员会曾说，英俄委员会在有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将起巨大作用。战争危险早就有了。托姆斯基去过柏林，在那里进行了协商。结果怎么样呢？将召集英俄委员会的建议作为报告提交给国际事务委员会，因为总理事会正在向我们，而不是向张伯伦宣战。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高兴地接受扬松同志的声明，他说我们可以随时参加工人支部，并在那里为我们的观点辩护，这时，我们感到痛苦的将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我们的追究，而是被工人抛弃。

我高兴地得知，83人声明（现在的人数要多得多）没有破坏党的纪律，因此我得出结论：对在声明上签名的人的任何迫害都是对党章的破坏。我将采用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把这类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不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态度。我还要补充一点，或许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但是我认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态度比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态度强硬得多，因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执行现行方针时更果断、更坚决和更彻底。

我高兴地得知，索尔茨同志称我可以对关于废品问题的文章提出原则性的批评。我高兴地指出，大多数与会者都支持索尔茨同志的这一建议。我高兴地指出，出席本次会议的《真理报》编辑部秘书乌里扬诺娃同志也不反对这一点。

我得知了罗伊津曼同志关于他敦促调查破瓶塞的声明，这些破瓶塞是同伏特加酒一起售出的，而且还提出新的苏维埃口号：“没有伏特加酒吃饭都不香”，“醉汉睡一觉就会清醒”……等等。我收到了我们主席就这个问题写的一个便条，上面只有一个非常简单而形象的词——“下流”。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些破瓶塞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它们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国家正在出售伏特加酒。

奥尔忠尼启则：季诺维也夫本人赞成这一点，但是我反对。

托洛茨基：如果他赞成，那他就错了。如果您反对，那您就对了。最后，有一点必须弄清楚，在沙皇制度下，伏特加酒对国家预算有利，而于私人经济不利。这是在沙皇制度下的情况。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伏特加酒怎么样呢？它对国家预算有利，而于国有经济不利。我认为，除了所有其他后果，诸如那些口号外，对国有经济的弊要大大超过对预算的利，因此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在反对我们自己。

我高兴地指出，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明目张胆地说我逮捕米雅斯尼科夫和枪杀共产党员时，大会主席打断了他的话。我必须指出，说我枪杀共产党员的卑鄙流言早就传开了。我还必须告诉你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对待我枪杀共产党员的卑鄙诽谤的。同志们，我这里有伊里奇所写并由他签署的公文副本。原件我已在几年前交给了列宁研究院。我保存的是影印件，而这一份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

公文纸的上端写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字样，最下端有列宁亲笔写的几行字：“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严厉性质，我完全相信，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是正确的、合理的，是事业的利益所必须的，因此我完全支持此命令。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这是列宁同志亲笔写的。当他把下端写有这几行字的空白公文

纸亲手交给我时，我表示不解。他对我说：“我得到报告，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您枪杀共产党员。我给您这样一张公文纸，而且像这种写有我同意您的决定的公文纸需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您可以在上面写上任何决定，公文纸上已有我事先签上的名字。”这是1919年7月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关于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态度的流言蜚语，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能拿出这种公文纸来，这种已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名的空白公文纸，列宁给我时说他先签上名字，我可以作出任何决定，于是这样的决定不仅常常决定着个别共产党员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更多的东西。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雅罗斯拉夫斯基将比奥尔忠尼启则更强硬，在所有的支部里将流传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说法，而不是奥尔忠尼启则在这次会上对他的谴责。然后奥尔忠尼启则本人也会说：“一点办法也没有，群众要求这样做，其实我本人也是听了托洛茨基的发言才确信这一点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什么预见！

托洛茨基：我高兴地得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谴责《真理报》的社论。但是这50万份净是流言蜚语的报告纸是政治事实，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谴责却鲜为人知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分子省里和县里都有。马列茨基的文章对县里、省里和其他地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分子来说就是斯大林的调子。运动将按照这个调子进行。这是利用最不觉悟的阶层的黑帮本性进行的肮脏的投机活动。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反对这些诽谤性的攻击。您自己才是黑帮分子。（奥尔忠尼启则按铃。）

托洛茨基：我高兴地得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声明，他说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一年以来官僚主义有所增长。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反对。

罗济特：应该让诽谤分子规矩点。

奥尔忠尼启则：谁也没有委托您发表声明。

托洛茨基：这不只是官僚人数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方针问题，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态度问题。在一次区里召开的有部分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区委书记雅柯夫列夫作了一个攻击反对派的派别性报告，一位女士发了言，大致内容是：“这里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对反对派必须加以惩罚，但要命的是，当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来到区委会时，他立刻会被带到他所需要去的地方，而一个衣着普通满身污垢的女士来到这里时，她就得在过道立等多时”。说这话的是一位女工，区委会委员。这种意见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这不仅说明官僚者人数的增加，而且表明统治集团正在日益同苏维埃新经济政策社会的上层融为一体，也表明正在形成两个阶层、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习惯、两种关系，或者用更尖锐的话说，正在形成日常生活中双重权力的要素，在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这种双重权力可能会转变成双重政权，而双重政权将会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直接的威胁。城市中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庞大阶层，他们在下午三点以前过着职员生活，而三点以后则过着市侩生活，对中央委员会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而每星期三下午六点以后他们都要谴责反对派缺乏信心。这种党员活像私下里信奉达尔文理论，而需要时就拿出圣餐证的沙皇官吏。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建议我们帮助他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解除反对派的职务呢？难道他们拒绝“提供帮助”吗？确实，过去和现在都有米柳亭式的人物，他们试图证明反对派不好好工作，妄图在背地里捣鬼败坏他们的名声，（我认为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并不鼓励他们这么做）。但是我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反对派被解除职务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称职，或者不遵循中央的指示，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而受到处罚，是作为反对派被解职的。他们是由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到惩罚和被解职的。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提出的帮助他进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建议，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更具权威性的建议，就是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是在他写完对外贸易垄断的信之后和他写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之前的事。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患病前的两三个星期。他把我叫到克里姆林宫他的住处，谈了我们苏维埃机关里快速增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和必须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问题。他建议成立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并请我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我回答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认为，目前在同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时不应忘记，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即在省、县、区、中央，所谓中央委员会等等形成了一套围绕党的著名领导集团和领导人挑选党的、非党的、准党的官员和专家的特殊办法。只要触动一个官员，就会牵涉到专家上头的党员领导干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可承担不了这样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了一会儿说道（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转述他的原话）：“这就是，我说的是必须同苏维埃官僚主义作斗争，而您认为斗争对象还应加上中央组织局？”由于出乎意外我不禁笑了起来，因为我脑子里还没有这种完整的想法。我回答说：“大概就是这样。”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那好，我建议成立一个联盟”。我说：“很乐意和一个好人组成联盟。”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建议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一个同“所有”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委员会，而通过该委员会我们就可以也碰碰中央组织局。关于组织方面的问题他答应再“考虑一下”。就此我们便分手了。后来我有近两个星期都在等他的电话，但是伊里奇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不久便卧床不起了。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自己的秘书给我送来了几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结果这件事就中断了。（会场上一片喧闹声。）

我当时把这一情况告诉过几位最亲密的中央委员同志，我希望

他们也一字不差地再来叙述一遍。同志们，这件事是根据当时的整个形势提出来的，这件事大致发生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或准备写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的时候，也就是在他给我写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信之后和他派人给我送来关于民族问题的便函之前。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这里试图以他对此类事情所特有的果断否定我引用过的他的一句话，不久前，就在这两天，他说冯玉祥是一个可靠的革命者。我建议中央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此事，也就是调查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不久前在党的一个比较大的基层组织中是否说过：冯玉祥是可靠的革命者，是“真正的农民”或“真正的无产者”，而当有人对他说，冯玉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时，雅罗斯拉夫斯基回答：“没有的事，他从莫斯科回到国内以后，把所有的神父都赶走了”，为此他提议与会者热烈鼓掌以示对冯玉祥的敬意，冯玉祥从莫斯科回来后成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志同道合者——一个积极的反宗教主义者。

我再次请求把斯大林同志4月5日讲话的速记记录送给我。我请求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把这份速记记录给我。我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有权得到这个记录。作为中央委员，我可习惯于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因此，我最后请求把这份速记记录给我。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唐恩兴高采烈地刊登了我的发言。我认为唐恩兴高采烈地刊登所有关于我们内部批评的东西，转载我们所有的争论内容，目的是加深我们的内讧。我再说一遍，有一次我曾经说过这件事：翻一翻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就会发现，这些报刊经常称赞反对派所提出的批评，但是也毫不留情地谴责他们的政策。而这些报刊称赞的正是你们的政策。这些报刊在政策、内部事务和中国革命等问题上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而它称赞的只是我们的批评。我记得，当列宁谈到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和我们从沙皇制度中继承的官僚主义的最坏一面

时，所有的白卫坏蛋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是，这丝毫没有降低列宁对我们的国家组织一处的批评的意义。

我想在本次会议上，利用这一次机会简略地谈一谈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也就是那些出现在我的所谓政治传记中的、特别是通过作为审判员出席本次会议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及与之类似的人的口和笔所传播的谎言。所有的老党员都知道，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一度反对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我不是孟什维克。如果把孟什维主义理解成一种政治阶级路线——实际上也只能这样理解，那么，我从来都不是孟什维克。从1904年年中起，也就是从孟什维主义开始形式一种政治倾向时起，我就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维主义决裂了。在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我不同意维拉·查苏利奇的文章和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支持地方自治自由派计划等等的文章的观点。在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我同孟什维主义的观点从来就不一样。而这是主要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不仅用近10年的情况，而且用更早以前的事情（那时我还站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两个主要派别之外），欺骗党和共产国际。

1905年5月，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武装起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决议。克拉辛同志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修正案，它实际上成了一项单独的决议，曾在大会上受到列宁的高度赞扬。克拉辛提出的这个决议案完全是在彼得堡草拟的，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即克拉辛在一次会议上写给我的一张便条。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最重要决议的中心部分——请查记录——是我执笔的，我也因此而感到自豪。在批判我的人的功劳簿上有什么能与此相比的东西吗？

1905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地下印刷所印发的许多传单都是我起草的，例如就1月9日事件告农民书，评沙皇的土地法，等等，

等等。1906年^①，11月间列宁主持的《新生活报》同我在《开端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我国革命性质的文章是一致的。我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所谓不断革命论。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您当时是在《开端报》，而不是在《新生活报》。

托洛茨基：您大概忘了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决议。几个星期后《开端报》便同《新生活报》合并了，《新生活报》曾不止一次地撰文热烈赞扬我的文章。这是趋于统一的时期。两报合并两个月之后又一次分裂了。当时我又被捕入狱……当然我那时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我必须说，你们歪曲了我过去的历史。你们只字不提1905年我在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克努尼扬茨^②、涅姆佐夫、克拉西科夫等人）携手合作的事实。当时不存在意见分歧。当列宁尖锐地批评同布尔什维克党外的革命者的细微分歧时，当他毫不留情地抨击犹豫不决和吞吞吐吐的行为时，他的做法绝对正确。但是后来当你们向我指出我的错误时，你们却不顾这些错误的实际发展情况，极力歪曲并加以夸大，这是欺骗行为。你们只字不提我1905年在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的事实。你们只字不提1906年列宁在《新浪潮》上发表我的阐述我们在革命中对待农民的态度的小册子《我们的策略》这个事实。你们只字不提列宁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赞扬我对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态度事实。我肯定，我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从来没有大过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同一些问题上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有谁敢说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有谁敢说他们是孟什维克。

^① 原文如此，似应1905年。

^② 克努尼扬茨，波·米·（1878～1911）——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

我那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从来没有在组织问题上犯过像维护英俄委员会或让中国共产党附属于国民党这类极端荒谬的重大政治错误。这不仅是组织问题上的，而且是整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即使在我本人对列宁右的背离最严重的时候，我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克里沃夫：那维也纳的行动纲领是怎么回事？

托洛茨基：您说的是1912年八月联盟吗？

克里沃夫：是的。

托洛茨基：那是调和主义的产物。我那时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起来的可能性还没有绝望。但是请不要忘记，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他们自己在1917年，不是在1912年，而是在1917年加入了同孟什维克的联合组织。维也纳代表会议是搞调和主义的一次尝试。我决没有想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我对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和解仍抱有希望，力图使两者统一起来。列宁和以往一样，不同意搞这种人为的统一。由于实行调和主义政策，我发现我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已结成了联盟。但是我与他们之间立刻，几乎在第二天就开始了斗争，而战争爆发时我们已经成了互不相容的对手。可是斯大林当时是一个相当庸俗的调和主义者，尤其是在最尖锐的时刻。1911年，斯大林写了一篇关于列宁与马尔托夫斗争的文章，称这一斗争是“杯水风浪”。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说的话。1917年3月，斯大林赞成与策列铁里联合。1926年，斯大林又赞成同普塞尔、蒋介石和汪精卫结成联盟。和这些错误相比，我的错误真是微不足道。我在1914年即战争期间的活动遭到了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党人库西宁，特别是当时的爱国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那帮先生的严重歪曲。我提请大家注意，我在战争开始时写了一本题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当时对我没有好感也不可能有好感的季诺维也夫

说，这本小册子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对问题的提法都是正确的。

什克洛夫斯基：那是1914年的事！

托洛茨基：一点不错，是1914年的事。这本小册子成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极左派手中的武器。我当时虽不是布尔什维克，却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在法国曾同一批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同志一起活动，他们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创建者。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法国的。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西班牙的。在纽约，我曾同沃洛达斯基^①和布哈林一起在《新世界报》工作。后来我遭到了当时是庸俗孟什维克的梅利尼昌斯基这类“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指责，他们伪造了许多事实……

在加拿大阿默斯特的集中营里，我曾把德国水兵中的李卜克内西的拥护者组织起来，后来这些人站在斯巴达克派方面进行斗争。1917年2~3月，我为《新世界报》撰写了几篇文章，当然就深度而言这些文章无法同列宁的文章相比——你们也不能这样要求我，但是这些文章的精神与列宁的文章相同，当时正是斯大林作为半孟什维克和半护国派分子在《真理报》上大发议论的时候。

奥尔忠尼启则：您只剩下四分钟了，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可我还没有回答你们提出的有关我国革命正走向“衰落”这个主要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您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谈您的经历？

托洛茨基：我认为被告人有权谈自己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主席不应加以限制，再说，关于我的经历的问题又不是我先提出来的。我并不想这么做。问题够多的了。但是，正是斯大林派用我的经历问题取代了一切政治问题。我只能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回答各

^① 沃洛达斯基，弗·（1891~1918）——十月革命后从事出版和宣传工作，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被暗杀。

种谎言。我请求主席团再给我 15 分钟来回答我国革命的命运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您先讲完剩下的这四分钟，然后我们再说给您延长的问题。

托洛茨基：奥尔忠尼启则指责我拿法国大革命作比喻，说是不能谈监狱、断头台和衰落的前景等问题。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说说伤不了人。伤人的是事实，是行动，是错误的政策。——但是，我必须说明，这个问题决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我绝对坚持。索尔茨并没有否定我原则上援引的是他的话。因此我认为援引他的话这件事是得到证实的。据沃罗比约夫说，索尔茨是这样说的：“你们想一想，当罗伯斯比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就不感到惋惜吗？你们想想，罗伯斯比尔不是真诚的革命者，他不是只考虑革命的利益，而用断头台来了结，因为革命斗争的逻辑就是如此。”我援引了索尔茨的这些话。这些话使我有根据提出革命的不同阶段的问题，革命的高潮和低潮问题，这个高潮和低潮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我必须指出，目前所有的基层组织都在为作更进一步的“结论”进行准备，这种准备正是根据驱逐和镇压的路线进行的，而你们，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却如此轻率地官僚主义地排除这条路线。是的，我再强调一遍，你们如此轻率地官僚主义地排除这条路线，闭眼不看党内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次会上有一位同志说：“千万别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这是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的反应……所有基层组织里的报告人事先都经过乌格拉诺夫之流和曼德尔施塔姆之流专门的训练，他们每提出一个关于反对派的问题，就会有一个工人，多半是奉命，站起来说：“你们还同他们啰嗦什么？还不该把他们枪毙吗？”这时，报告人就会态度温和、假仁假义地反对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已是党内的老一套了。问题常常是背着反对派分子提出来的，造谣中伤、含沙射影、粗暴无耻地即纯斯大林

式地歪曲反对派的纲领及反对派成员的革命经历，把他们说成革命的敌人，党的敌人，这一切是为了激起受蒙骗的与会者和不成熟的年轻党员的强烈反响——这些人是你们故意塞进党的队伍里来的——，也是为了以后你们有可能说：“你们瞧，我们是准备等一等的，可群众这么要求。”这是斯大林的既定战略，你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运动的组织者，可后来你们自己遭到这一运动浪潮的冲击时，你们却说：“是党要求这样做的，我能怎么样”……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对我的第二个指责是更为一般性的政治指责。他说，我拿法国大革命作比喻正表明了您的“悲观主义”。

据他说，托洛茨基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要是我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那我干嘛还要同你们斗争呢？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始终不能自圆其说。要是我像您所说的那样，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我为什么还要提出“掠夺农民”的建议呢？也许像您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我对农民有个人仇恨吗？要是我不相信革命，我为什么还要进行斗争？随大流岂不更好。请你们把这一点弄清楚，凡是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的人，也就不会进行斗争了。同志们，你们又没能自圆其说。

十月革命没有灭亡，我从来不认为它已经灭亡了。但是我说过，如果真有人这么做，十月革命是可能灭亡的，——而你们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您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思想不是辩证的，而是形式主义的。您的思想忽视了各种现实力量之间的斗争问题，忽视了党的问题，您的思想渗透了彻头彻尾的宿命论，您在区别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时，把它们看成是与形势和政治无关的两种不可改变的范畴，按照您的观点，一个人要么只能是“乐观主义者”，要么只能是“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或者认为革命已经彻底灭亡，或者认为革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会灭亡。这两种观点是错误的。难道革命没有经历过一系列的高潮和低潮吗？难道在十月革命时期没有过汹涌澎湃的高潮

吗？难道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没有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吗？请回想一下列宁在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时说过的话，他说革命时期驾驶政权这辆汽车是异常困难的，因为时时刻刻都要对付急转弯。布列斯特和约是一次退却。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一次退却。每一次退却的浪潮不都引起了机会主义情绪吗？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当革命的这种退却和低潮延续了一年、二年、三年的时候，就会使群众以至于党内的情绪更加低落。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您是高加索人，您知道山路不是笔直向上的，而是迂回曲折的，待到爬过陡峭的上坡，常常要走两三俄里的下坡路，然后再继续爬坡，但总的来看这毕竟是通向山颠之路。当我中途走的是一般下坡路时，我必须想到，山路迂回曲折，马上就会上坡的。要是我由于“乐观主义”，全然不顾山峦的起伏曲折，我的车子就会在某一个转弯处落入万丈深渊。我认为，你们目前正在向右转，正在走下坡路。危险在于你们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你们闭眼无视这一事实。而闭着眼睛登山是危险的。

我们已经攀登十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布列斯特和约和喀琅施塔得暴动，实行了新经济政策。难道新经济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是绝对有必要的）没有引起控制我们自己党内右翼的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这种现象吗？

1923年秋天，在德国革命高涨的同时，我国曾出现波澜壮阔的形势。而德国革命失败后，我们也开始了低潮。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次低潮中出笼的，这是一种悲观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背道而驰。1926年，中国革命期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我国又出现过一次汹涌澎湃的高潮。而中国革命在上海失败以后，我们又出现了低潮。对曲折的革命运动必须根据所有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1923年起我们遭到了一系列惨重失败。只有可怜的懦夫才灰心丧气。那些连左右脚、革命的高潮和低

潮都分辨不清的人纯属瞎子、蠢才和官僚主义者。1924年1月失败以后，我同布兰德勒进行过一次谈话，他对我说：“1923年秋天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是因为您过于乐观；而现在您又太悲观了，所以我还是不同意您的观点。”我回答他说：“布兰德勒同志，恐怕您永远成不了革命者，因为您分不清革命的高潮和低潮。”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探讨革命的成败问题时，完全忽视了这两者在进程中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政策与客观条件的互相作用。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革命不是必胜，就是必败。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确实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就可能断送革命。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去纠正错误路线，我们就会取得胜利。但是，有人断言我们无论对富农，还是对英俄委员会，或是对中国革命做什么都无损于革命，革命“反正”必定胜利，作出这种推断的只能是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主义者。而正是他们会毁掉革命。

我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首先是两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不同。在法国起领导作用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而在我国则是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在我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得到发展，尽管目前还存在着各种巨大的阻力和危险。这是第一个不同点。

第二个不同点是：当时法国的周围是一些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比法国更为落后的封建国家。而我国的周围却是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技术和生产方面都比我们先进，而且有更加强大和更有文化的无产阶级。这些国家在比较近的将来可能会爆发革命。这就是说，尽管帝国主义极端仇视我们，但是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我国革命的国际处境远比18世纪末法国的处境有利得多。

最后是第三个不同点。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生活在国际国内大动荡的时代，这造成了革命曲线的急剧上升，我们的政策就

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是，不能认为这条“曲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帮助我们前进。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谁要是认为我们甚至在资本主义有可能击败无产阶级几十年的情况下还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他他就是无知。这不是乐观主义，而是愚蠢的民族改良主义。我们只有作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才能取得胜利。即使世界革命推迟多年，我们也必须坚持到它的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政策的取向具有决定性意义。采取正确的革命方针，我们就能自我巩固许多年，就能巩固共产国际，就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能获得世界革命对我们的巨大历史性帮助。

堕落的政策和指望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方针将会使我们延缓世界革命，削弱我们自身，我们无疑会遭到灭亡。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革命灭亡了吗？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这样认为。否则就没有斗争意义了。但是我认为，目前也就是近三年以来，由于客观原因和不切实际的政策，我们的革命确实出现了严重的低落。那些客观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923年，资产阶级是否击败了德国的工人呢？击败了。本次会上也谈到了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所遭到的失败。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被中国资产阶级伙同帝国主义击败的吗？是的。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有的。这些事实是否延缓了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呢？延缓了。我国经济中的危机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剪刀差，这种危机是造成农民和工人群众的不满和革命情绪低落的原因吗？是的。你们说我们“张皇失措”。真是胡说八道！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会使我们遭到灭亡。关于这一点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说过：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是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冒充“乐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将使我们遭到灭亡。我认为党的制度是最大的危险，这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可事实的确如此。如果党的制度中目的与手段、任务与方法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

的地方，即内在的差距，那么这些现象就会使我们四分五裂，使我们陷入困境。如何检验党的路线呢？我们在中国对它的检验是最清楚最准确的。我已经给你们读了今天发来的一份电讯稿，而你们向党隐瞒了这份电讯稿，因为它说明你们的路线不正确。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同志，您刚才读的那份电讯稿，报上已经登出来了。

托洛茨基：当然，部分内容是登出来了。但是罪过就在于主要事实竟向党隐瞒了几个星期。电讯稿中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一个更为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证明，我们目前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正像瞎子一样摸着黑行走。我们用对普塞尔的希望“武装”国际无产阶级，用对蒋介石的希望“武装”中国的工人。难道这是革命的政策吗？我已经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说过，在这种路线下，关于总罢工和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武装起义的所有谈话都毫无价值。谁寄希望于普塞尔，谁就会指望普塞尔，那他就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走上这条路。英国工人怎样才能重新起来举行总罢工呢？为此他们不仅必须反对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国家，而且还必须反对工联和工党的所有机构，反对工人官僚把持的舆论工具。英国工人应该痛恨这群卑鄙的卖身投靠的官僚，去发动总罢工。而你们做了些什么呢？你们一方面说，我们要帮助世界革命，而另一方面又同普塞尔称兄道弟，说普塞尔在战争爆发时将成为我们的朋友，因而帮助他们欺骗和麻痹工人。用这样的政策能不能发动工人举行总罢工和起义呢？难道你们把列宁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对我们的教导都忘记了吗？

我认为，党的方针是主要危险。它压制了革命的反抗，加强了右派的方针。右派的方针是什么呢？我认为，你们依靠的是富裕农民，而不是雇农和贫农。我认为，你们坚持的是于官僚和官员有利，而于群众不利的方针。你们过于信赖各种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你们彼此得到有力的内部支持，互相包庇，这就是压缩编制一

事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由于脱离群众，出现了互相隐瞒的情况，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在我们党内，现在依靠的是书记，而不是普通党员。党的整个制度是这样的：上层依靠的是机关，而不是普通党员和群众工作者。你们依靠的是普塞尔，而不是被普塞尔激怒了的工人，你们不依靠革命的矿工，而是依靠出卖矿工的普塞尔。在中国，你们采取的方针是指靠蒋介石和汪精卫，而不是上海的无产者，不是扛大炮的苦力和起义的农民。我们这里现在依靠的是马尔丁诺夫、拉费斯、彼得罗夫斯基、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什麦拉尔、佩佩尔和库西宁。这些人政治上都是完全或不完整的腐化堕落分子，他们在困难时刻不会帮助我们。

现在你们已提出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当然，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普通党员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你们必须作出进一步的结论。生活本身将迫使你们作出这些结论。你们最好是尽早停止和改变这个方针。你们驱除我们就是加快党的右倾，加快共产国际的右倾。你们驱除我们是为了“支持”也会出卖你们的普塞尔。如果你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不想弄清这一点，那么你们不仅不会缓和党的危机，而且相反，还会给纠正党的路线造成极大的困难。

奥尔忠尼启则：我收到了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有关托洛茨基同志的一个提法的声明，托洛茨基说他即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利用群众的黑帮情绪做文章。遗憾的是我没有听到托洛茨基同志这么说，否则我就会让他放规矩点儿。“我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读声明）我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说法是可耻的诽谤。”

下面请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09442

托洛茨基就发言稿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1927年6月4日)

抄送：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昨天，6月3日，我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最近一次会议的速记报告。该报告第4页上说，我的发言稿没有刊印，因为未经我的修改。可是，没有收入速记记录的这个发言稿是我的秘书处于节前，6月1日星期三16时，也就是已经下班以后签收的。

从我给我送来发言稿到已印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速记报告给我送来，这之间不是工作时间，当时显然不可能把修改后的发言稿重新打印出来，看来当时速记报告已经付排。

因此，速记报告中说我的发言稿没有印出来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对发言的速记记录进行修改，这是不对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4日

№09443

托洛茨基就发言稿的引用问题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1927年6月9日）

抄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尊敬的同志们：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期间，执委会委员们收到了如下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编辑委员会

1927年5月21日第二号记录摘抄

第二条

关于速记记录

2. 速记记录不得随意公布。未经编辑部委员会特别许可，任何报告人都无权使用其本人的发言稿。

受编辑委员会委托——库雷拉。

虽然决定中只谈到对“本人”发言稿的使用，但是这一规定显然也适用于对他人发言稿的使用。因此，我认为必须提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注意下面这一情况。

在6月4日的《列宁格勒真理报》（第125号）上，刊登了一则关于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的报道。该报告多次引用我的发言和我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文

件。这样做究竟是得到了主席团的许可，还是通过了它的有关机关，抑或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擅自行动？

这个问题不仅有形式上的根据（在前面谈到的编辑委员会的决定中已有说明），而且也有实质上的根据。那些随意从原件中摘取并随意编排的引文常常被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解释得走了样，与这些引文的真正意思刚好相反。当然，不管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是它的各个机关都不可能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对引文的摘引和解释承担责任。要是我的发言刊印出来，那么每个读者都可以把引文同原文加以对照，并得出应有的结论。但根据前面提到的5月21日的决定，是禁止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使用本人的发言稿的。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使用我的发言稿是否得到了许可？是在什么情况下得到的？以速记记录即将出版为借口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是在记录正式公布之前引用的，况且当时并不知记录于何时公布。

因此，我请求你们允许我以单行本的形式公布我的发言稿和我提交的文件。如果主席团认为有必要的話，可在单行本上附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相应决定。这将使读者有可能把强加给我的观点同我实际上讲的加以对照。我认为，即使受到批评的观点也应该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党。

当然，我认为，向每一位关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同志说明，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从尚未公布的原件中随意摘引的引文时断章取义，这是我不可剥夺的权利。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9日

No 09444

托洛茨基：一个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决议^①

（1927年6月）

1. 10月16日声明决定了我们对党的态度和我们在党内的工作路线。谁不同意10月16日声明，谁就是对整个情况一无所知，也就无权说同我们的见解有任何一致之处。

2. 关于成立类似“八月联盟”的组织的提法是在拙劣效仿斯大林式的诽谤。

3. 我们在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上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已经阐明了我们对党内迫切问题的态度，今后我们还将向全党阐明这一态度，从而捍卫和发展我们的观点。

4. 我们深信，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些同志在明显错误的道路上的固执表现会给民主集中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并损害无产阶级事业。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

^① 这是我起草的。——托洛茨基注

№09445

托洛茨基的声明

(1927年6月)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发言之后紧接着重申(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托洛茨基枪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实际上枪杀共产党员的是白卫分子,即被他们俘获的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同样,在红军中也杀了许多白卫分子、叛徒和最危险的逃兵。如果这些叛徒和危险的逃兵中有个别共产党员,那么革命法庭也会将他们枪决。如果托洛茨基枪杀了真正的共产党员,那么党为什么不处决他呢?我知道一起革命法庭处决两名共产党员的事件,这是得到我的完全同意的,枪毙的是一名团长和一名团政委,他们在喀山附近,违反指挥部命令,撤离了前线,劫持了一条船,企图沿伏尔加河溯流而上。如果今天再发生类似喀山附近的事件,我还会完全赞同革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判决。伏罗希洛夫声称,我未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因为“害怕”军事反对派,这是当时斯大林暗地里组织起来不仅仅反对我、而且反对列宁的组织。如今不是任何捏造出来的谎言都可以用文件驳倒的。但可庆幸的是有关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谎言可以用文件驳倒。鉴于乌法形势严峻,中央委员会于1919年3月18日作出了关于派托洛茨基前往前线的决定,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克列斯廷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斯大林、施米特、斯米尔加、捷尔任斯基、拉舍维奇、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和斯塔索娃。决定说:“托洛茨基同志应当立即奔赴前线。”至于其他军人,为了不侵犯反对派的权利,

决定如下：“凡是认为前线正需要他们的人可以立即奔赴前线。”军事反对派首领弗·米·斯米尔诺夫得到特别许可而留在了莫斯科。这就是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建立正规军，克服游击作风谈何容易。矛盾相当多。有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也有不少正义的抗议和批评。自由讨论不论是在民间组织中，还是在政治部都进行得相当充分，同时又能严格遵守铁的纪律。但是还有一些损人利己、造谣中伤、惹是生非的家伙，也有一些恶棍散布谣言，说我或根据我的命令枪杀了许多共产党员。1919年7月，建立红军最为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倡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一张公文纸的下端用红笔写了这样的话：“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严厉性质，我完全相信，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是正确的、合理的，是事业的利益所必须的，因此我完全支持此命令。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像这种写有我同意您的决定的公文纸需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您可以在上面写上任何决定。”我倒要看看，如今揭发我的那些人中谁能拿得出这种寄托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限信任的公文纸给大家看看。列宁深信我的行为完全是为了革命和党的利益，所以才在这样的公文纸上签了名，对那些行为粗鲁、违法乱纪的人他是从来不会给予这种信任的。

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如同伏罗希洛夫一样，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向斯大林提起枪杀共产党员的卑鄙谎言时，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坚决制止了他。甚感遗憾的是，李可夫同志没有对伏罗希洛夫同志这样做，这就迫使我采取最激烈的方式进行抗议。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

No09448

托洛茨基的札记

(1927年6月25日)

列宁关于落后与被压迫人民争取本民族解放的斗争的革命意义的学说，并没有为全体被压迫民族提供普遍地或者自动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民族斗争的途径和方法取决于被压迫民族的阶级结构，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和影响。通常，资产阶级革命者，确切些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作用越大，无产阶级的人数就越少，独立性也就越小。反之，一个迅速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事先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起反革命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严格区分这两个处于两极的阶级类型，在它们之间的都是过渡类型，即宗法制殖民地（没有自身的工业，没有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最典型的的就是中国，它在自己的国土上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将占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帝国主义，特别是在世界大战期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利用自己的关税政策、金融—国库政策等极力阻止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正在运行的发展很快便采用了最新最高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立刻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形式。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看待俄国的经验并首先想一想，落后的俄国的阶级斗争进程为什么能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前将政权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中，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了。从发展类型来看，俄国是一个

半殖民地国家——介于英国与印度或中国之间，在很多重要方面更接近于中国，而不是英国。不承认沙皇的债务（这一点现在在我们的政策中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是我们反对依赖外国金融资本的结果。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俄国与中国的发展等同起来。但是把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加以正确的比较可以弄清楚很多问题。如果能正确地理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反对依靠外国金融资本的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的政治上的相互关系，那么对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就会看得更清楚。如果我们说，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不亚于旧俄国反对沙皇的斗争（……）^①比俄国无产阶级发展更快的时期。对旧传统的破坏更加彻底。由此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所畏惧和自我牺牲精神，从所有的资料来看，中国无产阶级并不亚于俄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中国大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无产阶级每一次发动大的进攻时，中国资产阶级都能体会到身后外国将军或海军将军的支持，他们提供金钱和武器以消灭工人群众并维护社会制度。列宁教导说，在中国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情况下，要善于发现民族革命，而不要用笼统的和平主义的或假共产主义的空话反对战争。但列宁还教导说，在民族革命中不要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因为它试图利用民族解放的思想加倍奴役工人群众，列宁又教导说，无产阶级先锋队或这个先锋队中的先锋队从一开始就应该揭露资产阶级散布的有关民族革命的卑鄙堕落的谎言。需要说明的是，革命政党不是资产阶级背叛行径的记录器，而是为数不多的革命教育者，它应提醒大家防备资产阶级的背叛行径，使群众对此有所准备，建立无产阶级可靠的革命根据地，首先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

^① 此处原件有遗漏。

斯大林加给民族压迫的那些特点，被马尔丁诺夫移到了沙皇制度上。整个推论过程一字不差地保存下来。列宁关于被压迫人民民族革命的理论被篡改为掩盖被压迫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疯狂反革命的真面目的理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25日

No 09449

给联共（布）中央全体 中央委员的信

（1927年6月27日）

尊敬的同志们：

党已经受了三年多的危机。1923年的争论涉及的分歧丝毫没有消除，相反，分歧愈来愈大，愈来愈深。1925年，在这之前甚至在政治局中一直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集团也彻底瓦解了。从这个集团中分离出一个列宁格勒反对派，而该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掀起了一场反对这个派别的残酷斗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反对1923年的反对派斗争。1923年的反对派和1925年的反对派在1926年实行了联合。同时，新的领导集团中再次出现分歧，酝酿着新的“分裂”。党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实质是：官僚排挤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官僚内部那些暴发户又排挤老革命家。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地表明，党正处于自革命以来它还从未经受过的如此深刻的危机之中。现在必须马上解决这一危机。

国际形势的急剧尖锐化同中国最近的一连串失败有直接联系，这些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错误领导造成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反对苏联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战争不可能是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普通战争，这场战争只能是资产阶级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将具有战争性质，所以这场斗争必将造成交战各方后方阶级斗争的极度尖锐，因而，在建立国际战线的同时，还要建立国内战线。

在这场冲突中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将起决定性作用。毋庸赘言，党内现在已成为反对派的那部分人在这种斗争中，如同在国内战争的历史性搏斗中一样，是不会龟缩在后面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只有在团结一致、积极行动并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但必须开诚布公地指出，目前尚不具备取得胜利的这种团结和积极性。党内危机必须加以解决。

中央委员会试图通过对反对派的机械镇压来解决这场危机。于是“一场批判”接着“一场批判”，“反击反对派进攻”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持反对派观点的同志被排挤出政治局，目前正策划将他们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切都发生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月之内，本次代表大会按常规应确定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对赞同反对派观点的普通党员的迫害更为残酷，甚至将他们开除出党，不管他们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第一线工人。在按最合法的党内程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84人声明上签名的人开始遭到迫害。反对派成员被带上党的法庭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了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观点的看法。可见党员失去了党员最起码的权利。党内正在公开制造将反对派开除出党的舆论。

不仅如此，中央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公然采取了一切党内影响措施，例如制造了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事件”，说他“煽动党外人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同志不久前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威胁反对派说：“你们到职业介绍所再去笑吧。”莫斯科委员会书记科托夫同志在莫斯科恐吓反对派党，“我们将解除你们的工作。”还有人想用饥饿迫使反对派保持沉默。中央公然借助于国家机关来反对党员。

只有变成瞎子才看不到用这种方法同反对派进行斗争就是同党进行斗争。中央没有给基层党员群众弄清分歧的机会。有关反对派

的观点党只是从中央的拥护者的歪曲转述中得知的。持反对派观点的同志的文章和发言不准发表，有时甚至连速记记录都不给作（例如，在中央四月全会上讨论中国问题时就是如此）。甚至违反以往的一贯做法，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告也不准在党的刊物上发表，而不久前为党员出版的一本有关这些争论的书中，就没有收入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理由是他来不及对速记记录进行修改。不让反对派成员发表意见，就是不让党员群众了解正在争论的内容，就是企图迫使他们相信官方报告人的话。

在党的会议上，党员由于怕遭到迫害而投票赞成中央（除非能避开表决）。形成了有名的“一致同意”的局面，但这是表面上的团结，与党的团结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表面上的团结压制了党的积极性。中央走的这条路不是团结的道路，而是摧毁党的道路。这条道路同时也是对列宁领导党的方法的极大歪曲。

为了迅速而切实根除这种状况，应该做些什么呢？全体党员必须十分冷静地、老老实实在地着手研究以下问题：第一，分歧的实质，第二，党内斗争的过程。对这两个问题都要进行研究，而且一定要有准确的公开发表的、经得起双方检验的文件。谁相信空话，谁就是不可救药的遭人唾弃的蠢货。如果没有文件，就必须向双方或多方见证人进行询问，一定要“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要“当着见证人的面询问”。

列宁 1921 年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现在也只能这样提出问题。党员群众，首先是工人党员群众是惟一有权解决党内由来已久的危机的评判人，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能解决。背着党员群众处置党内反对派（其中有成千上万名经受了三次革命炮火的洗礼、在国内战争前线进行过英勇战斗、在最困难时期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志），不是摆脱困境的办法。只有在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才能使党恢复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首先表现为全体党员群众具有

极大积极性，准备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牺牲一切。

党员群众有权利，争论双方的每一方也有义务向他们准确而详尽地阐明自己对分歧的所有问题的观点。我们也要在所附的文件中履行我们的这一义务。中央委员会也应在全党面前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央应该让党员群众了解包括我们的文件在内的所有文件，党员群众可以根据这些文件弄清当前的复杂形势，中央应当把这些文件打印出来，并作为党的十五大（离大会开幕总共还剩大约4个月的时间）材料分发给所有的党组织。最近一次中央全会应专门讨论代表大会日程和提交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相信，我们将有可能在全会上坚持我们所阐述的观点。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间隔两年后，也就是在党处于最尖锐的危机时刻即将召开。因此，在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时必须排除对党使用恐怖手段的任何可能性和施加压力任何企图。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必须在全党对面临的所有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完全符合党章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只有这样，这些决议才可能是正确的和有权威的。

1927年6月27日

这是我起草的。

列·托洛茨基

№09451

托洛茨基和叶夫多基莫夫的声明^①

（1927年6月28日）

最近时期，斯大林集团对反对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以前对反对派斗争的主要方法是：把反对派分子同党的无产阶级部分和全体工人分开，党对反对派的纲领作错误的通报，歪曲他们对最重要的原则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观点，向党的和非党的工人群众隐瞒或错误地阐述（对无产阶级革命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明反对派的路线和指示正确的所有事实、现象和过程，以完全扼杀党内民主和积极性的规模和形式进行镇压，彻底践踏列宁同志在党内产生分歧的情况下教导党的一切，那么现在甚至这一切都不够了。]像完成斯大林的直接任务的雅罗斯拉夫斯基、扎列茨基、罗济特等人，除了向官方机构，还向党的和非党的舆论灌输 [就其卑鄙和恶毒的程度来说是骇人听闻的论调]，说一旦战争爆发反对派有可能不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

例如，1927年6月22日第143号《真理报》的社论公然写道：“反对派在政治上利用这些困难，从而使人们对他们在危险时

① 在单独的5页大开本纸上 是手写的修改方案，题为“我的修改方案”并标明：Г. 叶 [夫多基莫夫]。叶夫多基莫夫对文献的正文作了28处修改，部分修改写在托洛茨基的打字稿的行间。这次把叶夫多基莫夫的修改方案放在托洛茨基文献的正文里，但加上了方括号和排成仿宋体。此外，在叶夫多基莫夫的修改方案的扉页上有托洛茨基手写批注和季诺维也夫给托洛茨基的信，现作为单独文献发表（见本卷文件№09452和№09453）。

刻能否忠于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疑问。”在6月2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同志谴责了这些话。主席团委员中没有一个人公开为《真理报》的文章辩护，虽然我们这些下列签名者公开称此文是对左翼的卑劣诽谤，充满了热月式的仇恨。[完全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说法相同。]

这种鼓动越深入，即深入到基层支部、非党人士中间，它就越来越具有粗暴的和无耻的性质。它日益露骨地责备反对派帮助张伯伦，而且越来越卑鄙无耻地公然暗示反对派直接为张伯伦效劳。[这种鼓动越深入，即越深入到基层支部、非党人士中间，这种腐蚀工作的“执行者们”越觉得可以不负责任和无所约束，他们的鼓动也越来越具有粗暴的和公然的性质。它日益露骨地责备反对派帮助张伯伦，而且听众得到的消息越少，政治上越不成熟，受斯大林体制的压制越厉害，反击的可能性越小，也就越卑鄙越肆无忌惮地公然暗示反对派直接为张伯伦效劳等。]

[本段开头作如下修改：“在党内制度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这样卑鄙的诽谤和诋毁当然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现在每个正直的党员都清楚它们是极其荒谬的。鉴于下述事实……这种诽谤的荒谬更是一目了然（别的就不用说了）。]鉴于下述事实：最重要的外交职务现在都由反对派担任，其中很多人已公开表示赞同83人的声明，这种诽谤和诋毁不仅令人厌恶，而且极其荒谬。克利斯廷斯基同志在柏林，拉科夫斯基、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巴黎，加米涅夫、阿维洛夫—格列博夫在罗马，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卡纳特奇科夫在布拉格，乌菲姆采夫、谢马什科在维也纳，奥谢姆在君士坦丁堡，姆季瓦尼在波斯，克拉耶夫斯基在南美洲，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反对派作为苏联的外交代表或经济代表维护着工人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仅丧失革命荣誉，而且丢掉残存的健全理性的人，才会说反对派同张伯伦

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政治上问题是这样的。英国政府现在是苏维埃国家的主要敌人。斯大林集团现在实际上是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斯大林集团偏离阶级道路 [将“偏离阶级道路”改为“背离阶级道路”]，寻求普塞尔的帮助和支持反对张伯伦，竭力讨好普塞尔，接受他的最后通牒，美化他的作用，掩饰他的背叛。由于反对派抵制这种政策，所以斯大林集团为了保持自己同普塞尔的友谊而对反对派进行残酷的斗争。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清楚，博尔杜因—张伯伦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代言人是普塞尔、希克斯之流的“左派”。保持同他们的联盟意味着加强张伯伦和削弱苏联。斯大林的政策现在正造成这些后果。但是，由于斯大林集团现在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所以该集团把对它的政策的任何批评都说成是破坏工人国家。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马列茨基之流发动整个运动和进行迫害、诽谤时，都把社会主义祖国 [和党] 同斯大林集团等同起来。这里已经不仅仅是热月的思想，而且是纯波拿巴主义的思想。[关于“波拿巴主义”必须修改。] 很多多数派代表担惊受怕地注视着这种令人厌恶的背离。但是，他们被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吓破了胆，因此只是关起门来进行柏拉图式的谴责，而为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之流提供活动场所 [把“为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之流提供活动场所”改为“让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之流炮制遭到这种制度压制的党的舆论，在他们的背后是……”]，在他们的背后是清楚该干什么和走向何处的斯大林。

斯大林在中国抓住不放而且抓到最后的是蒋介石，而后是冯玉祥，是汪精卫，而在英国是普塞尔。一方面寻找同妥协的和叛卖的上层，甚至同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的友谊，另一方面却对俄国的和国际的反对派（乌尔邦斯集团等）进行越来越残酷和越来越疯狂的迫害。[这样提乌尔邦斯集团是不够的。必须指出他们在保卫苏联

问题上的立场和活动。必须指出，其他所有的说法都是诽谤。（见《真理报》评路特·费舍在议会的发言。）必须指出，这里把斯大林关于马斯洛夫是挑拨者的诽谤性的批评同苏联的批评混为一谈。]

[关于这个集团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立场。]

在对内政策上，斯大林集团越来越向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上层看齐，公开让康德拉季耶夫、萨德林、尤罗夫斯基一类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式和半乌斯特里亚洛夫式专家靠近领导工作。斯大林不仅不拒绝乌斯特里亚洛夫这个要求对反对派进行残酷斗争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他的过分颂扬，而且公开地接受对他友好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这种颂扬。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党内也不得不完成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计划：流放反对派，用一切手段清除、镇压他们，不让自己的政策受“反对派的腐蚀性毒害”（乌斯特里亚洛夫语）。

斯大林的路线是从下层转向上层 [说“从下层转向上层”是错误的，这里是从阶级转向阶级，而不是从下层转向上层的运动路线，（列·达·后来也说过）。这个地方必须修改]，从工人、雇农和贫农——转向富农、官僚、资产阶级专家，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转向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汪精卫，从英国的矿工和码头工人——转向普塞尔、希克斯和西特林。这是一条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向小资产阶级妥协上层的路线，而这个上层则是通向大资产阶级的桥梁。斯大林的政策越露骨，它的后果暴露得越明显，反对派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对斯大林集团来说就越不能容忍。斯大林越是感到自己无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方法的基础之上，他就越得用组织扼杀的方法取代思想斗争。但是，由于斗争只限于党内，这些方法已经所剩无几。斯大林集团不得不把斗争转移到党外，以便有可能对反对派公开地采取国家暴力的措施，而不是党的措施。

斯大林集团现在正全力准备这种新的斗争阶段，而且准备工作一部分是通过官方机构，一部分是采取非官方的方式即通过官方机构中的个别斯大林派别成员进行的。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纪念会上批评马尔丁诺夫等人的几句话被说成是呼吁非党人士反党的号召书，并添油加醋地加以渲染。为此专门炮制了“欢送斯米尔加事件”。托洛茨基在车站上讲的惟一句话成了他的特殊罪行。这句话是：“困难的时期正在来临，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加倍地认识到自己是革命的列宁的党的忠实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使斯大林集团有可能尽快地把反对反对派的斗争转移到党外，并且不受党的方法的限制。

在最近整个时期，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实际上已经转到非党人士之中。与此相适应，改变了和正在改变斗争的口号。“反对派想掠夺农民”[这是旧的，而不是新的口号]，“反对派想挑起战争”，“反对派同张伯伦站在一条战线上”——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它同以反对派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的新口号。根据斯大林的总计划，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跑得更远。[应当说：“在支部里，有些被一年半的严厉批评、卑鄙的陷害和最近的事件弄得晕头转向的人，或者是一些有意挑唆的人常常提出……”等。]在支部里经常有人提出一些纯粹黑帮的和决非偶然的问题：反对派靠谁的钱开展自己的工作？——虽然反对派的整个工作就是捍卫自己的观点，除了坚定的信念和政治勇气，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钱”。

斯大林的政策阶级变动有自己的逻辑，必然促使他的集团越来越卑鄙。把反对派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集团来说只是一个阶段，一个小小的阶段。在目前政治方针下，特别是在目前的党内制度下，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可能一方面执行依靠普塞尔、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方针，另一方面又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

基留在中央。这两种趋势是不可调和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必须让位于马尔丁诺夫，因为马尔丁诺夫已经成为中国问题上的斯大林路线的主要理论家，并且得到了唐恩的赞许。

在斯大林的政策显示自己的结果之前，在这个政策表面上看来取得胜利之时，斯大林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打的是消耗战。但是当他的中国政策遭到骇人听闻的、现在已经是双倍的破产以后，当在英俄委员会的整个路线遭到致命的和彻底的崩溃以后，斯大林觉得必须打歼灭战。他已经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现在巨大的历史事件正以反对派所说的方式落在他的头上。

斯大林在中国的方针导致并将继续导致工农革命被资产阶级妥协上层不受惩罚地粉碎，而斯大林却想不惜任何代价仍然保持与它们的联盟。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加强了英帝国主义，有助于它反对苏联的行动。

斯大林在英国问题上的立场巩固了总理事会的立场，有助于提高普塞尔和其他叛徒的威信，加强了帝国主义的这群走狗，使他们在决定性关头支持顽固的刽子手反对英国工人（两次大罢工和反工联主义者法）、反对中国革命和反对苏联。总理事会现在已经转入对我们的攻击，并且把英俄委员会的分裂变成了有助于张伯伦实行其孤立苏联的政策的行为。

在国内，斯大林旨在夺取上层〔“夺取上层”的说法不恰当。必须换一种说法。〕的政策实际上遭到了更大的破产区别仅仅在于，这方面的后果今天还不那么明显，原因是还没有受到外部的检验。〔应当说：“由于没有受到外部的检验和由于党员群众对一系列事实、现象、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和政治进程根本不了解”〕战争的危險使这种检验日益临近。83人的文件说的正是这一点，现在赞同这个文件的已经有几百名〔提出准确的数字〕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同志。对城乡小资产阶级上层的让步没有使他们接近无产阶级，相

反，却提高了他们的要价。所有这些阶层都向往资产阶级制度的道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斯大林越让步，越向乌斯特里亚洛夫谄媚，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就越是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更迅速更彻底地粉碎作为党内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堡垒的反对派。越是向上层、富农、“殷实的中农”、官僚主义者、乌斯特里亚洛夫式的专家让步，城乡劳动群众中的惊慌、担忧、困惑和不满就越厉害。斯大林制度不让这种不满具有固定的党的表现形式，以便改变政策。[把：“以便改变政策”改为：“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根本改变政策”。] 反对派是群众的深深忧虑和内心不满的惟一表达者。就目前形势的实质来看，反对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不成为区区少数。[把“就目前形势的实质来看，反对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不成为区区少数”改为：“就目前形势的实质来看，党完全丧失了在目前状况下正确确定方向的可能性，党员群众丧失了有组织地表达自己对党内生活、苏联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最重要的问题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系列最重要的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有真正成效的、有布尔什维克觉悟的态度的可能性。由于这些原因，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党的决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以党的名义”的权利丝毫不符合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即在正常的党的制度的情况下可以而且应当形成的力量对比，以及最终不顾斯大林及其所有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助手们的各种诡计和努力而形成的力量对比，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的这一信念是基于深信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基于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基于党的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基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基于党的列宁主义的锻炼，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动力的科学的列宁主义的分析。]

斯大林的政策是在各阶级之间随机应变的官僚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本身是不稳定的。很多重大事件正在否定这种政策。它完全被中国革命的事件所推翻。在中国，理论上取得胜利的是马尔丁诺

夫和唐恩，而政治上取得胜利的是蒋介石和冯玉祥。这是公开地把“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的轨道。[“这是公开地把‘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的轨道”的说法，我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而以前政权处在什么轨道上呢？处在无产阶级—农民的轨道上吗？应当说：“这是公开地把‘国家’政权从假民主的资产阶级轨道转到反动的资产阶级轨道（或反动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轨道）”]

在我国，情况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坚信，将来也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斯大林的政策在逻辑上正在导致这种结果。他同反对派的斗争正在解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使他们对敌人和明天的叛徒错误地抱有希望，不相信真正的革命的朋友，通过对臆造的左的危险进行蛊惑人心的陷害的方法使无产阶级对日益迫近的来自右边的真正的阶级威胁丧失警惕性。[如果接受我以上的修改方案，那么当然需要在文字上进行一些修改并转到本段的第二部分。此外，我认为，必须把结尾放在本段并指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内曾试图把对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的指责说成是对党的指责。必须指出，当我们说无产阶级先锋队时，我们首先指的是我们党，首先指的是党的无产阶级部分，而当我们说热月的方法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情绪时，我们从未在这里指整个党，我们总是确切地指出说的是谁。]

由斯大林集团合法和不合法地挑起的党内斗争正接近最高潮。开除出中央是斯大林给其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设下了例行陷阱[尽可能用别的说法代替“例行陷阱”的说法]，同时训练他们并使他们逐渐养成用非党的手段迫害反对派的习惯。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走在前面开路。斯大林集团的下一步是自动选定的。如果它今天把伪造的数字强加于我们，那么，它明天就一定把伪造的行动也强加于我们。[建议删掉。]斯大林集团一定会在最短的时

间内动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反对反对派，就像1917年7月阶级敌人反对布尔什维克那样：“铅封车厢”、“与反动派勾结”、“外国的黄金”。[建议删掉。]斯大林的方针正在导致这种结果。导致这种结果并导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只有伪君子或政治上的瞎子不承认这一点。[而整个党呢？（我这是指“伪君子”和“政治上的瞎子”）。我认为，结尾应当大致写成这样：“但是，党不会无止境地容忍这样的制度。在列宁的党内扼杀活生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的手段越尖锐（和越卑鄙），这种对党和革命极有害的斯大林制度就会越迅速地被消灭。]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指出：尽管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偏移和官僚主义的歪曲，[建议删去“尽管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偏移和官僚主义的歪曲”]苏联对我们来说是社会主义的祖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派将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忠诚和热情为这个祖国而斗争，即决不能像大多数斯大林新官僚们那样麻木不仁。[建议这样说：“反对派将同全党一起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忠诚热情为这个祖国而斗争”，而结尾（关于斯大林的官僚们），建议删去。]

但是，我们同样明确地声明：斯大林的政策注定要导致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资产阶级国家，先是隐蔽的，后是公开的。[把“导致变”改为：“由于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毁灭。像在任何过程中一样，这种逐渐背离在一定阶段上……^①]

在这种转变的道路上有反对派这座布尔什维主义的壁垒。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在这座壁垒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具有经过伟大事件的烈火检验的绝对正确和坚不可摧的信念，我们将把反对斯大林的小资产阶级背离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预见到将对我

^① 叶夫多基莫夫作了两处修改的本页手稿丢失，档案库中也没有。

们进行连续不断的诽谤。我们将预先揭穿这些诽谤。已经知道了斯大林准备的热月的迫害的方法。我们公开提醒我们党和国际工人阶级防备这些方法。我们极端轻蔑和愤怒地谴责把苏维埃共和国同统治集团混为一谈的做法。党应在中央委员会之上，纵然中央委员会是由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武装起来的，否则，党就不成其为党，而中央委员会就不成其为中央委员会。我们极端愤怒和轻蔑地谴责把社会主义祖国同斯大林集团混为一谈的做法。我们将毫不妥协地同斯大林的路线作斗争，正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祖国免遭外部的危险和内部的蜕化。[这一点应当保留，但应当换个说法。]

打倒热月的谎言和诽谤！

把普塞尔分子、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和马尔丁诺夫分子赶出联共和共产国际！

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万岁！

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祖国——苏联万岁！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列·托洛茨基 [叶夫多基莫夫]

1927年6月28日

№09452

季诺维也夫就声明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便条

（1927年6月28日）

列·达·：

1. 叶夫多基莫夫的修改没来得及看。我的意见是：鉴于文件至关重要（和非常尖锐）——请再给一两天时间研究一下。应当用一页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并将它作为出发点。关于中国和武汉稍微多说一点。

2. 今天必须写好关于中国的文件——至多到明天。已经有了冯（玉祥）和蒋（介石）给汉口政府的最后通牒。当然，他们将投降。应当考虑到今天的社论。

3. 您关于粉碎施基里亚托夫的信，我（和其他看过的人）认为是成功的和必要的。而关于布托夫终究是“胜利”。罗伊津今天进行“反驳”。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6月28日

№09453

托洛茨基就社论给季诺维也夫的便条

(1927年6月28日)

应当嘲笑和盯住今天的社论。他们现在提出武装工人和不信任将军们的口号。(请对比连茨涅尔)。看来，武汉已经投降或者今天投降。几位“左派”国民党领袖不知将随共产党人退到什么地方去(也许，甚至退到莫斯科)，这将由国民党自己来宣布。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28日

№09454

托洛茨基就准备开除反对派一事

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7年6月28日）

尊敬的同志：

我从各方面获悉，党的负责人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甚至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根据各种理由，其中包括正式审问的结果，提出必须把托洛茨基及其最亲密的志同道合者开除出党。例如，有人再次通知我，说施基里亚托夫同志在正式谈话中作过这样的声明，并确定了必须开除的所谓托洛茨基分子，人数约有20人。施基里亚托夫同志似乎还补充说：“至于季诺维也夫，我们还要稍微等一等，审查一下再说”等等。

我没有理由怀疑传递给我的消息的准确性。

我们看到的是两面派手法，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上，当我根据可能的历史前景谈到开除出党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时，您表示很气愤。与此同时，您在主席团的最亲密的同事却按照完全正式的程序准备采取这种措施，并说这完全是预先决定的，甚至提出必须开除的人数。

我在主席团会议上说过，对反对派的迫害是根据早已制定好的路线进行的，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只不过是对这种派别路线加以伪装和掩饰。您曾经就此给我提意见，说对党的最高机关之一采取这样的态度是不能容许的。但是，请问，您如何把您这位主席的口气、决议的性质同施基里亚托夫同志（更不用说雅罗斯拉夫斯基

同志了)讲话的口气及性质统一起来呢?

假若我们有稍微健全的党的制度,党员的权利稍微有保证,就应该把施基里亚托夫同志送交法庭审判,因为他从事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正式路线相悖的破坏组织的派别活动。但是,当然谁也没有这样做,这种骇人听闻的两面派手法和欺骗行径是我们党的制度发生病变的无可争辩的证明。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28日

№09455

托洛茨基就发言记录问题
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

（1927年6月29日）

我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作的说明的速记记录刊印出来后，让人感觉我对速记记录作过什么实质性的修改。同时，秘书处却认为，速记记录准确地表达了我说过的话。事实上，速记记录中有很多重大遗漏和歪曲。当我纠正速记记录的这些错误时，正是恢复了我说过的原话。而你们却得出结论，说我修改了我说过的话。如果你们把未经订正的速记记录当作准确的文件，那就无须让作者修改速记记录了。我认为必须在此强调指出这一切，因为我在主席团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的速记记录有很多遗漏和对原话的歪曲。我说得很快，因此丝毫不怪速记员。但我要求，不要把我恢复过来的原话当作被修改的话。如果你们打算继续用括号增补出头一个错误文本中的东西，那么我请求刊印我这封信作为附录。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29日

【专题说明】

新经济政策下的城乡“结合”

(1924年4月至1928年8月)

1921年春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逼迫下，俄共（布）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起初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允许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经商做买卖。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完整的体系。在执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工农结合，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这里发表的主要是1924~1928年间农民写给《农民报》的信。这些信件表达了农民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发表了对农村今后发展道路的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农民对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不满或困惑。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屈洪翻译)

No 11127

杰米多夫^① 就农村生活改善给
《农民报》的信

(1924年4月2日)

读了你们的几张报纸，我深深地为愉快的心情和对工农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希望所打动。我亲眼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在怎样胜利地建设美好的生活，我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工人和农民紧密联合起来，我们就能永远战胜破坏。我们区的全体农民现在深信，我们将走上过友好生活的坚定道路。农民们说：“过去我们梦寐以求的，现在我们亲眼看到了。”行政秩序搞得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居民群众受到了教育。现在任何一个村庄里都能看到报纸和小册了。居民全都关心国家新生活的建设。合作社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并正在战胜私人贸易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与工业品的价格愈来愈接近。我们希望，所有商品都能很快按照价值得到调整，特别是由于新的硬通货的发行。所以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庆祝农业复兴的节日。遗憾的是，我们的父亲列宁同志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也会为我们未来的节日做些什么的。

农民 杰米多夫·伊万·尼基季奇

^① 杰米多夫是沃罗涅日省瓦卢伊基县卡津区波巴斯内依村的农民。

№11128

比留科夫^①：首长帮助农村

(1924年5月20日)

1923年秋天，日洛宾 NI-a 机务处工会基层委员会作出支援我们村的决定。过去，支援的方式表现如下：一个月或两个月作一次报告，带来一些陈旧的《汽笛报》。许多农民对这些报纸既看不懂，也不感兴趣。所以，农民对这种支援很不满意。不过，现在情况变了。首长开始常常来，了解村里的情况，解答农民提出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给我们订了6份《农民报》、2份《贫苦农民报》、2份《女农民》杂志等等。现在，如果农民遇到不懂的问题或者看到他不理解的现象，他来到村苏维埃或合作社，人们就会说“我将请首长来”。农民非常希望首长们常来村里，感谢他们给订的报纸，因为这些报纸对农村非常有用，他们说：“如果首长们到农村来得更勤一些，工农结合就变得正常了。”

农村阅览室管理员 比留科夫

① 这是戈梅利省罗加乔沃县日洛宾乡卢克村的农村阅览室管理员比留科夫给《农民报》的信。

No 11129

莫罗佐夫^① 就农民地位给 《农民报》的信

(1924年6月)

尊敬的公民、编辑，我想听到您的答复！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值得称赞的工作者和缔造者都联合起来反对农民，竭力从农民身上榨取最后一滴血？农民要献出一切——要养活军队，养活工业，存在着重叠的行政机关（选举产生的机关和党），共和国的一切组织都毫无例外地吊在农民的脖子上（碰上好年成，一个农民只能在两年里买一件布衬衫）。而你们，也就是《农民（也许不全是）报》都在干些什么？携起手来毒害农民。我想，最好写一些农艺师的建议，而不要在农民群众中制造混乱。你们设想一下你们在那里能做些什么，说一些公道话，而这里净说些下流话和进行挑衅。例如，加里宁同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农民的报告^②！而那种官方人士当中过去的瓶塞匠关于农民又知道些什么呢？只会嘲笑，如此而已。但是最终定下的1924~1925年度的农业税同样是个极奇怪的嘲弄。农民不会忘记这一点！沙皇制度剥夺、敲诈农民，使农民团结起来反对它，而你们是农民的保卫者，可你们又做了些什么呢？赋税增长了十多倍，而且是卡住脖子要。谁做得更坏些呢？

① 莫罗佐夫是特维尔省别热茨克县哈保茨克乡维索科沃村农民。

② 指加里宁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把协会，即农民协会^①还给农民，那我们将知道你们是站在我们一边！否则，你们就是犹太党的雇用工，而农民稍一提到协会，就会听到保卫者们的回答：“又闻到了1918年的味道。”但是请不要忘记，一切事情都会有个头，农民身上的枷锁也是一样。

热切地等待答复。

农民 莫罗佐夫·费多尔

^① 俄国的农民协会作为政治组织产生于1905年革命过程中，1917年处于人民社会党的强大影响之下，十月革命后因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被解散。“农民协会”的活动家们于1918年夏积极参加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

№11130

凯楚涅耶夫^① 就城乡结合给 《农民报》编辑部的信

(1924年11月10日)

城乡结合

11月9日，在戈罗基申斯基区戈罗霍维茨基乡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签订工农结合的协议，这不是口头上的结合，而是实实在在的结合，如劳动人民的亲爱的已故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嘱咐的。

我们农民，在我们自己的穷乡僻壤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这里新的思想是很少吹得进来的。场面异常隆重，真是感人泪下。从城里来了许多工人，党、团和工会的团体，他们举着旗，奏着乐，农民非常友好地亲切地欢迎他们，高喊“城乡结合万岁”！在一所学校里举行了隆重的大会，会上发言的同志讲了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嘱咐所实行的工农结合的伟大意义。会上还用不少时间回忆起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非常用心地听了发言者的讲话，在弄懂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之后，他们宣称，如果在外国有同志对本国资产阶级举行自己的“十月革命”，他们准备随时给予支援。

当天最隆重的时刻是通过党的区委对该区农民提供支援的决议并由首长向农民授旗。

^① 凯楚涅耶夫是弗拉基米尔省戈罗基申斯基区阿列芬诺村的农民。

报告人指出，戈罗基申斯基区的农民，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是最有觉悟的农民。支援的目的在于支持工农结合，在于在落后的农民中间普及文化知识和政治知识，最主要的则是巩固和最终确立对贫苦居民的物质支援。

区委在指出该村农民具有政治和文化觉悟的同时，认为自己有义务授予他们一面红旗。一位非党群众伊格纳奇耶夫同志在接受红旗时，对首长给予他们的荣誉表示感谢，同时表示希望，全体农民今后将踏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足迹继续前进，红旗对我们非常珍贵，因为它是用工人和农民的鲜血染成的。

工农的国际联盟万岁！俄国共产党万岁！苏联万岁！在全球建立苏维埃政权万岁！列宁同志的遗训万岁！

一个非党农民

No 07303

扎洛莫夫^① 致前政治苦役犯 协会的信（摘录）

（1924年12月18日）

……地少的农民特别仇恨国营农场。他们特别渴望干活，他们指责中央政府压缩顿巴斯的煤炭产量。他们认为，“改革”即十月革命，没给一点好处，他们想要能够让所有的人都有活干的另一种改革。他们不想要沙皇制度，不想要地主和资本家，但是他们认为，国家的舵掌握在没能耐的人手中，所有的祸根都出在这里……当然，革命前买了土地的那些农民希望土地归私人所有。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土地多一些，能保障在土地以外再挣点外快……如果我们按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等的决议去判断农民的情绪，那么我们就看不清农民的面目……所有的决议都是党员同志写的，反映的是他们的意见和愿望。大部分庄稼人搞不懂决议，只会“叽咕咕”，想叽咕多久就叽咕多久，想叽咕什么就叽咕什么。他们一般不敢“叽咕”反对意见，于是，决议往往在75%弃权的情况下“一致”通过。总之，对决议完全漠不关心。只有当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被触动时，农民才会活跃起来……在我们这

① 扎洛莫夫，彼得·安德烈耶维奇（1877~195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02年索尔莫沃游行的组织者；阿·马·高尔基《母亲》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1925年加入俄共（布）。1920~1924年为个体农民。合作社组织者（1927年）和集体农庄组织者（1929年）。

里^①，由于饲料匮乏，花 20 卢布就能买到一头牛，于是，一些农民，甚至有些“无产者”，想把牲口倒到境外，还为中央政府不准这样做而发火。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富农，而是贫农，是革命时期养成投机习惯的贫农……我经常 [给农民] 讲多区轮作制的好处，讲种植甜菜，等等，可是有些人把这些话当成“老太太编的故事”，就是理解的人也说，由于广大农民群众的极端个人主义，集体干活是不可能的……

农民还想得到土地，而交出一寸土地他们也不会同意，这就是我们反对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主张的王牌。

^① 库尔斯克州苏贾区。

№11131

叶西波夫：我们的首长是 怎样工作的^①

(1924年12月27日)

从1924年4月开始，康琴斯克乡就有了首长——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9个月的支援工作使我们乡有了很大的进步，关于这一点我现在简短地谈一谈。首长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俄共乡支部在首长帮助下为我们乡的教师办了好几期秋季政治训练班，首长还帮助学校弄到教科书，帮助合作社站稳了脚跟。首长还进行工作，同乡党支部达成协议，为进行的各种政治运动派遣报告员并提供图书。由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在支部里认真对待支援的伟大任务——工农联盟，我们农民（在接受支援前）原来只有两个农村阅览室，现在却有了22个文化红角，原来乡里只有一个共青团支部，现在，到12月份，已经有了约10个共青团组织。乡支部和首长已开始对妇女进行工作。选出了农妇代表。在首长的帮助下，乡在农村阅览室改善了自己的工作，向农村（村里的阅览室）供应报纸、杂志和书籍。教师们也在对青年进行大量的工作并积极参加农村阅览室的工作。我们农民今年在村苏维埃和互助委员会的选举中都提出了很多诚实的工作者，在乡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我们对那些能够领导全乡进行经营和管理的可靠的人们投了信任票。首长还帮助我们乡里的组织买了两台拖拉机，这样就能使我们在春天进行土壤

^① 这是莫斯科省卡希拉县康琴斯克乡的农民叶西波夫给《农民报》的信。

改良方面更好地工作。

乡党支部得到了巩固和扩大。首长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安排。在兄弟的城乡联盟中，我们将走向更好的生活。

No11132

巴任就农村状况给 《农民报》的信

(1925年6月13日)

我是一个农民，现在写信给《农民报》社，反映一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叫巴任·普罗科皮·伊凡诺维奇，过去在沙皇政府时代读过点书，但很少接触过政治书籍。我在沙皇政府时代亲眼见过地方自治局的长官、警察局长、警察局，看见过他们是怎样管理的。记得1905年，当时在我们村看到一些从高加索来的流放者，还有乌克兰人，他们都是一生诚实的人，有良心的人，这些人显然是为了维护真理，为了良心才被流放到我们维亚特卡省的。1905年，尼古拉二世颁布了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12月[10月]17日宣言。结果怎样呢？代之而来的却是每个村派来15个骑警，每个乡住着一个徒步的警察，还有许多流放者。由于尼古拉二世恩赐了10月17日宣言，召开了有农民代表参加的第一届国家杜马，它决定缩小劳动人民的利益，后来被解散了。又召开了第二届杜马^①其中有以沙皇大臣斯托雷平为首的地主和商人的代表，它所确立的私有制对劳动群众来说后果是悲惨的，这个事实，我巴任·普罗科皮是清楚的，对此不满，我没有对别人讲过这一点，独自走上了反对沙皇政府的道路。

^① 写信人不大了解国家杜马召开的顺序及其活动性质。第一届杜马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杜马。有很大数量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劳动派代表参加的杜马是第二届杜马，于1907年6月3日被解散。写信人所说的第二届杜马是第三届杜马。

后来发生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大战，在两年的战争过程中，人民还幻想指望沙皇，但是当战争结束时人民焦急不安起来，他们了解到在战争中到处是欺骗，到处是背叛。我在1916年被抓去参战，曾在罗马尼亚前线作战，当时听到召开立宪会议的消息，我投了第6号〔选票〕布尔什维克的票。当我复员回家以后，我在村里说，苏维埃政权对农民将是公道的。老年人和年轻人，多半是资产阶级的保卫者，他们对此毫不关心。

1920年，要我们所有的人都去登记，迫使我们干力所不能及的劳动，一个男人一冬天要锯12立方米的木材，一个女人要锯8立方米。结果我一个人就得锯20立方米，而那些入了党的掌握这种登记权的资产阶级子弟，也就有钱往自己腰包里装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些说“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好？”的人们面前，只能使自己羞得脸红。1922年到来时，还有1923~1924年，贫苦农民又不得不付出更多，而那些富有的良种畜牲们又付出多少呢？不过总会找到出路的。

现在在我们边疆区有诸如农业合作社以及农作物协会之类的组织，它们收购农民出产的一切东西，廉价收购农产品，高价出售工业品，而掌握这一切的又是资产阶级，他们嘲笑政权，又靠政权发财。而那些农村和农民都非常需要的小铁匠铺，却都得办了执照等等才能开业，还有水磨坊也要办执照，还要拿平均摊派的税和国家课的租金，而这一切又都落在了农民的肩上。穷人到哪一天才能见到天日呢？

请予解答。

还想打听一下，我们是否要向法国还债，因为这还会全部落在农民身上。

我可以签字保证我所写的都是实在的。

巴任·普罗科皮·伊万诺维奇^①

^① 巴任，普·伊·——维亚特卡省马尔梅日县老柯普科夫村的农民。

№11133

雅罗沃依关于粗暴对待农民的报道

(1925年6月27日)

通常在6月2~3日举行的阿特巴萨尔集市上，来赶集的人很多，农民从200俄里之外的偏远乡村赶来，在那些地方人们很少读书，也很少看到演戏和吹奏乐这样的东西。在集市第一天快结束时，所有农村青年，甚至有些上年纪的人，突然拥到公园去看体育运动和音乐。门票是15戈比，的确，不算便宜，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钱。对口袋没钱的也就免费放了进去。但是事与愿违，阿特巴萨尔市的共青团员们担负起了宪兵的任务，他们开始连叫带嚷，吹着口哨，把那些无票的农村青年统统赶出了门外，有的则把他们的制帽从头上摘下来扔到门外，他们则不得不拣起帽子走到大车下去睡觉，这是他们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遭遇。这就是城市的共青团员对待农村青年的态度。城里人对农民的这种态度必须彻底根除。

列昂尼得·雅罗沃依^①

^① 列·雅罗沃依是阿克莫林斯克省科克切塔夫县巴尔卡申乡博戈斯洛夫斯克村的农村通讯员。

№07305

Л.Н. 加里宁致维·米·莫洛托夫（摘录）

(1925年11月14日)

……“过渡”时刻已经变成了长期建设，这种长期性开始压得工人难受。任何运动都不反映实际情况，不错，统计数字用在汇报中很好，您看到的是某某省1923年播种了多少，1926年将播种多少，可是我作为一个工人只看到了一点：一昼夜只收入280戈比；房租每月10卢布，照明费3~5卢布，合作社的皮鞋25~20卢布（而且质量差），白面包每400克13~11戈比，一包香烟20戈比，肉35~40戈比，等等。降低零售价也叫运动，你会读到：每公斤肉便宜了1.5戈比，可我只需要100克左右的肉。当然，肉贱了是好事，只是对买100克肉的我来说算不上好事，只是对一次就买16公斤肉的人来说才算好事。您算一算，1.5戈比除以10，我能得到多少实惠？您会说：小事一桩！是的，您说得对，对您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可我的一生就是由一桩桩小事组成的！您会说：这是庸俗作风，小事一桩，更重要的是事业，这就是搞清谁更准确地理解恩格斯同志“关于一国社会革命的可能性”的论点，1905年列宁写同一题目的文章时是否指俄国，谁理解得准确些？是托洛茨基还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还是您和斯大林？是的，也许这事重要，可是对我们来说，自己的肚子也重要，当你们在那儿争论时，我家里的人可能会饿死。而且，我本人照旧会是个穷光蛋，因操劳过度而疾病缠身!!!也许，我们很可能对您说：喂，您滚开吧，要不就干点正事，别浪费口舌，大谈谁写了什么，这应当怎么理解。

您谈中世纪关于宗教问题几个回合的争论，这个我们不懂，我们想干活，想吃饱饭。莫洛托夫同志，我不是党员，在这封信中，我把我观察到的公开坦率地给您写出来。什么迫害我都不怕，你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因为1908年我蹲过大牢，也没有害怕！……

我告诉您我现在在哪里……干什么工作，我不隐瞒，公开地对您说，别看我们在会上作决议，可是我们工人处境不好。我们在会上是例行公事，如果有人拿出决议来，我们巴不得尽快举手表决，因为想吃饭，而且家里还有活急着要干，得帮助妻子忙家务，等等。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怕迫害（顺便说一句，我不是“捣乱分子”，在工厂是个守纪律的工人，请您核实）。

暂时写到这里，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Л.И. 加里宁

地址：符拉迪沃斯托克，船员俱乐部，钳工加里宁收

No 11134

斯季哈辽夫就农村状况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5年)

农村落后于城市！

农村愈来愈落后于城市。如果我们到城市去看一看，我们就会发现那里有很多俱乐部、红角、图书馆和阅览室，其中都有大量图书。而在农村我们却很少看到，即使看到，也只是设在某个逃离农村的富农的房子里。农村目前还很穷，无力建造这样的红色阅览室。城市里也有人来农村进行宣传，建议建立农村阅览室。说的很好，我们也很乐意，……有人已经开始这样做。在城里这一方面做得很好，城里有很多逃离的白卫分子、资产者所留下的房子，可以建设红角。而在农村，有一户农民在自己的房子里也辟出一个角落，不过那里挂的却是许多农村的圣像，这些东西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我们也看不懂，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书籍。由于没有阅览室，我们也没有书，非常可悲，我们同样是想读书和学习的。

因此，我们农村请求城市，把你们的书籍分给我们一些，这些书籍你们已经读了许多遍，一些政治书籍，在农村我们根本看不到，还有提高农业方面的书，人们常常谈论四轮耕作制，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你们如能这样做，这也是城乡结合嘛。为红色阅览室放书的地方还是有的，可以放在学校或村苏维埃里，我们可

^① 此信以所谓全村的名义发出，但没有写信者的地址。

以委托优秀的工作者来管这件事。

斯季哈辽夫寄自农村

No 11135

农妇马秀拉^①就无产阶级专政给 《农民报》的信

(1925年)

读了《农民报》，特别是最近几号，越来越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号召农民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同工人合作。雅柯夫列夫同志在第60号《农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开头是这样写的：从农民那里（有时）听到这样的意见，说什么共产党只是为工人办事，说共产党只是空谈联盟等等，而列宁早就说过：不懂得农业，而又要去教训当家人，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了。不应当对农民发号施令，而应当向农民学习并给他们以帮助。

也许在中央，共产党是这样想的（如果它还能想到农民的话）？而这里，在人民群众中，谁都不会这么想，因为自有农民以来，他们还没有对谁有过像对工人、特别是对共产党人那样的仇恨，这种仇恨的根源不在这里，它不是产生于地方，而是来自共产党的心脏，因为它提出的神圣口号——无产阶级专政，此乃仇恨的根源。在共产党那里，将军和地主已经不存在了，已无法对他们实行专政，只剩下农民，只能对农民实行专政，因为农民把农民的最后一头牛卖掉去交税是不情愿的，是在专政的压力下被迫干的，而你们同时却在寻找同盟和团结。第二个根源，老实说，就是党本身，因为任何党都是由一小撮人组成的，而其余的则是整个非党群众，换

^① 马秀拉是阿穆尔州扎维京斯克县阿尔哈林斯基乡米海洛夫卡村的农妇。

句话说，党在地方上变成了禁卫军，虽然它并不像伊凡雷帝的禁卫军那样把狗头栓在马鞍子上，但它总是脱离人民，农民向所有的人提供吃的、喝的、穿的，就是不包括自己，因为农民常常是忍饥挨饿，赤身裸体，而共产党人则拿现成的，他们不仅不帮忙，而且到处碍事，他们还一意孤行，毫无限度。有趣的是，雅柯夫列夫在文章结尾所说的话，他说，对《农民报》来说，今后没有什么工作会比切实推行工农联盟更光荣了。是的，今后对这一点将会写得很多，将在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作出许多决议，但是工农合作将永不会有，这是因为第一，工人劳动能获得报酬，而农民劳动则要自己为自己的劳动付酬，第二，因为，共产党好像竭力要使所有的农民变穷，只鼓励贫农，不是帮助他，而是鼓励他穷，如果一个农民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经营，那他就得从贫农队伍中除名，在他头上贴富农的标签，把他看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可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改善自己的经营，这就在党的眼中成为富农。换个说法，就是没有一个农民不想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关于农业税要做点改变，现在写得很多，他们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们害怕直截了当地说出：你们不要妨碍言论自由，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不要妨碍独立的进步报刊，那时你们就会看见，你们收了橡树果实，却在挖橡树的根，你们砍倒屁股下的树干，一百年没有橡树——农民，你们也不会感到惋惜，你们要的是橡树果实——税，你们会因为吃它们而变得肥胖起来……

№11136

戈戈伊关于工农关系的提问

(1926年6月13日)

第一次提问

读了23(总130)号《农民报》上发表的莫霍夫同志的信,我想起了今年3月召开的支部大会上,曾公开地向大会主席(党员)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到处都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不是写“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联合起来”,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有什么差别妨碍着他们共同提出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号召?我们知道,除了有劳动的双手,其他一无所有的工人和农民是无产阶级,而有一点很小的财产的农民已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私有者、农民,尽管他也是穷人,这样说对吗?可是又给我们写着“工农联盟万岁”,甚至邀请中农同我们站在一起,不光我们这里,甚至全世界都是这样。

党员们对农民的答复

1) 哨所所长说,口号不能变动,因为无产阶级在支持和扶植其他国家的苏维埃政权方面比农民更可靠,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
2) 村苏维埃主席党员兹维亚金同志说,农民需要无产阶级化,那时[也许可以]把农民加进上面提到的口号中。请您解释一下,因为上面提到的口号可能使农民怀疑自己是否处于平等地位,是否能够在自己国家,目前也就是在我们苏联,过上好的生活。

农民 戈戈依·谢尔盖

第二次提问

我们农民还有一点不理解，为什么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常说：“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我们没有错，那么这种提法给我们的感觉是，无产阶级（工人）指挥一切，农民只能服从和执行，不管农民愿意不愿意。

我们农民对下面的提法和做法感到骄傲，这就是“工农政权”，“国家”，“政府”，“红军”和“工农专政”，而不只是一个无产阶级。

上面所说的一切，如果我们农民不那么理解，请给我们作出解释。

农民 谢·戈戈伊^①

^① 谢·戈戈伊是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蒂拉斯波尔区捷尔诺夫卡村的农民。

No 07306

捷尔任斯基^① 就管理体制问题致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的信（摘录）

（1926年7月1日）

通过南方之行以及视察南方机器制造托拉斯、南部地区钢铁工业托拉斯等企业，我坚信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不行，因为它建立在全面不信任的基础之上，要求下属机构呈报用以计算全托拉斯平均数的各种各样的报表、资料和数字，剥夺我们的基层单位即工厂的独立性，造成了有害于现实工作的永无休止的公文往来和拖拉作风，浪费巨额资金和劳力。必须抛弃这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我们实际上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们不是用计划把大家联系在一个协调一致的方向和速度上，而是一片混乱，听其自然……工厂至今不知道自己的成本。我们的体制没有形成一种组织力量，在这方面原地踏步不前。

我看出路只有一条：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整个方针扭转 180 度，我们应当把这种方针转变为信任方针。必须用人不疑，否则无法管理工业，既要教你用人，也要向你用的人学习，帮助他们，还要认真挑选符合信任体制的苏联工业干部。

由此可见，必须多一些个人交往（管理总局、托拉斯和工厂三

^① 捷尔任斯基，费·埃·（1877～1926）——波兰和立陶宛王国联合社会民主党组织者之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07年、1917～1926年）。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17～192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1922～1926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4～1926年）。

个系统)；把公文往来和书面报表压缩到最低的必要限度；用懂业务而且善于学业务的人取代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官员；领导工作者经常到现场去，到工厂去；把所有的工厂改成所谓的经济核算制，即转入工厂平衡和与托拉斯建立符合定额的相互关系的状态，使工厂的经营者不仅在本厂、托拉斯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大名鼎鼎，而且在社会舆论中大名鼎鼎……

必须立即研究我在此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作出具体切实的决定。必须吸收广泛的经济管理层参与研究这些问题。工业管理领域的节约制度运动应当本着这一精神进行。节约制度运动会给我们节约数千万的资金，带来数亿收入。

No07304

扎波罗热茨致
联共（布）中央的信（摘录）

（1926年8月30日）

为什么共产党现在不重视，确切地说，不制止日益发展的新经济政策的继续增长？这个问题常常不由自主地萦绕在心头。其实……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既定作用，现在是给它送终的时候了，因为合作化可以完全取代这种新经济政策。我觉得，该是最大限度地重视取消新经济政策问题的时候了，因为在苏维埃国家这里，看到不走正门的家伙叫人厌恶，而重要的是，该制止一些人昧着良心诈骗，靠工农的血汗钱生活了……我个人觉得，这种新经济政策对我们苏维埃国家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当然，过去有段时间它是有益的，但是现在是有害的……

共青团员 A.E. 扎波罗热茨

地址：科诺托普边区科留科夫卡区瑙莫夫卡

№11137

齐布特金：亲娘生的和后娘养的^①

(1927年3月12日)

分析一下宪法，一眼就能看出，宪法第9条给城市居民规定的权利多于农民，那里说，工人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权是每25000人出一名代表^②，我作为农民对此感到非常奇怪，我想，这里有亲娘生的和后娘养的之分。我知道，人们会这样回答我：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工人发动了革命，工人肩上担负着革命的重担，因此才给他们更多的代表权。还可以补充说什么，农民在政治修养方面没有工人高，等等。但是我想，虽然工人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农民却完成了它。因为农民对革命的祭坛同样供献了一切：献出了自己的儿子、马匹、粮食和所需要的一切。难道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及全部匪帮，不是由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的游击队赶跑的吗？他们被赶出了我们革命的国家。难道农民在建设自由方面没有出力吗？是的！但是为这些功绩给了他们什么呢？是五分之一的选举权。^③这里有什么城乡结合，这里有什么“面向农村！”的口号，这里根本没有！情况恰恰相反：只有五分之一的面向农村。我的“亲娘生的和后娘养的”文章突出地证明了这是否公道。我知道，人们还会对我说，农民还没有摆脱个人主义的私有观点，农民还远远没有具

① 这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省雅罗斯拉夫斯基县诺尔斯基乡耶夫列莫夫村的农民齐布特金给《农民报》的信。

② 实际上规定的标准是：城市选民每25000人有一名代表。

③ 写信人指的是城市拥有五倍的选举权。

备对生活的社会观点。他们说什么，农民有房子、马、牛，总是考虑他们自己的财产。但是要知道，他们需要这些东西，正像工人为了工作需要机器一样，农民正是用这些来扶植工业，为全国造福。而且，如果把问题再看得深一点，那么，城市居民、工人想有房子、留声机、自行车、衣服。没有一个工人愿意穿农民所穿的那种衣服。请听一听吧：为了买一辆自行车，我卖了一匹马、一辆大车还加上一头牛犊。因此，如果说农民是干个体的，那么，工人在这方面也没有比农民走得远多少，而就我知道的工人来说，他们和农民没有多大差别。何况，工人和农民是一家人，被一条锁链拴在一起。为什么要进行划分，像宪法第9条所规定的那样。因此，我把我的文章“亲娘生的和和后娘养的”提交群众来评判，并请在即将举行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审议这个问题。要知道，现在已经处在十月革命10周年的前夕，农民已经完全成熟，他们完全能够携起手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工人的生活习惯我完全了解，因为我本人当过15年工人。

伊凡·里沃维奇·齐布特金

№11138

鲁索夫就苏维埃职员问题给加里宁的信^①

(1927年3月30日)

寄《农民报》编辑部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

亲爱的加里宁同志：我给您写这封信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不是会出现两个敌对的阶级，在这两个阶级之间是否会进行斗争。第一个阶级是工人和农民，他们都是劳动者阶级。第二个阶级是苏维埃职员，就是那些薪俸优厚，每月拿50卢布甚至更多的人，以及那些也能拿到100和200卢布的人。当然我强调的不是那些拉大车的人同职员之间的斗争，而是同那些在苏维埃政权下，坐在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脖子上养得大腹便便的人的斗争。不用走多远，就在中央地区，例子就能顺手拈来，例子之一就是我们的农民齐斯加科夫，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的乌列尼耶村工作。当他在农村时，他吃的是面包，喝的是水，当他开始在苏维埃机关工作以后，他吃成了大肚子并官僚化了。今年冬天，他来到我们村，甚至在同农民谈话时也态度恶劣。在所有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人，也都变成了这种样子。按照我们农民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容许这种厚颜无耻的人参加管理工作，因为这种人妨碍工作，妨碍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同这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开始，农民开始憎恨那些拿高额薪俸的人。这些人很少工作，正像从山羊身上既挤不出奶，也剪不到毛。应当尽可能削减工资，因为那时苏维埃职员就不会遇

^① 信寄自下诺夫哥罗德省韦特卢加县赫美列夫乡苏汉诺夫村。

到憎恨，那时寄生虫就会少些，那时像齐斯加科夫这样的人的肚子就会小一些，农民的税负也会大大减轻。几乎所有的税都用来维持高额薪俸，这样做，哪能把人民的资金储蓄起来。从降低薪俸节约下来的资金可以全部用于我们的工业。应当这样做，原来拿 100 卢布的，今后不再拿 100，哪怕是拿 75。我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会给我回信或者提交工农进行讨论。

鲁索夫·伊凡·阿尔希波夫

№11139

什巴金就农民的状况致

《农民报》的信^①

(1927年10月14日)

亲爱的同志们！农民现在已经不需要财产，因为他们在革命后已经饿了十年，几乎都在吃谷糠。而那些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却都是脑满肠肥。难怪过去的口号是“打倒穿皮鞋的！”，而现在则是打倒穿麻绳鞋的。不论谁，只要一进入机关，很快就忘记了贫农的生活，我只想说一句话：工人和农民平等博爱万岁！如果你们中有谁说，这是某个坏蛋写的，他不相信这里所写的，那他就不是贫农的朋友，就不是全体劳动农民的朋友。

^① A.A. 什巴金是奥尔洛夫省克鲁克良斯克乡的农民。

№11140

什克里诺夫就农民负担给 《农民报》的信^①

(1928年1月4日)

同志们，首先请你们原谅写了这样一封毫无经验的信，因为它出自我这个过着愚昧生活、双手长满老茧的贫农之手。同志们，我在《农民报》第904/2049号上看到了霍齐耶夫同志的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举例说，好像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比在旧制度下吃得好了，他们不往城里运送白面、食油、肉，这一切都自己吃了。霍齐耶夫同志，你在这里可是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是工人在剥削农民的劳动。不错，农民生产了各种农产品，但是它们落不到农民手里，是工人同志替农民吃了。霍齐耶夫同志要人相信，好像工人的劳动非常廉价，以钉子、白糖为例，说它们卖得太便宜，但是霍齐耶夫同志只是没有注意到农民所需要的布疋，完全没有注意到农民所起的最主要的作用，即国家让农民的劳动所承担的全部重担，因为农民要为每一米缎纹布付出一普特粮食、为一磅白糖付出20磅粮食。工人一生都得到报酬和受到尊重，工人向农民伸出了手，但是他自己却坐在农民的背上。工人同志只看重自己的劳动，却贬低农民的劳动……战前，一俄尺纯棉印花布可以卖20戈比，一普特粮食可卖1卢布90戈比，而霍奇耶夫同志把一切都百分之百地简化了，一点也不问问每件商品的价格。霍齐耶夫同志怀着恻隐之心

^① 寄自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博古斯拉夫村。

大谈贫困，说贫农在旧制下是怎样生活的，说他们买东西很贵，用尽了他们最后的几普特粮食。霍齐耶夫同志，贫农现在又是怎样买东西的呢，他们是合作社的社员，却没有一个完整的股份，他们由于缺钱，还是买不到东西，而富人需要什么，就可以挑选什么，然后才轮到穷人，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股份。霍齐耶夫同志说，战前为使用土地要付多少钱，现在好像便宜了。霍齐耶夫同志，现在农民也不轻松，尽管农民用自己的血汗浇灌了土地，尽管从农民手里把产品全部拿走去供养军队，说是为了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农民什么也没有得到，结果完全是个骗局。主宰土地的是资本，是农场主任，是国土资源，农民又被迫爬到国营农场的牛轭之下去干活，让农民像服劳役那样，一部分给自己干，一部分给国营农场干，你如果不愿意，就取消国土资源的使用，在草地的使用期内付出15卢布。这就是贫农、中农的生活。农民请求最高当局按照战前粮价标准降低商品价格，国家分给农民的土地不是每人两俄亩，而是更多些，从国营农场手里把土地收回来。

请求在《农民报》上给予答复。

A.Φ. 什克里诺夫

附言：请原谅，我写得很不好，因为我文化程度很低，因为贫困才处于愚昧状态。

No 11141

一个贫农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8年1月27日)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还想转达几句话供你们参考。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好，多么自由，也就是说，在苏维埃政权下对工人来说是多么好，多么舒服；这个苏维埃政权是多么平等，多么自由；多么自由，多么平等，我们的苏维埃政权，但是并不完全平等，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政权是平等的，但是人们的生活并不平等，对人的关心也不平等。政权最关心的是工人，也就是那些工厂主，给他们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他们享有真正的自由，他们工作8小时，有时是7小时，其余的时间他们是自由的，可以休息，玩乐，受教育。但是对贫农却很少关心。农民没有短的工作日，没有高的工资，工厂主一天干8小时，叫作工人，农民一天干17小时，却不能叫作工人。工厂主一月拿到60卢布，不用交税，农民一天干17小时活，挣7卢布，还得交税。但是农民非常愿意帮助苏维埃政权，准备全力帮助国家，也就是帮助苏维埃政权，但是政权不让他们发展，不让他们得到解放，不给农民所需要的木材，对农民的粮食规定固定的价格，可是农民买东西却不按固定的价格。农民买一双靴子需要付出15个卢布，也就是要卖掉农民所需的70公斤粮食，而农民不卖粮食是无法弄到钱的，政权不让农民去挣钱，不让他们发展农业，不给他们自由，农民没有自由。有人刚把农业发展

^① 寄自库尔斯克省。

了，就剥夺他的选举权，这就是说政权希望所有的人都过穷日子，不，这算什么自由？需要帮助，需要给农民自由，让他们发展，让他们发家致富，因为农民在养活整个俄国，整个俄国都靠农民来供养，怎么能不给农民自由呢，不过对我们刚刚说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国家需要粮食，从哪儿拿？向农民要，向农民要税，向农民要粮，而农民除了种田得到的收入以外没有别的收入，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想要他们住在不同的集体里，总的说，住在一起，这对农民来说是多么沉重。这样做，你们就是在农民脖子上挂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不自由的情况下生活该是什么样的生活？给农民以自由，让农民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吧，只要谁的头脑在工作，就让他活下去吧。

我希望把我的信在报上登出来，并在库尔斯克的各农民真理报上转载。

寄往莫斯科沃兹得维任卡9号编辑部。但我请求你们把我的信在库尔斯克农民的真理报上登载，恳切请求把我的信在各报转载，而不要只把信登记在册，我相信你们不会这样做，我再次请求你们把信登报。

No11142

谢奇科就发展公共经济给 《汽笛报》的信^①

(1928年7月14日)

专门为农民栏而写。

现在农民的劳动，有的是分散的小农经济，有的是集体经济。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建立集体农庄呢！

我住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那里的粮食过去不够吃，现在也不够吃。可以看到，农民排队在自己的合作社里买烤面包。不相信吗？可笑吗？是的，农民是在排队买烤面包，这是事实！（丹尼洛夫乡普列得捷切夫合作社）现在雅罗斯拉夫的农民生活得再坏不过了——他们真的仅靠牛奶为生（谢天谢地，牛收回来了），否则就完了，就得饿死，因为既没有粮食，也没有土豆，也没有肉。这样贫穷的原因在于小农经济，土地又坏，副业挣钱又很少。现在农民干活，不知道任何关于劳动的法律，他们像服苦役一样，得到的收入只是使他们不至于饿死，他们的劳动成效也很少。如果农民组织成集体农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说，两三个邻近的村庄组织起来，合并成一个集体农庄，选举出一个管理委员会，任命一个掌管农业的主任——事情就会完全不同了。事实已经证明，在大经济中，就像在一切大的事业中一样，干活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单凭这一点，就应该让农民考虑组织集体农庄的问题。集体农庄是根据

^① 阿·伊·谢奇科是北方铁路索奇站（雅罗斯拉夫尔省、丹尼洛夫县）的居民。

合作社的原则组建的，本身是一种合作生产形式，而我却想建议在公共事业原则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农庄，尽管我知道，我的建议将有很多人反对，但是我还是想试着证明这种用公共事业原则管理经济的全部合理性的好处。把邻近的两三个农村（越多越好）联合起来，把现有的所有牲畜、农具及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清点登记，将其全部交给管理委员会，不需要的东西可以清理卖掉，用卖来的钱购买所需要的东西。对于这种组织，众所周知，国家会给以各种贷款并尽力帮助。在这种公共经济（我将这样称呼它）中，工作和生活也应该按照公共事业的原则加以安排，也就是说，每一个成员干委托给他的一定的工作，为他的劳动在组织的仓库里领取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生产出的一切产品也都要交给仓库。组织的管理委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把所有多余的产品交给国家换取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交给某一个经济单位，换取我们国有工业的产品，或者是换钱，或者二者都要，这要根据需要和情况来办。在国家广泛的帮助下，它一定会成为这样的经济，也就是说，只要经营得正确，在不长时期内，即在3~4年内，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它将有自己的农艺师，一切田间工作都将机械化，畜牧业也将得到应有的发展，主要的是，庄员的劳动将成为富有成效的劳动，不需要从天亮干到天黑，不再坐在那里饿肚子，劳动将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就像在我们城市里进行生产一样。

丹尼洛夫斯基 [笔名]

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谢奇科

No11143

乌克兰农民 C.M. 就中农地位给 《农民报》的信

(1928年8月11日)

编辑公民：请把我的信在贵报刊登。我已经第三年订阅贵报，并且一号不拉地认真阅读，注视国家的政策，用我笨拙的头脑思考问题。最高当局也会犯错误，这就是在经济政策方面依靠无产者，依靠农民集团中的贫农，而对中农则不信任，把他们看成动摇分子，可是请看一下，谁在供应城市农产品和原料呢，是中农……

中农是人民群众的供养者。富农是他人劳动的掠夺者，贫农、农村无产者则是懒汉，也是他人劳动的剥削者。富农总是想用欺骗的办法剥削别的劳动者。

无产者躺在那里，什么也不干，总想无耻地享用别人的劳动，还说什么政权是我们的。我们则是能销什么就生产什么……可是政权对无产者每年都尽量给以帮助，他们对这种做法已习以为常，中农看着他们，渐渐地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正如人们常说的，把农业搞好不容易，搞坏则不难，人们指着贫农说：看，他们什么也不干，可生活得比我们并不差，而且还不交税。从报上看，好像贫农上升了，实际情况则相反，请看看我们吉尔吉斯地区的情况，那里的贫农增加了一倍还多。

我们那里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在1921年曾经进行重新分配。按照牲畜和农具把人分成三类：富农、中农和贫农，然后开始分配，贫农分三份，中农分一份半，富农只分半份，大小牲畜这样

分，其他农具和粮食也这样分。

这样做的结果怎样呢？那些分得三份的贫农，一年之后已所剩无几，只剩下一头牛，虽然他们当时分到了近 20 头牛和 20 张犁。而富农在三年之后又要划分，原来怎么分，现在还怎么分。中农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不剥削别人的劳动，因为他们日夜工作，所以中农原先是中农，现在还是中农。

现在在农民中间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少播种点，那样可以不交税，落入 35% 的免税贫农的圈里，现在我们是为他们，为懒汉们干活，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按照统计表上的数字，好像是播种面积扩大了，可是粮食却不够。原因不难找到。我现在和在旧制度下都是中农，我不仅知道每个农民在想什么，而且知道他靠什么活着：过去我们这是一个中农要播种 10 或 12 俄亩，登记的是 6 或 7 俄亩，现在按照 107 条^① 的规定，他们登记的播种面积是不到一犁沟。

我是个乡巴佬，很少见过世面，我觉得，政权在竭力使所有的人都变成无产者和贫农，可是那时国家靠什么来生存呢，如果我们农民只是为自己而生产的话？城市和工人又靠什么生存呢？当然没有城市和工人，农民也无法生活。或者，当遇到天灾或歉收时，如果我们没有存粮，岂不都要饿死，就像苍蝇在冬天会冻死一样。那时国家也救不了我们。

政权或者可以依靠集体农庄，这种东西文件上写得很漂亮，而实际情况并不像写的那样。我对此也有亲身体验。我在集体里待过，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它。今后应当改造懒人。当时也想在农民工作中建立公社，就像工厂一样。并不是每一个懒汉都能改造成新

^①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投机倒把的第 107 条。

人。有这么一件事，一个懒汉套一辆马车套了三个钟头，而他上路不久就翻车了，把车也摔坏了，可是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他比你知道得多，并且要指挥你。

下面是一些中农和我个人对农业税的意见。贫农给3或4俄亩土地，每亩课税5卢布或10卢布，给我们哪怕是5亩、10亩或者50亩，我们每亩交10卢布的税。那时我们中农就会充分供给你们粮食，而且不需要别人的劳动，只需给我们自由和机器，我们将向你们证明，我们不需要你们派农艺师，国家在他们身上白花钱。每一个农民都是当地的庄稼人，他知道怎样使用土地，怎样施肥，这方面他比你们的农艺师强。只是请给中农一点优惠，就是当他们取得成绩时，不要给他们扣上富农的帽子。那时你们的粮食就会多得没处放。暂时写到这里，下次再写。

C.M. 寄自吉尔吉斯自治州、卡拉科尔县

【专题说明】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

(1923年5月至1927年11月)

随着一场社会政治革命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在20年代的过渡时期，这一变化过程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孩子的命名、开办托儿所和学校问题、入党入团问题、恋爱婚姻问题、妇女地位和妇女解放问题、酗酒斗殴和社会治安问题、丧葬问题以至民族语言的使用问题，等等，都提上来日程。这里发表的主要是农民写给《农民报》的反映农村情况的信，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到当时农村生活习俗新旧交替的状况。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屈洪翻译)

№11144

拉祖莫夫给《农民报》的信

(不早于 1923 年 5 月)

为了做安魂祈祷

在我们下诺夫哥罗德省韦特卢加县格鲁斯科夫乡的库列米赫村，在 1921 年饥荒闹得最厉害的时候，5 月份里，农民波洛佐夫的两岁孩子死了。他把孩子的死报告给马卡里耶夫村里的神父伊万牧师，并请他给死者做安魂祈祷，等到秋收时再交付粮食，因为农民从后半个冬天开始几乎是只吃椴树的锯末和一些掺杂物，但神父对这种情况不闻不问。由于没有东西可付，农民提议拿出自己的一张多余的木耙，可神父却说必须拉两个死者，因为这时邻居的一个小孩也死了。农民把两口棺材装上车，上面放着木耙，套上马，也没戴帽子，就拉着死者去安葬了。

№11145

细木工联合会克列敏费格区委会 全体委员为新生儿命名大会记录^①

(1924年1月20日)

拉德琴科同志宣布开会，着重指出庆祝会的意义，同时指出，上述事实是协会进行教育工作的结果，说明广大会员已经意识到宗教仪式的荒谬，这种宗教仪式已经压迫愚弄了工人阶级好几百年。只有伟大的十月革命使工人阶级从资本的压迫下得到解放，才使我们有可能按照我们的良心和理智指示的那样来发现和建设我们的生活。拉德琴科同志宣读了理事会关于以光荣的领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给新生儿命名的决定（Нинел，尼涅尔^②），并说我们保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孩子，希望我们社会的这个新成员将以自己享有我们伟大导师的名字而自豪。

大家一致同意理事会关于给孩子起名 Нинел 并吸收他为全俄细木工协会会员的决定。

拉德琴科同志把协会会员证以及礼品交给新生儿的父母，然后把孩子交给“少年斯巴达克”体育协会^③的代表。

① 这次命名大会是专门为联合会会员工人克拉斯尼克的儿子举行“红色洗礼仪式”召开的。在20年代，苏联开始向宗教仪式发起进攻，由此就产生了“红色”洗礼仪式、结婚仪式、丧葬仪式。党和共青团的书记常常在人民中间以“红色牧师”闻名。1923年在各报上曾展开以“推翻众神节”代替圣诞节问题的讨论，当时还有人建议把1917年10月定为新历法纪元的开始。

② 列宁的俄文是 Ленин，新生儿的名字叫 Нинел，是 Ленин 的字母顺序倒过来。

③ “少年斯巴达克”体育协会是二十年代的儿童团体之一。

奥列斯坦同志以“少年斯巴达克”体育协会的名义宣布吸收新生儿以预备会员（预备期 10 年）的资格加入“少年斯巴达克”体育协会的一个小组，过一段时期以后，“少年斯巴达克”体育协会保证用斯巴达克纲领的精神教育孩子，培养他加入共青团。

共青团市委的代表米赫尔松同志宣布吸收新生儿为共青团预备团员，预备期 14 年，之后，保证使孩子加入光荣的俄国共产党。

奥列斯坦同志代表“少年斯巴达克”体育协会市委给新生儿胸前别上一枚纪念章，上面刻有题词：“学习，锻炼，斗争，团结”他还代表共青团市委给新生儿胸前别上一枚“青年共产国际”的纪念章。

俄国共产党的代表科瓦利同志从共青团代表手中接过新生儿，说，通过上述的共产主义学校（少年斯巴达克和共青团），他将来应当加入俄国共产党的战斗队伍，共产党将让他在为我们心头的理想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中进行锻炼，把他造成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真正卫士。最后，他又在新生儿胸前别上了伊里奇纪念章……

新生儿的父亲克拉斯尼克同志从俄国共产党代表手中接过孩子，保证不仅要教育好新生儿，而且要教育好自己的其他孩子们，一定要用无产阶级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维尔比茨基同志在宣读了理事会关于以伟大的光荣的领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给新生儿命名的决定后说：

——我们，十月革命的一代，在鲜血中，在饥饿中，在贫困中，在同资本主义的狼犬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高举着这面旗帜。你要继续举着它前进，同我们一起斗争和工作……

工人阶级世代代在资本家奴役下工作，6 年以前，在我们俄国，工人阶级抛弃了资本主义的锁链，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工人阶级在其反对世界各国资本家的神圣斗争中的真正领导者，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是共产党。只有在世界共产党的旗帜下，劳动者才能

建设自己美好的新生活。你今后在自己的斗争中要沿着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前进。

你是在全世界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这时德国工人在敌人和叛徒的包围下，正想按照俄国工人的榜样，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他们正在准备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将同德国工人一起进行斗争。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从世界各个角落被赶跑，我们会遭遇艰难困苦和牺牲。我们在它们面前决不后退，我们将通过一切障碍奔向胜利。

新生活的曙光已经在痛苦的大地上出现。让共产主义那光辉灿烂的太阳燃烧吧。我们将通过你来迎接光明的未来，为了它我们将准备不惜一切牺牲。

我们给你命名……

当你的智慧成熟起来，意志坚强起来时，你要读读这几行字，彻底打碎压迫的枷锁。

No11146

伊捷尔斯基就其弟上学问题给

《农民报》的信^①

(1924年2月10日)

请求《农民报》编辑部向我解释一下，这里还有没有真理，从谁那里能找到真理，我该找谁。

我的弟弟在萨拉普尔州叶洛夫区的第一寄宿学校学习。但不知为什么现在把他裁下来了，据说因为他有母亲和我这个哥哥。但是我们的母亲55岁，没有劳动能力，我们还有个妹妹10岁，我们没有任何定居点，我们的情况极其困难，我当雇工今天在这个农民家里干活，明天在另一个农民家里干活，我的健康状况很坏，我在红军中服役时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我没有力量教育和养活弟弟，而弟弟才12岁半，他本来在第4班学习。现在当需要继续学习的时候，他却不能学了。如果让他上一般的学校，每月要交4个金卢布的学费，而在生活还是勉强维持的情况下，又从哪儿弄到这些钱呢。结果又是，谁有钱，谁就能成为有学问的人，而我们的弟弟是穷小子，又得像过去一样，仍然愚昧无知。我在红军中服役，保卫了苏维埃，当我从红军退役回家时，就想到要让弟弟上学，将来不会成为笨蛋，而会成为有知识的人，成为什么都懂的人，可是现在要钱，钱又去哪儿弄呢？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家有业，却也住在寄宿学校，不交学费，为什么不把他们裁下去呢？又是穷孩子孤儿不

^① 寄自乌拉尔省萨拉普尔州叶洛夫区。

能上学，那么工农政权是在保护谁的利益呢？谁有钱，谁就能上学，我的弟弟则被从学校抛出来，又得去靠乞讨为生，因为我和母亲没有力量养活他。他原来夏天和秋天还在寄宿学校干活，冬天则休假。究竟到哪里去寻找真理，难道没有真理吗？

请编辑部不要拒绝我，请刊登此信，因为报纸是维护我们雇农的。

没有任何定居点的雇农 伊捷尔斯基

№11147

切尔诺伊万诺夫就富农逞凶给 《农民报》的信^①

(不早于1924年5月1日)

富农 - 强盗

[1924年]五一节，在索洛科夫卡村发生了村贫农委员会主席被当地富农沙莫法洛夫追打的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富农沙莫法洛夫不顾当时宣布的五一节谁都不要到田间工作的规定，照样到田间去了。村贫农委员会主席知道他的恶劣的本性，到田间去找他时态度非常和好。主席又一次走到他跟前说：“同志，今天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节日，因此请你不要到田间去工作，不要给别人制造借口。”但事与愿违，富农忘记了他是在无产阶级的国家生活，一下就从车上跳下来大叫道：“我不承认你们的节日，因此，你给我滚开，穷光蛋！”为了向贫农委员会出气，他从车上拿了个东西向贫农委员会主席头上拼命打去，贫农委员会主席见势不好，便开始跑，富农就在后面追，幸亏贫农委员会主席腿快，才因此得救。富农在后面喊：“可惜，跑掉了，要不然，我倒要叫你看看今天是什么节日，我决不让你从沟里活着出去，你那时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无产阶级节日。”富农同志们，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生活在什么地方，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你可以拿着棍子随便打贫农，而是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在和平自由的国家里，让你们这些狗熊呆在熊窝里，你

^① 寄自哈尔科夫省索洛科夫卡村。

们应该够满意了，现在需要做有理智有文化的人，抛掉你们的愚昧无知，做一个自由国家的诚实的劳动者，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和平生活，不要有任何提心吊胆，可是你们对我们，对我们贫农委员会，又动手了。注意，还是不要动手，不要流血为好，否则，你们将会更糟糕。我们不会向你们挑衅，我们是有组织的，是团结的……我们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携手并肩为苏维埃工农政权而斗争，如果你们还要动手，那我们就同你们断绝一切关系。

贫农委员会委员

No 11148

女农民诺维科娃的入党申请书^①

(1924年10月28日)

致俄共(布)普鲁德科夫党支部
女公民诺维科娃·别拉格·雅柯夫列夫娜
32岁，离婚
谢格洛夫斯克县^②上托姆斯克乡

申请书

我自愿向普鲁德科夫党支部申请加入俄国共产党，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作好了充分准备。受过中等教育。政治上不够开展。没有任何家产，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完全的无产者。从来没有在法庭受过审。我决定入党，完全是为了感谢使我获得了完全自由的我们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在婚后生活的沉重压迫下度过了10年，我找不到任何出路，害怕一生遭罪，又想，这决不能容许，由于亲爱的伊里奇颁布的法令，妇女可以自由地摆脱丈夫的毒打，可以自由地生活，我下定决心，要把我的一生献给保卫妇女和人民的事业，我要自豪地敞开胸怀走向无产阶级，完成我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训，因为他的名字在我心中永不会死，我将终生记着他的名字为保卫妇女奋

^① 这份入党申请书是诺维科娃寄给《农民报》的。

^② 库兹巴斯的克麦罗沃市的旧称。

斗到底。因此我请求普鲁德科夫党支部给我寄一份入党申请表，我将在上面填上自己的名字诺维科娃。

附上我的地址：泰根区鲍里索夫村苏维埃朗斯克地段。

请勿耽搁。

我入党的口号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放妇女的法令万岁！”

№11149

加宁就命名会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4年11月25日)

我们村里的第一次“十月命名会”

我们的民警卡尔平科同志生了一个儿子，他不想按照旧的牧师的仪式给孩子施洗礼，于是举行了“十月命名会”，这是10月23日在民众文化馆^②举行的。出席命名会的共有2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成年人，甚至还有老头和老太太，他们很想知道：“这是怎样按照新的方式，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式受洗礼的。”当“十月命名会”进行时，听众们还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注意地听讲，全场非常安静，对每个人的讲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同意给新生儿取名“吉姆”。聚会结束后，听众中传出了这样的声音：“阿！小伙子，他们讲的真不错，这些演说家说的对，施洗礼用的圣水盘的确会传染疾病，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什么病都可以流行起来。”我们那里的第一次“十月命名会”就是这样进行的，它对村民有很

① 寄自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省切列帕诺沃县杰里缅科村。

② 民众文化馆是早在革命前的俄国就建立起来的文化教育机构，革命后在农村的某些地方还保留着。后来成立了农民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等等，取代了民众文化馆。

大的影响。^①

斯切潘·安德列耶维奇·加宁

盼刊登！

① “十月命名会”或“红色洗礼”最早是在1922年举行的。可以归入“红色名字”的范围相当广泛，有些甚至是由革命词汇构成的缩语，尽管后来成为习惯从而得到广泛应用的只有一些和传统接近的名字。如“吉姆”，“尼涅尔”，“维廉”，“维莲娜”，“弗拉基连”等等。至于像“十月”，“思想”，“理想”，“新世界”，“世纪”这样一些名字，多半是出于好奇。有很多孩子为了纪念列宁，取名弗拉基米尔，女孩子为了纪念罗莎·卢森堡，取名罗莎。

No 11150

洛巴诺夫就青年生活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5年2月18日)

农村青年

在莫济里州米赫诺维奇村住着一个无产阶级出身的贫农韦列梅耶夫·安德列。每天晚上都有一些姑娘到他家里来聚会，干她们自己高兴的事，她们在这里寻欢作乐，唱无产阶级歌曲——看来，是一些有觉悟的姑娘。每天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些非党的单身汉，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漂亮的、聪明的大男伴，其中有：洛巴诺夫·哈里通和韦列梅耶夫·谢尔盖。但他们都是一些愚昧无知的穷光棍，关于他们简直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他们为了吸引姑娘们对自己的注意，反而先把姑娘从自己身边推开：他们中间的头一个，甚至是个未到应征年龄正在接受普及训练的人，每一次都是他先把灯熄灭，在黑暗的屋子里推姑娘，同时另一个便走到火炉边，弄些炭灰往姑娘们脸上抹，使她们互相认不出来，如果有某个姑娘表示反对，他便使劲推她，使她弄不清都是谁从那个方向推她的。我为什么想请《农民报》把这些人在报上曝光，最后给以严重警告，是因为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什么劝告都不听。

农村通讯员 A. 洛巴诺夫

^① 寄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戈梅利省莫济里州米赫诺维奇村。

№11151

红军战士奥尔洛夫斯基的申请书^①

(1925年3月6日)

我向您申请，如果可能的话，请派我到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因为我想学政治理论，如果不可能，我请求派我到莫斯科支援我们的单位去从事生产，因为我在我的贫穷的小农庄里无法生活，需要寻求帮助，解决日常的吃饭问题。万一哪里都派不出去，那就请把我和我们的骑兵连一起留在红军部队，因为我不想再麻烦你们，请支部考虑我的申请，因为我想不管在哪里总能对我作出安排。

俄国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奥尔洛夫斯基
1925年3月6日

① 红军战士奥尔洛夫斯基是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以意大利无产阶级命名的鄂木斯克第27步兵师独立骑兵连服役。这是他向党支部提出的申请，当时由于1921~1925年进行的军事改革，有近500万人准备复员。第27步兵师当时驻防在维捷布斯克，被称为鄂木斯克师，因该师在东线反对高尔察克的战斗中攻下了鄂木斯克而得名。后来该师调往西线，参加了波苏战争。二十年代初，该师的部队在白俄罗斯领土上参加了肃清反苏暴动的战斗。

No 11152

普里瓦洛夫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5年3月7日)

同酿制白酒作斗争

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在1925年，农民中酿制白酒之风非常盛行。在这一方面，区执行委员会、区委会、民警、村苏维埃三驾马车都积极参加了反对这一行业的斗争。对被捕的公民课以罚款并交付法庭审判。在法庭受审的公民被罚以强迫劳动，同时也实行罚款。现在，如果我们站得高一点看，我们这样进行斗争行吗？我们能用这种方法消灭这种祸害吗？当然，不能。为什么？因为，俄国人民世代代染上了酒瘾。这是第一。第二，不管你怎样惩罚他，不管你怎样对付他，他也只有在受到全面震撼时才能老实起来。只要一被释放，他那上瘾的机体就要求饮酒。他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由于在这一方面他的行动是不自觉的，他毫不考虑酒精对人体有害，会伤害脑子，会削弱体力，最终会使人变得不聪明，甚至会使人丧失理智，喝得过量时还会致人死命。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办，采取什么办法才能消灭烧酒。办法是列宁同志在我们面前提出的三项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只有靠科学的帮助，我们才能消灭这一祸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喝酒的人常常是病人，是不聪明的人，他的孩子会长得不健全，体力衰弱，智力低下，在我们的建设中将不会成为有用之才，那么，我

^① 寄自阿克莫林斯克省科克切塔夫县舒琴斯克乡德米特里耶夫村。

们的中央就应该特别注意，吸引医务工作者来研究酒精的害处。很好，我们开始工作了，开始研究了。可是有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国家为什么要生产俄罗斯烧酒，如果他们知道这确实对我们全体俄罗斯人民有害的话？如果知道，那就不应该生产。”我们回答：“第一，国家参加酿酒业的竞争，第二，可以补充预算。”人们回答我们：“不错，为了补充预算，这是一条很好的办法。”同时可以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尊重这种行业的人们中间的威信。对上面提出的所有问题和答案我要回答如下：当然，我们似乎觉得，我们能从这里得到很大的好处，能参加竞争，能提高苏维埃政权的威信。不对，同志们！我们从这里得到的是可以用于国家周转的千百万卢布的资金，可是我们失去的却是我们千百万人的智慧。在发展烧酒的情况下，我们的农村过去没有繁荣起来，将来也不会繁荣起来。这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问题。如果农村愚昧无知，我们国家的建设也不能有力地开展起来。例如，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甚至很有天才，他们本来能够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作出很大贡献，可是由于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天天泡在酒里，他们也就只能淹没在愚昧的群众中间默默无闻。他不学习，也不愿学习，因为他有专门的职业——酗酒。既然是这样，那也就难免受奴役的统治。富农将会压迫贫农。一切痛苦，一切贫农的需要都将因酒浆蒙住眼睛视而不见。至于竞争，情况则是：一瓶俄国烧酒值1卢布75戈比，1普特粮食值1卢布20戈比，1普特粮食出10瓶烧酒，酒精度约为35，因而在这个部门搞竞争是不合适的。而在尊重这一行业的人们中间享有威信也毫无意义。应该在全世界的独立自主的工人、农民、学者、作家、诗人、画家中间享有威信。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站稳战斗的脚跟，逐步走向社会主义。我已经说过，为了千百万卢布，我们会丧失我们人类的千百万人的智慧。现在人们可以向我提一个问题：“这种智慧对国家有用吗？”当然，每一个人都明白：一个智慧好，

两个更好。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有知识的人，我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会停止不前，我们的工业、运输、技术、农业等都将不断得到发展。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从卖俄国烧酒得来的这千百万招灾惹祸的卢布，而是从自由的、健康的劳动得到的亿万卢布，而烧酒这种东西是违背人类常理的。对这个问题我们的中央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使我们生活在苏联的全体公民对此都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观点。我希望加里宁同志能对我的看法谈谈他的意见。

Ф.И. 普里瓦洛夫

№11153

冈恰连科就离婚问题给《农民报》的信

(1925年3月25日)

最近一些期刊上经常出现一些关于新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结婚的短评。但很少看到关于离婚和同离婚作斗争的文章，而离婚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现象。在西伯利亚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现代农村中离婚的流行病传播得特别厉害。农村中的离婚，主要由男方提出，而且男方主要是党员。这无疑会给党脸上抹黑，在非党群众中引起对新的婚姻的明显嘲笑。在这类离婚事件中主要的事实是，丈夫和自己的妻子已经连续生活了10~12年，由于命运的安排，他被调入了城市，在执行委员会或某一机关工作，这时他发现，妻子由于缺少文化对他已不合适了，他不是去培养她，而是找到了摆脱这个妻子的最容易的方法，这就是离婚，而离婚在现代条件下又非常简单，他在离婚之后就可以再娶一个城市“美女”。旧的妻子常常是甚至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生活，而且是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资料。或者还会常常碰到另一种性质的离婚，例子之一就是阿克莫林斯克省科克切塔夫县“红玫瑰”公社的支部书记列留克同志的多次离婚。他的离婚带有经常性。1921年他同妻子到了公社，很快就同她离了婚，原因是他对她冷淡了，他需要换换“菜”。妻子在这以后不得不带着孩子到另一个公社去。列留克就娶了另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公社社员。过了一段时间，妻子怀孕了，像任何妇女一样在怀孕期间变丑了。看到妻子发生了变化，列留克同志就想起，在乌克兰还住着他的第一个情人，他就想再离婚，于是就往乌克兰寄了一封

信，信中向女方提出求婚，并得到了对方的同意。这时同他一起生活的妻子已生下一个孩子，在生下孩子后马上就得到了离婚的建议。

这种行为和俄共（布）党员的身份是不相称的。周围的居民把公社视为样板，对这种多次离婚是采取申斥态度的。希望在报上阐明一下对党的、科学界的显要工作人员以及读者中的这类现象所采取的态度。

阿克莫林斯克省科克切塔夫县阿康布尔鲁格乡
“红玫瑰”公社社员 冈恰连科·瓦西里·萨维奇

在报上请不要公布我的姓名，因为那样我在公社里就不好待了。

瓦·冈恰连科

№11875

扎伊采夫就尼科利斯克事件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5年4月7日)

尼科利斯克事件

尼科利斯克-伊格罗夫斯克的共青团任何教育工作也不做，只是有时在尼科利斯克的新垦区的集会屋里上演一些简单的戏剧，这个集会屋的面积有28平方俄尺。农村青年对这种演出一点也不感兴趣。此外，在复活节那一周，在尼科利斯克新垦区这里有一个年轻妇女被强奸，甚至还挨了打。强奸是在集会屋里发生的，强奸者中有一个共青团员，叫米特罗辛·彼得。有几个人曾几次……〔字迹不清〕他们一共有7人。第二天上午，尼科利斯克新垦区公民召开全体大会，当受害者申诉昨天所发生的事情时，公民们只是对她进行嘲笑，在他们看来这很有趣，因为她哭，而他们觉得可笑。共青团则把这件事看成合法行为，因为它没有予以重视。可怜的女人只有眼含着泪退出会场。尼科利斯克-伊格罗夫斯克的共青团应该好好清理整顿，使强奸者和酗酒者在共青团中没有立足之地。

外人 [笔名]

^① 寄自巴什共和国巴尔县基耶巴克乡扎伊采沃村。

№11154**古采夫：坚冰已被打破**

(1925年4月15日)

坚冰已被打破。春天的灿烂的阳光已经透过了我们农妇的肮脏的围墙。这里，在我们戈梅利省戈梅利县多布鲁斯乡日古尼村就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一个年轻的农女根据丈夫——村里的一个先进分子的建议，从自己的木房子里的“红角”里摘下了挂在墙上的弗拉基米尔的圣像画像。于是，日古尼村热心宗教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老太太和老头子都纷纷议论，说抛弃圣像，挂上共产党人的肖像不怎么好，你生了孩子，还得带孩子去找“接受忏悔的神父”。他们说什么，你大概不想让孩子成为小淘气鬼。你既得不到“听忏悔的神父，也得不到创造天地的上帝”的宽恕。不信宗教的苏珊诺娃生了个儿子。老太太们的“预言”没有应验。苏珊诺娃没有带着圣餐恭恭敬敬地去找长胡子的神父，而是按新的方式举行了洗礼仪式。那些老太婆们又继续胡说，没有受过洗礼的孩子活不长。但事实相反！好像故意和她们作对似的，吉姆长得非常活泼，健康，没有死。于是，那些老太婆及日古尼村的教会就决定等待苏珊诺娃家总有谁会死。不错，苏珊诺娃的一个儿子死了，但不是那个没受洗礼的，而是那个由长胡子的“村里的绵羊牧师”用自己的“圣水”洗过的孩子。大家想，好吧，洗礼仪式，这也不是新事，马马虎虎算了，可是举行葬礼却不能没有神父。结果事情也不是像热心宗教的人想象的那样。苏珊诺夫·约瑟夫——苏珊诺娃的丈夫来到日古尼村共青团团委会开会的地方，以他妻子和他自己的名义要求举行

红色葬礼。“同意！”——我的那些孩子们高喊。记录上写着：支持村里的新事物的萌芽。用不着找整个支部。快点通过自己的代表找学校商量一下就行了。说办就办。次日就举行了红色葬礼。葬礼举行得很热闹，从打击腐朽透顶的宗教迷信的意义上说收效很大。我们那里一件新旧交替的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苏珊诺娃是一个普通的贫农妇女。

俄国列宁共青团支部书记 И.М. 古采夫

康达柯夫：我在农村所看到和听到的^①

(1925 年夏)

关于村苏维埃

我参加了一次村苏维埃会议，全体成员都是没有胡须的年轻人。他们一下子很难弄清村里的情况和各种关系，不熟习情况也就难以工作，但是他们顽强地克服一切困难，尽管工作开展得很慢，却在不断前进。一个农民进来开证明，使会议中断，他们也不嫌麻烦，开了证明，继续开会。

关于酿私酒和流氓行为

谈到酿私酒，总有点不对头。爱喝酒的村民说：“这是我们惟一的消遣和满足。老是拼命干，拼命干，可是有时总得休息一下，娱乐娱乐。节假日喝喝酒，消除疲劳，心里痛快。而国家酿制的烧酒没劲，家酿酒更有益。”酿制私酒的器具每村都有十来套。农村的钳工制作一套酿私酒的器具，要求付6普特〔看来是谷物〕，这倒可以提高生产。每逢节日，家酿酒像小河水一样流。结果，没有一次游艺会，没有一次青年聚会不闹事，不打架。维杰尼柯夫两兄弟被人开枪打死了，塔拉索夫斯基被人打死了，兹维列夫斯基被人杀死了等等。旧的残余至今没有根除，改正起来非常困难。对于流氓和打架斗殴者必须采取更严厉的行政司法手段，而缓刑、剥夺选举权等等对预防犯罪来说是太轻了。

^① 康达柯夫是工农预科班学生。1925年暑假期间，在维亚特卡省亚兰斯克县尤克苏姆乡科里亚克村进行采访，给《农民报》写了很多报道。

关于文化工作

为了同愚昧无知及其伴侣——酗酒和流氓行为以及其他缺点作斗争，青年中的觉悟分子在支部的帮助下组织起农村阅览室，并在阅览室下面成立了文化教育小组。富农和一些思想落后的老头子千方百计地妨碍小组的工作。他们影响孩子的父母，再让父母去影响孩子。“我们是在放纵孩子参加共产党，善良的人们进天主教堂，你们的狗崽子却干反基督的勾当，在复活节演戏！真是学的好事！嘿、嘿、嘿……！”就这样，在我们这里组织起来的文化教育小组很快就垮了。而教育是需要。在我们村里每一家都有文盲。在12~35岁的人们当中，不识字的就有30人。全村的居民才近200人。邻村的情况也不比这里好。村里的“扫盲协会”^①分会计划要设几个扫盲站，它们在最近期间即将开始工作。

II. 康达柯夫

^① 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同文盲现象作斗争，为了筹建文化教育基金、普及教育、传播图书报刊，在1923年成立了“扫除文盲”协会。协会在各地建立了广泛的扫盲分会和扫盲站，到二十年代末，总数达27000个。

博勃科夫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5年8月18日)

……的确，那个共青团员的处境是没有办法的。一些觉悟低的农村共青团员甚至在比较顺利的情况下也因结婚而退团。例如，库尔斯克省利戈夫县俄国列宁共青团支部的别里茨卡娅的文章说，支部书记谢明·舍尔古诺夫追求一个姑娘。家庭情况迫使他结婚。但是未婚妻不同意按照苏维埃方式结婚。谢明等了好久也没有结婚。后来未婚妻表示同意了，谢明已准备好结婚了。可是未婚妻遭到了家里的攻击，她退却了。谢明也遭到了父亲的攻击：还不快点，宰好的肥猪都要臭了。谢明无奈，只有跑到教堂里结了婚。青年通过这件事害怕加入共青团。女共青团员没有，为什么是这样？农村的共青团员，特别是在夏天，处境很糟。许多共青团的工作脱离农活，从而招致父母的抗议。青年的觉悟还很低，他们看不到入团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他们说：“当团员干什么，非党员倒能更快地通过走后门的办法去学习。”姑娘只在家里干活，永远也入不了团。只在家里干活的团员说：“不能一辈子打光棍。”青年们通过这件事不愿意加入团。列文说得对，这种事情到处都有。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勃科夫

^① 《农民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农村悲剧》的文章中（作者叫列文），谈到一个共青团员因结婚问题退了团。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里发表的是库尔斯克省利戈夫县日加耶夫乡马特耶夫卡村尼·阿·博勃科夫寄给编辑部的就此发表的看法。

№11157

纳乌莫夫为《男人心灵的哀号》一文
给《农民报》的信^①

(不早于1925年12月8日)

我是萨利斯克州齐姆朗斯克区茹科夫村镇的哥萨克，我想对青年农民就他的信说几句话：兄弟，我读了你写的小文章感到吃惊，我想，如果苏维埃政府接受你的哀求，用法律条文把妇女限制在1917年前，也就是革命以前她在我们俄国所处的框框内，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也许会对兄弟你产生一点影响，你自己也会感到吃惊，不再在妇女的权利问题上伤脑筋。兄弟，我举的例子是：在我们哥萨克那里情况是这样，有些事情常常发生。当哥萨克的妻子参加游艺会或宴会时，比如说我或者你这个青年农民去和她跳舞，并按照通常的习惯说：“谁跳舞，谁就要接吻。”于是，大家知道，也许就接了吻。为了这件事尽管很一般，由于忌妒，哥萨克可以把他的妻子打个半死，因为她没有躲开另一个哥萨克的接吻。而她则应该像鱼一样沉默，不能向任何人诉苦，如果她向人诉苦，人们也会对她说：“听从丈夫吧。”或者更简单：“论功行赏嘛。”请看，兄弟，这件事，真使人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可是你，据说，感到吃惊，你妻子要离开，要拿走她应得的一份。我认为，法庭应该考虑，是在什么情况下离的婚，并且应论功行赏，而对于小孩，当然，你作为父亲应该抚养他，否则，也许我

^① 这是纳乌莫夫针对1925年12月8日《农民报》第104号上发表的文章《男人心灵的哀号》而写的。

们光荣的孩子们……以后会溜走的。

红色哥萨克 纳乌莫夫·谢尔盖·季多维奇

№11158

科尔多绍娃就农村旧习俗给 《农民报》的信^①

(1926年3月31日)

旧习俗

在我们叶尔莫洛夫村（梁赞省、斯科平县，斯科平邮政分局、波别金斯克乡），1926年过新年时，农民姑娘们聚在一起算卦。每一个姑娘都倒一杯水，拿着镶嵌宝石的结婚戒子，再用点燃的蜡烛往戒子上滴，滴三滴后，就可以看，看她看到的是冠还是棺。两个姑娘这样算了命。人们拿来圣水，倒在茶杯里，再往水里打个鸡蛋，用毛巾把杯子盖上，毛巾必须是干净的没有用过的。过15分钟，打开杯子看。一个姑娘看到的好像是教堂，第二个姑娘看到的好像是一个瓶子和几根柱子。这就是我们的农村妇女所干的事。

E. A. 科尔多绍娃

^① 寄自梁赞省斯科平县波别金斯克乡叶尔莫洛夫村。

№11159

德维亚科就妇女地位致《农民报》的信

(1926年4月3日)

谁来解放妇女呢？

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区新奥辛诺夫卡村镇，在庆祝红军周年纪念日的公民大会上，有各种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言，这些组织是：村苏维埃、学校、苏联列宁共青团支部……还有红军代表，妇女组织的代表。总之，一切都好，只有一点不好，在会后，一位女教师、妇女组织者说，丈夫们应该把自己的妻子领来参加会议：“你看，她们在你们这里从来不参加会议”。

还有，今年3月召开全村大会，选举参加非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上级有命令，选举的代表要有一半是妇女，可是除了女教师、女共青团员、劳动儿童教养院的代表以外，参加会议的一个妇女也没有。可是妇女代表还是在她们不在场的情况下选了。

德维亚科

№11160

波里舒克就婚姻问题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6年4月3日)

青年在婚姻方面的状况

苏维埃政权在一切方面都很好，就有一点不好：在年轻人的婚姻问题上不好。对妇女太放纵。我现在举几个我自己的例子：由于家里缺少干活的劳动力，我于1925年1月16日结了婚。我当时刚满18岁。娶的是一个24岁的大姑娘。婚后两个月她过得还可以，到第三个月她就开始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晚上干完家务就出去，直到半夜，甚至更晚。你如果说点什么，她马上让你住嘴：“现在是苏维埃政权，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只有和她凑合，可是到第四个月还是不得不离婚。

现在再说1926年，今年2月18日我又和一位离过婚的姑娘结了婚，婚后所发生的情况和上次一样。不论是说服、抚爱、责骂、都无济于事，因为对妇女太放纵了。对这个问题需要颁布一项新的法律，哪怕是稍微收紧一点，使妇女不能这样随便理解苏维埃政权。但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妇女的压迫者，我在村里第一个出来维护妇女的利益，但是我还是建议，对放荡不羁的妇女要管一管。

波里舒克

^① 寄自西伯利亚边疆区巴拉宾斯克州克什托夫斯克区阿苏辛诺村。

№11161

塔林斯基就入团问题给斯大林的信^①

(1926年7月17日)

亲爱的领袖：

我是上乌金斯克市以孙逸仙命名的少先队第25中队的少先队员。我现在向你请求帮助。我知道你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你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因为你的每一分钟都在为建设苏维埃共和国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新生活而工作，但是也许你能抽出几分钟来读读我的信并给我一个答复。我希望不把你当作高不可攀的伟人，而是把你当作我的导师和兄长，甚至可以说是父亲。我现在希望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队伍，而困难的是我现在还缺少一个介绍人，而且我的父亲非常不幸，他曾在某个时期当过商人，就这样在我加入共青团的道路上遇到了这些巨大的障碍，这些障碍需要消除或者越过去。我直说吧，我是想请你当我的介绍人并且支持我。你不了解我，也不了解我的家庭，所以我想以少先队员的直率和坦诚，毫不隐瞒地把我的自传，确切地说，把我的父母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情况扼要地写给你。

我的出身是这样：我祖父，我现在就住在他那里，过去是伊尔库茨克省上乌金斯克县彼特罗夫斯克村的农民。但是有一次在灾年之后，带着全家，其中也有父亲，逃到希洛克车站，在那里开了一个小店铺。1905年以前，一切都平安无事。当这个在俄国革命历

^① 少先队员伊里亚·塔林斯基于1926年7月17日从西伯利亚边疆区上乌金斯克市寄给斯大林。

史上最著名的年份之一到来时，我祖父和我父亲积极参加了斗争。反动回潮时，连年坎普夫将军^①带着讨伐队进入了希洛克村，祖父被逮捕，在一段时间里处于被枪毙的威胁之下，但是由于连年坎普夫将军的疏忽，在亚历山大罗夫三角堡里坐牢的人有幸逃了出来，当时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还没有停息，讨伐队又离开了西伯利亚。我的祖父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不了解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等之间的区别。据他说，他当时就是反对沙皇、宪兵和资产者。我父亲在我祖父被捕期间，逃到了布良斯克的村庄并在那里隐藏起来，后来他被遣送到上乌金斯克，被当作不可靠分子受到警察的暗中监视。1917年革命时期，父亲携全家其中也有我住在特罗伊茨克斯拉夫斯克，他当时在俄罗斯-亚细亚公司的一家商行工作，在红军占领上乌金斯克时，他来到这里，但没有找到工作，便开始经商，确切些说，是帮助我祖父经商，过了一年半，他在阿穆尔找到了工作，现在还在那里工作，他在那里给我往上乌金斯克寄钱。现在我的近中没有一个人经商，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工作，可全部不幸就在于我父亲1902年到1905年、1911年到1915年、1921到1922年曾经经商，并且无法证明自己参加过1905年革命。我在一年半以前参加了少年先锋队，我的工作情况你可以从少先队为我要求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团而写的评语复印件中看到，现在我把这个复印件随信附上。现在我希望加入共青团，我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这上面。我现在有一个介绍人，这就是上乌金斯克少先队区委的主席，我还有少先队的评语。问题是需要两个介绍人，而我费尽力气也没有找到，因为我根本没有认识的党员，而共青团员都是25~24岁，太年轻，我不太满意，所以我决定向你求

^① 连年坎普夫，帕·卡·（1854~1818）——沙俄骑兵将军。1900年参加镇压中国义和团起义。

助，因为你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是永远忠于革命事业的亲爱的领袖，是对人的不幸富有同情心的人，是老布尔什维克，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的战友，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发誓将永不辜负你对我的信任，决不白白地把一个最老的布尔什维克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介绍信递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第18支部。

现在谈谈自己。我15岁半，今年已在中学三年级毕业，我有很好的政治修养，读过辛克莱，杰克·伦敦和我国现代作家赛福林、涅维洛夫、比比克、绥拉菲莫维奇及其他人的小说，还读过俄国和外国文学古典作家的作品，在政治书籍方面，我读过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及你的著作等等。现在我写完了，焦急地等待着你的答复。

永远准备着，并致少先队员的敬礼！

伊里亚·塔林斯基

地址：上乌金斯克市，布里亚特街，19号楼，

伊里亚·塔林斯基收

№11162

科洛索夫斯基就托儿所问题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6年7月30日)

在我们列斯诺村的托儿所里，一个保姆要管25个孩子，托儿所主任干自己的缝衣服的活，就是管管大一点的孩子，她也认为这不是她的事，由于看管得不好，常常发生孩子由二楼楼梯摔下来的事，最后，由于实行节省人员和节省伙食配给量的制度，托儿所成了对孩子来说可怕的事物。那些贫穷的父母，由于家里没吃的，夏天也没有人看孩子，就不得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其余的人当孩子任性不听话时就吓唬他们说：“现在就把你送到托儿所去。”而孩子，尽管只有两岁，也知道待在托儿所里是什么滋味——把你扔在床上或摇篮里，直到晚上，你就哭吧，保姆说：“我没有25双手，能把你们都看管好。”而伙食也不好：早晨给喝茶，有时给白面包，有时给黑面包，12点，喂鱼汤，从12点到6点，什么也没有，如果中午饭剩下点什么，就喂什么，如果什么也没剩，也就这样了。主任说：“家里会喂他们。”她哪里知道；有些穷寡妇家，干活的人只能吃点白面包，其他人连黑面包也不够。需要说一下，除了规定的20戈比外，母亲们还要给每一个孩子每天往托儿所送一瓶奶，一个鸡蛋，一个月送一磅油。按这样算，孩子们应该吃得很好，但是我们的主任每天每个孩子只开销10个戈比，鸡蛋不给吃，也许给自己煮两个吃，油放在那儿，直到有哈喇味，最后扔掉。如果保

^① 发自诺夫哥罗德省楚多夫乡列斯诺村。

姆不提议带孩子到户外玩一玩，主任从来不派她们去，总的说，女公民叶利谢耶娃对托儿所这一事业非常冷淡。母亲们看到这种乱七八糟和管理不善的状况，又把孩子从托儿所接回去，服务人员也都纷纷离去，厨娘在托儿所里干了20天就辞职不干了，洗衣女工也被主任叶利谢耶娃解雇了，因为洗衣女工，一位贫穷的寡妇（农民代表）敢于和主任争论，向主任指出去年托儿所的秩序很好，孩子吃得饱，不像现在饿得哭叫，主任对一切都关怀备至，大家也都懂得，托儿所对我们有益，也没有把孩子从托儿所带回家的事，而现在不行了，特别是在谈话中她不慎用了“你”来称呼主任。

叶利谢耶娃，过去当过女教师（后被撤职），是某将军的养女，她说她是诺夫哥罗德市任命的，根本没有义务向村妇们报告工作，“而且，我并不是她们的女友，她们竟然用‘你’称呼我，而我上学念书，并不是为了让一个肮脏的老太婆对我指手画脚”。当人们劝她多接近一些农民时，她回答说，她知道掌握“某种界限”。

有人把这里的托儿所的不正常的工作情况反映给区执行委员会，上面倒是派了人来、进行了检查，当时托儿所里根本没有孩子，他们看到还干净，床也在，于是就走了。

主任叶利谢耶娃感到，乡执行委员会离这里远，有20俄里，召请才来，来了也是走马观花，所以她认为正是利用这种节约制度来为自己捞好处的时机，更有甚者，她还公然对服务人员们说：“我虚报的不多，弄够路费，我就到诺夫哥罗德去。”农妇们说：“诺夫哥罗德给我们派来了一个贵妇人。”而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看来倒更了解如何保护婴儿，要她们来管理托儿所，会比叶利谢耶娃好得多，叶利谢耶娃怕摸我们的孩子的手，说他们的手脏。

科洛索夫斯基

№11163

普柳斯尼娜：塞尼金托儿所的印象^①

(不早于1926年8月28日)

1926年8月28日，我，塞尼金村苏维埃、乌斯奇-土尔村的女农民普柳斯尼娜·克拉夫季娅，访问了塞尼金的夏季托儿所。当我一走进托儿所，我马上就发现，托儿所里秩序井然，房间里干净，孩子们都很清洁，洗过脸，梳过头，都穿着干净的白内衣，床上也都 very 干净。孩子们盖的都是床单，每个角落都有阿姨照管，阿姨对孩子照管得很好，不叫不嚷，怎么都不会吓着孩子。贮藏室里放的内衣都是熨过的，洗得也很干净，到处是一片清洁。后来我又等到他们开午饭。孩子们吃饭的桌子都铺着白桌布和漆布，午饭端来的有肉片汤，很有油水，还有牛奶黍米粥，土豆泥饼。午饭前，孩子们都先洗手，套上很清洁的围裙，我问孩子们，他们在这里烦闷不烦闷，吃得饱不饱，我的问题都得到了回答，孩子们非常满意，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比在家好。”我还发现，这些托儿所对我们做母亲的来说，在夏天从保护婴儿和儿童健康的角度讲，是一种很大的支持。母亲摆脱对儿童的看护，可以从经济上带来更大的好处。因此，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托儿所。托儿所的主任，看来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事业。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托儿所主任。

克拉夫季娅·普柳斯尼娜对本文签字

^① 乌拉尔省彼尔姆州女农民给《农民报》的信。

托儿所从 1926 年 6 月 9 日工作到 9 月 24 日。入托儿童每天 18 或 19 人。

№11164

霍赫洛夫：“不需要托儿所”^①

(1926年10月18日)

普利沃金斯克村苏维埃下属的委员会从科特拉斯区执行委员会接到了在农村组织托儿所和义务消防队的任务。委员会的委员们出发到各村去进行宣传，但是农夫们坚持己见，说算了：“这对我们不合适，第一，建托儿所需要地方，第二，雇保姆及一般服务人员需要自己花钱，第三，儿童的伙食也要自己提供。而这一切算起来，一夏天要花不少钱。不，这对我们不合适。如果我们自己雇一个保姆，她既能看孩子，又能看炉子，既能喂牲口，又能看家，干这一切活，总共也不过花20个卢布（一个保姆可从旧历6月1号干到10月1号）。

至于购买消防车和组织义务消防队，我们理解，这是好事情，但是没有钱购买消防车，组织消防队也完全不合适。比如说，你组织了消防队，对岸失了火，我们的车和马怎样过去？我们的村子在河对岸，周围全是水，我们就像兔子待在岛上。你往哪儿去，而且事情又是那么紧急。你如果不去，那就糟了，人们会罚你款，还可能把你送交法庭，家里的事又那么忙，我们哪儿有时间去跑法庭。不，请免了吧，不要让我们干这些事吧。”——这就是农民们对委员们的回答。你不管怎么劝说和解释，他们都坚持自己的看法，委

① 霍赫洛夫从北边疆区北德文斯克州科特拉斯区普利沃金斯克村苏维埃阿列克辛诺村发给《农民报》的报道。

员们还想再向他们讲道理，就像旷野呼声一样没人听。

委员会委员、农民 霍赫洛夫

请把这篇短文在报上刊登，农民看到这篇短文，也可能会认识自己的错误。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联列宁共青团普罗库尔斯克团支部书记 霍赫洛夫

№11165

波达波夫就妇女解放问题给

《农民报》的信^①

(1926年11月22日)

尊敬的编辑公民：我在报纸、日历以及其他书籍之类的什么地方读到，好像妇女在受压迫，让群众参加政治不能不让妇女参加政治，因为占人数半数的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双重压迫，她们没有充分的权利，主要是，好像她们成了家庭的奴隶，被最繁琐、最沉重的厨房劳动以及一般的家务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说得对吗？有时同农民们谈起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这种说法不完全对。

第一，她们没有与男人完全平等的权利，没有选举权，应该使男女在权利上完全平等，这一点说得不错。但是第二，这种说法，从根本上说是不正确的，我们农民不同意说妇女好像在受压迫，好像她们成了家庭的奴隶，被最繁琐、最沉重的厨房劳动以及一般的家务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问题是，如果妻子不在厨房做饭，不照看孩子，那么难道让男人自己去做这一切吗？也就是说，男人应当耕田，在院里喂牲口，赶集，干一切农活，或者冬天去干手艺活等等，此外，还应当烤面包，做汤，为全家准备茶水，看孩子，而女人即妻子应当厨房的活什么也不干，只是坐着，应当是这样吗？这样对吗？不只是农民，就拿莫斯科的政治委员来说吧，如果他把自己

^① 寄自从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阿拉第尔县库瓦依村。

己的妻子从厨房调到办公室，而自己下厨房去煎包子、做汤、准备茶水、当保姆，这样对吗？不，不对，这是唆使妇女不干厨房的活。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坐办公室，还需要有人在厨房干活，因为每一个男人并没有坐着，他也经常在干活：有时在地里干活，有时在院里干活，只是不在厨房干活，因此，在厨房干活——煎包子，并不繁重，在家里，承担繁重劳动的更多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关于平等，我要说，妇女应当平等，而在劳动分工上——女人应当在厨房，而不是在办公室。我请求编辑部发表我的信。或者在你们最近一号报纸上对我的信作出答复。我将聆听，对还是不对。

此致敬礼！

农民 伊万·季莫菲耶维奇·波达波夫

No11166

库兹米奇就使用乌克兰语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7年2月15日)

在旧制度和教会权力下，曾用斯拉夫文出版过书籍，甚至还在学校教过人们不懂的斯拉夫语^②。现在在我们这里，在乌克兰的斯大林州也在这样出版书籍、布告、州和区的各种命令等等。有些东西全用人民不懂的乌克兰语。布告贴在区执行委员会和村苏维埃，但并不想让人读，因为它们是用人民不懂的乌克兰文写的。有人骂一声就走掉了，大多数人也对此不满。在村里的大会上宣读命令、指示、布告也是用乌克兰语。人民说：“请用听得懂的俄罗斯语读，我们不需要用匈牙利语（即听不懂的语言）读”。召开过一次有土地测量员参加的大会，开始用乌克兰语读。群众喊，请只用俄语读。由于土地测量员能把用乌克兰语的东西翻译成俄语，人们便开始注意听，因为是用纯粹的俄语讲的，人们听得懂。在村俱乐部里，能从莫斯科订俄文报纸，人们争先恐后地抢着阅读，而乌克兰文的《里亚姜村报》就在旁边放着，没人看。在村俱乐部里还有图书馆，里面有一些俄文书，人们也抢着读，看见乌克兰文的便躲开，大多数人对列宁传等等很感兴趣，但是看得懂的俄文版没有，只有乌克兰文本的^③，可是谁也不想读，就是有谁拿起一本，没有

① 寄自乌克兰苏维埃斯大林州巴甫洛夫区尼科里斯克村。作者科特·费奥凡·库兹米奇显然希腊出身。

② 指教会的斯拉夫语。

③ 俄共（布）十三大规定用民族语言出版列宁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材料。

翻译也看不懂。这是为什么？在村里的大会上也提出过问题，为什么要用人们不懂的乌克兰文写、读、出版书籍等等？虽然我们住在乌克兰，但乌克兰文我们一点也不懂。教师回答说：“党的 13 大决定实施乌克兰化。”^① 人民懂得，既然十三大作出了决定，它的下级机关就应当执行，尽管当权的是大俄罗斯人，纯粹的俄罗斯人，也许还有乌克兰人，但他们讲俄语，不过既然有十三大的决定，当然需要执行和贯彻。但是如果十三大征求人民的意见，尤其是斯大林州和整个顿巴斯人民的意见，问问他们愿意用什么语言，那时十三大就会相信，就是那些正在推行乌克兰化的人也会投票赞成说和写都应该只用俄语。或者从参加十三大的党员中派谁到顿巴斯来，听一听人们是怎样尊重乌克兰语言的，那时十三大就会改变决定。对希腊人来说，完全听不懂。^② 收到一份粮食税的清单，是用乌克兰文印的。目的是让人读，可是读不懂。还有关于保险的文件等等，也读不懂。但是既然是十三大的决定，下级政权也不能改变。因此我请求最高中央权力机关，请加里宁、李可夫、彼得罗夫斯基等领导来听听乌克兰人民的意见，来听听那些不讲乌克兰语，不读乌克兰文，对所讲的和听的都弄不懂的地区的意见，废除十三大关于乌克兰化的决定，因为一些地区不愿意讲乌克兰语。这就是人民要说的话。我请求编辑部把本文在农民报上刊登。

科特·费奥凡·库兹米奇

笔名 N4236/01

请收到信后盼复。

① 俄共（布）十三大的决议中没有这样的决定。有用民族语言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决定。这里显然指的是俄共（布）十二大（1923年4月）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其中有一点说到，必须颁布特殊的法律，保证在所有国家机关以及一切为当地民族居民服务的机关使用民族语言。

② 这里讲的多半是本文作者自己的问题。

№11167

库戈列夫就社会秩序问题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7年2月22日)

莫斯科—布良斯克铁路的谢尔戈—伊万诺沃车站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商业地点，那里有两个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农业信贷合作社，还有“粮食”股份公司的粮食收集站。每天都有大批农民到这里来销售自己的产品，例如，亚麻、亚麻种、燕麦等等。这些东西都很好也很需要，很受当地人的欢迎，这个站上的人在革命年代把一个荒凉的小车站变成了活跃的商贸地点，但是有些东西还很缺乏，有些现象还很糟糕，可以说是美中还有不足。例如，流氓给自己营造了巢穴，对于他们的胡作非为谁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相反，他们的流氓行为好像还有人掩护。有两个民兵，当公民向他们求助时，他们就说：“请安静地去找医士吧，他就住在那里，住在一个砖瓦厂旁边的一间新房子里，他会给你检查，包扎，给你开个身体某处受伤的证明，然后你再到人民法庭去申诉。”

农业合作社收留这些流氓在合作社工作，从而给他们作了坚强支柱，尽管他们多次殴打来这里向合作社卖粮食的农民。

他们打人可以找到很多借口和原因，例如，他们突然向这个或那个要酒喝。公民对此不完全理解，要酒的人遭到拒绝。于是立刻就没了他的好。

据接近合作社的人说，合作社的董事有点怕他们，所以不敢拒

^① 寄自莫斯科布良斯克铁路的谢尔戈—伊万诺沃车站附近的杰利亚托夫卡村。

绝他们在那里工作。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流氓头子萨哈罗夫走进合作社的商店要酒喝，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为他从柜台上拿起秤锤一下子砸到了货架上。

农村通讯员 库戈列夫

请删去姓名

No 11168

工人杜罗夫采夫就社会秩序问题
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7年9月24日)

我想就关于对犯罪分子实行惩罚政策的问题写几句以供讨论。我们的政权是工农政权，由此也给工农带来了许多灾难，如果考虑到存在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无疑99%来自工农。我们的政权伤透脑筋，考虑如何改造走入歧途的同志，为此耗费了许多钱财，做了多少牺牲，可是这些还在继续发生，可惜，犯罪行为越来越多，而且技巧越来越熟练。正在传来，确切地说，已经传来这样的消息，在郊区，一到天黑，就得赶快回家，以免外边穿的衣服被扒去，而邻近城市的乡村，天一黑，就静悄悄的，如果有人回家迟了，他不知神经要受到多大折磨才能到家。集市上全是骗子，他们都是公开地干，你不敢作声，因为可能挨打。总的说来，我们不得不常来，但是这种情况不知何时才能结束。工人不知何时才能在劳动之余自由地到娱乐场所玩一玩，而不必留在家防备小偷进来，因为在我们那里有很多屡教不改的罪犯^②，他们在法庭上掩盖罪行，不说他们有罪应该受审，而说他们有很大一家人需要养活。而法庭审理案件只是图快点结案，或把它们束之高阁，往档案库里一扔了事。一个区里就积有1000件这样的案卷，将来只能付之一炬，因为没有办法清理。我倾向于动员社会舆论，不知各地如何反应？我的建议是

① 寄自坦波夫省科兹洛夫县普利戈罗德乡顿河镇。

② 屡教不改的罪犯一词在二三十年代非常流行。

必须对屡教不改的罪犯实行恐怖手段，只有坟墓才能改造他们。也只有这样，居民才敢报告：某人已有好几年都靠抢劫为生。

瓦西里·米海洛维奇·杜罗夫采夫

№11169

科兹洛夫就阅览室的作用给《农民报》的信^①

(1927年11月10日)

我们农村的愚昧现象为什么消除了？

在离共和国的心脏莫斯科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茂密的森林和峡谷里，坐落着我们荒凉的贫穷的村庄，这就是曼图洛沃乡的沙美洛沃村。乡里和县里的工作者很少光顾它，但农民对此并不抱怨：“的确，我们听不到他们讲话！我们祖辈父辈怎样生活，我们也怎样生活，这就行啦！”确实，我们的沙美洛沃村是一个最没有觉悟的最落后的村庄。村里的生活一切照旧，任何新的、好的、光明的东西都没有。

一个醉鬼，伊万诺夫·亚历山大，在村苏维埃里待了整整三年，他对村里的事情毫不关心，他所干的事就是喝那气味难闻的白酒和睡大觉。大家知道，这样的工作人员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农民本身也酷爱喝酒。他们中很少没有酿酒的工具的，他们亲自酿制那种喝了令人头晕的白酒。青年人过去游手好闲，每天晚上在村里来回闲逛，耍流氓，在手风琴伴奏下唱那些下流的歌曲。每逢节日，作完弥撒，从一大早沙美洛沃村就开始打斗，参加打斗的还有少妇和老头子，他们打斗不是因为有什么仇恨，只不过是打着玩——过节嘛，无事可干，为什么不显示一下自己的力气，互相痛揍一顿。在这种“节日娱乐”之后，有好几个礼拜，年轻人的脸上还有着青一

^① 寄自科斯特罗马省曼图洛沃乡沙美洛沃村。

块、紫一块的伤痕和打肿的眼睛。沙美洛沃村的人在田间干活还是按着旧的方式，瘦弱的马吃力地拉着旧式的木犁。农民浑汗如雨，不断诅咒自己艰难的生活。如果村里遇到什么灾难，比如马或牛病了，他们不是去找兽医，而是去找牧师。给神父带上鸡蛋和鸡，请求给牲口洒上一点“圣水”——也许会好的，于是胖神父走过来，给马洒一点“圣水”，建议主人常到教堂来，不要忘记上帝。但是“圣水”一点也不管用。最后一头母牛也断气了，主人为靠其供奶的母牛的死去悲痛万分。在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巫婆叫基里亚尼哈，她能治百病，并且能说会道。她用嘴向水里一吹，然后在自己周围一喷，在病人身上划个十字，让他喝点水，说：“喝吧，亲爱的，一切都会手到病除的。”基里亚尼哈靠沙美洛沃村的愚昧无知吃饭，愚弄诚实的人民。在我们村过去既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除了小店铺老板法捷季耶夫，谁也不读书。沙美洛沃村民过去只有在教堂里才能听到新闻和娱乐一下，那也是在经商的富农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村民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和无稽之谈。

如果不是有了农村阅览室，我们沙美洛沃村还会照老样子生活下去。现在，过去的那些东西全不见了。现在村里的生活一切都变新了，变好了，代替旧的木犁弄来了全新的铁犁。今后会越来越多。我们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党支部和团支部不欺骗我们，它们竭力向我们农民说清楚，其他地方的人民是怎么生活的，村苏维埃为了使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都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我们沙美洛沃村的村民听了这些，都记在心上。现在我们全村的人都聚在农村阅览室里听报告，进行座谈，每天都能读到各种各样的报纸。上面所写的这一切已经可以说明，我们沙美洛沃村在文化方面不落后了。是谁，不正是苏维埃政权在关心我们吗？它善于组织贫农，竭力把不识字的、只会做饭的农村“老太太”变成能读书认字的、有觉悟的妇女代表。我们沙美洛沃村的青年人都变得认不出来了：不论在

政治方面，还是文化、经济方面，都变得坚强起来了。你为什么这样想？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它们给我们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村没有阅览室，我们沙美洛沃村的人可能至今还像过去那样生活。

科兹洛夫·斯切潘·雅柯夫列维奇

No 11170

梅里尼柯夫给《农民报》的信^①

(摘录) (1927年11月27日)

《农民报》。请看我们村的青年是如何庆祝十月革命节的：他们组织成两个阵营，或者说，两个匪帮进行劫掠。两个匪帮都很大，这里有普通青年，也有退伍的红军战士，于是村庄就开始遭到破坏。两个匪帮中都有小偷，他们什么都能干：碰到老头需要在脖颈上给他一巴掌，就给他一巴掌，再给他一脚将其绊倒，夜里揭开板房的房顶，进去偷，进去抢，为此就大喝俄国烧酒。10月30日，他们聚集起来闯进一个贫农家里，打坏了他的铁锅，用水桶互相往头上打，现在每个人作为奖赏都带有伤，有的伤在脸上，肿块有水果那么大，有的手被刀割伤，有的被橡皮锤打伤。他们这样干，没有谁敢于让他们安静下来。因为他们都是苏维埃政权职员们的最可恶的弟兄。例如，一个是村苏维埃主席的兄弟，一个是区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兄弟。如果你们有可能把这篇文章登出来，那就一定请你们不要把我的名字和父名公布出来，因为这批青年手中有枪，他们常练射击，又有什么他们干不出来，我会因此很容易遭罪的……

梅里尼柯夫·伊万·伊万诺夫

^① 寄自戈梅利省切切尔区鲁德尼亚-巴尔多洛梅耶夫斯卡雅村。

No11171

莫斯科军事检察院关于两名红军战士 酗酒所作的初步调查

(1927年)

初步确认，上面所指控的两个红军战士^①在“国防”日确实严重酗酒，并在博茨马诺沃村干下了一系列流氓活动，如：喝醉酒以后在一座房子的正面楼梯上撒尿，抓住村苏维埃主席的衣领子并想揍他，把该主席的弟弟（1920年的党员）的衬衫撕破（不厉害），并且也要揍他。抓住铁道道口守卫者的肩膀使劲摇晃，并撕破他的衬衫，原因是他不给他们奶喝（他并没有奶牛）。其中一个姓奥夫琴尼柯夫的，撕掉了自己的领章，摘下红军战士的红星扔在泥里践踏。接着又走到在此路过的妇女和姑娘们跟前，说了些种种不体面的话，对红军连法官一起骂。尽管村苏维埃主席、他的弟弟，还有和他们在一起喝酒的克里莫诺夫一再恳求这两位红军战士不要胡来，他们就是谁也不听，继续干他们的，惹来了大批群众（不下80人）前来围观。

奥夫琴尼柯夫和安季平对上述各项指控统统予以否认，只承认他们喝醉了酒。

更详细地进行调查不大可能，因为在证词当中谁也没有指出，他们究竟打了谁，靠近了哪些妇女，撕破了哪件衬衣。

办案员 波普特奇柯夫

^① 指第14步兵连的红军战士安季平·瓦西里和奥夫琴尼柯夫·伊万。

№11172

普霍夫就儿童教育给《农民报》的信^①

(约于1927年)

读《农民报》很少看到关于农村儿童教育的专门文章，而主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农村最需要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农村的儿童，特别是在夏天，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由于农村缺少托儿所，这就迫使母亲们在农忙时把吃奶的婴儿交给5~12岁的孩子照管。显然，这些不懂事的小保姆，他们自己还需要别人照顾，不可能是好保姆。他们放任自流，根本不考虑如何照看自己的小弟弟或小妹妹，他们自己还想玩，何况对他们又毫无监督，更没有明理的人在孩子玩时给予指导，告诉他们哪些游戏对儿童的发育是有趣的和有益的。因此，农村儿童常常玩那些有流氓习气的游戏，主要是打石头仗，唱下流的歌曲，互相骂娘，毁坏花园和菜园。在我们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单独播种豌豆或其他能够生吃的蔬菜如芜菁、胡萝卜、洋大头菜、黄瓜等等。特别是果园受到儿童的侵犯最厉害，他们在果园里摘取还完全青的根本不能吃的果实，毁坏嫩的树苗。最糟糕的是吸烟和饮酒，并常常因此而引起火灾。就这样，坏习气在儿童中间非常流行，人们为此而对这些未来的苏联公民非常担心。而对儿童进行正确的教育并不那么困难，有的地方，两个小村子离得很近，可以把二者合并起来，建立一个儿童运动场，大的村子可以每村建一个。在运动场里老师可以指导孩子们做游戏，只

^① 寄自科斯特罗马省科洛格里夫县马特维耶夫乡巴哈列沃村。

要在礼貌上不出圈，就可以允许他们发挥主动性，在农村有可能到森林中去，到田野里去，这时就可以向孩子们讲解自然现象，植物是怎样生长，怎样吸收养料的，森林对农民对国家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样，孩子们就可能改变过去的坏习气和流氓习惯，对正确的体力劳动产生兴趣，通过对自然的有益的观察，通过做有益的游戏和体育锻炼来发展自己，通过对自然的深入了解来取得有益的知识。采用这种办法，就可以使长期得不到改正的无人过问农村青年一代教育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将看到我们的接班人在身心方面都能健康地成长，他们将无愧于苏联自由公民的称号。

我是农民，一部分时间干自己的农活，另一部分时间作为建筑工人到城里打零工，看到城乡之间儿童教育的差别，我根据自己的亲眼观察写了这篇文章。也许编辑部认为可以在贵报刊登。

《农民报》的长年订户 A.И. 普霍夫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版人：谢曙光

编审人：刘仲亨 陆象淦

发行人：胡鹏光 王菲

编辑主任：程晓燕 许春山

编辑：章若男 陈云卿 徐文渊 周绍珩

封面设计：孙元明

内文设计：范 迎

责任印制：盖永东

编 务：宗 静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关于“托季联盟”（一）（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

专题说明

07932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避免争论致斯大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1926年7月13日）

07933 梅德维捷夫就党内右倾危险问题致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体委员（1926年7月17日）

07934 托洛茨基等13人致中央七月联席全会（1926年7月）

07935 我们为什么投票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就苏维埃改选问题提出的决议案（1926年7月）

07936 关于拉舍维奇等同志的事件的决议草案（1926年7月）

07937 托洛茨基：谈谈施米特同志关于工资的建议（1926年7月）

07938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1926年8月）

07939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委员（1926年8月13日）

07940 反对派声明（1926年8月13日）

07941 拉狄克：关于反对派（1926年8月）

07942 托洛茨基给一名匿名共产党员的信（1926年8月25日）

07943 托洛茨基给拉狄克的信（1926年8月30日）

07944 托洛茨基答 . 尼基京问（1926年9月5日）

07945 托洛茨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926年9月7日)

07946 托洛茨基的便条(1926年9月19日)

07947 托洛茨基:三个标准(1926年9月)

07948 托洛茨基:供宣传用的问题与答复(

1926年9月)

07949 托洛茨基给一位不知名的收信人的信(

1926年9月21日)

07950 托洛茨基:论党的统一(1926年9月)

07951 托洛茨基:就反对派问题答同志们问(

1926年9月)

07952 托洛茨基:关于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

1926年9月)

07954 声明(1926年10月16日)

07955 托洛茨基:关于政治局的决定(1926年

10月16日)

07956 托洛茨基:是否需要争论?(1926年10月

)

07957 托洛茨基:对我国革命的评价及农民问题
(1926年10月29日)

07958 托洛茨基:答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指
责(1926年10月29日)

07959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农业和农民(1926年
11月)

07960 皮达可夫: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草案(1926年
11月)

07961 皮达可夫:对李可夫同志“关于经济状况”
提纲的修改意见(1926年11月)

07962 克尔纳给托洛茨基的信(1926年12月6日)

07963 克尔纳:论一国社会主义(1926年12月初)

07964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会议

上的发言摘录（1926年12月9日）

07965 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1926年12月12日）

07966 托洛茨基：反对派声明（1926年12月13日）

07967 托洛茨基：札记（1926年12月）

07968 季诺维也夫：声明（1926年12月中）

07969 季诺维也夫等三人致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主席团（1926年12月14日）

07970 季诺维也夫：国际局势恶化下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草案）（1927年1月）

07971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1月6日）

07972 季诺维也夫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1月）

07973 托洛茨基：关于《列·托洛茨基全集》第14卷第1册前言（1927年1月8日）

07974 艾森贝格的便条和托洛茨基的批语（1927年1月13日）

18174 托洛茨基：对文章的几点说明（1927年1月14日）

07975 托洛茨基：对外政策的提纲（1927年1月15日）

07976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1927年1月26日）

07977 索恩采夫：当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基础（不晚于1927年1月28日）

07978 托洛茨基致索恩采夫（1927年1月28日）

07979 弗·米·斯米尔诺夫：联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基本建设投资（1927年2月）

07980 托洛茨基：致卡普林斯基同志（1927年2月2日）

- 07981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托洛茨基（1927年2月7日）
- 07982 托洛茨基就注文问题致巴甫洛夫（1927年2月15日）
- 07979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2月16日）
- 07984 托洛茨基：关于注释（1927年2月16日）
- 07985 托洛茨基致中央委员（1927年2月21日）
- 07986 托洛茨基就派遣皮达可夫出国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1927年2月21日）
- 07987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雅罗斯拉夫斯基（1927年2月22日）
- 07988 季诺维也夫致托洛茨基（1927年2月23日）
- 07989 托洛茨基：札记（1927年2月26日）
- 07990 托洛茨基致萨普龙诺夫（1927年3月2日）
- 07993 奥尔忠尼启则就皮达可夫出国事致托洛茨基（1927年3月11日）
- 07994 托洛茨基就哈萨克问题致索柯里尼柯夫（1927年3月11日）
- 07995 托洛茨基：哈萨克斯坦政策中的民族因素（不晚于1927年3月11日）
- 07996 托洛茨基就皮达可夫出国事致奥尔忠尼启则（1927年3月18日）
- 07998 托洛茨基：我们能取得经济独立吗？（1927年3月19~27日）
- 08000 托洛茨基：不肖徒辈（1927年3月）
- 08001 斯米尔诺夫：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总结关于价格政策问题（1927年3月底）
- 08003 托洛茨基：德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问题（1927年4月2日）
- 08004 季诺维也夫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

席团（1927年4月）

08005 托洛茨基：关于农业任务的提纲（1927年4月11日）

08006 托洛茨基就速记记录事致托夫斯图哈（1927年4月14日）

08007 托洛茨基：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1927年4月15日）

08008 托洛茨基：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提纲（1927年4月15日）

08009 托洛茨基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决议草案（1927年4月16日）

08011 托洛茨基致中央书记处（1927年4月18日）

08012 托洛茨基：关于对外政策的提纲（1927年4月19日）

09425 托洛茨基：不要倾倒垃圾！（1927年4月21日）

09426 托洛茨基：提交瓦尔金的意见（1927年4月26日）

09427 斯米尔诺夫：谁在说“高烧胡话”（1927年4月）

09428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通过决议后发表的声明（1927年5月初）

09429 格季耶就治病问题致托洛茨卡娅（1927年5月4日）

09430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5月16日）

09431 托洛茨基：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1927年5月16日）

09433 托洛茨基就提纲事致皮亚特尼茨基（1927年5月18日）

09434 托洛茨基就提纲问题致中央书记处（

1927年5月18日)

09435 托洛茨基就提交提纲致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5月18日)

09436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27年5月25日)

09437 叶夫多基莫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5月25日)

09439 拉狄克:热月危险和反对派(1927年6月)

09440 八十三人声明和我们的任务(1927年6月)

09441 托洛茨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两次发言(1927年6月)

09442 托洛茨基就发言稿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1927年6月4日)

09443 托洛茨基就发言稿的引用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1927年6月9日)

09444 托洛茨基:一个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决议(1927年6月)

09445 托洛茨基的声明(1927年6月)

09448 托洛茨基的札记(1927年6月25日)

09449 给联共(布)中央全体中央委员的信(1927年6月27日)

09451 托洛茨基和叶夫多基莫夫的声明(1927年6月28日)

09452 季诺维也夫就声明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便条(1927年6月28日)

09453 托洛茨基就社论给季诺维也夫的便条(1927年6月28日)

09454 托洛茨基就准备开除反对派一事致奥尔忠尼启则(1927年6月28日)

09455 托洛茨基就发言记录问题致中央监察委员

会秘书处（1927年6月29日）

新经济政策下的城乡“结合”（1924年4月至1928年8月）

专题说明

11127 杰米多夫就农村生活改善给《农民报》的信（1924年4月2日）

11128 比留科夫：首长帮助农村（1924年5月20日）

11129 莫罗佐夫就农民地位给《农民报》的信（1924年6月）

11130 凯楚涅耶夫就城乡结合给《农民报》编辑部的信（1924年11月10日）

07303 扎洛莫夫致前政治苦役犯协会的信（摘录）（1924年12月18日）

11131 叶西波夫：我们的首长是怎样工作的（1924年12月27日）

11132 巴任就农村状况给《农民报》的信（1925年6月13日）

11133 雅罗沃依关于粗暴对待农民的报道（1925年6月27日）

07305 . H . 加里宁致维·米·莫洛托夫（摘录）（1925年11月14日）

11134 斯季哈辽夫就农村状况给《农民报》的信（1925年）

11135 农妇马秀拉就无产阶级专政给《农民报》的信（1925年）

11136 戈戈伊关于工农关系的提问（1926年6月13日）

07306 捷尔任斯基就管理体制问题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的信（摘录）（1926年7月1日）

07304 扎波罗热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摘录）（1926年8月30日）

11137 齐布特金：亲娘生的和后娘养的（1927年3月12日）

11138 鲁索夫就苏维埃职员问题给加里宁的信（1927年3月30日）

11139 什巴金就农民的状况致《农民报》的信（1927年10月14日）

11140 什克里诺夫就农民负担给《农民报》的信（1928年1月4日）

11141 一个贫农给《农民报》的信（1928年1月27日）

11142 谢奇科就发展公共经济给《汽笛报》的信（1928年7月14日）

11143 乌克兰农民C.M.就中农地位给《农民报》的信（1928年8月11日）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1923年5月至1927年11月）

专题说明

11144 拉祖莫夫给《农民报》的信（不早于1923年5月）

11145 细木工联合会克列敏费格区委会全体委员为新生儿命名大会记录（1924年1月20日）

11146 伊捷尔斯基就其弟上学问题给《农民报》的信（1924年2月10日）

11147 切尔诺伊万诺夫就富农逞凶给《农民报》的信（不早于1924年5月1日）

11148 女农民诺维科娃的入党申请书（1924年10月28日）

11149 加宁就命名会给《农民报》的信（1924年11月25日）

11150 洛巴诺夫就青年生活给《农民报》的信（1925年2月18日）

11151 红军战士奥尔洛夫斯基的申请书（1925年

3月6日)

11152 普里瓦洛夫给《农民报》的信(1925年3月7日)

11153 冈恰连科就离婚问题给《农民报》的信(1925年3月25日)

11875 扎伊采夫就尼科利斯克事件给《农民报》的信(1925年4月7日)

11154 古采夫:坚冰已被打破(1925年4月15日)

11155 康达柯夫:我在农村所看到和听到的(1925年夏)

11156 博勃科夫给《农民报》的信(1925年8月18日)

11157 纳乌莫夫为《男人心灵的哀号》一文给《农民报》的信(不早于1925年12月8日)

11158 科尔多绍娃就农村旧习俗给《农民报》的信(1926年3月31日)

11159 德维亚科就妇女地位致《农民报》的信(1926年4月3日)

11160 波里舒克就婚姻问题给《农民报》的信(1926年4月3日)

11161 塔林斯基就入团问题给斯大林的信(1926年7月17日)

11162 科洛索夫斯基就托儿所问题给《农民报》的信(1926年7月30日)

11163 普柳斯尼娜:塞尼金托儿所的印象(不早于1926年8月28日)

11164 霍赫洛夫:“不需要托儿所”(1926年10月18日)

11165 波达波夫就妇女解放问题给《农民报》的信(1926年11月22日)

11166 库兹米奇就使用乌克兰语给《农民报》的

信（1927年2月15日）

11167 库戈列夫就社会秩序问题给《农民报》的信（1927年2月22日）

11168 工人杜罗夫采夫就社会秩序问题给《农民报》的信（1927年9月24日）

11169 科兹洛夫就阅览室的作用给《农民报》的信（1927年11月10日）

11170 梅里尼柯夫给《农民报》的信（摘录）（1927年11月27日）

11171 莫斯科军事检察院关于两名红军战士酗酒所作的初步调查（1927年）

11172 普霍夫就儿童教育给《农民报》的信（约于1927年）

封底